

[文章编号]1009-3729(2014)05-0003-07

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长与发展的 共同点和一致性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的再思考

朱荣英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 共同的时代境遇和时代课题,选择并造就了马克思恩格斯一同成为伟大的时代旗手。青少年时代他们共同的文化氛围、人生理想与思路历程,引出了相同的实践结论并同时完成了思想转变。共同的批判对象、密切的学术合作,彰显了他们相同的革命主张与理论共建。这一切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缔造与发展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凝聚了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共同的心血与智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实践史证明:恩格斯毫无疑问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缔造者与拓展者,他与马克思在共同研究中取得了思想认识的高度一致、浑然一体,任何制造“马恩对立”或者“二人存在原则分歧”的谬论,都注定不能成立。

[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5.001

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在国内外实际上很早就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与普及、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阶级队伍中主导地位的日益加强,一些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出于诋毁、颠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旗帜功能的需要,就开始制造所谓“马恩对立”或者“马克思反对恩格斯”的谬论,这就引起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对二人思想关系问题的申述与辩驳。我国关于二人思想关系问题的研究,从1970年代末开始,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1980年代以前,主要是大量引介有关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的国外新著,集中了一批学者对之进行认真译介与理性梳理,评述时仍然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印记,有力量的反驳与批判尚没有全面展开,但是,一些研究者开始注意到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理论研究侧重点上存在差异,马克思与恩格斯二人因理论

兴趣与专业功底不同,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存在对立的现象;1980年代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国内学者随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马恩关系问题的深入研究,开始对“马恩对立论”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批判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马恩一致论”“二人思想等同论”“内在实质相同论”“存大同而舍小异论”等,吸引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对马恩思想的共同点与一致性问题进行详细论证,这方面的成果不菲;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这十几年来中,研究二人思想关系的问题更加深入而具体,不仅论证了二人思想关系的内在等同方面或者紧密合作情况,而且在各个领域,结合不同的实际情况,开始了二人思想的真正对比性研究,揭示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突出贡献与思想特质,尤其是二人思想的同质性研究,显得更加具体而细微。鉴于尚没有人从马恩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和二人思想背景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本文拟从文本刊布、手稿鉴别、思想源流等各个

[收稿日期]2014-07-12

[基金项目]河南省人文社会科学开放性研究中心资助课题(YH:2010-12)

[作者简介]朱荣英(1963—),男,河南省尉氏县人,河南大学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方面,就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的思想成长、精神交往经历,共同的时代背景、思想境遇、思想转变过程,以及共同的对敌论争和得出的共同实践结论等问题入手,进一步论证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长与发展的共同点和一致性。

一、马恩共同的时代背景、时代课题成就了两位时代旗手及共同的理论体系

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其思想孕育、形成、成熟和发展于自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削制充分展开的时代,这是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从各个民族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伟大时代。时代依据自己向前向上发展的需要,呼唤着最先进、最科学的理论,而此时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说却日趋庸俗和反动,逐渐丧失了其作为时代先导的历史方位与时代旗帜的政治功能。而科学技术与产业革命的胜利推进,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及其基本矛盾的日益尖锐,无产阶级的迅速壮大及其革命运动的波澜壮阔,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多方探索与深层开掘,这一切为马恩应时代所需勇于求解时代课题而成为时代旗手提供了外在条件,也只有这样的时代,才为最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提供了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准备。马恩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时代的指针,他们正是在解决“资本主义向何处去”这一时代课题时脱颖而出的。而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家对时代课题的多方求解所积累下来的思想理论成果,为马恩思想的孕育、成熟与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马恩依据时代所需进行了巨大的理论改造和实践创新,创立了无产阶级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对社会历史责任的强烈感知与担当情怀,对自己的时代课题的深刻理解与洞察预见,他们才科学、透彻地解决了“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无产阶级向何处去”的问题,从而破解了人类历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谜,时代才选择了马恩作为自己时代的伟大旗手。马恩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是欧洲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最高发展,是人类思想文化与社会文明的智慧结晶与实践升华。他们的这些思想,由于对世界的认识深刻而透彻,对推动社会的发展突出而强烈,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广泛而持久,故而是无产阶级观察处理问题的锐利思想武器,是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斗争

中明察秋毫的显微镜、透视镜,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方向盘与助推器。两位时代旗手与实践舵手的思想,可谓是一同得以孕育、形成、创立与发展的,他们的精诚团结、分工合作是在思想认识上高度一致的情况下进行的,除少数个别领域外,二人的思想发展与创造可谓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密不可分。“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友谊是举世无双的。用威廉·李卜克内西的话说,他是马克思的‘第二个自我’”^{[1](P6)}。二人工作上配合得是如此相得益彰、珠联璧合,理论合作的成果是如此彻底严密、相互印证,以至于很难区分一种思想究竟应该属于谁、究竟谁起的作用更大些。其实,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毫无疑问是属于二人共同的思想创造,任何制造“马恩对立”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当时的思想发展史和以后的实践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二、马恩青少年时代有着共同的思想境遇与人生理想

恩格斯1820年出生在德国巴门市,其父是知名商人与虔诚教徒,其母出身书香门第、很有教养,外祖父是语言学家。受家庭浓重文化氛围的熏陶,少年恩格斯就具有了虔诚主义和人文主义两重素养。中学时代的勤奋学习又激发了他反封、资、神的观念和对人民大众疾苦的同情,其中学求学情况及其肄业证书表明,恩格斯在中学学习期间操行优等、成绩突出,特别是他的谦虚真诚、热情奔放的性格引起师生们的重视,他不仅资质很高、志趣高尚而且表现出很强的求知欲望和远大理想,在各方面均取得了可喜进步。在爱北斐特中学的三年中,“包括汉契克校长在内的大多数老师都公认,恩格斯操行优异,真诚热情,资质很高,有独立的思想,理解力很强,善于清楚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1](P35)}。17岁中学尚未毕业的恩格斯就屈从父命而先后到巴门和不莱梅市学习经商,虽中断了学业却为之打开了新视野,因厌倦生意经而大量阅读了文史音。在不莱梅市,他接触了“青年德意志”进步团体,阅读了伯尔尼、海涅等人的文学著述,其反封、资、神的主张赢得了他的思想共鸣,认为这是合乎历史潮流的“时代观念”。1839年恩格斯于该派刊物《德意志电讯报》发表处女作《乌培河谷的来信》,依据其亲身经历痛斥了虔诚主义宗教观对工人心灵的扼杀及野蛮的工厂制度对工人身体的摧残。稍后,受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斯特劳斯《耶稣传》的影响,从“我目前是一个热

心的施特劳斯派了”^{[2](P205)}开始向黑格尔主义转变,感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来就写出了我的心里话”^{[2](P224)}并使自己走上了黑格尔哲学的阳关大道。但像马克思一样,他并没有真正成为彻底的黑格尔信徒,“我当然不会成为像欣里克斯等人那样顽固的黑格尔主义者,但是我应当汲取这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中的主要内容”^{[2](P228)}。这表明,恩格斯青少年时代思想成长的家庭教养、成才环境,以及挥斥时弊、向往民主的志趣和情怀与马克思大致相同。虽然恩格斯没有受完系统教育、没有读大学,“但他才智出众,兴趣广泛,自学成才”^[3]。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深受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影响,既让黑格尔哲学的理性光辉照亮自己的内心世界,又坚强地忠于自己的性格并已然做好了向旧秩序挑战的一切精神准备。可见,马恩二人有着几乎一样的心路历程、思路历程、心灵期盼与人生理想。

三、治学道路上马恩共同的思路历程引出了相同的实践结论

恩格斯1841年回到巴门并于同年9月到次年10月在柏林服兵役,这期间经常旁听柏林大学的课程,与“博士俱乐部”建立联系并成为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为捍卫黑格尔辩证法的自由主义原则,恩格斯奋起批判谢林的“启示哲学”扼杀黑格尔精神的企图,不仅于1841年发表了《谢林论黑格尔》一文,而且1841年出版了《谢林与启示》《谢林——基督哲学家》两本书,尖锐地揭露了谢林维护封、资、神的反动本质,高度评价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把黑格尔比喻成蕴藏丰富宝藏的迷宫,指出只要从其独立而自由的精神原则出发,就能获得强有力的现实结论。恩格斯“尖锐地抨击了谢林对黑格尔的攻击以及所宣扬的非理性主义、蒙昧主义,捍卫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恩格斯的这些著作在当时起到了较大的影响,最终迫使谢林辞去了柏林大学的教职”^[4]。此时恩格斯很重视理性与现实关系的辩证性理解,并通过这种理解引出了实践结论。他说,“迄今为止,任何哲学给自己规定的任务都是要把世界理解为合乎理性的。凡合乎理性的,当然也是必然的;凡属必然的,便应当是现实的或者终究应当成为现实的。这是通向现代哲学的伟大实践结果的桥梁”^[5]。这表明,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都特别重视哲学与生活 and 时代的互相作用,并从理性转化为现实的角度来论证从事实践的必要性,为其日后的科学实践观的形成与发展做了理论铺垫。同时,正

是借助这一点,恩格斯开始认识到黑格尔哲学的时代局限与个性缺失,为此后对其进行超越与批判打下了基础。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转向了黑格尔又辩证地批判了他,与青年黑格尔运动联系密切,但又存在原则分歧,不同意以哲学自身来实现辩证法原则,而认为必须通过政治斗争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正如梅林所说:“他们两人都出身于德意志哲学派别,并且从这种哲学出发,在国外达到了同样的结论。不过,马克思是通过法国革命的研究理解了当代的斗争和要求,而恩格斯则是通过对英国工业的研究做到这一点的。”^[6]

四、马恩都是受当时社会现实和矛盾的影响改变了自己的理论旨趣

恩格斯于1842年11月前往英国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任职,在赴英途中,他访问了科伦的《莱茵报》编辑部,在那里和马克思第一次见面。应该说马恩的第一次会晤对此后二人思想的共同发展意义不大,马克思出于对恩格斯的误会,将之等同于无政府主义者的盟友,“极为冷淡地接待了他”^{[1](P35)},因话不投机故二人没有深谈就不欢而散。在曼彻斯特期间,恩格斯通过对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与社会现实的考察,使自己的哲学思想与政治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开始他对英国人过度重视物质利益不理解,仍然运用德国思维从精神原则出发去剪裁现实,直到后来看到物质利益冲突在社会上的作用很大,才逐步突破了唯心史观的局限,认识到物质利益的冲突是阶级对立党派斗争产生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恩格斯从物质利益是阶级对立的根源出发,认识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与阶级本质,认识到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不可避免性。这一年的下半年,恩格斯给莱茵报撰稿,连续写了《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国内危机》《各个政党的立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谷物法》5篇文章,其观点与马克思极为接近,马克思正是在编审这些文章的过程中,“逐渐感受到了两人思想上的共鸣”。此后历经半年多的书信来往,二人欣喜地发现,“他们通过不同的道路得到了同样的观点与结论”,即经济的发展决定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所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几乎在一切理论方面都达成了共识,于是决心共同努力,把以前分头从事的人类解放事业纳入同一条科学轨道”,恩格斯“把马克思的事当做了自己的事,当做了共同事业的一部

分”。^{[1](P86-87)}这一时期,恩格斯还研究了欧洲主要国家的社会情况和共产主义的各种学说,在1843年10月完成了《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第一次表述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共产主义不是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特殊状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7](P474)}这表明,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大致是在接触社会现实生活、了解关心人民疾苦的过程中,运用黑格尔理性原则到处解释而碰壁后,才开始从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其思想转变的契机,以及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想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理论旨趣,与马克思也大致相同。

五、马恩几乎同时实现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

恩格斯除了社会实践生活的历练之外,其思想成长还经历了辛勤的思维劳作,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清算了自己过去的哲学信仰。马克思曾经说过,恩格斯此时通过另一条道路大致实现了思想的转变。由于恩格斯离开学校过早,更早接触到社会现实与经济问题,对经济因素决定社会发展的作用认识更清楚,其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表明,他是通过政治经济学而实现向唯物史观转变的。马克思对这部“内容丰富而具有独创性的著作”评价很高,认为它不仅非常必要,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天才大纲,而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当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8],其非凡之处在于他的开创性,他从社会主义立场出发,批判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局限及其论证资本主义“天然合理与唯一可能”的伪善与矛盾,是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私有制科学,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垄断、竞争、无政府、经济危机、人民贫困与道德堕落等,都是私有制统治的结果,这必然导致社会革命。这个结论与马克思基本一致。恩格斯犀利的批判方法,也“一定大大地吸引了马克思”,“一定受到了马克思的独特看重”,马克思将之视作可以列入史册的“一部光辉著作”^{[9](P39)}。另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片面性、抽象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强调了人在改造自然界中的能动作用。这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思想基本一样。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英国状况——评马

斯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中,论述了批判宗教的意义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并得出了与马克思大致相同的结论,即“只有彻底克服一切宗教观念,坚决地真诚地复归,不是向‘神’,而是向自己本身复归,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人性、自己的本质”^{[7](P519)},才能真正按照人的方式并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安排周围的世界;无产阶级不是什么无理性的群氓,而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只有他们才有前途,才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这些著作表明,恩格斯与马克思通过各自的探索,同时实现了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根本转变。恩格斯尽管还没有摆脱旧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在一些基本点上,都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适应时代需要,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不但勇于超越前人,更勇于超越自己,不断将自己的理想推向前进,这为二人亲密合作、共同探索与创立新世界观奠定了基础。

六、《莱茵报》时期共同的批判对象显示了马恩理论主张的完全一致

1844年8月,恩格斯在从英国返回德国途中,绕道巴黎与马克思第二次会晤,经过彻夜长谈发现他们的观点完全一致,从此便开始了二人为无产阶级事业亲密合作、共同战斗的光辉历程和始终不渝的伟大友谊。后来恩格斯曾经回忆说:“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10](P232)}他们共同工作的第一个成果,就是合写了批判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论战性著作——《神圣家族》。在该书中他们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指出了青年黑格尔派理论上的谬论,并指出其并不新鲜而是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庸俗化的复活而已,并深刻地揭示了其错误思想的认识论与社会根源及其在实践上的危害。在该书中他们还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提出一系列接近唯物史观的重要思想: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历史说到底是生产方式变革史,而非自我意识发展史,生产劳动是历史发展的基础,是人的真正的类本质,基于此论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他们还用“市民社会”来概括社会关系,深化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分析,指出了阶级斗争、社会革命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分析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与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历史必然

性等。这本著作表明,二人的理论探索已经进一步向新世界观特别是唯物史观接近。青年黑格尔派对封、资、神曾进行过深刻批判,也发挥过进步作用,马恩同属其重要成员,虽然与鲍威尔等人有些思想分歧,但一度还能精诚团结、一同战斗。然而后来随着马恩世界观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而青年黑格尔派则日趋堕落与倒退,在政治上、哲学上抛出了许多荒谬观点,成为比“唯灵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这导致了《莱茵报》时期马恩与他们的分道扬镳并依托《德法年鉴》对之进行公开批判,对青年黑格尔派思想进行了一次总清算,在批判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七、马恩的合著及相关表述证明了二人思想的高度一致

1845年4月恩格斯来到布鲁塞尔与马克思再度会面,二人1845—1846年合作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表明了二人在新世界观探索中发生了质的飞跃,唯物史观的科学结论已经形成。在马克思看来,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精辟的概括,后来与恩格斯一道在布鲁塞尔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并得出了与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得出的一样的结论。于是“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11](P592)}。恩格斯也曾经多次表明,在1845年之前的几年中,马克思与他已经逐渐接近于发现唯物史观,而在1845年春天当他们在布鲁塞尔会面时,马克思“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阐发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并且用明晰的语句向恩格斯说明了。“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形成的世界观了”^{[10](P232)}。《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二人详细制定这种观点、阐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合著。在同旧哲学的关系问题上,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曾经批判过黑格尔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理论实质,对费尔巴哈的思想也曾经有过批评与保留,但总的看来对之的评价过高,甚至存在对之过分迷信的现象,但是到此时二人开始以费尔巴哈哲学作为集中批判的对象,批判了其

人本学及其社会基础,在很多方面超越了费尔巴哈并将自己的哲学体系与他区别开来。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他们公开树立了新唯物主义或者实践唯物主义的旗帜,同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旧哲学划清了界限,实现了以生产关系这一重要的基本范畴为基点,系统地论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与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与人类的解放等基本原理的整体构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及二人在哲学理论及其思维方式上的高度一致。1848年二人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撰写了《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12](P5)}。它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献,是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革命导师共同智慧的结晶、共同劳动的成果,也是二人密切合作而成功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

八、马恩结合革命斗争实际携手对共产主义世界观进行了全面拓展与系统建构

马克思恩格斯在完成了新世界观的创立后,适逢1848年欧洲革命,他们并非如专业学者那样将自己的理论成果“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争取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争取德国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以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10](P233)}。此时的马恩风华正茂、精力充沛,在亲身参加革命实践与智力劳动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工人运动相结合,合作撰写了大量论著,留下了许多精辟的论断与不朽的文献,继续用科学的世界观分析革命形势、发展革命理论、制定革命策略、预见革命前途,这不仅是从思想上引领无产阶级推进历史前进的需要,也是从理论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此后为了反击资产阶级反科学、反理性的唯心主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各种思潮的新挑战,也是为了

进一步深入论证和全面运用科学的世界观,他们在总结科学技术新成果和革命运动经验基础上,大力推进了工人运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他们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理论创造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重要意义进行了全面拓展与系统构建。马克思深入钻研经济学,完成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式的伟大著作——《资本论》的撰写,恩格斯除一段时间投入到《自然辩证法》和军事哲学的研究中外,还写出了《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完成了《资本论》第2、3卷的整理出版,在各个方面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阐述与系统论证而努力,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不断引向深入。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为整理出版《资本论》第2、3卷,恩格斯晚年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克服疾病缠身、党务繁忙等种种困难,冒病情恶化甚至一病不起的危险,对堆积如丘的数千页手稿,夜以继日地清理。面对每一页都有几十处写得不全的句子,每部分都有费揣摩的缩写词,潦草得连作者写过自己都难以辨认的字迹,恩格斯白天口述、夜晚校对,经过再加工、精雕细琢、拓展深化,将自己的心血与亡友的心血交融,铸成了献给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瑰宝。列宁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中写道:“整理这两卷《资本论》,是一件很费力的工作。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说得很对: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12](P58)}

九、马克思主义的创建与发展是马恩二人智慧与心血的共同结晶

晚年的恩格斯为了反击党内机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进攻,为了反击把恩格斯与马克思对立起来的“割裂论”,为了反击将马克思主义弄得面目全非和肆意歪曲的种种伎俩,在一系列通信中发展并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同时这也说明了他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及其在科学理论创立中的合作情况。尽管一些思想恩格斯很早就形成了,但考虑到马克思也有同样的思想且向他清晰地做了说明,因而恩格斯还是谦虚地说,“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11](P9)}但实际情况是,“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的《英

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11](P14)};恩格斯还说过“这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马克思作出而我只能说参加了很少一部分工作”这样的话,这仅仅是指“史学方面引起变革的发现”^{[10](P232)}这一点来说的,并非就马克思主义完整学说的缔造而言的,就其整个学说的缔造与发来看,毋庸置疑,是二人智慧与心血的共同结晶,马恩一道为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恩格斯说:“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13]他还说:“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时期,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很容易地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14]恩格斯的上述说明,并不意味着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创立与发展所起的作用真的就是微乎其微、无关紧要的,事实上,这恰恰反映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恩格斯,具有非常高贵的谦虚品质和博大胸襟。这些说明也不能成为抹杀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中做出的杰出贡献、发挥的伟大作用的依据,更不能成为诋毁恩格斯或者制造马恩对立的口实。易言之,马克思主义的创建与发展,马克思的确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这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一个人的事情,恩格斯也同样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两位伟大的导师长时间相处在一起,“在相互的观点交流和彼此的思想启发中产生的思想共鸣,是任何其他的愉悦都不能取代的”^{[1](P94)}。不仅马克思的理论研究、革命活动与恩格斯的大力支持、直接参与是紧密相连的,而且正是因为恩格斯的思想创建与理论影响才使得马克思不断修正了自己早年的一些错误主张,并在二人思想见地高度一致、思维深度与方式完全等同的情况下,经过多年艰苦的探索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二人思想的高度“合而为一”,除了在二人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二人共同签名的很多通信与短文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以后的独立作品中也将这种做法

贯彻始终。^{[9](P53)}在《反杜林论》付印之前,恩格斯曾把全部原稿念给马克思听,而且说正是因为得到了马克思的“知识”与支持才使之得以实现。在同杜林的论战中,“马克思和我的观点”贯穿了广泛的理论领域,“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15](P11)}他们在很多领域从事的共同研究,是在共同的世界观高度上进行的,“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和历史观的人”^{[15](P13)}。这一点是最基本的学术共识,中外学界有良知的学术同仁对此绝无异议。但是,到了20世纪中后期,在西方出现了贬低恩格斯的思潮,他们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谎言,歪曲和反对恩格斯晚期的著作,抹杀恩格斯的理论贡献,从而试图通过否定恩格斯来颠覆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股思潮在我国也有反映,在学术界时不时就有人抛出各种奇谈怪论:认为马恩的意见分歧不是在细节上而是在实质上,其思想差别表明了二人思想原则上不一致,恩格斯不能在理论高度上与马克思相提并论,恩格斯晚年篡改与背叛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等。^{[9](P53)}有鉴于此,正确阐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捍卫恩格斯的思想成果与历史意义,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一项严肃任务。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的一个初衷。

[参 考 文 献]

[1] 陈林. 恩格斯传[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3] 冯契. 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程[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0.
- [4] 庄福龄. 简明马克思主义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7.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44.
- [6] [德]弗·梅林. 马克思传[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22-123.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1.
- [9] [美]特雷尔·卡弗. 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M]. 姜海波,王贵贤,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 列宁. 论马克思主义[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5.
- [1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2.
- [1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4)05-0010-06

从康德到海德格尔之形而上学追寻

董鹏¹, 陈明梁²

(1. 卡莱(梅州)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计划部, 广东 梅州 514759;

2. 中山大学 逻辑与认知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海德格尔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阐释为形而上学的一次奠基活动, 由此将康德为形而上学奠定的基础归结为先验想象力。但是, 康德由先验想象力到“统觉”的退缩和未能阐明认识有限性的存在论后果, 显示了这一奠基的不牢靠性。由此, 海德格尔从此在的生存论建构出发, 实现了形而上学奠基的置换——基础存在论。基础存在论为形而上学奠基的关键在于具体澄清了作为时间性的“操心”。海德格尔通过源初时间性建构起操心之结构的整体性, 从而完成了其在形而上学的奠基。海德格尔所奠基的这一形而上学扭转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致思取向, 将哲学的使命规定为对人的“实际生命”的关涉。

[关键词] 康德; 海德格尔; 纯粹理性批判; 基础存在论; 时间性; 形而上学

[中图分类号] B516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4.05.002

如何看待康德哲学, 尤其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成了当代欧陆哲学争论的一个焦点性问题。新康德主义倾向于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看做一种“数学—自然科学的知识理论”, 从而进一步把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转向”视为一场认识论的革命。然而, 海德格尔从其存在论的视域, 以对“基础存在论”的解读来对抗新康德主义者所作的认识论阐释。海德格尔式的康德解释引发了一场持久性的哲学论争。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等人针对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提出了各种批评, 卡西尔甚至还这样评论道: “海德格尔在这里已不再作为一个注释家在说话, 而是作为一个篡夺者。他仿佛是在运用武力入侵康德的思想体系, 以便使之屈服, 使之服务于他自己的问题。”^[1] 这样, 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就被扣上了一顶所谓的“强暴性的阐释”的帽子。在这场激烈的思想交锋中, 海德格尔坚持“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阐释成形而上学的一次奠基活动”^[2](P229)。根据海德格尔的论证, 这项任务恰恰是依康德的意思而提出, 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对《纯粹

理性批判》所蕴藏的真实任务的一次阐明。

其实, 从康德的《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这一书名中, 我们就可以看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目的就是为未来的科学的形而上学进行奠基。正如《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所述, 康德写作此书的时候, 形而上学正在走向衰退, “今天, 时代的时髦风气导致她明显地遭到完全的鄙视”^[3](P49)。因此, 康德批判形而上学, 目的不在于嘲笑, 而是为了重建。那么, 现在我们要做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工作便是: 康德通过“纯粹理性批判”如何奠基了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批判康德的形而上学奠基。“海德格尔如何从康德本身的思想推导出另一个天地来?”^[4] 通过海德格尔对康德形而上学奠基的批判, 探讨形而上学的当代形态与未来走向, 是研究海德格尔对康德“强暴性阐释”的主旨所在。

一、海德格尔奠基形而上学的立场

海德格尔对康德的所谓“强暴性阐释”植根于

[收稿日期] 2014-07-30

[作者简介] 董鹏(1980—), 男, 陕西省安康市人, 卡莱(梅州)橡胶制品有限公司战略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西方哲学史; 陈明梁(1979—), 男, 浙江省绍兴市人, 中山大学在站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 西方逻辑思想史。

其哲学立场。“存在”问题是海德格尔运思之路的核心问题。海德格尔指出:“存在是哲学真正的和惟一的主题。这不是我们的杜撰,这一主题设置活跃在古代哲学的起始阶段,并且在黑格尔逻辑学中达到了最辉煌的结果。现在我们只是主张,存在才是哲学真正的和惟一的主题。用否定的方式说:哲学不是关于存在者的科学,而是关于存在的科学或者(正如希腊语所表述的)存在论。”^{[5](P12)}从海德格尔的观点来看,“存在”乃是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始终不变的主题。但是,从柏拉图一直延续到黑格尔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就其实质而言不是关于“存在”的研究,而是关于“存在者”的科学。“从哲学开端以来,并且凭借于这一开端,存在者之存在就把自身显示为根据……作为根据,存在把存在者带入其当下在场。”^{[6](P68)}传统形而上学之所以是“存在者的科学”,就是因为它是“对‘存在者之为存在’的根据的探讨,从而将‘存在’实体化为‘存在者’了。正是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指出‘存在’问题被传统形而上学遮蔽了,并且宣称要解除‘存在’问题的‘千年之蔽’。海德格尔‘存在的遗忘’并不是说传统形而上学遗忘了‘存在’问题,而是意味着传统形而上学没能寻找解决‘存在’问题的正确路径。在形而上学的这种际遇之下,海德格尔必须要拯救它,而这项工作的展开始于为‘形而上学奠基’。

何谓“奠基”?“奠基”原本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概念。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对“奠基”作了一个形式上的定义:“如果一个 α 本身本质规律性地只能在一个与 μ 相联结的广泛统一之中存在,那么我们就说,‘一个 α 本身需要由一个 μ 来奠基’,或者也可以说,‘一个 α 本身需要由一个 μ 来补充’。”^{[7](P302)}“奠基”或“奠基关系”的概念在胡塞尔的意识分析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现象学的意向分析的诸多结果最终都可回归为在意向体验的“奠基关系”方面所获得的本质认识。就此而言,“奠基”意味着,被奠基的构成物如果不回溯到奠基性的构成物上就无法自身被给予。“每一个内容与每一个内容都通过奠基而相互联系,无论这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联系。”^{[8](P210)}这就是胡塞尔所谓的“奠基统一”。借此,他阐明认识和认识对象之本质,其目的是把哲学建成严格的科学,为形而上学奠定一个明证性的根基。

但是,海德格尔的“奠基”思路根本不同于胡塞尔的。胡塞尔仍然囿于传统主体性哲学的认识论问题,而海德格尔的哲学则是存在论的,奠基于对生命

本身的阐释和领会。海德格尔指出:“形而上学虽然不是什么现成的就在那里的建筑物,但却作为‘自然天性’实际存在在所有的人那里。因此,形而上学之奠基或许就可以叫作:为这一自然的形而上学置入一个基础,或者更确切地说,用一个新基础替换掉那旧有的……形而上学奠基,却绝不是对某个体系及其内层的空洞建造,而是对形而上学之内在可能性所进行的建筑术意义上的划界与标明,这也就是说,去具体地规定形而上学的本质。但是,所有的本质规定性却只有在首先对本质根据进行发掘中才可以达到。”^{[9](P107)}在这里,海德格尔的“奠基”具有双重含义:奠基不仅为形而上学提供新的基础,而且这个新基础将决定形而上学本身的重建。海德格尔所寻找的这个基础是以往一切形而上学赖以立身而又不能达到的那个基础,并且,通过此奠基能够扬弃和清除传统哲学的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由此可见,海德格尔力图从更为本原的视野出发来为形而上学的大厦寻找一个坚实的地基。这一地基不仅是对形而上学的奠基,并且还规定了形而上学的重建形态。

因此,“奠基”的问题,实际上关涉到对形而上学本身理解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奠基就会有什么样的形而上学,有什么样的形而上学就会需要什么样的奠基。在《康德书》中,海德格尔详细地剖析了传统的“形而上学”概念。作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既是存在物本身的知识,又是存在物的最高级的类域的知识,存在物的整体从这一最高类域来得到规定。因此,“形而上学乃是对存在物本身和存在物整体的根本性知识”^{[10](P374)}。海德格尔将这一概念称为“形而上学的学院概念”,并认为主要有两个动因决定形而上学学院概念的形成:第一个动因涉及到形而上学的内容划分。这源于基督教的世界观念。在基督教的世界观念中,上帝作为造物主处于最高的位置,一切非神的存在物都是被造物,而在被造物中,人又拥有卓绝的地位。如此,存在物整体就可以划分为上帝、自然和人,相应的研究领域也就被划分为神学、宇宙学和心理学,这些领域就组成了特殊形而上学;与特殊形而上学相区别,一般形而上学(存在论)就以一般存在物为对象。另一个根本动因在于其认知方式和方法。形而上学将普遍的存在物与最高的存在物视为其对象,形而上学就成为具有最高荣耀的科学,成为了“科学中的女王”。因此之故,形而上学的认知方式也就必须是最严格的,必须具有绝对的约束力。数学的知识正好契合了形而

上学的这一知识理想。数学知识,因为其独立于偶然的经验,乃是最高意义上的、理性的和先天的知识,这就是说,它是纯粹理性知识。这样,关于一般存在物的知识(一般形而上学)和追求存在物的诸主要领域的知识(特殊形而上学)就成了“出自纯粹理性的科学”。海德格尔认为,“康德坚守这一形而上学的意图,进而还在特殊的形而上学中把这一意图强化,康德将之称为‘本真的形而上学’‘终极目的形而上学’”^{[2](P230)}。

正是在为形而上学“奠基”的路上,海德格尔遇到了康德。海德格尔发现: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康德对“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发问,第一次使存在论从根本上成了疑难。康德将存在论的可能性之疑难归结为这样的问题: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对这一提问方式的阐释力求说明,为形而上学的奠基是作为对纯粹理性的批判来进行的。正是由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奠基工作才得以开端。这也就是康德哲学尤其是《纯粹理性批判》所具有的重要的哲学史意义。

二、先验想象力与康德的形而上学奠基

正是基于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是形而上学奠基而非单纯认识论的理解,海德格尔指出,当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讨论时,这并不是其目的本身,毋宁说,康德是要从对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思考中获得对人的生存本质的洞察。“我们对于康德的真正理解只能从按其本质就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开始,即从关于存在的理论或存在论开始。”^{[3](P71)}因此,康德所揭示的人的认识的有限性正是人的存在之有限性的集中体现。

在康德看来,“形而上学即使不是现实地作为科学,但却是现实地作为自然倾向而存在。因为人类理性并非单纯由博学的虚荣心所推动,而是由自己的需要所驱动而不停顿地前进到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是通过理性的经验运用、也不是通过由此借来的原则所能回答的,因此在一切人类中,只要他们的理性扩展到了思辨的地步,则任何时代都现实地存在过、并将永远存在某种形而上学”^{[5](P12)}。当康德如此界定形而上学的时候,就决定了其对形而上学的奠基只能是在理性领域的认识论奠基。“形而上学至少就其目的而言是由纯粹先天综合命题所构成的。”^{[10](P375)}针对怀疑论的挑战,康德要为理性的合法性地位进行辩护,即对象以我

们的认知为准。这样,哲学意义上的知识问题就不再是认识符合对象,而是对象符合认识,以保证知识的可靠性和必然性,这就是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面对独断论,他提出必须限制理性的僭越,为理性划界,即人的认识只能达到现象界,而永远不可能达到“物自体”,这就是康德式的“不可知论”。“‘理性’要走出‘独断’的阴影,而又要保持自己的‘权力’”^{[3](P72)},这就是康德在哲学中要做的主要工作——“纯粹理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构成了康德的形而上学奠基路径。

海德格尔指出,在康德那里知识一般首先是直观,“一种知识不论以何种方式和通过什么手段与对象发生关系,它借以和对象发生直接关系、并且一切思维作为手段以之为目的的,还是直观”^[4]。康德站在批判的知识论立场上指出,上帝、神作为原始的存在者,其直观属于创造性的直观或者理智直观,即他在直观中不受制于任何思想而能直接创造出他的对象,此种神秘的认识方式对于作为存在者的人来说是不能想象的。因为人的直观按其本性来说只能是接受性的,这种直观不能创造它的对象,只能接受向它显示的对象,属于派生性的直观。这种直观“不是本源的,就是说,不是这样一种本身就使直观的客体之存有被给予出来的直观方式,而是一种依赖于客体的存有、因而只有通过主体的表象能力为客体所刺激才有可能的直观方式”^{[5](P12)}。人类的全部认识始于直观,有限的直观给定了我们认识的视界,这首先表明了人类认识的有限性本质。海德格尔指出,康德从一开始就强调知识的有限性,即知识只有在有限的意义上才是可能的。

从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出发,康德承认知识始于经验,我们没有先于经验的知识。但是,源于经验、始于直观的知识又如何获得普遍必然性呢?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康德的论证思路是这样的:有限知识的发源地就确定于“心灵的两个基源”——人类自身先验所具有的感性和知性,通过前者对象被给予,通过后者对象被思维,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源头的这种双重性又如何联结起来使知识成为可能的?“提供时空观念的感性形式”和“提供判断形式的知性范畴”并不是“单纯的比肩并列”,相反,只有在这种由其结构所规定的两者合一即“综合”中,某种有限的知识才会达到其本质性的存在。这一“综合”必发自某种“共同之根”。海德格尔根据《纯粹理性批判》第1版得出结论说,这一“共同之根”乃是先验的想象力。在这个层面上,海德格尔借康德之口

赋予先验想象力以结构性和实质性的本原地位：“一般综合只不过是想像力的结果，即灵魂的一种盲目的、尽管是不可缺少的机能的结果，没有它，我们就绝对不会有知识，但我们很少哪怕有一次意识到它。”^{[2](P230)}正是立足于此，康德通过“先天综合判断”使知识获得了严格的普遍性和必然性。

对此，海德格尔说道：“在我看来，重要的地方在于指出，在此作为科学理论而被提出的东西对康德来说并不重要。康德并不想给出任何自然科学的理论，而是要指出形而上学的疑难索问，更确切地说是存在论的疑难索问。将《纯粹理性批判》中这一具有积极性的主要部分的核心内容，以正面的方式植入到存在论之中。”^{[2](P231)}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通过哲学史上的这一“哥白尼式革命”探求的正是存在论的根源问题。因为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正蕴含着这样的思想：在知识中已包含有对“存在者之存在”的先行领会。这种先行领会即是理性对自然的“预先拟订的计划”，它先在地决定了存在者的存在。康德认为，“理性只会看出它自己根据自己的策划所产生的东西，它必须带着自己按照不变的法则进行判断的原理走在前面，强迫自然回答它的问题，却决不只是仿佛让自然用襟带牵引而行”；“理性必须一手执着自己的原则，另一手执着它按照这些原则设想出来的试验，而走向自然”^{[3](P73)}。对存在的先行领会在康德的意义上，就是理性对自然“预先拟定的计划”，就是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主体性原则。正是对存在的先行领会即存在论的知识，使得关于存在者的知识得以可能。“形而上学的奠基在整体上就叫存在论的内在可能性的开显。这就是在康德‘哥白尼式的转向’的标题下总被误解的东西的真实意义，而它之所以是真正的，因为它是形而上学的。”^{[5](P12)}因此海德格尔说，《纯粹理性批判》一开始就不仅仅是知识论的而是存在论的。

在康德的形而上学奠基中，先验的客观的知识从根源上讲就是由“先验的想象力”这种唯一的根本能力保证的。“康德的形而上学奠基追问的是存在论知识的本质统一之内在可能性的基础问题。康德奠基的基础就是超越论的想象力。超越论的想象力，完全不同于作为开端的心灵的两个基源（感性和知性），它作为居间能力脱颖而出。”^{[3](P74)}在第一批判中，想象力是一种盲目的遵循规则的综合，在认识理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先验想象力要解决的问题是直观与概念的结合问题，这个问题既是说明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关键，也是服务于证明先天

知识的先验演绎的。先验想象力是直观与概念的“共同之根”。因此，它在康德进行形而上学奠基的过程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而海德格尔认为，先验的想象力这种可能性正是得益于源初的时间。“那源初起统合作用的东西，那似乎仅仅是中介性的超越论想象力的居间能力，无非就是源生性的时间。惟有借助于这种在时间中的扎根，超越想象力之一般才能够成为超越之根柢。”^{[6](P69)}因此，源初性的时间使得先验想象力成为可能。

先验想象力与时间的关系或者说“时间”概念是海德格尔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进行解读的关键所在。也正是以源初的时间性为依据，海德格尔深刻地区分了康德的“自我”与笛卡尔的“我思”。“然而，在康德那里，时间的这种必然的核心功能最先总是仅仅作为一切表象的普遍形式来表现宣示和介绍的。但关键的地方仍然在于，这是在什么样的关联情景下发生的？”^{[3](P75)}康德仅仅把“时间”看作是感性直观的形式，意即海德格尔所指出的“表象的普遍形式”。正是在此，海德格尔找到了其存在论研究的切入点。海德格尔对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既非卡西尔所说的是“粗暴的侵占”和“篡改”，也非单单为了争得康德研究的学术荣誉。海德格尔明确表示，他是要从康德文本已说的东西中揭示出康德本人想说而尚未说出的东西。

三、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奠基与形而上学的未来

海德格尔指出，康德的先验想象力作为根本能力是通过所谓的“图型化”过程实现的。“图型”是概念与直观的结合，是使经验知识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桥梁。而概念与直观的综合正是在时间性中进行的。“只有当时间状态成问题之处已经确定的时候，才能成功地引进光线来照亮图型说的晦暗之处。”^{[5](P13)}海德格尔所关注的，正是时间在“先验的想象力”的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先验的想象力通过其综合功能，构造了现在、过去和未来三个维度，也即创造了时间。先验的想象力作为自我的中心，使自我获得了统一性。海德格尔将康德的自我与时间性联结在一起，对柏拉图式的、笛卡尔式的主体主义哲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海德格尔指责笛卡尔的“我思”只是一个先行的设置，而实际上“只有规定了我的存在，才能够把捉我思的存在方式”。相对于笛卡尔封闭的“我思”概念而言，康德的“自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当康德把时间作为

“自我”的基本结构时,他至少意识到了时间问题的重要性。就此,海德格尔高度评价了康德:“曾经向时间性这一度探索了一程的第一人与唯一一人,或者说,曾经让自己被现象本身所迫而走到这条道路上的第一人与唯一一人,是康德。”^{[10](P375)}

但是,康德不仅没有进一步探索先验想象力所植根的源初时间性,反而将先验想象力退回到了“统觉”。在《纯粹理性批判》第1版中,康德认为,先验想象力比“统觉”更本原、也更先在,是人的本质的更充分的表达。但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中将先验想象力已取得的独立和突出的地位取消了,并使之作为低一级的能力隶属于“统觉”。原因可能在于康德所确立的先验想象力的中心地位,违背了自笛卡尔以来的西方哲学强调主体性认知能力的强大传统,面对传统主体哲学的这一威胁,他不得不选择“退缩”;另外,康德在其以后的思想中并没有深究人的认识有限性的存在论后果。人的认识的有限性正是人的存在之有限性的集中体现,“把有限性的最内在本质的强调凸显出来,这乃是形而上学奠基活动的要求”^{[10](P374)}。因此,海德格尔断言,康德为形而上学所确立的根基并不牢靠。沿着存在论形而上学的理路,海德格尔进一步追究了作为有限性的人是如何在一个源初的时间性中揭示出存在的意义的。由此,海德格尔开始了其形而上学的构建,而康德所找到的奠基起点被海德格尔置换为“基础存在论”。

基础存在论之所以基础,是因为“存在”不仅与“此在”相关联,而且把时间作为了言说“存在”的境域。“基础存在论建构的优越之处就在于:这一建构活动应当要将掌握着所有此在的最熟悉的东西的内在可能性开放出来,尽管这一最熟悉的东西还是无规定性的,甚至是太过自明的。”^{[9](P107)}海德格尔又将这一建构活动理解为“此在的出击”,实际上指的就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谓的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在海德格尔看来,“操心”是人的存在样态,但是“将操心作为此在超越论的基本法相凸显出来,这仅仅是基础存在论的第一阶段”,“生存论分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下一步骤,就是具体澄清作为时间性的操心”^{[9](P107)}。

因此,海德格尔在谈到《存在与时间》的意图及目标时写道:“具体而微地把‘存在’问题梳理清楚,这就是本书的意图。其初步目标则是对时间进行阐释,表明任何一种存在之理解都必须以时间为其视野”。^{[7](P317)}可见,“时间”构成了海德格尔追问“存

在”问题的视域。同时海德格尔认为作为此在存在方式的“操心的结构的源始统一在于时间性”。这就决定了海德格尔的此在生存论分析工作是从实际被抛的生存本身的“具体性”出发,以便把“时间性”作为使生存成为可能的源始的东西揭示出来。海德格尔是从生存本身的“具体出发”,去建立起“时间”与“存在”的关系的。一旦“时间”与此在之“生存”联系起来,“时间”就变成了“时间性”。

海德格尔从“时间性”去理解“存在”,这使得他避免了流俗的“时间”理解。“此在由之出发的视野就是时间。我们必须把时间摆明为对存在的一切领会与解释的视野。必须这样本然地领会时间。为了摆明这一层,我们须得源源始始地解说时间性之为领会着存在的此在的存在,并从这一时间性出发解说时间之为存在之领会的视野。”^{[31](P76)}所以,与其说是“时间”构成了海德格尔解说“存在”的视野,不如说是从“时间性”出发解说“时间”之为“存在”之领会的视野。海德格尔指出,“我们把如此这般作为曾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而统一起来的现象称作时间性。只有当此在被规定为时间性,它才为它本身使先行决心的已经标明的本真的能整体存在成为可能。时间性绽露为本真的操心的意义”^[4]。“时间性”是“曾在”“将来”和“当前化”三者的统一。但是把“时间性”这一语词用作术语时,海德格尔要求首先必须远离一切从流俗的“时间”概念里涌上前来的“将来”“过去”和“当前”的含义,也必须远离“主观的”和“客观的”或“内在的”和“超越的”“时间”概念。为此,海德格尔区分了“本真的时间性”和“非本真的时间性”。“将来”“过去”和“当前”这些概念首先是从“非本真的时间”领会中生出的。所以,必须把时间放在此在的展开状态中来理解。因为,这个展开过程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基轴进行的,即把“本真的存在”与“非本真的存在”分离开,把“源始的时间”与“流俗的时间”分离开。

海德格尔认为,“对于流俗的时间领会来说时间就显现为一系列始终‘现成在手的’、一面逝去一面来临的现在。时间被领会为前后相续,被领会为现在之‘流’,或‘时间长河’”^{[31](P77)}。流俗解释把时间规定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前后相续,把时间当作一种无终的、逝去者的、不可逆转的现在序列。这种流俗的时间描述源自沉沦着的此在的时间性。与此相应,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把对源始而本真时间性的分析概括为下面几个命题:“时间源始地作为时间性的到时存在;作为这种到时,时间使操

心的结构之建制成为可能。时间性在本质上是绽出的。时间性源始地从将来到时。源始的时间是有终的。”^[4]这一段话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源始时间性的特征。需要注意的是,这几个命题之间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并且是针对着流俗的时间概念提出来的。所以,海德格尔认为:“探索工作反倒必须先熟悉源始的时间性现象,以便从这一现象出发烛照流俗时间领会的源流的必然性和方式,以及它占有统治地位的根据。”^{[5](P12)}在本真的时间性的烛照下,非本真的、流俗的时间概念会更加清楚地向我们显现出来,反之亦然。

“此在”源始的存在论上的生存论结构的根据乃是时间性。时间使操心的结构之建构成为可能。正是这种“时间性使生存论建构、实际性与沉沦能够统一,并以这种源始的方式组建操心之结构的整体性”。到时的“时间性”在建构“操心之整体结构”的同时,也显示出自己的“绽出”特性。海德格尔指出,“将来、曾在与当前显示出‘向自身’‘回到’‘让照面’的现象性质。‘向……’‘到……’‘寓于……’等现象干脆脆地把时间性公开为绽出。时间性是源始的、自在自为的‘出离自身’本身。因而我们把上面描述的将来、曾在、当前等现象称作时间性的绽出。时间性并非先是一存在者,而后才从自身中走出来;而是:时间性的本质即是在诸种绽出的统一中到时”^{[3](P78)}。“到时”是在绽出的统一中到时。“时间性在每一种绽出样式中都整体地到时,即:生存、实际性与沉沦的结构整体的整体性,也就是说,操心之结构的统一,奠基于时间性当下完整到时的绽出统一性。”^{[5](P13)}时间性的绽出统一性,亦即在将来、曾在状态与当前这诸种样式中“出离自己”的统一性。至此,海德格尔通过源初时间性建构起操心之结构的整体性,从而完成了“此在”形而上学的奠基。

海德格尔对康德哲学的诠释是两个哲学家之间的一场意味深长的“思想对话”,是其奠基形而上学途中的一个准备性的阐明。海德格尔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工作予以了这样的评价:“至于康德自己是否达到了对这一问题的完全澄清,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说康德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并首先将它提了出来,就已经足够了。”^{[5](P1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意义在于第一次意识到了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问题,亦即形而上学的奠基问题,并将这一问题归结为“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康德形而上学是一种更加严格的科学的形而

上学,是一种知识论形态的形而上学。但这种形而上学依然行进在笛卡尔所开辟的形而上学的“我思”之路上。因此,海德格尔认为,“康德耽搁了一件本质性的大事:耽搁了此在的存在论”^{[3](P60)}。相对于康德,海德格尔要构建的则是真正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当海德格尔宣称“唯当此在在,才有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充分显示了他形而上学的理论本性。“形而上学决不仅仅是人所‘创造’的体系和学说,毋宁说,存在之领悟、领悟之筹划和被抛在此在本身中发生。‘形而上学’就是在突破进入存在物之际所发生的基本事件,而这一突破与人这样的东西的实际生存同时发生。”因此,海德格尔主张:“其它一切存在论所源出的基础存在论必须在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中来寻找。”^{[5](P13)}这就是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奠基,也就是海德格尔所奠基的形而上学。从海德格尔所奠基的形而上学中,我们可以看出:“哲学问题关涉实际生命的存在”“哲学问题关涉那种在当下被称呼存在和被解释存在之方式中的实际生命的存在”^{[8](P210)}。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只不过是实际生命的明确解释而已”^{[10](P375)}。

[参 考 文 献]

- [1] [德]恩斯特·卡西尔. 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评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释[J]. 世界哲学, 2007(3): 32.
- [2] [德]马丁·海德格尔. 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M]. 王庆节,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 [3] [德]伊曼努尔·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 译. 杨祖陶, 校.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4] 叶秀山. 海德格尔如何推进康德之哲学[J]. 中国社会科学, 1999(3): 118.
- [5] [德]马丁·海德格尔. 现象学的基本问题[M]. 丁耘,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 [6] [德]马丁·海德格尔. 面向思的事情[M]. 陈小文,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7]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 逻辑研究(第2卷第1部分)[M]. 修订本. 倪梁康,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8] [奥]施太格缪勒. 当代哲学主流[M]. 王炳文, 燕宏远, 张金盲,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9] 叶秀山, 王树人. 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1卷)[C]. 南京: 凤凰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 [10] [德]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 译. 熊伟, 校.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文章编号]1009-3729(2014)05-0016-04

美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窦效民

(郑州轻工业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通过对美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考察发现,美国高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学生的品格教育、坚持“以生为本”的办学理念、强化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优化人才培养生态环境。借鉴美国高校的一些成功做法,结合我国高校发展实际,我们应坚持和完善“以生为本”和开放办学的教育理念,为学生成长成才提供更好的服务;大力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强化“以文化人”的功能,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关键词]美国高校;人才培养;品格教育;办学理念;创新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5.003

培养高素质人才是高等院校的第一要务。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和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我国长期实行的应试教育已成为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羁绊,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势在必行。本文拟在对美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进行考察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提出有针对性的借鉴举措,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一、美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理论与思想的指导下,按照特定的培养目标,形成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管理制度和运行方式。美国现共有高校4182所,其中可授予准学位(二年制学院)的有1732所,可授予本科学士学位的有951所,可授予硕士学位的有964所,可授予博士学位的有535所。在这些高校中,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并存,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和社区学院层次分明,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等不同层次的教育同步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1. 注重学生的品格教育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品格教育越来越成为提升人们道德素质的重要维度。美国大学的品格教育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主要聚焦于

国家意识的培育、社会责任的倡导和个人美德的塑造3个方面。

一是国家意识教育。移民众多是美国社会的显著标志。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在宗教信仰、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并直接在高等学校的学生身上反映出来。因此,如何通过系统的教育和科学的引导让学生理解并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培养他们对美国的热爱和作为美国公民的认同感,就成为美国政府和各高校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一方面,他们把美国历史无一例外地作为美国各公立高校的必修课,通过讲述美国获得独立的经过和开国元勋的光辉业绩,激发学生的历史荣誉感;通过宣传美国政治体制和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通过引导学生聚焦美国总统选举,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以及美国国家形象的塑造等议题,鼓励学生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美国政治改革、外交政策和社会建设等问题的讨论。另一方面,整合多种社会资源,营造国家认同感的“合力场”。遍布美国各州的博物馆、名人塑像和纪念碑均向公众免费开放,俨然一部生活化的爱国主义教科书,这对宣扬美国辉煌历史和卓越成就,彰显美国精神,激发大学生爱国热情极具感染力和号召力。

[收稿日期]2014-06-12

[作者简介]窦效民(1957—),男,河南省淮阳县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科学社会主义。

二是社会责任教育。美国高校的社会责任教育强调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相契合,要求个人在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同时,需要遵循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并尊重他人的基本权利。美国高校的社会责任教育在实施过程中注重道德示范与道德实践相结合。一方面,教师在课堂上引介或再现生活中的道德场景,并组织学生就其中的道德争议进行辩论,引导他们从社会道德价值层面思考对策,逐渐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美国高校录取特别是知名大学的录取,都要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考察,看考生的经历,看考生是否参加过义务劳动,是否当过志愿者。许多公立学校都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区公益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亲身体悟现实生活中的道德问题,并在帮扶弱势群体过程中体验给予和分享的道德价值,合理权衡与他人利益的关系,进而在不断的尝试和反思中深化社会责任意识,强化社会责任行为。

三是个人美德教育。尽管美国各州在大学生美德教育的理念导向和路径选择方面有诸多分歧,但对其教育的核心内容已经达成共识,即信赖、尊重、责任、公平和关怀。“信赖”强调诚实守信,恪守自己的承诺,不背叛朋友和家人;“尊重”提倡既要珍视自己的生活价值,崇尚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树立坚定的生活信心,又要在与他人的交往中,理性地看待他人在信仰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与其平等相处;“责任”要求应自觉地预估自己的言行可能产生的后果并对其负责,正确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并履行相应的义务,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公平”是指个人在参与社会竞争时,应自觉遵守既定的规则,善于与人协同合作,达成目标;“关怀”是指对家人和朋友的关心和支持予以感恩,尽自己所能同情和帮扶弱势群体等。

2. 坚持“以生为本”的办学理念

一是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赋予学生充分的学习自主权。在培养计划的制定上,美国多数高校为学生量身制订培养方案。(1)学生可以任意选择、调换专业。美国高校的学生在大学本科4年的学习过程中,有超过一半的学生调整专业,有的甚至转过2次以上专业。一些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可以修两三个专业,这一制度设计虽然增加了管理的难度,但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2)提供丰富多样的课程供学生自主选择。学生自主选课等于有权选择任课老师。一般而言,任课教师的学识水平、讲授效果与个人形象是学生选课时考虑的重要因素。如果某位教师所开课程长期无人选,那么这位老师也就该“下课了”。每门课

程结束时,校方都要发给每位学生一份评价表,以无记名方式对老师授课情况提出批评意见,评价结果作为教师考核、晋升和奖惩的重要依据,以此激励每位教师专心执教,不断提高教学水平。(3)实行完全学分制。学校只规定毕业所需的最低学分,取得学位、学历没有年限限制,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与兴趣安排个人的修学计划,自主确定学习方式、注册时间等,进而使半工半读、工读交替成为可能,有利于积累工作经验。

二是实行“互动式”教学,调动学生“学”的积极性。美国高校的任职教师普遍认为,评价教学效果的关键不在课堂上老师讲了多少,而是看学生掌握了多少,效果怎么样。教师通常提前向学生布置课堂讨论题目,每次上课都留出一定时间开展讨论,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发表个人见解,与教师进行互动交流,开发学生的智力和潜能,变被灌输为主动学习。此外,每门课还要求学生通过课题形式,自己查阅图书资料或进行实验论证,经过自己思考和动手,以论文形式完成。这一过程是学生对所知识的理解、消化、吸收、验证、运用、提升过程,是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的过程,效果很好。

三是把管理融入服务之中,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人权利。美国大学负责学生事务的岗位和管理者主要有两位:一位是主管学生事务的副校长,另一位是学生事务长。各个大学都设有学生事务管理中心,配备相当数量的工作人员。他们除了负责学生的日常教育和事务管理外,还要做大量的服务性工作,如帮助学生选课、选专业,搞好职业规划、开展就业指导和心理咨询等。同时,坚持依法治校原则,严格按照法律处理学生事务。对学生的申请或请愿、申诉,学校和院系都会成立相关的委员会,听取学生的意见和诉求,并严格按照规定和程序办事。

3. 强化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

美国高校注重以市场和就业为导向,围绕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坚持“三个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学与人文相结合、教学与研究相结合。

一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课堂讲授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巧与课外实践和创业性活动结合起来。在课外实践方面,比如,加州大学波莫纳分校服装营销专业经常邀请企业界人士来校授课,组织学生到企业参观实习,考察职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并让学生自己设计、自己采购面料、自己动手剪裁加工,然后推向市场。学校办有服装厂、服装商店,学生联系供货商自主经营。运用所学知识,经历

从设计到产供销全过程训练,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大为提高。同时,美国大学十分重视学生的创业能力的培养,大一就开设创业教育课,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撰写创业计划,学校每年给予几千万美元的创业启动资金,让学生面向客户做市场调查、研发并销售产品,大三、大四时为学生提供孵化器服务。据统计,硅谷60%~70%的科技企业是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创办的,比尔·盖茨、杨致远等都是非常成功的大学生创业者。

二是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美国高校落实两个结合的重要手段是强化通识教育。比如,乔治·华盛顿大学明确开设的共同核心课程有六大类,第一大类就是人文类,其他依次是外语类、数理科学类、自然科学类、社会科学类、文明研究类。斯坦福大学要求主修的学生中,40%以上要选择跨学科主修,文科选理工科,理工科选文科,深受学生欢迎。这一举措促进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结合,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三是学习与研究相结合。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成立有本科生研究项目办公室,都把本科生的科研纳入课程计划,参加科研项目的学生可以获得学术学分,成为总学分的一部分。一方面,高校为本科生配备科研导师。如斯坦福大学要求教师把自己的科研项目在网上发布,鼓励学生参与课题研究,学校在经费和工作量评定上给予支持。再如伯克利大学规定,教师指导一名本科生,学校给予800美元的资助经费;而麻省理工学院把教师指导学生完成研究计划的情况作为聘任和晋升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学校为学生的研究项目提供资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行设计项目方案并向学校提出研究资金申请。斯坦福大学每年向学生提供1000多万美元的项目资助。这样,既可以使本科生有机会接触到学科前沿,又能使很多教师在学生参与研究的过程中受到挑战性启发,在科研上实现突破。这是美国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在本科教育上的一大亮点和竞争优势。

4. 优化人才培养生态环境

一是高度的开放性。(1)开放的校园设施。美国的校园大都没有围墙,校门只是象征性的标志,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校园布局与城市建筑融为一体,注重生态环境和文化内涵。大学的图书馆、实验室、体育场馆等设施都向社会开放。美国高校这种对社会开放并与之相融的特点,有利于学生社会意识和包容精神的培育。(2)开放的办学理念。美国为使其成为全球人才的聚集高地,保持其在人才和

科技方面的领先优势,大力推进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他们面向全球招生(美国高校留学生占在校生比例一般在25%左右,有的高达50%以上),面向全球延揽人才。在教学内容安排上,强化世界历史、地理、国际金融和贸易等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所必需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与训练。他们鼓励学生进行国际交流、到海外实习,把师生的国际化程度作为评价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准,把建立跨国大学作为发展战略。(3)开放的教学管理体系。美国的高校皆根据市场需求确定办学目标和发展定位,如加州大学多明戈分校,很多学院都设置有专门征询社会各界人士和毕业生意见的机构和渠道。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许多高校开展了远程教育和计算机辅助教学,新的考试形式、教学手段为更多的求知者敞开大学之门。

二是丰富的校园文化。(1)校园建设重视文化意蕴。美国高校的校园和公共场所的布置十分重视审美原则,从中体现出一定价值指向的人文精神,是美国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些建筑、校园环境、道路、文化长廊等,设计精美,意蕴深刻。如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大楼,就是传统与现代建筑风格相结合。(2)精神激励无处不在。美国大学重视用雕塑等载体将学校的办学理念、育人原则直观形象地传达出来,其影响和效果巨大、广泛而持久。如哈佛大学的雕像,显示了不同历史年代哈佛大学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耶鲁大学图书馆前石刻上刻有不同时期毕业生的名字,在其校园建筑的醒目位置,刻有战争年代牺牲的校友名字;斯坦福大学校内的教堂走廊周围的地板下,珍藏着从建校以来每一届毕业生的花名册和他们认为最有纪念意义的物品,使毕业生永远与母校血脉相连,薪火相传。(3)校训彰显特色,以文化人。如哈佛大学的校训“让真理与你为友”、华盛顿大学的校训“通过真理取得力量”,都离不开“真理”两字,这是追求真理的文化,是严谨求实的文化,是教人求真、学做真人的文化;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让学术自由之风劲吹”、加州理工学院的校训“真理使人自由”、麻省理工学院的校训“动脑又动手”,这是一种崇尚学术自由的文化,是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文化。这些校训从其创立至今大多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是广大师生共同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对人们言行举止,以及如何教与学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校训一经确立,不会轻易更改,随着社会的变迁,历久弥新,其理念内核不断被赋予时代的新意,始终是引领这些大学发展的精神主旨与标志。

二、美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对我们的启示

通过对美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考察,从中发现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可以更好促进我国高校的学生教育和管理工作的。

1. 坚持“以生为本”的办学理念,为学生成长成才提供更好的教育和服务

一是在品格教育中,关注学生的品格需求。美国品格教育的倡导者认为,品格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激发学生向善的需求,从而实现社会品格要求与学生个体求善需求的有机统一。我们应当借鉴美国品格教育的经验,坚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德育教育、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为基础,在教育内容、方法、手段等方面进行探索创新,运用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话语和方法,努力营造平等、融洽、包容的教育氛围和交流机制,搭建品格教育的实践平台,促进学生良好品格的形成。二是尊重学生学习的自主性。采取制度化的途径征求学生对专业、课程建设的意见和建议,设计更多的教学项目供学生选择,使学生有更多的学习自由度和选择权,把学习的主动权真正交给学生。三是正确认识学生在学校事务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关注学生的利益诉求。在处理和决定与学生切身利益有关的事项时,诸如教学安排、食堂管理、宿舍管理尤其学生处分时,要吸收一定数量学生代表参与讨论,严格按制度办事,依法维护学生的正当权益,搞好权益救济。评定奖学金助学金、评先评优,要坚持公平、公正、择优原则,严格按程序操作,树立正确的导向。四是正确对待学生个性发展,提倡多样性,鼓励、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培养学生的探索创新、创造精神。五是要深入持久地开展“三育人”活动,要从招生、培养、就业等各个方面为学生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

2. 树立开放办学的理念,推动学校的发展

开放对于高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在开放中发现问题,在开放中抓住机遇,在开放中追求卓越,在开放中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生态的繁荣。一是要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增强对外开放意识。教育国际化是21世纪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要深入理解教育国际化的内涵,不仅要把学生送到国外深造,而且要注重引进优质国际教育资源,促进学术与文化交流,扩大合作范围,提高教育国际化层次,形成良性的国际教育合作机制,推动学校的发展。二是要开放教学系统。要充分了解社会和业界

目前对专业人才状况的评价,以及对未来专业人才的需求情况,专业设置、教学改革应该充分征询各界人士的意见,及时作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要让学生有更多机会到社会中去开阔视野,经受锻炼,增强社会适应性和就业竞争力;要让更多业界人士登上大学的讲台。高校的教师,特别是工科的教师要扩大活动边界,走出校门,经常深入生产一线,吸收营养,获取新知识、活知识和新能量。三是要开放科研系统。应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联系,积极探索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的模式,推进学校与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的资源共享,形成协同创新的有效机制,提高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能力,提高对地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参与度和贡献率。

3. 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强化“以文化人”的功能

把具有高校特色的校园文化建设全面体现在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建设之中。一是要树立校园文化环境意识,通过广泛宣传教育,让广大师生充分认识到校园文化环境在育人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增强校园文化环境建设的责任心和爱护校园文化环境的深厚感情。二是要重视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办学理念、育人原则与人文精神需要一定的载体承载和体现,应当通过一定的建筑、雕塑等载体将学校的办学理念、育人原则直观、形象地传达出来,可以借鉴美国高等院校的一些做法,进行校园建设时注重文化内涵的塑造;采用雕塑、石刻、文化长廊等载体,体现并展示校园文化;建设不同时期毕业生的纪念性标志等,以加强校友与学校的精神联系。

三、结语

由于中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不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较大差异,因此对其发展成就的认识,要做客观的分析,对其经验做法的借鉴不能生搬硬套。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结合我国高等院校实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对我们有利、有用的东西,以扬长避短,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黄爱华. 国内外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变革取向分析[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0(6): 134.
- [2] [美] 罗伯特·M·赫钦斯. 美国高等教育[M]. 汪利兵,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4)05-0020-03

美国高校科研管理特点及对我们的启示

张素智

(郑州轻工业学院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 高等学校科研工作是国家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高校的科研工作与美国等科研强国高校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美国高校的科研管理特点在于:科学研究深入,引领科技前沿;研究成果实用,建立校企联盟;研究核心技术,注重专利保护;科研管理精细,评价体系合理。结合我国高校科研管理实际,我们应区别学术研究和应用开发,重视技术专利保护、加强科技成果技术转让,大力构建校企联盟,引导学生参与科研活动,以促进我国高校科研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关键词] 高等院校;科研管理;专利保护;科研评价

[中图分类号] G47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4.05.004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是高等学校的三大任务。高校科研工作是国家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科研工作的改革与发展不仅是高校自身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国家的科研发展密切相关。我国虽是科研大国,但不是科研强国。高校科研作为国家科研的主力军,虽然近年来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与发展,但与美国等科研强国的高校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本文拟在对美国部分高校考察的基础上,借鉴其科研管理经验,探讨我国高等学校科研管理工作健康发展之路。

一、美国高校科研管理的特点

美国高校科研的发展既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也受其社会制度和现实经济的制约,美国人实用主义观念与高校自治原则下发现真理、探索真理的职责相互作用,推动了美国高校科研的发展。美国高校科研管理概括起来具有以下特点。

1. 科学研究深入,引领科技前沿

美国著名高校的科学研究真正做到了引领技术前沿,面向某个领域的关键技术展开深入研究。研究的首要目标是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的突破,研究的成果更多是实用性技术专利,然后是学术论文。

这些技术专利一旦应用于某一领域或产品,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美国高校的科学研究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研究学科领域的前沿技术具有创新性;二是实用性强,技术专利易于转让。

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无线通信研究中心研发的项目,包括微波电路设计和SOC、生物芯片、电源设计、人脑与机器接口、多核系统等,特别是电子墙纸(Electronic Wallpaper)和Unpad技术更是未来电子新产品的关键技术。其科研项目经费大多是通过专利技术转让或者通过技术合作而获得的。斯坦福大学更是凭借其创新性的科研成果支撑着Google、Intel、Sun等数百家企业的技术,使它们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2. 研究成果实用,建立校企联盟

美国高校科学研究目标明确,实用性强。科学研究不是为“做论文”、写Paper,而是针对具体领域的关键技术和前沿技术开展研究,形成具有自主产权的专利和成果。申报国家和政府基金项目,学校会通过专业评审委员会严格把关。学校允许教师参与企业的生产实践,与企业联合研发实用技术。有的高校还建立了校企产业联盟,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圣地亚哥大学,通过企业会员制形式定期进行

[收稿日期] 2014-06-23

[作者简介] 张素智(1964—),男,河南省孟州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数据库系统与应用、高校科研管理。

校企技术交流,从企业实际产品研发过程中寻找研究课题。

3. 研究核心技术,注重专利保护

美国高校科学研究是以基础性、核心技术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以做一个产品、完成一个项目为目标。项目申报时制定的目标往往是别人还没有完成或者是根本还没有人提出的课题,项目完成后取得的成果往往是理论或技术上的突破,取得技术上的专利。美国高校非常注重技术专利保护,制定严谨的管理方法,切实保护专利发明人和学校的利益。图1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003—2012年取得的专利和授权情况,每年学校都会从专利转让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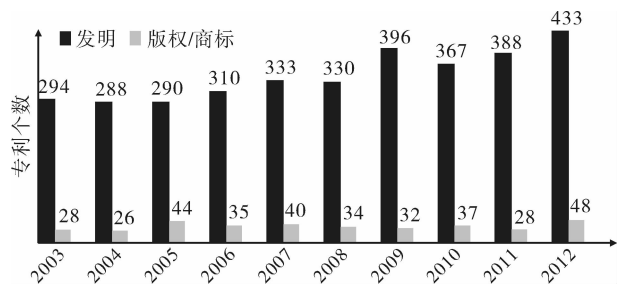


图1 2003—2012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发明专利情况

美国高校的科学研究课题均来源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经过科学研究、发明专利,形成有价值的知识产权;通过专利保护,并将专利转让给企业合作者,促进企业技术革新并获得市场成功,再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成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科技发展的引擎(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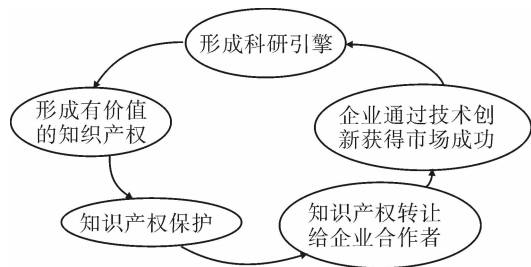


图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科技发展循环示意图

4. 科研管理精细,评价体系合理

美国高校大多成立了科学研究事务办公室(ORA),主要负责项目申报、技术转让、研究生基金和研究规范,提倡与企业合作创新,但必须确保项目申报时没有利益冲突。教授通过学术委员会参与管理,包括制定科研政策、招商、学位认定,颁布新的科研政策等,教授的研究成果归属学校,确保学校利

益。美国高校鼓励大学教授到企业开展联合研发活动,但要保证校外活动与学校利益不冲突。美国高校设立有政府关系部门(GRR),负责争取政府各类项目和基金的支持;设立的技术转让办公室(TTO)负责将学校的专利向社会发布和推广,与工业企业界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美国高校的科研评价为教授负责制,以项目为载体,实行自我淘汰机制。一是教授实行聘任制,在没有获得终身教授之前,教授们必须取得公认的科研成果,否则不可能取得终身教授资格,甚至会被解聘。二是教授组织科研团队去申请项目,科研团队能否维持要看其能否申请到或者争取到更多的研究经费,否则,就没有科研人员和研究生来为其工作,科研团队就会解散。除非是学校认为有研究价值、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項目,学校才会提供资助。

二、美国高校科研管理特点对我们的启示

美国高校先进的科研管理为我国高校科研管理提供了宝贵经验,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结合我国高校科研管理实际,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开展工作。

1. 区别学术研究与应用开发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要把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应用开发)区别开来,这是科研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笔者认为,高校教师应把重点放在第一个阶段,因为该阶段的目标是获取新技术新理论,特点是具有创新性,其研究过程需要不断提出新理论、新方法,需要做大量的科学实验,研究成果多是通过学术论文和发明专利来体现。这是高校科研的优势所在。

服务社会(应用开发)是采用已有的科学技术来为社会服务,或者开发出社会需要的应用产品,服务于社会。这也是高校的职责之一。这一阶段的科学研究课题应来源于社会需求,在科研过程中要取得新的突破,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社会,进一步促进产品升级和社会进步。这是高校科研的第二选择。

2. 重视技术专利保护,加强科技成果技术转让

在高校做科研,毫无疑问,只有通过获取知识产权才能使利益得到保护。现在搞科研更多的是处于应用层面开发,没有形成自己的知识产权。如果在科研过程中,形成有自主产权的成果,一旦技术转让出去,将会长期得到收益。为此,应通过制定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定,使大学教师专注于知识的创造,而不

是商业运作,进而提高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水平。

3. 建立校企产业联盟

应逐步陆续建立校企产业联盟和研究机构,研究要有目标,成果要能应用,企业产品内涵技术要有提升。如果高校教师许多科研项目提出的研究目标没有针对性,没有应用的背景,最终的研究成果也难有价值。因此,应建立校企产业联盟,共同建立研究机构,从企业发展和产品升级过程中找课题,将最新技术应用到企业研发过程中,对研发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关键技术开展研究,这样才能将科研做到实处。

4. 以学生为本,引导学生参与科研活动

高校要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在培养环节上就要积极引导参与科研活动。美国高校一直秉承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一是学校定位准确,不同层次的高校培养适应社会不同需求的学生,使学生毕业后有一技之能,二是注重科研素质培养和实践动手能力。美国高校在学生培养环节上,非常注重实

践能力培养,注重科研各个环节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参与科研活动。这是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薄弱环节,亟待重视和加强。

三、结语

中美两国高校在管理体制、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求真务实是科研工作的通用法则。借鉴美国高校先进的科研管理经验,继续深化我国高校科研体制改革,才能真正促进我国由科研大国向科研强国的转变。

[参 考 文 献]

- [1] 吴玮. 简析美国高校科研资金投入的构成[J].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09(3):41.
- [2] 王清,江海宁. 美国研究型大学科研管理对我国高校的启示[J]. 煤炭经济研究,2007(11):83.
- [3] 宋鸿雁. 美国与英国高校科研管理专业化探析[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2):10.

本刊数字网络传播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维普网等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其相关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4)05-0023-05

将货币发行收入纳入我国预算管理 的立法建议

吴礼宁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各国的货币发行权由各国的财政部或中央银行等货币发行方行使,货币发行的结果便是货币发行方征得与所发货币面值相等的“税金”,意味着在国家与人民之间建立起一种同税收契约关系具有同等性质的货币契约关系,可将其看作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货币契约是确立公民与国家之间、国家机关之间财产征稽与缴纳关系的规范基础,是政府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依托。在这一契约关系中,政府、中央银行等依据宪法和中央银行法向公民征收通胀税,公民负有缴纳的义务;国家征收通胀税的对价是承担保持物价稳定、提供公共服务的义务。货币发行收入如未纳入公共预算,不受法律约束,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腐败和寻租行为,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严重伤害。通过立法明确界定货币发行收益的权属,将该项收入纳入立法机关和公众的监督之下,可防止货币发行收入不受预算控制的问题,降低货币发行方通过货币发行获取法外利益的可能,提高通过货币发行谋利的机会成本。通过《预算法》的修订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在现代国家,政府预算必须反映政府的一切收入和支出,不允许政府有预算外公共财政资金。预算外资金的存在意味着不受预算法控制的政府财政权的存在,而法治国家法律至上的原则要求一切国家权力皆须依法存在、依法行使,不允许法外权力存在。因此,即将付诸修订的《预算法》应当明确禁止预算外收入,并将货币发行收入、公债收入等各项收入一并归入公共预算收入的范畴,从而给货币发行方套上法治的笼头。

[关键词]货币发行;预算收入;预算法;反腐

[中图分类号] D922.2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4.05.005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下文简称《预算法》)修订程序的启动,堪称新中国立法史上一件大事,也是当前法学界备受关注的焦点。《预算法》是事关“钱袋子”权力的法律,是国家法律体系中最根本的部门法之一。如果此次修订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无疑会成为里程碑式的事件。《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一经公布,立即引起热议,并遭遇拍砖,而三审亦未能沿循惯例“三审通过”。当然,较之第二稿,第三稿频有亮点闪现,但需斟酌之处仍比比皆是。对于这几次审议,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财政权的配置问题,如国库管理权是归央行还是

归财政部、如何强化人大预算监督、地方债“防火墙”怎样设置^[1]等。而就相关的争论来说,对于同样属于基础性问题的财政收支结构、财政收入范围问题,始终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公共财政收支结构和范围的明确界定,是《预算法》得以真实有效实施的前提,否则必将导致预算外资金大量存在、不受制约,进而助长寻租和腐败之风。在这一问题上,《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做出了一些努力,如在现行法的基础上,将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转移性收入纳入公共预算收入范围(《预算法修正案(草案)》(第三稿)第27条第

[收稿日期] 2014-08-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CFX021);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2YJC820109)

[作者简介] 吴礼宁(1981—),男,河南省民权县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货币宪法、财政宪法。

1款),这可以说是对现行制度的一种补偏。但是新的草案对最重要的几项公共财政收入类型仍未能作详尽的列举,进而无法在一些实质性问题取得突破,尤其是货币发行收入(含外汇储备收入)等收入类型,仍未被预算法所承认。然而货币发行收入数额极其庞大,绝不亚于税收收入,如不能将其纳入公共预算收入的范畴,将导致整个预算制度有名无实。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在2013年增加了114 395.73亿元,2014年上半年增加了103 062.22亿元;外汇储备在2013年增加了约25 376.84亿元,2014年上半年增加了10 607.14亿元;而2013年全年的财政收入为129 143亿元,2014年上半年则为74 638亿元。透过货币供应量和外汇储备总额的增幅,我们可以看到,货币发行总收入已远远超出被纳入预算范畴的全国财政总收入。对于如此庞大的财政资金,如不能将其纳入预算法的监管之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腐败和寻租行为产生,进而导致货币发行收入规模失控,人民的财富也将不断流失,宪法上有关财产权保障的规定亦将形同虚设,更是与我国当前大力反腐的时代背景背道而驰。基于此,本文拟分析货币发行收入的属性、将其纳入预算管理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并提出《预算法》相关条款的修改建议,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货币发行收入法律属性之界定

货币发行收入指的是中央银行等货币发行方通过发行货币这种向社会负债的方式获取的资本收益,主要由基础货币投放和外汇储备收入两部分构成。基础货币即准备货币,又被称为“高能货币”,是中央银行等货币发行方为广义货币和信贷扩张提供支持的负债,它通常包括中央银行发行、由银行持有的货币(库存现金)和流通中的现金,有时还包括其他存款性公司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和它们持有的本币^[2],基础货币是货币发行方发行的货币总量。外汇储备又叫外汇存底,是一国政府持有的以外汇形式存在的国际储备资产。在我国,“企业和个人出口商品或劳务,挣回美元等外汇,然后将这些外汇的一部分或全部卖给银行获得人民币。外商对中国投资也往往需要将手中的部分或全部外汇资金换成人民币,也得将外汇卖给银行。……外汇一旦被央行购买就成为国家外汇储备”^[3]。中央银行换取外汇的对价则是自己印制的钞票。由此可以看出,外汇储备同样是中央银行印钞的结果,因此可以认为,政

府所持有的外汇储备,同样是通过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所获得的财政收入。

政府获取货币发行收入的过程并没有想象中的复杂,其实就是中央银行等货币发行方根据需要印刷本身不具有任何价值的纸币,然后按其票面价值要求公民支付相应的商品或劳务。这些纸币基于国家法的强制性规定而承载了一定的请求权,中央银行每印一张纸币便等于凭空多出一份对于财产或者劳务的请求权,并可用来投资、支付薪金,或者兑换生产者出口商品换来的外汇与其他有价值的商品。总之,货币发行收入是政府凭空创造的财富。很显然,货币发行是一种能够攫取财富的行为,正如布坎南等^{[4](P133)}所说的,授予政府发行不兑现货币的垄断性特权,也有一定价值,因为这种特权是这样一种权力:以基本上是零成本的方式,创造个人会赋予其经济价值的资产。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的资产又被称为“通胀税收收入”,在社会总财富恒定的情况下,政府每印一张纸币,便意味着公民损失同等比例的财产,印钞行为本身便是一种征税行为。

在本质上,货币发行收入是政府对社会公众的负债,同税收的属性非常接近。税收乃是基于社会契约建立起来的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其存在的基础是经全民同意的立法——税收条款。征税权乃是公民授予国家行使的主权性权力,政府基于征税权获得的收入即为公共财政收入。货币发行也是如此,它是政府凭借宪法、中央银行法等法律的规定,印刷纸币并派发给人民,在这一过程中,人民获得的是纸币上不断贬值的信用,丧失的则是实实在在的财产权。

通常来讲,各国的货币发行权由财政部或中央银行等行使,货币发行的结果便是政府征得与所发货币面值相等的“税金”。一个最直观的判断是,政府所征得的“税金”,属于国家财产,应当上缴国库。既然国家代表全民行使所有权,这些财政资金在本质上属于公民的财产,于是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就建立起一种同税收契约关系具有同等性质的货币契约关系。货币契约关系可看作是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在私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中,债权人可以向债务人请求给付,债的发生可能基于法律,也可能基于约定^[5]。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此类似,即国家基于法律要求人民进行金钱上的给付。货币权力所具有的公权力属性,决定了公法上的货币发行与通胀税收收入之间的法律关系与私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之处在于,货币发行如同税收

和其他公课一样,涉及到对公民自由的限制或干预,因此应受到法治原则的限制,即作为债权人的国家应当依法行政,而持币人的基本权利应受到充分保障。^[6]更为重要的是,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给国家设定了特定的给付义务,即国家应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公共物品,尤其在福利主义时代更是如此。

可以说,货币契约是确立公民与国家之间、国家机关之间财产征稽与缴纳关系的规范基础,是政府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依托。在这一契约关系中,政府、中央银行等依据宪法和中央银行法向公民征收通胀税,公民负有缴纳的义务。国家征收通胀税的对价是承担保持物价稳定、提供公共服务的义务,而持币人则有权对政府提出此项要求。同样,由于货币发行是对公民货币财产权与货币自由的限制,因此应严格控制货币发行权,将通胀税的征收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物价的大幅波动,减少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伤害,并维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

二、限制货币发行权之必要性

货币发行是政府通过立法强制取得持币人货币财产的权力,是当代国家获取财政收入的首要手段。在这里,强制并不是对持币人使用暴力,而是不必逐个征求持币人的同意,持币人也意识到对此没有选择的自由。正如布坎南所指出的,对持币人而言,“不存在‘逃税’或逃避通货膨胀税这种负担的绝对出路”^{[4] (P49)},货币权力也因此成为近代国家政治权力绝对性的象征。

货币发行权作为公权力的一种,具有公权力的一般特性。就公权力最普遍的性征而言,利益的驱动使其倾向于无限扩张,除非遭遇外在刚性规则的强有力约束,否则不会停止。另外,公权力还总是试图突破外在规则的限制,从而造就了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最普遍、最根本的矛盾——权力的扩张与制约。^[7]货币权力更是如此,该权力的行使本应遵循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则,但是由于货币发行方自身具有经济人的特性,也在不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缺乏有效制约机制的情形下,货币权力就会不可避免地演变为超越法律的异己力量,变成货币发行方谋取自身利益的工具。正如司马光所说:“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宋史·司马光传》)政府通过货币发行谋利的实质,乃是把持币人的部分财产转化为政府财产。这是因为,随着流动性的增加,公民在所持有的名义货币量不变的

情况下,其所能购买的商品价值不断减少或者说其持有纸币的请求权能效降低了,而流失的那部分价值则成为政府的财产,也就是说政府从个人和企业那里收取到了更多的财产税。

在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的福利国家,货币权力的扩张特质更是显现无遗。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提出的“政府活动扩张法则”显示,政府职能总是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不断扩大,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即比率也会相应提高^[8]。这一定律已经得到多数国家发展经验的验证,日益攀升的福利水平决定了各国财政支出的日益膨胀。但是我们知道,政府的财政支出应以财政收入为前提,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途径主要有税收、收费、国有资产收益、借债和发行货币等,而发行货币则是其最便捷、有效、不易被察觉、最不容易遭受抗议的获取财政收入的方式。尤其在现代民主国家,政府总是试图在获取更多财政收入的同时,保持一定的公民满意度,因此,货币发行就成为一种最重要的财政手段。

货币发行虽然类似于税收法律关系这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但二者仍有不同。因为税收具有共同补偿性的特点,即便国家在税收关系中更关心征收而不是给付^[9],但它无法推卸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这也正是税收的对价。然而货币发行收入不受这一规则的约束,至少目前是这样。因为当今世界还不存在将通胀税收入纳入公共预算的先例,甚至所有国家的法律在谈及货币发行收益时都是闪烁其词,并为其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于是货币发行权和货币发行收入都不受法律的约束。

对不受制约的货币发行权的垄断,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腐败和寻租行为产生,并诱使政府不断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利。因为对货币供应的垄断,使政府丧失了控制其开支规模的自觉性,政府也从来不会像受到金本位制的纪律约束那样,“克制自己不去肆意地滥用手中的权力”^[10]。来自货币发行领域的腐败和滥权是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头号催化剂。我国当前处于大力反腐的时期,自然也应将存在于货币发行领域、金融监管领域的腐败置于反腐的利剑之下,这也是治理通胀、防范金融危机的必由之路。恰如美国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所说的,“通货膨胀是世界上的头号窃贼。它不声不响地从寡妇孤儿、债权人持有者、退休人员、年金受益人、人寿保险受益人手中窃取财富。小偷、抢匪、贪官污吏等所掠夺的财富加在一起也比不上通货膨胀的祸害。通货膨胀具有两面性,它不光是江洋大盗,同时也是慈善

的施舍者,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慷慨的施舍者,惠及债务人、囤积居奇者、不动产所有者、政府(借此可以减轻公共债务负担)”^[11]。通货膨胀的直接后果是货币购买力的下降,面对商品价格与工资水平的失衡,人们的生活条件会一直处于相对恶化状态之下。

鉴于货币发行所具有的侵益性特性,如不能对其施以有效的法律约束,其必将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严重伤害。而要想控制货币发行,首先需要确立严格的宪法性规则,对货币权力施加外在的刚性约束,并通过合理的权力配置,实现对货币权力的有效制衡。其中一项的核心要求便是,通过立法明确界定货币发行收益的权属,将该项收入纳入立法机关和公众的监督之下,防止货币发行收入不受预算控制的问题,降低政府通过货币发行获取法外利益的可能,提高通过货币发行谋利的机会成本。而能够实现此一目的的,则是《预算法》的修订。

三、将货币发行收入纳入预算监督的法理正当性

公共预算要求国家每年的财政收支,“须由政府于会计年度开始之前,就岁入岁出之项目数量,分别开具,提经议会通过后始得据而为收入与支出”^[12],这是近代国家通行的重大原则^[13]。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现代色彩的财政制度,公共预算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在各民主国家得到了普及。科学而有效的预算制度闪烁着现代法治的理性光辉,支撑着现代国家民主政治的逻辑成长。

预算制度的本质就是要对国家的公共财产资源做合法且合理的分配,并借由分配的内容促进国家利益的发展,创造公民的公共福利。^[14]它是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对可支配公共资源所进行的调整和配置,是经法定程序批准的政府年度收支计划,以维护公共利益或提供公共服务为目标,调整国家与公民、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预算制度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制约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法治精神,尤其是将预算监督权力交由议会行使的制度设计,形成了对政府安排财政收支权力的有效制衡机制。

成熟的预算制度是现代国家政治文明程度的标志,也是现代财政国家构建的首要目标。王绍光^[15]将拥有现代预算制度或遵循现代预算原则的国家称为预算国家。预算国家有2个基本标志:一是财政统一,即将政府的收支统到一本账里,并确保预算的全面统一、准确严密与时效性。二是完善的预算监

督体制。预算监督是指代议机构掌握预算权,对政府财政收支进行监督,确保预算依财政年度制定,并且公开透明。其中,财政统一不仅要求收支统一,还要求实现预算内容的全面、准确,要求将所有的公共财政收支事项全部纳入公共预算的范畴,而不得有预算外收入存在。就我国现行的预算制度来看,还远未能实现财政统一这一要求,“预算外”概念则体现出我国预算制度的现实困境。现行《预算法》第76条规定,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但并未对预算外收入做出明确界定,单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未被纳入预算管理的公共财政收入,其中自然应当包括货币发行收入。在现代国家,政府预算必须反映政府的一切收入和支出,不允许政府有预算外公共财政资金。预算外资金的存在意味着不受预算法控制的政府财政权的存在,而法治国家法律至上的原则要求一切国家权力皆须依法存在、依法行使,不允许法外权力存在。因此,即将付诸修订的《预算法》应当明确禁止预算外收入,并将货币发行收入、公债收入等各项收入一并归入公共预算收入的范畴。

当然,要将通过发行货币征收的“税金”纳入预算管理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一,若中央银行为国家所有,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所得收入即为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具备了将该项收入纳入公共预算的条件,所欠的只是预算法的文本确认;其二,若中央银行为私人所有或混合所有,则须首先界定货币发行收入的权属,进而通过立法确立通胀税收收入上缴国库的原则。就目前世界各国的立法与实践来看,这两点并未得到完全实现。这一方面是由于私人中央银行大量存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货币发行收入权属不明,去留无踪,更难以在《预算法》文本上得到体现。在实行中央银行私人所有的国家,货币发行收入主要是作为私人的红利而被瓜分;而在实行中央银行国家所有的国家,由于缺乏对货币发行收入权属的界定,从而无法将其视为公共财政收入并纳入预算管理,这就使得该项资金成为一笔庞大且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府资金,再加上中央银行本身的神秘色彩,对于政府如何使用这笔资金,公众几乎无从知晓,这显然与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精神相违背。

四、我国《预算法》修改建议

我国现行《预算法》第76条关于预算外资金的规定本身便体现出法律文本上的结构性矛盾。《预算法》第19条第2款规定,“预算收入包括:(一)税

收收入;(二)依照规定应当上缴的国有资产收益;(三)专项收入;(四)其他收入”。这一规定体现了立法技术的科学性,由于社会发展阶段和人类认识水平的限制,法律条文无法穷尽列举所有的收入事项,因此通过“其他收入”的规定赋予该条款以弹性,于是所有未列举的公共收入事项,包括货币发行收入,都可依据这一规定纳入公共预算的范畴,因此无需再通过第76条将管理预算外资金的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预算法》第76条的存在,事实上等于是对其第19条做出的例外规定,意味着承认了预算外资金存在的合法性。同时《预算法》第76条将管理预算外资金的立法权授权给行政机关,会造成这样一种法律后果,即同一个部门行使着立法权和执行权两种权力。正如孟德斯鸠所担心的,当同一个部门同时行使这两种权力时,该部门或是先通过立法赋予自己更大的管理权限,或是在《预算法》之外规定豁免条款,进而依据这些条款更加自由地支配公共资金。

此外,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第38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中国人民银行的预算经国务院财政部门审核后,纳入中央预算,接受国务院财政部门的预算执行监督”。然而通过人民银行每年的部门决算可以看到,被纳入中央银行预算收入的主要有财政拨款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附属单位缴款及其他收入,2013年的总额为1 614 507.05万元(《2013年度中国人民银行部门决算》),并不包括货币发行收入。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货币发行收入并未纳入预算管理,而能够使问题得到解决的只能是《预算法》上的“其他收入”条款,即充分发挥法律解释的功能,界定货币发行收入的公共属性,将其纳入“其他收入”的范畴。

回顾2012年6月提交审议的《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该草案第24条第1款对公共预算收入做出了如下界定:公共预算收入包括各项税收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其将收费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纳入公共预算范围,但对于货币发行收入未涉及。《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三次审议稿)沿袭了这一规定(第27条第1款)。当然,“其他收入”条款的保留,仍为将货币发行收入纳入预算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不过“其他收入”条款的规定,本是为弥补法律刚性之不足,为规范将来可能出现的公共财政收入类型而设定的弹性

条款,是例外而不能是常态。既然已经认识到货币发行收入的存在,并且知道该项收入数额极其庞大,甚至超过了国家的正常税收,就没有必要再遮遮掩掩,而应当在《预算法》文本上以列举的形式加以规定,并明确使用“人民币发行收入、外汇储备资金”的字眼,以起到确认和宣示的作用,并表明国家立法服务于预算法治的决心。同时立法还应要求中央银行、财政部和外汇管理局编制有关货币发行和外汇储备管理的专门预算案,并征求公众意见。专门预算案应包含收、支两项内容。上述部门在向全国人大提交审议专门预算案时,须一并提供详细的说明和论证。不仅如此,货币发行并不单纯地表现为中央银行派发纸币的行为,政府举债行为也是创造信用的过程,同样会带来流动性的增加,因此对举债获得的收入,也应当作为广义的货币发行收入纳入预算管理。

总之,通过预算法文本的修改和完善,充分发挥人大的预算监督功能,约束政府发行货币的冲动,在充分发挥中央银行货币权力职能能动性的同时,削减其侵益性,降低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风险,使持有人的财产权得到更有效的法治化保障,应是本次《预算法》修改首先加以解决的问题之一,而对货币发行收入、外汇储备资金、政府举债收入做出明确列举,也将是此次修法的题中应有之义。

五、结语

人类历史的政治法律实践一再表明,不受制约的公权力乃是腐败的根源。因此法治理论强调公共权力的有限性,强调公权力的法律约束。在货币发行领域,货币发行方行使着重要的公权力,如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势难避免腐败和寻租行为的发生,会进一步侵害公民的财产权益和自由。腐败的治理不仅在反,更在防,即通过刚性的外在规则和严格的控权机制,将货币发行方的自由裁量权降到最低,增加其腐败和寻租行为发生的机会成本,将腐败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而货币预算制度则是一种有效的防范机制。通过货币预算机制,设定货币发行限额,并限定其用途,确保货币发行收入最终能够用之于民。同时应当建立货币政策透明机制,提高货币发行和管理过程的透明度,确保公众知晓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政府行为,为监督货币规模及其用途提供便利,并最终给货币发行方套上法治的笼头。

(下转第32页)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4)05-0028-05

私法中的法律假定及其司法价值

王华胜

(安徽财经大学 法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对于私法中某些难以确定的情况,法律往往会从社会秩序、经济效益和法律政策的角度出发,对此类情况作出某种假定。这些假定是可反驳的,但在没有被反驳之前,法官应当将其认定为法律事实。法律假定的司法价值在于决定举证责任的分配,迅速解决纠纷,以维护正义。从法律假定的角度探究当前国人的“救助恐惧症”,发现:当下“救助恐惧症”日益严重的原因,并非只是社会道德水平的低下,司法对法律假定问题的忽视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诱因。基于人性考虑,缓解“救助恐惧症”的有效方式不是高喊空洞的道德口号,或是对普通人提出圣人般的道德要求,而是回到法律层面本身,承认基本的法律假定,从而使救助者获得一定的安全感。

[关键词]私法裁决;法律假定;举证责任;无辜者假定;救助恐惧症

[中图分类号] D903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4.05.006

在当下中国,一个“扶不扶”的问题让众多国人为之纠结,产生了“救助恐惧症”。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也许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根本,但相对具体的个案而言,道德教化则明显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要求救助者先行拍照,或是找见证人证明固然是一种办法,但在众多情况下未必可行。也许我们需要思考的并不应是如何让一个人能自证清白,而应该是为什么要让一个人来自证清白。本文拟对法律中的假定问题进行分析,讨论证明责任在私法裁决中的分配方式及其正当性基础,以期缓解这种“救助恐惧症”提供一种思路。

一、理性化举证责任的形成

法律对纠纷的处理往往具有事后性,为了正确地裁决纠纷,裁判者的首要任务是要查明已经发生的事实。然而事件本身已经逝去,裁判者所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能保证所查明的事实就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实。为了试图明白过去发生了什么,法律必须清除回忆错误、文件遗失、证人缺失等数不清的障碍。由于人类自身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我们无法保证每个已发生的事实都能够查明。因此,法律首先要解

决的问题自然是:应该由谁来证明已经发生的事实,证明到何种程度,未能达到相应的程度时该由谁来承担风险,这一系列问题在法律上可以统称为“证据负担问题”。

在人类法律智慧发展的不同阶段,解决证据负担的方式也不同。在早期,比如在日耳曼法中,谁来承担举证责任这样的问题并不存在,原告和被告任何一方的主张在它被否定前都被认为是可信的。^{[1](P139)}在诉讼过程中,举证责任的分配方式是要根据诉讼程序的发展变化而有所不同,并且证据的提出带有很强的形式主义和单方性特征:一方当事人只要举出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据形式,即可排除对方证据的证明力及其诉讼请求。法律裁判者并不会依据一定的证据标准对双方证据的真实性与证明力进行判决取舍。比如在债务诉讼中,原告请求被告履行对自己的欠债时,法律并不要求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相反,如果被告否认存在这样的债务或者声称已经清偿,则被告需要承担举证责任,他可以通过简单的“不欠债誓言”来否认债的存在,也可以通过12个佐证人的誓言来证明债务已经清偿。^{[1](P141)}对于财产侵占诉讼,如果被告对原告的合法权利提出质

[收稿日期] 2014-07-01

[作者简介] 王华胜(1969—),男,安徽省枞阳县人,安徽财经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法、法理学。

疑,则原告需要承担举证责任,以证明自己对于争议物享有合法权利。但对于非自愿丧失占有的财产(比如盗窃、遗失),占有者在面临原告追索时需要提供其权利的前手来证明财产来源的正当性,或是接受神明裁判的裁决。^[2]类似的规定也出现在《汉谟拉比法典》中,如该法典第2条规定:如果指控一个人从事巫术,在没有证据证明时,被指控者要经过水审的考验。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是法律非理性化时代的产物,虽然它有利于迅速地裁决纠纷,但缺乏公平合理的因素。

大约到了公元2世纪,罗马法学产生了较为理性化的举证原则,罗马法学家保罗将这一原则阐述为,“举证要求在于确认者,而非否定者”。^[3]根据罗马法学家的观点,如果一个人所声称的事实对其有利,如果这一事实并非是众所周知的,或者对方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否认,那么声称者必须证明这一事实的存在。因此原告必须对其诉权所依赖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他只需要按照常规方式来证明权利存在的事实,而无需证明导致其权利终结的事实。比如在债务诉讼中,原告只需证明其债权存在的事实,而无需证明债务没有被清偿的事实;在侵权诉讼中,原告必须证明被告实施了伤害的事实和所造成的损失,以及被告存在过错等事实。^[4]随着中世纪罗马法的复兴与罗马教会对神明审判的禁止,罗马法的举证规则逐渐取代了日耳曼法的证据规则,成为现代各国普遍采用的举证方式。

二、法律假定及其类型

罗马法举证规则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因为它与实体法中的法律假定密切相关。之所以要“谁主张谁举证”,是因为主张者声明的事实与法律所假定的事实不符。因此,法律中的假定实际上是举证责任合理分配的基础。

所谓法律中的假定,是指法律或法官对某些事实情况所作的一种推定。按照17世纪法国私法学家鲍迪埃^[5](P527)的观点,法律上的假定可以定义为法律或个人关于事物真相的一种判断,是通过从另一事件推论出的结论作出的,这种判断是建立在通常情况下会发生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法律上的假定是法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以经验主义和理性分析为基础的。早在古典罗马法时代,罗马法学家们就发现,对于某些法律事实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来看,并不需要过多的证据来证明,或者对于某些事实的发生当事人根本不可能提供相关的证据来证明

时,法律往往会对这类事实的发生或权利的存在作出一种假定。比如在合同法领域,书面契约的解除被假定为债的清偿,在错债给付诉讼中存在有利于债权人的假定,以及关于死亡顺序的假定和妻子财产源于丈夫的假定等。^[6]对于罗马法中的假定,中世纪的罗马法学者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形成一种法律假定理论,并被后世大陆法学者和普通法学者所继承。

按中世纪罗马法学家的观点,法律中的假定可以分为3类:法官假定(prasumptio boninis or iudicis)、法律假定(prasumptio juris)和基于法定的前提由法律推定的假定(prasumptio juris et de jure)。^[7]对于最后一种假定,中世纪意大利学者Menchius^[8]作了详细的分析:之所以命名为“prasumptio juris”,是因为它是法律作出的假定;之所以命名为“de jure”,是因为法律将这样的假定视为真实,并基于此而建立确定的权利。法律不仅假定某种情形为事实,并且规定必须按真实来对待,不可以规避或通过相反的证据来反驳其存在。普通法学者通常将这种假定称为“不可反驳的假定”,比如普通法关于7周岁以下的儿童无犯重罪能力的假定;在统一票据法中,票据持有人经过合理的期限后,其前手对其进行有效交付的假定等。^[9]在大陆法中,这样的假定同样大量存在,比如有关民事行为能力年龄阶段的假定,破产宣告前某段时期内转移财产为非法的假定,以及取得时效的假定等。由于这一类假定根本不允许相反的证据来反驳,所以有学者认为这种不可反驳的假定根本就不是假定,而是一种实体法规则,它与我们要讨论的证据问题没有多大关系。

与举证责任相关的假定都是可反驳的假定,即中世纪罗马法学家所分析的法官假定和法律假定。法官假定是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凭借理性思维和日常经验,结合事件发生的环境和行为人的先期行为而作出的推定。比如,根据通常人的理解或交易习惯,债务人的借款借条通常情况下都是由债权人占有的,如果借条已经转由债务人占有,则意味着借条所载明的借款数额已经清偿。在普通法理论中,这类假定常被称为“物自证其身”原则,即事物本身就可以说明其真实情况应该如此。但经验常识和逻辑思维并不一定是绝对可靠的,如果有相反的证据证明,这种假定就可以被推翻。

所谓法律假定,是指对于某些不确定的事实或权利状态,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立法者对事件的真实情况和权利的归属作出的一种假定。与法官假

定不同的是,法律假定是法定的,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出现,否则法官必须坚持这种假定。这种假定可以是明示的,通过具体的法律条文明确地加以规定,其比较常见的有:继承法中的死亡顺序假定,婚姻法中的“生父身份假定”,夫妻财产共有假定,以及相邻财产共有假定等;还有一些法律假定则是隐含的,尽管法律条文本身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根据该法律的基本原则或法律的基本政策,理当存在这样的假定,否则将违背法律的基本精神,比如占有者权利假定,无罪假定等。占有者权利假定,源于日耳曼法中的动产不可追溯原则,后经法国私法学者的改造,最终为法国民法典所采纳,成为了一种明确的法律假定,即占有等同于权利凭证。^[2]在我国物权法中,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这一假定,但基于占有理论实质上也认可这种假定。不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前那些被认为难以证明的情形越来越少,在私法中明确规定的假定已不多见,更多是交由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判断。

三、法律假定的基本原则

通过比较分析发现,无论是罗马法还是现代私法,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法律假定。这些法律假定是立法者理性思考的产物,立法者作出法律假定所坚持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3条。

1. 社会秩序原则

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无论哪个国家的法律都会把维护社会秩序作为法律最基本的价值追求。稳定意味着对一种现状的维持,为此法律必然基于既存现状的正当性作出一般性的假定,同时将对既存状况的破坏视为一种反常。只有在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里,人们才会有安全感。而安全这个曾被启蒙时期的自然法视为基本人权的概念,首先意味着每个人的人身和财产不受无端的侵害。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人们可以自由地生活,不必有丧失财产和自由的恐惧。为了保障这种自由的秩序,法律必须对自由与财产作出两个最为基本的正当性假定:一切处于他人占有之下的财产,其占有者均假定为合法权利人;一切自由人均具有正常理性的无辜者。任何试图推翻这种假定的人,必须提出充分的反证。如果缺乏这两个基本的假定,则意味着每个人的自由和财产安全会受到威胁。因为如果人们所占有的财产没有被假定为合法,人们就必须时时拥有自己每一份财产的合法凭证;如果每一个不被假定为无辜者,那么在遇到他人

的侵害指控时,他就必须证明自己的清白。

2. 经济效益原则

对于某些情形,凭借社会经验或相关的科学知识即可作出判断,如果严格地按照证据法的要求予以确证的话,势必会造成不必要的时间、金钱和精力上的浪费。比如,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妇女的怀孕期不会少于180天,也不会超过300天。因此,意大利民法典有关“怀孕假定”的条款就推定:如果在婚姻解除后超过300天生出的孩子,则假定为非法出生(意大利民法典第233条),没有必要再通过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再比如,继承法中的死亡顺序假定,早在罗马法时期,针对多位亲属在同一事故中同时遇难的情形,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法律总是假定长辈先于晚辈死亡。如果没有这种死亡顺序假定,为了探明真相势必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且会导致财产继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为了便于继承纠纷的迅速解决,法律只得作出长辈先于晚辈死亡的假定。还有一些情况是因为时代久远,其真实情况已经无人所知,为此法律只能作出一种折衷的假定。比如,对于两个相邻不动产之间的分界物,在所有权归属不明时,法律假定该分界物为相邻不动产所有人共有。法国奥尔良地区习惯法就曾规定:处于两块连续地产之间的高于7尺的墙为双方共有,如果一方将某物放置墙上,另一方无权加以阻止,放置方也无需提供共有证明。^{[5](P529)}在我国物权法中,对于共有,类型不明的共有法律假定为按份共有,这是因为按份共有更方便财产的管理,在发生纠纷时也便于财产的分割。

3. 法律政策原则

在制定法律时,立法者往往会将其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在法律中得到体现。因此,对于某些法律上不确定的情形,法律会作出符合其政策要求的假定,而不会与之相反。比如,关于夫妻财产的假定,由于立法者政策的变化,法律会作出不同的假定。在古罗马时期,罗马法的假定是已婚妇女的财产被假定为其丈夫所有,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证明。^{[10](P33)}但到了17世纪,法国私法学家鲍迪埃^{[5](P529)}就认为,同一地方的夫妻,习惯上应该认为婚姻期间的财产为双方共有,法律应假定他们之间存在关于财产共有的协议,妻子因此有权从其丈夫继承人处获得丈夫所拥有财产的一半份额,并且妻子也没有义务提供这样的证据。这种夫妻财产共有假定也为我国婚姻法所采纳,基于男女平等的政策,我国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财产共有。但这一规定仍然是一种法律

假定,因为当事人可以通过第19条规定的内容(夫妻可以约定夫妻财产的归属)来推翻它。再比如意大利民法典中的“生父身份假定”(意大利民法典第231条):在婚姻存续期间,丈夫为该期间所生子女的生父。这种假定最初源自罗马法,罗马法学家保罗认为:子女的生母总是确定的,尽管她可能与他人也发生过关系,但子女的生父仍然为生母婚姻关系中的丈夫。^[11]这种生父身份假定的理由不只是基于实践需要,或是社会学、统计学方面的考虑,这种法律上的假定主要是出于对婚外性关系的一种否定。^[12]所不同的是,在古罗马,这种假定为不可反驳的假定^{[10](P80)};而在现代社会,这一假定已经转变为可反驳的假定了,但其包含的政策倾向依旧未变。

四、法律假定的司法价值

1. 决定举证责任的分配方式

法律假定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推定,这种推定是可以通过相反的事实来推翻的。然而由谁来承担推翻法律假定的义务,这便涉及到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在证据法中,举证责任分配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凡是对法律上的假定提出质疑的一方,就有义务提出证据来反证,也即质疑法律假定的一方需要承担举证责任。同时,由于法律假定所涉及的利益大小不同,法律对质疑方的证据要求和证明标准也存在差别。比如,人身自由为一个人最为根本的价值,因此如果要推翻对一个正常人的“无罪假定”,那么对举证者的证明要求也就极为苛刻。在普通法中,这一证明标准是达到“排除合理的怀疑”。而对于私法领域的“无辜者假定”,质疑者所提出的证据只达到“优势证据”的标准即可推翻这种假定。法律假定的受益者如果需要增加假定的强度,就需要提供更为优势的证据来推翻质疑者的反驳。证据标准的差异是因为两者承载的价值风险不同:“无罪假定”一旦被推翻,被告人丧失的可能是自由与生命;而“无辜者假定”一旦被推翻,无辜者损失的更多的只是财产。

2. 指导司法的正义选择

当纠纷产生时,法律上的假定一定会有利于纠纷的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在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假定并非持中立的立场,它会将复杂的举证负担强加给一方,并审查反驳者所举证据的可信度与证明力。法律假定本身的偏向性,导致在个案问题处理上难免会存在不公正的情形,甚至会达到不能容忍的程度。比如,在债务纠纷中,债权人出于

信任而没有留下任何借款凭证,一旦债务人拒不还款,债权人可能会没有任何手段来推翻“无辜者假定”。法官在假定未被推翻情况下只能将假定视为事实,不可能出于对受害人的同情而判决债务人还款。无疑,此时的“无辜者假定”就变成了背信弃义者的帮凶。为此,我们要追问的是:法律假定为何要具有这种偏向性?实际上,法律假定所表现出的某种偏向不是针对个案中的当事人,而是为维护更为一般性、更具有根本性的价值。法律假定本身就是对诸多价值进行分析取舍的结果,为了追求更为普遍的正义,法律有时不得不以牺牲个案的正义为代价。在不能推翻“无辜者假定”的情况下,法律只能漠视债权人的利益。“有侵害必要救济”的格言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理想,至少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五、结语

有人类必有纠纷,法律只不过是立法者为其所能预测的纠纷提供正当性的裁决标准。对于某些可能有争议的事实,基于社会安全、经济效益或是某些重要的法律政策考虑,法律常常会作出某种假定以便于纠纷的迅速解决。这类假定虽然都是可反驳的,但反驳者必须承担举证责任,通过证据来推翻这种假定。在无可反驳的情形下,法律假定即为事实。在侵权诉讼中,指控他人侵权实际上是在反驳一种“无辜者假定”,因此受害人必须承担证明责任,来证明侵害事实的存在和因果关系的发生。在没有任何证据反驳的情况下,被指控者即为无辜者。

在笔者看来,当下“救助恐惧症”日益严重的原因,并非只是社会道德水平的低下,司法对法律假定问题的忽视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诱因。在侵害纠纷发生时,司法机关总是从救济受害人的角度出发,将受指控者推定为侵害者。这种试图为了每一种伤害都假定出侵害者的冲动,只会给众多的无辜者带来威胁。一旦发生某种伤害事件,因担心受指控后无法自证清白,人们难免会害怕与受害者发生直接关联。尽管我们并不排除存在具有高尚情操的人,但法律制度的设计不应以道德人为基础,私法所调整的对象永远是“既理性又利己的经济人”。^[13]如果不承认人性这一弱点,法律非但不能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反而会使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变得更加脆弱。

基于这种人性考虑,缓解“救助恐惧症”的有效方式就不只是高喊空洞的道德口号,或是对普通人提出圣人般的道德要求,而是要回到法律层面本身,

承认基本的法律假定,从而使救助者获得一定的安全感。只有这样,在危难发生时才会有更多的人敢于出手相救。对于受害者来说,法律对他的要求不只是“主张谁是侵害者”,更为重要的是要“证明谁是侵害者”。不可否认会出现这样令人遗憾的情形:受害人仅仅是因为自己反驳能力的缺失而不能证明谁是侵害者,从而因难以获得补偿而陷入困境。然而即使要对无助的不幸者予以救济,承担救济责任的也应该是社会与国家,而不应该是将它强加给一个无辜的第三者。否则,当救助者连基本的救助安全感都得不到保障时,道德情操也只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参 考 文 献]

- [1] Engelmann. A History of Continental Civil Procedure[M].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27.
- [2] 王华胜. 私法制度如何生成——善意取得制度的发生学解读[J].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1): 63.
- [3] Greenidge. The Legal Procedure of Cicero's Time[M]. London: Clarendon Press, 1901: 229.
- [4] Bernhard Erwin Grueber. The Roman Law of Damage to Property[M]. New Jersey: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2004: 258.
- [5] Robert Joseph Pothier. A Treatise on the Law of Obligations' or Contracts[M]. London: A Strahan, 1806.
- [6] James Williams. The function of evidence in Roman law[J]. Law Mag & L Rev, 1894(19): 279.
- [7] Andrew MacDowall Bankton. An Institute of the Laws of Scotland in Civil Rights[M]. Vol 2. Edinburgh: R Fleming, 1752: 667.
- [8] Alexander M Burrill. A Law Dictionary and Glossary[M]. New York: John S Voorhies, 1860: 323.
- [9] Paul Brosman. The statutory presumption[J]. Tulane Law Review, 1930(5): 17.
- [10] George Mousourakis. Fundamentals of Roman Private Law[M]. Berlin: Springer, 2012.
- [11] Monro C H. The Digest of Justinian[M].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74.
- [12] Guido Alpa, Vincenzo Zeno-Zencovich. Italian Private Law[M]. London: Routledge, 2007: 64.
- [13] [日]星野英一. 私法中的人[M]. 王闯, 译.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 7.

(上接第 27 页)

[参 考 文 献]

- [1] 王姝. 预算法修订背后的权力配置之争[N]. 新京报, 2014-05-13(A16).
-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Z]. 2000: 52.
- [3] 田俊荣. 外汇储备是谁的?[N]. 人民日报, 2011-12-17(017).
- [4] [澳]布伦南, [美]布坎南. 宪政经济学[M]. 冯克利, 秋风, 王代, 等,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5] 张艳. 关系契约理论对意思自治的价值超越[J]. 现代法学, 2014(3): 73.
- [6] 葛克昌. 行政程序与纳税人基本权[M]. 台北: 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2: 26.
- [7] 吴建华, 罗卜. 公共权力的异化和制约[J]. 哲学研究, 2003(9): 31.
- [8] 郭庆旺. 公共经济学大辞典[K].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243.
- [9] 蓝元骏. 熊彼特租税国思想与现代宪政国家[D]. 台北: 台湾大学, 2005.
- [10] [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货币的非国家化[M]. 姚中秋, 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7: 114, 36.
- [11] [美]唐·帕尔伯格. 通货膨胀的历史与分析[M]. 孙忠, 译.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8: 1.
- [12] 林纪东. 比较宪法[M].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0: 364.
- [13] [日]芦部信喜, 高桥和之. 宪法[M]. 3版. 林来梵, 凌维慈, 龙绚丽,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15.
- [14] 杨志恒. 预算政治学的构筑[M]. 台北: 财团法人张荣发基金会, 国家政策研究中心, 1991: 201.
- [15] 王绍光. 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J]. 读书, 2007(10): 3.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4)05-0033-04

当前我国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理论基础

——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分析

杨洋, 章兴鸣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 发掘分析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背后的理论依据, 将有效说明这一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以巴黎公社的“公仆”观、马克思恩格斯的收入分配公正思想、列宁的公开性原则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 对当前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均具有理论指导意义。这些经典理论从体现公职身份的本质属性、维护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3个方面对构建中国特色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有着积极的启示, 可以为该制度的实施扫清认识上和思想上的障碍。

[关键词] 公职人员; 财产公开制度; 反腐倡廉;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

[中图分类号] D630.9; A8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4.05.007

科学有效反腐的前提是加强权力制约, 而权力制约的前提是公开透明。财产公开作为公开透明的重要方面, 具有使人不能腐的效果。财产公开制度在西方国家有着“阳光法案”之称, 至今诞生已有240余年,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发挥着有效的防腐作用。而在我国, 公职人员财产公开一直未能实施, 在学术界也存在着诸多讨论。例如, 李占乐^[1]认为财产公开现在面临的阻碍因素主要包括高层领导对实施后果的担心、官员群体的阻力、民众的思想观念偏差和社会配套制度不完善4个方面; 袁东生^[2]从实践中总结了我国财产公开制度的推行路径: 沿着先党内后党外、逐渐扩大公开财产的范围、逐渐扩大公开的主体范围、先完善配套措施后全面公开的路径推行。目前关于此问题的理论探讨多集中在一些实施困难和对策细节的实证研究上, 缺乏理论根源的深度挖掘。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中, 发掘财产公开制度的理论依据, 以期有助于我国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的施行。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财产公开的理论资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虽没有集中明确地提到财产公开问题, 但是可以从中发掘出一些有价值的思想, 这对我国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实施具有指导意义。

1. 巴黎公社的“公仆”观

公职人员公开财产接受人民监督, 是马克思主义公仆观的必然要求。巴黎公社的“公仆”观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的核心内容, 是关于反腐倡廉思想最集中的反映, 其中一些论述对于公职人员财产公开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支撑。1871年3月, 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成立,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其实践经验时首次提出了“公仆”观。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实质和特征时说: “公社的领导成员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 而是由人民选出, 受

[收稿日期] 2014-08-20

[基金项目] 2013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DSD011)

[作者简介] 杨洋(1990—), 男, 河南省信阳市人, 江南大学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公共政策与政治传播; 章兴鸣(1975—), 男, 湖北省浠水县人, 江南大学副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公共政策与政治传播。

人民监督,废除了一切特权的人民的‘勤务员’‘公务员’‘公仆’。”^{[3](P12)} 身为公职人员,究竟是做官老爷还是做人民的公仆,这是评价一个现代国家民主制度的重要指标。公职人员如果变成老爷,就会利用手中的公权,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把自己摆在支配人民的位置上,窃取社会主人的地位来统治人民,以便为自己谋取私人利益。为人民大众服务,按照人民赋予的权力为群众谋福祉并接受人民的监督,是公仆的职责所在。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采取了两个办法。第一,……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与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3](P12-13)}。恩格斯在这里所提到的让国家公职人员工资与工人相同,就是取消干部待遇上的特殊化。只有使公职人员在经济条件上与人民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才能使他们在工人阶级政权下的社会公仆本色得以显现,才能使他们贴近群众,为人民服务。

马克思恩格斯还对公职人员如何公开财产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工资收入水平上对公职人员提出了要求,而且也提到了财产如何公开的问题。“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律公布出来,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让公众知道”^{[3](P65)},这句话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公职人员要敢于公布自己的言行并敢于暴露自己的缺点。公职的身份体现在公共的政治权力上,而“政治权力需要受到选民给予他的限权委托书(正式指令)的约束”^{[3](P66)}。因此人民的监督是保障政治权力不被侵蚀的重要方式,能有效防止公权的违规滥用。而财产公开是人民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的一个重要途径,这将大大消除财产上的特权,化解公权力的扭曲外壳,使其更好地服务大众,从而降低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可能性。

2.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收入分配公平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收入分配公平的思想也是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理论依据。该思想衍生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公平正义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对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异化的批判,其核心思想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阐述为:只有到未来社会(共产主义)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P305-306)}。马克思恩格斯的收入分配公平思想在共产主义初期(社会主义阶段),表现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即一个人的劳动收入与他对社会

的贡献应是大致相等的。因此,对一个公职人员来说,其经济收入的多少应主要是由他的工作劳动来决定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有过专门明确的论述:“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3](P12)} 如果公职人员利用社会公共资源为其私人谋取利益而使其个人真实收入远大于应得的劳动所得,并且与普通劳动人民的收入形成了巨大差距时,就不符合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内涵和要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职人员的收入应符合“按劳分配”原则,这也就注定了公职人员的收入不能与社会普通工薪阶层的平均收入水平相差太多。然而,现阶段我国一些公职人员除了工资福利性收入以外,往往还有大量的“灰色收入”,造成了公职人员与普通群众之间收入水平差距悬殊的事实,这明显违背了社会主义制度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收入分配公平的思想。因此,为了防止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社会公有资源为私人谋取利益,对其个人家庭财产进行公开以反映其经济收入的真实情况,是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公平性的内在要求。

3. 列宁的公开性思想

(1)列宁的公开性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列宁在领导苏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对政(党)务、舆论、审判等一些涉及公开性的事务有过大量经典论述,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列宁的公开性思想,其中财产公开是其核心。公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和必然要求,是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权利的重要途径。实行国家事务公开,增强国家管理的透明度,是巩固和保持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信任基础。关于公开性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列宁是这样回答的:“大家大概都同意广泛民主原则主要包括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只限于对本组织成员的公开。”^{[4](P131)} 这是列宁关于公开性思想最著名的一段论述,是其公开性思想本质的反映,这为财产公开又提供了一段重要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关于民主政治原则,列宁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论述:“对于党员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举一动进行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监督”,“完全公开、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作用,能保证每个活动家最后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他的能力的工作,亲身尝到自己的错误的一切后果,并在大家面前证明自己能够认识错误和避免错误”^{[4](P132)}。对于财产公开亦当如此,应该

用财产的清廉性来决定一个公职人员在政治生活中是否应该被淘汰,而评判清廉的标准来源于其个人家庭财产的数目。

(2)列宁公开性思想中关于主体范围的论述。首先,公开应该从高级干部做起。列宁的公开性思想中与财产公开理论最贴切、最接近的论述当是“全党必须系统地、逐步地和坚定不移地为中央机关培养称职的人,对每个准备担任这种高级职位的候选人的全部活动了如指掌。甚至了解他们的个人特点,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他们的成功和失败”^{[4](P88)}。对每个担任高级职位的候选人的全部活动了如指掌,应该包括对他们的经济活动状况进行了解,应当说经济活动应该是这个了解中最核心的部分,因为它最能反映出一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品行。因此,公职人员财产公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的一部分,是落实人民监督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重要途径,这对于反对官僚主义和预防权力腐败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其次,值得提出的是列宁公开性思想的主体并不只局限于党内,他讲道,“不仅担任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而且担任负责工作的所有公职人员,……都应当作这类工作报告”^{[4](P245)}。文中原意是指要向人民做出实事求是的工作报告,其主体应该涵盖所有公职人员,这个主体范围的说明对财产公开同样适用。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对当前财产公开的适用性

1. 财产公开是公职人员“公仆”身份的本质体现

在当前我国的政治制度中,巴黎公社“公仆”观与财产公开理论相衔接的部分表现为3个方面:一是公职人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公职人员必须由人民选举并接受人民监督,三是公职人员应与人民同甘共苦。在社会主义国家担任公职,应当抛弃过去旧体制中“官老爷”的思想,应该视人民利益为第一位。“当官只为求发财”的心态跟“为人民服务”的从政理念完全悖逆,腐败的盛行必然带来人民福祉的损失,利益诱惑的驱使只会让其在背离“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同时,人民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对财产进行监督是其至关重要的一环。因为权力失去监督必然会导致腐败,腐败获得私利,公权被滥用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私人利益的增长。通过财产公开,私人财产的数目可以反证其政治生活的清廉,

这也是对权力进行可行性、有效性最强的一种监督手段。与人民同甘共苦的直接表现就是物质待遇上的一致性,“与工人同酬”就是取消公职人员在财产上的特权,这是“公仆”身份属性和形象的必然体现。

2. 财产公开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公平正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收入分配公正思想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所谓形式公平掩盖下的不公正事实进行了批判,认为社会公平正义的评判标准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否相一致,并强调没有绝对化的社会公正,社会公正只能是一个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阶级的渐进式发展过程,其核心内容就是最终在未来社会达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汲取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邓小平同志提出我国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只能从实际国情出发,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这在本质上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收入分配公正思想一脉相承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允许其通过合法手段致富。如果通过非法手段谋利,那么就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而贪污腐败的公职人员就属其中一种。因此由于贪腐行为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是最不能允许的,它与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严重不符。

3. 财产公开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列宁的公开性思想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因为由于受到现阶段我国国情和生产力的限制,全体人民还无法直接参与国家政权的管理,只能通过各种形式的监督间接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管理。实行公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是把群众对公权力的监督落到实处的重要途径。财产公开作为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和内容,是国家和政府预防腐败的必要前提。如果不这么做,一些公职人员可能借助公权牟取私利,与人民群众的财产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这将会导致执政队伍与人民群众的脱离,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成为一句空话。对包括公职人员财产在内的涉及大多数群众根本利益的事务实行公开,可以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与监督的积极性,加强群众与政府之间的政治互信,提高公职人员在群众中的威信,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向前发展。

三、中国特色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理论基础构建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了“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以及健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机制,领导干部需要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并计划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5]。由此可以看出,中共中央计划推行公职人员财产公开的目的中涵盖了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以及健全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几个方面,而这些都能从上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找到依据和联系。具体说来,构建中国特色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理论基础,我们应主要从以下4个方面着手。

首先,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支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这个根本不能丢。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有关反腐倡廉的思想一直以来都在指导着我国公务人员廉政教育的实践,而反腐不仅仅要靠教育,更重要的还在于预防。因此,构建我国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理论基础,需要继续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关理论思想为指导。

其次,在当代中国,需要不断汲取国外的一些先进理论与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地消化吸收后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便形成我们的中国特色。构建我国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理论基础亦是如此。不可否认的是,财产公开制度起源于西方、发展于西方,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深厚的理论根基和制度体系,其中,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公共利益优先原则是西方思想中与财产公开联系最为紧密的两个经典理论。因此,西方关于财产公开的理论思想在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情况下,可以拿来借鉴、为我所用。

再者,中国特色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理论基础构建还需要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理论资源,包括儒家、道家、法家等各家学说,以及名家诗词古句中所蕴涵的反腐倡廉思想。因此,利用根植于中华大地的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来构建财产公

开制度,将会更适应我们的传统人文观念,也更有利于这项制度的推广实行。

最后,不管是坚持马列主义思想,还是借鉴西方经典理论或是继承传统文化思想,构建中国特色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理论基础,都需要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国情。任何教条式的照搬照抄都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因此,需要充分考虑到目前我国公民社会不断增强的权利意识、彻底防治腐败的迫切需要、提高党和政府公信力的应然之义,以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以此为背景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

四、结语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理论资源的挖掘,寻找财产公开制度的理论依据,可以为该制度的建设扫清认识上和思想上的混沌与障碍。其结论是:人民主权和权力监督的原则是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理论基础的核心观念,它体现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不断摸索前进的过程,民主政治的完善也是一个渐进式的发展过程。在当前文化思潮多元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借鉴国外先进思想和成功经验,根据我国国情,构建有效的中国特色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以成功治理腐败问题。

[参 考 文 献]

- [1] 李占乐.我国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阻碍因素及其消解[J].理论月刊,2012(2):91.
- [2] 袁东生.我国官员财产公开的现状、问题和解决路径[J].理论视野,2010(11):49.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5] 新华网.授权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13-11-12)[2014-08-10].http://www.sn.xinhuanet.com/2013-11/16/c_118166672.htm.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4)05-0037-06

论“阿拉伯之春”运动 对中阿合作论坛的影响及应对

杨帆

(武汉大学 国际法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2004年成立的中阿合作论坛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沟通的重要平台,其创造性地构建了发展中国家之间合作的新范式。中阿合作论坛成立10多年来为中阿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各方面交往的深入发展,中阿合作论坛的相关机制在某些方面已无法满足双方日益增长的需求,尤其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以来,阿拉伯国家联盟内部权力结构面临的重组,域外国家如美国在该地区活动的加强,中国与伊朗、以色列外交关系的处理,对中阿关系和中阿合作论坛的进一步发展均产生了严峻挑战。有挑战就有机遇,有必要理清当今阿拉伯世界格局,适时调整相关外交政策,抓住机遇推动中阿合作论坛向更高水平的合作模式演变。为此,首先,应将国际法作为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点,不仅自己的行为要符合国际法,而且还要倡导用国际法来解决双边或地区热点问题;其次,应确定对阿外交的重点国家和地区,以经济合作促进政治交往;再次,中国的外交政策应坚持国际正义;最后,在对阿关系中要进行全面交流,不应仅限于政府间对话。当前,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完善中阿合作机制:一是提高中阿合作水平;二是借鉴国外相关经验;三是重视人文交流,加强软实力建设。

[关键词] “阿拉伯之春”运动;中阿合作论坛;中阿关系;中东局势

[中图分类号] D822.3;D815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4.05.008

2004年1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了设在埃及开罗的阿拉伯国家联盟(以下简称“阿盟”)总部,会见了阿盟秘书长阿姆鲁·穆萨和22个阿盟成员国代表,会见结束后,李肇星处长与穆萨秘书长共同宣布成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以下简称“中阿合作论坛”),以深化双边合作。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中阿双边关系由新型伙伴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中阿合作论坛在双边合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取得了丰富成果,具体表现在:第一,论坛机制更加健全。建立了部长级会议和高官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政治磋商、企业家大会暨投资研讨会、文明对话研讨会、环保合作、高教科研、友好大会、能源合作大会、新闻合作论坛、互办艺术节、人力资源培训10余项合作机制,为增

进双方政治互信、解决贸易争端创造了良好的平台。第二,论坛涉足领域日趋多元化。论坛由最初的政治、经贸合作发展到科技、教育、核能利用、反核扩散、环境保护、农业、文化、新闻出版等更宽更深领域的合作。第三,作为双边合作重中之重的经贸领域,更是取得了重大进展。中阿双边贸易额从1999年的80亿美元增长至2013年的2410亿美元,预计2014年双边贸易额将达3000亿美元。^[1]

尽管中阿合作论坛对双边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受到了双方高层和民众的一致肯定,但是合作论坛本身并非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其做出的宣言、发展计划、执行计划本身并无法律约束力,需要双方本着道义上的要求去实施,因此中阿合作论坛属于软法机制,处于国际合作中的

[收稿日期] 2014-07-15

[作者简介] 杨帆(1990—),男,安徽省宿州市人,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国际法基本理论。

低端层次。另外,阿盟成立的时间较早,但由于世俗政体与伊斯兰政体、伊斯兰内部逊尼派与什叶派、地区大国与小国之间的矛盾重重,其在超国家一体化方面的进程远远落后于成立时间较晚的欧洲联盟,因此阿盟内部矛盾也成为限制中阿合作论坛合作水平升级的重要因素,这要求中方要注意协调与阿方不同利益体之间的关系。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2011年开始发酵的“阿拉伯之春”政治运动,改变了阿盟内部的权力结构,以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为代表的传统地区强国力量受到削弱,卡塔尔、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为“海合会”)国家逐渐掌握了阿盟的对外话语权,这要求中方重新审视与阿盟内部国家的关系,及时调整外交政策,以适应新的中东局势。

受2011年西亚和北非动乱的影响,我国虽然成功进行了利比亚撤侨运动,保护了海外华侨的人身安全,但也遭受了重大的投资财产损失,因此从保护我国的海外利益出发,深化发展中阿战略合作关系,提高中阿合作论坛的水平就成了当务之急。首先,必须对当今中东局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认清中阿合作论坛深化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其次,在此基础上调整我国的对外政策,以排除限制中阿合作水平提升的政治因素;最后,针对论坛本身的制度缺陷,通过完善制度设计,使论坛更有效地服务于双边关系和中阿务实合作。

一、后“阿拉伯之春”时期中阿关系面临的挑战

1. 阿盟内部权力结构的重组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使伊拉克在中东的影响力遭受重挫,同时以逊尼派为统治根基的伊拉克萨达姆政府的倒台,也大大削弱了逊尼派在中东的势力。2006年当选伊拉克总统并在2010年获得连任的马利基则代表着正在崛起的伊拉克什叶派力量,加上一一直具有独立倾向的库尔德人,三股势力在伊拉克明争暗斗,形成了北部的库尔德人势力、南部的什叶派势力和东部的逊尼派势力割据的局势。由于伊拉克的什叶派势力与伊朗遥相呼应,阿拉伯历史上的传统宿敌有联合的趋势,这样,正如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所言:伊朗经伊拉克南部、叙利亚直到黎巴嫩南部正在形成“什叶派新月地带”,这将对逊尼派国家产生重大威胁。^[2]面对这一情形,逊尼派大国沙特打算向伊拉克逊尼派提供武器和资金援助,以抑制伊拉克国内的什叶派势力,消除其对逊尼派阿拉

伯国家的威胁。因此,尽管伊拉克如今在中东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但其局势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沙特和伊朗的实力对比,进而影响整个中东局势,伊拉克依然是各国在中东战略布局的重要环节。

“阿拉伯之春”运动表面上看源于阿拉伯国家人民要求改善民生、对民主的诉求,其深层原因源自于2004年美国提出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3]。该计划的初衷是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对阿拉伯国家进行民主化改造,一方面彻底改变滋生恐怖主义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扩大美国的影响力,增强这一区域人民对美国价值观的认同。但是随着该计划的实施,其产生的结果适得其反:民主选举导致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黎巴嫩的真主党、伊拉克的什叶派等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通过合法形式取得政权,原有的矛盾和冲突大大激化,伊斯兰极端主义进一步蔓延,恐怖主义更加猖狂^[4],民主诉求逐渐成了伊斯兰主义政党冲击世俗政体的幌子。沙特趁此机会扩张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势力,通过资金援助等方式向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推销“萨拉菲威权主义”,并产生了积极效果。2011年10月23日,突尼斯“复兴运动”在制宪议会选举中获得41.47%的选票。2011年11月27日,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在立法选举中获胜。2011年11月28日,埃及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和萨拉菲派光明党在人民议会选举中分别获得47.2%和24.7%的席位,两党在2012年1月29日举行的协商议会选举中又分获59%和23.9%的席位。2012年7月17日,利比亚“全国力量联盟”和“公正与建设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分获48.8%和21.3%的席位。伊斯兰主义力量在部分海湾阿拉伯国家也呈现上升趋势,2012年2月2日,科威特伊斯兰派别及其盟友党派候选人在国民议会选举中共获得42%的席位。^[5]

尽管埃及军方的干预致使穆斯林兄弟会下台在一定程度上对沙特重塑其在中东的影响力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是众多世俗政体的倒台、伊拉克民族宗教矛盾的加剧和叙利亚的内忧外困,促使伊斯兰逊尼派力量在中东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客观上大大增加了沙特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不可忽视的是,卡塔尔利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一直试图扮演维也纳体系中奥地利的角色,不断地在地区冲突中斡旋,尽管并未提出任何有利于解决争端的方案或缓解事态的积极措施,但确实通过其金融实力在斡旋中提高了自身的影响力,与沙特一并主导着阿盟的话语权。

“阿拉伯之春”运动所导致的阿拉伯地区权力

结构的调整,将会对中阿合作论坛产生重大影响。首先,由于地区局势动荡,轴心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埃及、叙利亚近两年都将精力集中在国内事务上,“高官会”“部长级会议”等论坛机制无法正常运行,如在2012年中阿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一些国家仅派部长级以下代表参加,阿拉伯国家对论坛重视不够可见一斑^[1],同时会议期间所达成的协议的效力也不能令人信服。其次,阿拉伯内部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的影响力下降,海合会国家的影响力上升。最后,“阿拉伯之春”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中阿合作论坛的基础。中阿合作是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而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本属一国主权事物的国内变革却受到外部的干涉,如西方国家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干涉利比亚国内争端;海合会国家不仅要求叙利亚现政府下台,而且还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资金和武器援助,赤裸裸地干涉叙利亚内政。这些问题对于中阿合作论坛的深入发展均产生严峻的挑战。

2. 美国对中阿关系的影响

美国在中东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要遏制其他大国在中东势力的崛起,维持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要平衡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关系。美国对中阿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是经过“阿拉伯之春”运动,很多受影响的国家都将经历转型期,但转型进程并非一帆风顺。首先,民主改革的诉求被淡化,教派矛盾强化。其次,国家内部宗教势力与世俗政权对立严重,导致社会分化,如埃及。再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缓慢,无法解决严峻的民生问题,如利比亚石油和天然气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95%的财政收入和98%的出口收入均来自能源领域,然而2011年长达8个月的战乱导致利比亚石油出口几乎一度停止,2011年8月份利比亚石油出口跌至日均4.5万桶。^[6]最后,严重的社会动荡威胁社会稳定和人员安全。这些问题凭美国一己之力难以解决,美国需要借助中国参与的多边场合,使中东恢复到稳定和秩序的秩序中来。

二是伊朗核问题是地区安全的一大隐患,实现中东无核化固然符合阿拉伯各方利益,但就是否使用武力逼迫伊朗放弃核武器方面,美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存在分歧。阿拉伯国家反对对伊朗使用武力的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首先,出于安全考虑,在中东地区发生任何战争都不符合阿拉伯国家的利益;其次,武力打击伊朗将会严重刺激鼓吹政教合一、激

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他们不仅会对所在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更会威胁到世俗政权的统治;最后,伊朗在该地区的存在有利于制衡以色列,阿拉伯国家普遍认为,只要阿以争端还存在,有核国家以色列对自己的威胁是现实的,尚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对自己的威胁仅是潜在的^[7]。中国一直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反对任何国家以违反国际法的方式使用武力,在这一点上中阿看法一致,因此双方在维护中东地区和平方面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三是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东地区遏制中国崛起依然是阻碍中阿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因素。美国智库指出:“美国对中东的影响力正在受到中国的挑战,中国巧妙地利用了阿拉伯对美国政策的不满,同时中阿关系稳定发展,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长足进步,华盛顿无法忽视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的兴趣日益增长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8]为此,美国一方面加强与阿拉伯国家的安保合作,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以强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利用媒体的影响力,鼓吹“中国威胁论”,扰乱阿拉伯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和判断,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形象,减弱了他们与中国合作的热情和愿望。如西方媒体大肆渲染中国在苏丹只顾维护自己的石油利益,对巴希尔政府独裁统治没有尽到大国责任,这使中国的投资项目经常招致当地民众的骚扰,既损害了中国的投资利益,也恶化了当地的投资环境,于双方均不利。

“阿拉伯之春”运动是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持续影响的结果。如前所述,美国在中东推行的民主改造计划,不仅没有使阿拉伯国家走上民主的道路,反而使阿拉伯地区局势更加动荡,恐怖分子活动愈加猖狂,普通民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同时美国传统上将反恐与民族、宗教挂钩,在巴以问题上对以色列偏袒,这些因素使美国在阿拉伯国家民众中的形象进一步恶化。如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埃及民众对美国好感者的比例从2009年的27%下降到17%,其他伊斯兰国家民众对美国好感者的比例也基本上不超过人口的20%。^[9]但阿拉伯国家内乱频繁客观上增加了政局相对稳定、温和亲美的海合会国家在中东的影响力,致使短期之内美国在中东政策的推行不会遇到太大阻碍。这一情况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即在政治国家层面美国依然是中东最有力的存在,然而在市民社会层面美国的影响力日渐式微。这为深化中

阿合作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3. 中国与地区大国的关系对中阿关系的影响

这里的“地区大国”主要是指伊朗和以色列。中国与这两个国家均建立了外交关系,都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然而阿拉伯国家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复杂,因此中国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不免会对中阿关系产生影响。

(1)中伊关系。根据2014年霍普金斯学会报告,伊朗是中国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10.9%。^[10]中伊关系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的能源安全,因此伊朗一直是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重点。但我们也要认识到,阿盟主要国家一直将伊朗视为其最大的安全威胁,尤其是伊朗核问题,更是影响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是沙特等国与美结盟的主要动因。伊拉克战争客观上增强了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加大了阿盟国家的危机感,因此,妥善解决伊朗核问题,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符合中阿双方的利益。

(2)中以关系。以色列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则有广大的市场,由于这种互补关系,中以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有大量经贸往来。同时以色列由于与美国存在特殊关系,对中东局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巴以问题一直是中东和平进程的中心环节。由于阿盟内部在对以色列态度上存在分歧,埃及、沙特、卡塔尔等阿拉伯温和派持亲美立场,与以色列保持密切关系,而叙利亚、伊拉克什叶派力量、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持反以立场,与伊朗坚定地站在一边,这为中国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增加了难度。

综上所述,后“阿拉伯之春”时代,阿盟内部的权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埃及、叙利亚等国的影响力受到严重削弱,地区传统大国沙特和以卡塔尔为代表的国家掌控了阿盟的话语权。美国在这一区域依然处于主导地位,依然是影响中阿关系的重要因素。中伊关系和中以关系由于直接关系到阿拉伯国家自身利益,他们必然会要求中国妥善处理这两种关系并以此作为深化双边合作的前提。同时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传播也对阿拉伯地区民众产生影响,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权思想愈加受到重视。上述种种情况对中阿合作论坛的深化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当然有挑战就有机遇,当今,中东地区远没有成为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的后花园,相反在经历“阿拉伯之春”运动后,动荡局势还未平息,国家重建任重道远,这就为中国参与多边合作,密切与阿拉伯国家关系,进而为深化双边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阿合作论坛是处理中阿共同关切的问题、密切双边联系、促进双边共同发展的重要机制,从它成立至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中东局势的变化,对这一机制的有效性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新形势下发展中阿合作论坛成了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应从两方面解决这一问题:宏观上,应主动调整我国的对阿政策,为发展中阿合作论坛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微观上,应完善中阿合作机制,使之成为高效的、值得双方信赖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合作模式。

二、未来中国对阿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

中阿合作注定要面对复杂多变的中东局势,因此我们应客观、科学、实事求是地界定中国在中东的地位和能够发挥的作用,保持清醒头脑,以务实和创造性的外交,与时俱进地把握机遇,应对挑战。结合上述阿拉伯地区所经历的种种变化,以有利于中阿合作论坛的深入发展为宗旨,在与阿拉伯国家交往中中国应坚持以下基本立场。

第一,应将国际法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点。国际法是处理国际问题、引导国际关系良性发展的基本准则,应将国际法作为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点,不仅自己的行为要符合国际法,而且还要倡导用国际法来解决双边或地区热点问题。首先,“阿拉伯之春”运动导致中东局势动荡,地区均势被打破,地区新兴强国为了获取更大的话语权,会向这些动荡国家输出武器、资金,同时还会提供国际话语支持,以使该国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比如,沙特支持埃及穆兄会反对穆巴拉克的统治,以削弱埃及在阿盟内部的影响力;卡塔尔等海合会国家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反对巴沙尔统治的武装叛乱,以削弱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这些严重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不仅动摇了中阿合作论坛存在的政治基础(即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尊重和支持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而且也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不干涉内政”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受到了阿盟内部成员的反对。其次,伊朗核问题应当本着“禁止使用武力”、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予以解决。同时,由于核扩散关系到全球安全,因此伊朗核问题应在联合国框架内以多边的方式和平解决,相关国家应避免做出刺激性的军事行为或武力威胁,以避免伊朗以此为由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最后,应按国际法合

理处理巴以问题,反对任何一方使用武力或进行恐怖活动,尊重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决权,同时利用我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身份,积极为双方和平对话创造条件。

第二,确定对阿外交的重点国家和地区,以经济合作促进政治交往。正如前面所言,东盟内部已经出现权力结构的重组,传统大国衰落,新兴国家开始主导这一区域话语权。因此,我们的外交政策应保持灵活性,加强发展与海合会国家间的关系,积极推进中国-海合会国家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以经贸往来促进政治对话和政治谅解。同时,随着页岩气和页岩油的开采,估计美国的能源自给率在2030年将提高到99%,15年内美国可能成为能源出口国^[11],到时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将会成为中东能源产品的主要消费国,这将强化双方之间的相互依赖,未来可能的局面是海合会国家在安全方面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在经济方面与中国结为战略伙伴。因此,当前强化阿位伯国家与中国关系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

第三,坚持国际正义。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促进了西方思想在民众之间的传播,中国未来在这一地区的作为取决于中国投资者和中国政府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因此适时地支持当地民众的民主和改革诉求,不仅可以增进中国与阿拉伯民众之间的关系,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而且可以有效回击西方鼓吹的“中国威胁论”,消除阿方对中国心理上的戒备,有利于双方继续深化合作。同时,在灾区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参与战后国家重建,不仅有利于拉近与其民众间的关系,而且在战后重建这块“蛋糕”上可以分到属于中国的份额。

第四,在对阿关系中要进行全面交流,不应仅限于政府间对话。在一些中东和北非国家,民族国家的概念并不像世界其他地区那么深入人心,相当多的民众对自己家族、部落和教派的认同超越了对传统国家的认同。由于这种原因,具有国际性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在这些国家可能不会得到很好地执行,因为他们缺乏对国家履行责任的意识。虽然现在部落的政治影响力有逐渐削弱的趋势,但其作为民众的社会归属,在解决外国与本国民众的矛盾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后“阿拉伯之春”时代深化发展中阿合作机制的建议

受“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影响,中阿合作论坛暴露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阿拉伯国家对该论坛重

视程度不够,这可能是由于论坛本身合作水平较低,执行机制不健全,合作流于形式,不能有效解决阿方关切的实质性问题;其次,论坛内部各种机制混杂,缺乏统一协调,造成职能重复甚至冲突;再者,由于双方对彼此文化不熟悉,造成文化交流上的误解。因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以深化发展中阿合作机制。

1. 提高中阿合作水平,完善中阿合作机制

(1)强化中阿合作论坛的法律基础。奠定当前中阿合作论坛的文件是《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宣言》和《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行动计划》。从内容上来看,这两个文件并不包含调整国家间关系、确定双方权利与义务的规则、原则,对双方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因为这两个文件并不是国际法,双方都没有执行的义务。因此,为了加强对论坛的法律保障,还需中阿双方协商谈判制定政府间实质性法律规范,以加强论坛达成共识和协议的法律效力,使其能真正约束各方行为。

(2)应将部长级会议作为中阿合作的中心机关,其他机制作为该机关的下设机构来运行。应尽可能地发挥部长级会议的统筹作用,将中阿工业、农业、能源、技术转让、文化教育交流等话题进行整合,将其分配给隶属于论坛但又分工不同的各个下设机构,这样可以使权利和职责的分配更加明确,以提高论坛的运作效率。另外,还有必要建立危机管理机制,以避免、补救可能出现的诸如在阿中国劳工或在中阿方劳工因沟通不畅,突发事件或其他原因引起的利益损失或其他恶劣影响。

(3)建立后续行动的执行机关和监督机关。由于中阿合作论坛的合作水平较低,每届部长级会议达成的《宣言》《行动计划》缺乏法律约束力,文件的目的完全靠双方意愿来实现,因此有必要建立执行机关以敦促各方为执行相关事项而进行必要的准备或进一步谈判磋商。

2. 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作用

在规划中阿合作论坛未来发展时,应从国外相关实践中汲取经验,这些经验包括:一要强化非政府组织在中阿合作论坛和中阿合作中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中表现得非常活跃,它们常常制造和引领话题,影响舆论,与政府部门相互配合,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战略的实现摇旗呐喊。在中阿合作论坛中,我国应当借鉴这方面的经验,将更多的非政府组织纳入其中,尤其应当

学习发达国家在海外建设非政府组织的做法,这对提升我国在阿拉伯地区的软实力和改善国家形象有重大帮助。二是要注重当地的民生建设,少搞形象工程。德国和日本在阿拉伯地区所树立的良好的国家形象得益于对该地区民生建设的重视。比如,德国帮助较为落后的阿拉伯国家完善基本卫生服务体系,保障人民用水安全,还与区域组织合作帮助建立完善水利组织机构,实现非洲国家安全用水;日本则从微观方面做起,搞一些小项目,如供水、建小学,赢得当地普通民众的好感。

3. 重视人文交流,加强软实力建设

一要利用孔子学院传播中国文化。截至2012年,我国在中东地区6个国家设立了8座孔子学院,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中国文化,提高了中国的软实力。但我们也应看到,相较于阿盟22个成员国而言,这些努力依然杯水车薪。因此,今后我们不仅要增加孔子学院的数量,还需提高孔子学院的质量,不能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仅理解为包饺子这种低级水平,而要真正地为中阿人民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切实地做出贡献。

二要加强媒体人员在该地区的活动。当前阿拉伯地区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主要是半岛电视台和西方媒体,中国媒体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感极弱,很难发挥其影响力并向阿拉伯人民宣传正面的中国形象。同时由于西方媒体的活跃,又为“中国威胁论”添油加醋,使中国形象严重受损。今后中国一定要注意在该区域话语权的争夺,帮助中国在该区域营造积极的舆论环境。

四、结语

总之,“阿拉伯之春”运动对中阿合作论坛的深化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西亚和北非动荡发生以来,虽然中国政府一直保持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沟通,尝试维护中国相关利益,但当时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既无应对危机的安全对话机制,亦无解决冲突的外交斡旋机制,致使在西亚和北非动荡发生后很长时间内,中阿双方避实就虚,并未就该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现有的中阿合作论坛机制缺乏相应的危机管理功能,不能及时适应形势的变化,往往在从事亡羊补牢的工作。以中国从利比亚撤侨行动为例,尽管此次行动取得了圆满成功,但于是被动应急,所

付出的代价也十分巨大。

当前,中阿合作论坛既存在着挑战也面临着机遇。中阿合作论坛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为中阿各方面务实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于中阿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深化合作中都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双方都对提高双边合作水平抱有期望。同时,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拥有传统的友好关系,得天独厚的经济互补性和相似的东方文化价值观,这些都可成为中阿合作的牢固基础。中国应和阿拉伯国家一起,积极应对挑战,完善中阿合作论坛的各项机制,努力推进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为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世界的持续发展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

[参 考 文 献]

- [1] [埃及]穆罕默德·努曼·贾拉勒.“中阿合作论坛”的成就、挑战与前景[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2):3.
- [2] 吴冰冰.中东战略格局失衡和中国的中东战略[J].外交评论,2013(6):35.
- [3] 王锁劳.“阿拉伯之春”:回顾与展望[C]//王缉思.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1).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234-244.
- [4] 朱小莉.国际战略视野中的中东[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 [5] 包澄章.中东剧变以来的萨拉菲主义[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6):106.
- [6] 新华网.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公布最新石油产量数据[EB/OL](2012-09-04)[2014-06-14].http://news.xinhuanet.com/energy/2012-09/04/c_123667845.htm.
- [7] 李意.海湾安全局势与中国的战略选择[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10.
- [8] Chris Zambelis, Brand Gentry. China through Arab eyes: American influence in the Middle East[D]. Parameters: US Army War College, 2008.
- [9]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第四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关系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 [10] 李明波.中国进口石油来自哪些国家[EB/OL](2014-04-26)[2014-06-14].<http://news.hexun.com/2014-04-26/164285576.html>.
- [11] 网易财经.报告称美国2030年能源自给[EB/OL](2013-01-18)[2014-06-15].<http://money.163.com/13/0118/16/8LH1U86B00253B0H.html>.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4)05-0043-05

医疗改革类型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 OECD Health Data 2006 的分析

侯圣伟

(郑州轻工业学院 政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以 OECD Health Data 2006 为基础,从医疗保障性、医疗费用抑制和医疗质量三方面分析主要经合组织国家医疗保障体系改革,可以归纳出三种改革类型:一是在医疗保障性和医疗质量方面虽取得一定成就,在医疗费用抑制上却未见成效;二是在医疗保障性和医疗费用抑制上虽取得成功,却造成了医疗质量的下降;三是成功达到医疗费用抑制和提高医疗质量的预期目的,却造成了医疗保障性的降低。上述现象的出现与各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等变量密切相关。从历史实践的角度来看,我国完全可以在保证医疗质量提高前提下提高医疗保障性、降低医疗费用的目标。

[关键词] 医疗改革;医疗保障性;医疗费用;医疗质量

[中图分类号] D669.4;R197.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4.05.009

医疗保障体系改革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西方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障体系经过长期发展和不断改革,相对比较稳定和完善,其改革方面的成功经验,可以给予我国医疗改革有益的启示,更好地推动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对于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国家医疗保障体系改革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大多集中于医疗卫生数据资料方面的对比分析与具体国家的医疗体制和改革成果的研究;而国外学术界对于 OECD 国家医疗保障的研究,则侧重于定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医疗改革的背景与具体事例的分析上,对于 OECD 国家的医疗改革经验对我国的适用性鲜有涉及。国际医疗改革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中,本文拟以 OECD Health Data 2006 为研究对象,以当前的视角对 OECD 国家已经取得的医改共识进行定性分析,以期有助于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

一、基于目标实现划分的医疗改革类型

任何社会政策的实施都具有一定目的性,医疗改革成功与否,其主要检验标准为改革的目标是否明确,改革的措施是否围绕目标而进行,以及改革的结果是否实现了预期目标。医疗改革的目标是医疗改革的关键,直接决定了医疗改革能否取得成效。医疗改革目标的设定需要相应的评价标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践检验。

1. 医疗改革目标及评价标准

当前,医疗改革的目标主要包括医疗保障性、医疗质量和医疗费用缩减 3 个方面。

医疗保障性是指医疗服务需求方在使用和接近医疗服务时,其医疗保障的给付不受收入、人种、地位等因素的影响,将医疗服务使用的公平性视为第一要义。为保障医疗服务使用的公平性,须加快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放宽医疗服务需求方的资格限定,

[收稿日期] 2014-05-31

[基金项目] 2012 年度郑州轻工业学院博士基金项目;2012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CGL105);2014 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4-gh-125)

[作者简介] 侯圣伟(1977—),男,山东省梁山县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保障、卫生经济学。

以及提高服务的可及性。

医疗质量是有关提供多少有效医疗服务的问题,属于医疗保障内在性层面。E. Kelley 等^[1]指出,医疗质量决定于接受医疗服务的意愿,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医疗保障体系的反应,即患者的需求这一主观层面和新医疗技术及装备引进这一技术层面,更进一步说是为了适应这一要求,政府进行医疗保障体系改革的目的、运营方式等层面的制度性努力。从这一点上来说,医疗质量应主要从患者满意度、新技术的引进和就医等待时间3个方面考虑。

19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医疗改革基本都围绕缩减或控制公共支出、提高效率来达到减少公民医疗费目的而展开的。医疗费用的缩减,应主要从扩大资金筹集方式和减少患者本人负担上来进行,但不同的医疗保障体系,由于其资金筹集方式不同,因此其压缩财政支出的效果也不一样。比如,NHS(国民卫生服务体系)方式相比NHI(国民健康保险)方式,由于其财政收入来源主要为税收,其调节能力较强。本文主要以公共部门与民间部门筹资的比例,以及公民医疗费用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进行考察分析。基于以上分析,医疗保障体系改革的目

标与评价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医疗改革的目标与评价指标

改革目标	评价指标
医疗公平性	广泛性、资格限定
医疗质量	满意度、医疗时间
医疗费用抑制	资金筹集

2. 主要 OECD 国家医疗改革类型

首先我们看一下根据医疗改革目标与评价指标对主要国家进行的测定值(见表2)。其中,“广泛性”和“本人负担”为全体医疗费中个人负担所占的比重,为1999—2004年的平均值;“资格限定”为NHS和NHI的适用比率;“可及性”为医疗使用日;“满意度”为1999—2000年的平均值;“新技术”为每100万人口MRI(磁共振成像)引进台数;“等待时间”为住院患者入院等待时间;筹资方式为2003年度全体支出中公共支出所占的比例。

将各个国家的测定值和国家间的平均值相比,高于平均值赋值为1,低于平均值赋值为0,经过二次变数间的转换,可以得出医疗改革的不同类型。将3个改革目标的下位值进行核算,再进行二次变数转换,可得出医疗改革的类型(见表3)。

表2 主要 OECD 国家医疗改革评价指标测定值

国家	医疗保障性			医疗质量			医疗费用	
	广泛性/%	资格限定/%	可及性/日	满意度/%	新技术/台	等待时间/日	筹资方式/%	本人负担/%
丹麦	15.4	100	5.7	76	10.2	5.2	82.9	15.4
法国	10.2	99	5.9	78	3.2	13.4	78.3	10.2
英国	10.8	100	7.8	56	5	7.2	85.4	10.8
芬兰	19.1	100	12.4	74	14	10.0	76.2	19.1
荷兰	8.5	76	7.8	73	-	12.5	63.0	8.5
澳大利亚	15.6	98	8.3	83	14.9	7.8	70.3	15.6
土耳其	25.3	99	7.3	77	6	-	71.1	25.3
美国	14.9	26	5.1	-	-	6.5	44.6	14.9
挪威	15.6	100	5.4	-	-	8.2	78.2	15.6
德国	10.4	89	9.3	50	-	10.4	83.7	10.4
瑞典	-	100	6.5	59	-	6.2	-	-

注:数据根据 OECD Health Data 2006 整理计算而得出。^[2]

表3 主要 OECD 国家医疗改革的类型

医疗改革的类型	国家	医疗保障性	医疗质量	医疗费用
相互制约型	丹麦、法国、英国	1	1	0
	芬兰、荷兰	1	0	1
	澳大利亚、土耳其	0	1	1
其他类型	德国、瑞典	1	0	0
	挪威	0	-	0
	美国	0	-	1

从表3可知,德国、瑞典和美国的医疗改革呈现出医疗费用和医疗保障性的逆反性,即德国和瑞典在医疗费用控制方面虽然表现困难,但在保障性方面取得成功,而美国在医疗费用的抑制方面卓有成效。挪威在保障性和医疗费用抑制方面都是失败的,成就不显著。相互制约型的国家都表现为在两个方面取得成就,在一个方面成就不显著。围绕医疗改革的三方面目标,各个国家进行了不同的努力,出现了不同的类型,其中丹麦、法国、英国、芬兰、荷兰、澳大利亚、土耳其7个国家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相互制约关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各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人口等方面的原因密切相关。

3. 医疗改革的影响因素

Saltman 等^[3-4]对影响医疗改革的因素进行了很多研究分析,概括起来,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因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医疗改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一,作为经济发展状况表现形式之一的人均GDP,影响到公民医疗需求的增加和医疗服务的供给水准;其二,失业率的上升是福利保障项目缩减的一个重要原因,也会影响到医疗改革成效;其三,政府的财政赤字水平,对于医疗保障项目会产生直接影响;其四,国民经济的开放度会对医疗改革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国家的行动方式发生变化。

(2)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可以从制度性和政策性2个层面来分析。从制度性层面来看,国家如果在制度性改革中居于中心地位,就必须从国家的能力和结构来分析其对医疗改革的影响,可以使用宪法结构指数来对其进行分析。宪法结构指数是指对联邦程度、总统制、选举制度类型、公民投票等进行数值化测定后得出的结果。从政策性层面来看,主要是指各政党之间的竞争。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不同政党执政之后往往会带来政策上的变化,而在西欧影响比较大的2个党派是左翼政党和CDU(基督教民主联盟)两大党派的执政时间与所占议席的比例,会使医疗改革呈现不同的特色。

(3)人口因素。人口因素在医疗改革方面一直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根据Roberts^[5]的研究,人口的老龄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医疗改革的成果,但同时也成为医疗改革的主要原因,其根源在于老龄化和超老龄化带来的医疗需求的激增,以及相对应的有关抑制医药费的改革等。

以上总结了有关医疗改革的影响因素,表4对

各个因素的测定方法给予了说明。

表4 医疗改革的影响因素及其测定方法

影响因素	测定方法
经济因素	Log 实际人均 GDP
	失业者人数
	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
	Log 国民经济开放度
政治因素	宪法结构指数
	左翼政党执政时其所占议席比例 基督教民主联盟执政时其所占议席比例
人口因素	OLD(Log65 岁以上老人人口)

二、不同医疗改革类型的结合原因分析

1. 分析方法

对医疗改革类型的综合因素主要采用定性比较分析,使用布尔代数对影响医疗改革的宏观经济社会因素等进行定性研究。定性比较分析保留了定性分析的特点,并结合具体事例来分析说明,将所有相关的原因变量进行整体组合,结合原因来说明结果变量。比如,如果存在4个原因变量,可将其表示为二次变量形式,可能的原因组合变为16个,再将这16个原因组合以结合变量的名义与结果变量进行对比分析。在本研究中共有8个原因变量(见表4),存在256个组合,通过将其与结果变量进行对比,可以推断出其最终的原因组合。

2. 分析结果

从表3可知,各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效果可从保障性、医疗质量和费用抑制三方面来衡量,其在两方面取得成功的同时都会在另一方面存在不足,三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我们对其医疗改革的成果利用8个原因变量来进行推断,其结果见表5。在表5中,结合原因转化为二次变量来表示,“1”表示测定值大于平均值,“0”表示测定值小于平均值;结果变量中 Y_1 为类型1国家, Y_2 为类型2国家, Y_3 为类型3国家,无数值表示模糊难以界定。例如,结合原因GDP中丹麦的测定值为1,意味着丹麦的GDP高于比较对象国家GDP值的平均数。同理,丹麦的结合原因OLD为0,表示丹麦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低于其他国家的平均比例。由表5可以看出,影响丹麦医疗改革的结合原因,包含相对较高的GDP、政府财政赤字比例、较强的左翼政党影响力,以及较低的老龄化指数、CDU影响力、国家自律性、失业率和经济开放度等。

表5 医疗改革类型、因素及测定值

国家	结合原因								结果变量		
	<i>GDP</i>	<i>GFB</i>	<i>OLD</i>	<i>LEFT</i>	<i>REL</i>	<i>FBD</i>	<i>UNEMP</i>	<i>OPEN</i>	Y_1	Y_2	Y_3
丹麦	1	1	0	1	0	0	0	0	1	0	0
法国、英国	0	0	1	1	0	0	1	0	1	0	0
美国	1	0	1	0	0	1	1	0	-	-	-
芬兰	0	1	0	0	0	0	0	0	0	1	0
荷兰	0	0	0	0	1	0	0	1	0	1	0
德国	0	0	1	1	1	1	1	0	-	-	-
挪威	1	1	0	0	0	0	0	0	-	-	-
土耳其	0	0	0	0	1	0	0	1	0	0	1
澳大利亚	0	0	0	0	1	1	0	1	0	0	1
瑞典	0	1	0	1	0	0	0	1	-	-	-

从整体上来看,结果变数存在3个集团。结合表1和表5,类型I的国家在医疗保障性和医疗质量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包含丹麦、法国和英国,其在提高医疗质量的同时,在医疗公平方面也成绩明显,原因在于它们努力减轻医疗费用的负担;类型II的国家包括芬兰和荷兰,其在医疗保障性和医疗费用方面成绩突出,坚持了医疗改革的目的即医疗费用抑制和医疗保障性扩大,但在提高医疗质量方面存在一定问题;类型III的国家有澳大利亚和土耳其,其努力提高医疗质量和压缩医疗费用,但存在医疗保障恶化的可能;而对美国、德国、挪威和瑞典来说,其医疗改革的方向为单向性,特性不明显。

(1) 类型I:医疗保障性+医疗质量

$$Y_1 = (GDP \times GFB \times unemp \times old \times open \times LEFT \times rel \times fbd) + (gdp \times gfb \times UNEMP \times OLD \times open \times LEFT \times rel \times fbd)$$

上式中,大写字母变量表示为对结果产生积极影响,小写字母变量表示对结果产生消极影响;“×”为并列条件,是表示结合原因的符号;“+”为选择条件,表示结合原因的对策。 Y_1 国家类型是通过以下两个途径而形成的。

第一个途径为,人均GDP相对较高,伴随较低的财政赤字、经济开放度和失业率,从政治上来看,左翼政党的力量比较强,CDU的力量较弱,国家组织主要靠自律进行,老龄化指数相对较低。由于类型I是医疗保障性和医疗质量相对较高,从接受医疗服务者的立场来看,都会认为其改革结果会比较公平有效,从这一点来说,政治上就需要保持左翼政党的优势地位和行政权力行使的自律性,并且只有老龄化指数较低,才会降低医疗费用。更进一步来说,为了动员改革资源,需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行

政自律性。

第二个途径为,经济上存在较高的财政赤字和较低的增长率以及较高的失业率,但相对于CDU来说,力量较强的左翼政党和老龄化的进展结合在了一起。在这些国家里,虽然经济比较困难,但比较妥善地处理了老龄化所带来的医疗需求的增长,这一点可在丹麦、法国和英国得到证明。

对于上式,我们可以进行如下简单的因数分解:

$$Y_1 = LEFT \ rel \ fbd \ open \ (GDP \ GFB \ old \ unemp \ + \ gdp \ gfb \ OLD \ UNEMP)$$

括号中相加的两项是并列的关系,各项可以相互代替,为同价要素,括号外的各项为各个国家进行医疗改革的必要结合原因,即为了进行类型I的医疗改革,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左翼政党和微弱的CDU,需要较低的开发度与国家机构自律性的结合。

(2) 类型II:医疗保障性+医疗费用抑制

$$Y_2 = (gdp \times old \times left \times GFB \times rel \times open \times unemp) + (gdp \times old \times left \times fbd \times gfb \times REL \times OPEN \times UNEMP)$$

此式也可进行如下因数分解:

$$Y_2 = gdp \times old \times left \times fbd$$

类型II国家出现的原因,从经济层面来看,是其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从社会层面来看,是其较低的老龄化;从政治层面来看,是其较低的左翼政党支持度和国家结构的较高自律性等。类型II国家一般来说是以牺牲医疗质量来获得传统性医疗改革的目的——医疗费用抑制与医疗保障性强化。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国家有着实施医疗改革的强大能力,并且其较低的老龄化指数未带来医疗费用负担过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其左翼政党力量软弱和经济增长低迷,其也同时成功实现了医疗费用抑制和医

疗保障性强化的两大目的,但会伴随出现医疗质量下降的问题。

(3) 类型Ⅲ:医疗质量 + 医疗费用抑制

$$Y_3 = gdp \times gfb \times old \times left \times REL \times unemp \times OPEN$$

由 Y_3 公式可知,类型Ⅲ国家在经济上有着较低增长率和失业率,较高的政府财政赤字;在社会方面其老龄化指数较低;在政治上其左翼政党支持度低而 CDU 相对强势,同时伴随较高的经济开放度。这种改革类型,由于老龄化程度较低,对于医疗的需求相对来说不高,在政治层面上缺乏推动医疗改革保障性的动力,再加上较高的经济开放度和较低增长率及政府财政赤字,其难以确保医疗保障体系的保障性的强化。

三、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成功抑制医疗费用的国家,其共同点在于其具有较低的 GDP 和较弱的左翼政党影响力,即在那些国家中,可以充当医疗财政的资源不足,抵制缩减医疗费用的势力较弱。在提高医疗质量方面,大部分国家的区别并不明显,无论是左翼政党还是 CDU,以及国家经济的开放度,这是因为医疗质量的提高对于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重要医改课题。在成功实现医疗保障性提高的国家中,其共同点在于国家对社会有着高度的自律性,因为在复杂的医疗改革中,国家相关部门的努力是顺利推动改革的关键所在。

目前,我国的医疗改革已经进入到“深水区”,医疗改革不能仅仅局限于数量与表面上的变化,必须满足人民群众对医疗“质”的变化的需求。但我们从主要 OECD 国家医疗改革的经验中可以得知,

医疗保障性、医疗质量与医疗费用抑制难以同时实现。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及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我国的医改要以提高医疗保障性和医疗费用抑制为着力点,在此基础上强调医疗质量的提高。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这种高速增长存在持续的可能性,这可为我们的医改提供有力的宏观经济支持。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看,医疗改革反映了人民的诉求,是党实施和推动医疗政策的动力来源,是保证医改政策能够落实的强有力的政治保证。现阶段我国虽然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如“单独可以生二胎”等,人口结构会发生相应变化和调整,很难说人口红利会终止或者说难以持续下去。由于类型Ⅱ的原因有着经济增长低的因素,所以就我们国家来说,在追求确保和提高医疗保障性、降低医疗费用的同时,结合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景,应该可以保证医疗质量的同步提高。

[参 考 文 献]

- [1] Kelley E, Hurst J. Health Care Quality Indicators Project: Conceptual Framework Paper [R]. Paris: OECD Health Working Papers, 2006.
- [2] OECD. OECD Health Data 2006 [R]. Paris: OECD Data Base, 2006.
- [3] Saltman R B, J Figueras. Analyzing the evidence on european health care reform [J]. Health Affairs, 1998(2): 85.
- [4] Huber E, Stephens J. Development and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s: Parties and Policies in Global Market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346 - 368.
- [5] Roberts M. Getting Health Reform Right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9 - 14.

[文章编号]1009-3729(2014)05-0048-06

新医疗改革的实证探索与经验分析

——基于浙江省台州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情况调研

夏梁省

(台州市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教研室, 浙江 台州 318000)

[摘要]通过对浙江省台州市医疗改革情况的调研和分析,发现当前医疗改革中存在财政补助机制尚不完善、基层医疗机构编制人员不足、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队伍建设较为滞后、新农合筹资和保障水平总体低、基金结余率较高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须从完善医改的地方财政投入体系、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强化药物监管体制改革、强化医改的社会保障功能、创新公立基层医疗机构绩效考核体系等方面着手,加快推进新医疗改革的顺利实施。

[关键词]公共政策;医疗改革;药物制度

[中图分类号]D669.4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5.010

自2009年初国务院发布新医改意见以来,我国逐步推进城乡居民社区医疗救助、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健康教育等基本卫生服务改革。新医改的有效实施,使关系到居民切身利益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了缓解。^[1]但是,随着医改的不断深入,体制机制上的障碍问题日益凸显。医改关乎民生,如何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上解决医疗资源的配置问题是当前医改的重中之重。尤其应该从公共政策的视角去探索新医改的未来走向,比如在理念创新上,应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2]。同时,要从公共利益的角度,确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目标。而这些目标与要求的实现,有赖于基本药物制度、医药分开、管办独立、人才流动等措施的实施。因此,为了确保新医改能够满足居民基本的医疗需求,应从新医改实施的基本情况入手去探究分析新医改实施的效果、实施遇到的突出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对策。^[3]但是,目前理论界对新医改实施中遇到的现实问题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许多理论研究缺乏现实依据与实证分析。^[4]本文拟结合浙江省台州市新医改实施的基本情况,通过实证调研重点揭示新医改所面临的新问题、实践

创造出的新方法,以及得到有效验证的新举措,进而总结出能够提升当前我国新医改水平的对策措施。

一、台州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情况

1. 医疗卫生资源概况

台州市现有人口580万,面积9411万平方公里,行政区划为3区2市4县。据统计,2013年全市实现国民生产总值3153.3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13.30亿元,增长0.6%;第二产业增加值1515.55亿元,增长8.1%;第三产业增加值1424.49亿元,增长8.7%;三次产业结构为6.8:48.0:45.2。全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53222元,比上年增长7.3%,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8594美元。

截至2012年底,全市共有医疗机构3014家,其中县及县以上医院35家(综合性医院18家,中医院9家,精神专科医院4家,妇幼保健医院4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33家,卫生院分院和社区卫生服务站495家,村级医疗机构2083家(包括社区卫生服务站449家,村卫生室1634家)。

[收稿日期]2014-08-28

[作者简介]夏梁省(1986—),男,浙江省台州市人,台州市民营经济研究中心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民营经济。

全市开放床位 16 528 张,每千人口拥有医院床位 2.83 张,卫生技术人员总数达到 26 765 人,每千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4.59 人,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师 1.98 人,每千人口拥有注册护士 1.56 人。2012 年,门急诊总人次为 3 249 万人,总收入 75.83 亿元,其中,财政补助收入 5.55 亿元,药品收入 37.13 亿元,医疗收入 33.15 亿元,药品收入占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52.83%。

2. 医改完成情况

(1) 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一是新农合覆盖面进一步扩大。2012 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农民总人数达 427 万人,参合率为 97.58%,超过目标任务近 3 个百分点。二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均筹资水平逐年提升。2012 年,全市新农合人均筹资水平达 310 元(2010 年为 197 元),其中个人出资 107 元,各级政府补助 203 元。筹资水平最高的为玉环县达 355 元,市辖椒江区、黄岩区、路桥区 3 区达 320 元,温岭市为 310 元,其余县(市)均达到 285 元的省定标准。截至目前,全市共到位资金 10.93 亿元,到位率 81.26%,全市新农合门诊统筹实现全覆盖。三是基本医疗保险补偿标准进一步提高。2012 年上半年,全市共完成参合农民住院补偿 15.14 万人次,住院补偿金额达 5 亿元,统筹区域政策范围内住院补偿率达到 60% 以上,最高支付限额达到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6 倍以上,其中玉环县最高达 13 万元。四是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水平明显提高。全市所有县(市、区)均提高了儿童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等重大疾病保障水平,报销比例达到政策范围内 70% 以上。在此基础上,温岭市实现五保低保对象尿毒症全免费、天台县精神病全免费;为农村艾滋病人提供免费 CD4 检测,抗病毒治疗,部分县(市、区)为病人提供肝功能、血常规等检测,并为机会性感染的病人提供医疗机构转介服务。

(2)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稳步推进,并实现全覆盖。2013 年 2 月 25 日,全市 9 个县(市、区)全面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截至目前,全市共有 500 家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机构和 7 家非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机构实行基本药物零差价销售,按要求统一配备药品 557 种,覆盖人口 580 万人,实现了基层公立医疗机构基本药物全覆盖,超额实现医改目标。据统计,截至 2012 年 8 月底,门急诊数量为 774.55 万人次,比 2011 年同期增长 46.04%,门急诊均次费用 50.27 元,比实施前下降 32.6%,药品总收入 3.36 亿元,比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减少

42%,累计为群众减少药品支出费用约 2.44 亿元,让群众直接感受到了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带来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国家基本药物医保报销政策全面落实,所有县(市、区)均已将基本药物全部纳入新农合报销范围,报销比例高于非基本药物 5 个百分点。

(3)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明显加强。为彻底改变基层医疗机构基础设施简陋状况,改善群众就医环境,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近年来,台州市在加快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进程的同时,不断加大内涵建设。截至目前,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达标率高达 99.32%,有 20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省级规范化标准,100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市级规范化标准,下设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2 083 家,20 分钟服务圈基本建成。同时,县乡村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改革扎实推进。目前,台州市乡村一体化管理正在积极推广玉环县的以“六统一”(机构设置、人事、业务、药械、财务、绩效考核)为标准的分类型(公益型、紧密型、松散型)管理模式。

(4)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一是服务经费逐步到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全面落实。2012 年,台州市 9 个县(市、区)城乡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达到省定 25 元标准,服务项目经费也逐步到位,经费到位率达 96%;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全面落实,重大疾病管理重点突出。截至目前,全市建立城乡居民规范化健康档案 449.12 万份,建档率 79.5%;建立城乡居民规范化电子健康档案 235.7 万份,建档率达 41.7%,完成率 69.5%。0~6 岁儿童健康管理人数达 41.4 万人,孕产妇健康管理人数达 2.4 万人,65 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人数达 73.7 万人;规范管理高血压病人 33.1 万、糖尿病人 5.03 万、重性精神病人 9 021,完成率分别为 97.35%、67.07%、100%,在三门县开展高血压、2 型糖尿病和重性精神病等(以下简称“三病”)慢(疾)病综合防治试点工作,并在全市推广。全市第三轮参合农民健康体检总人数 201.6 万人,体检率达 46.72%。二是全面开展网络健康教育。台州市市健康教育所按要求开展网络健康教育,各地利用网络、媒介、报纸、宣传册等多种宣传方式普及健康知识。如仙居县开设了网络视频健康宣教系统,每个月开展一两次健康教育。三是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大部分得以较好落实。截至

2012年8月底,已完成适龄妇女宫颈癌检查13374人次,完成率66.87%;对17884名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进行补助,完成率92.67%;对27208名农村生育妇女免费补服叶酸,完成率86.24%;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率达到95%以上;为1701例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开展复明手术,完成率89.2%;已完成2525户无害化卫生厕所建设,完成率84.17%。

二、台州市医疗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1. 财政补助机制尚不完善

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后,台州市各地财政基本以预拨付形式来弥补基层医疗机构药品零差价的收入,没有一个县(市、区)制定刚性的补偿机制。据统计,截至2012年8月底,全市9个县(市、区)补助资金到位1.72亿元,仅占实施基本药物零差价后药品收入减少的70.08%,且县(市、区)之间补助到位资金也极不平衡,这与当前财政补偿机制尚不完善、刚性财政补偿政策缺少息息相关。此现象不但使基层医疗机构运行经费保障存在着较大的变数,而且也不利于基本药物制度的顺利实施。

2. 基层医疗机构编制人员不足

从已完成的基层医疗机构定编情况来看,台州市全市每万名服务人口中平均只有11.9名医务人员(未含床位数的编制),在浙江省排名靠后,且各县(市、区)之间的差距也较大。编制数居前三位的依次为仙居县、三门县、路桥区,分别为每万户籍人口平均15.4、15、13.9名;编制数居后三位的依次为玉环县、温岭市、临海市,分别为每万户籍人口平均10.3、10.1、8.9名,这与《浙江省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和编制标准实施意见》(浙编办[2007]58号)和《浙江省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机构设置和编制标准实施意见》(浙编办[2009]19号)文件要求的每万户籍人口13~15名差距较大。基层医疗机构人员编制不足,直接影响到基层医疗机构正常的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3. 新农合筹资和保障总体水平低,基金结余率较高

虽然台州市新农合人均筹资水平年年都在提高,2012年已达到人均310元,但是与浙江省其他地市相比仍处于落后水平,低于浙江省平均水平69元,而农民医疗费用与浙江省平均水平相当。当前政策范围内住院补偿比例与医改要求力争达到70%仍有较大差距。基金累计结余率仍然较高,2011年排名前三位的分别为临海市(53%)、路桥区

(36%)、玉环县(30%),均未达到浙江省规定的不超过当年统筹基金25%的要求。尤其是临海市农医保、城镇居民和职工医保都是社会保障局管理的,要想减少结余率,三大保险要一并考虑,难度较大。

4. 其他问题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队伍建设较为滞后。医改的各项任务最终都要通过基层医务人员来完成。当前台州市的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滞后,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较低,很多服务工作的质量不高,甚至有部分工作难以完成。医改工作推进中仍有几项工作推进行履艰难:一是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推进艰难。特别是紧密型一体化管理推进难度较大,至今仅玉环县7家村卫生室纳入紧密型一体化管理,实施基本药物零差价与非基本药物有差价销售的双轨制管理。二是基本药物货款30日内支付难已达到,原因有:(1)未建立有效的国库统一支付,目前都在卫生局设专用账户;(2)医保付款慢,造成卫生院货款不能及时回收;(3)医疗机构采购的药品不能在30天内及时用完;(4)药品付款金额定期汇总上报卫生局需要一定时间;(5)糖尿病发现率低,全科医生继续教育培训起步晚,门诊和住院均次费用实现零增长难度较大。

三、加快推进新医疗改革的政策建议

1. 完善医改的地方财政投入体系

地方政府应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的意见》(国发办[2010]62号),尽快出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政策,以便县级政府落实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补偿的具体办法,确保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顺利实施。以台州市为例,一是要使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府补助标准达到200元;二是要使城镇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达到60%,医保政策范围内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达到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6倍,城镇居民医保应达到当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倍以上;三是应使门诊统筹建立后,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结余率从40%下降到25%以下。

2. 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

一要加大工作力度,提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以台州市为例,各县(市、区)新农合参保率应达到95%以上,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力争达70%左右,确保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政府补助

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00元以上,经费及时足额到位。认真落实国家基本药物的报销补偿有关政策,确保基本药物目录药品全部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报销范围。二要理顺新农合管理体制,尽早实现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制度的衔接整合,实现城乡统筹,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服务效率。^[5]三要定性、定编。地方政府应重视城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定性、定编工作,要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合理确定其编制。省编委应根据相关文件,认真开展城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定性、定编工作。2012年台州市各县(市、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编制情况见表1。

3. 强化药物监管体制改革

基本药物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保障公众基本用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国家实施新医改的重要工作内容。在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全覆盖后,要扩大实施范围,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在非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应不断探索创新,鼓励公立医院使用基本药物;应在拟定基本药物质量监管工作目标责任书的基础上,与各县(市、区)局(分局)签订基本药物质量监管工作目标责任书,落实基本药物属地监管责任,并纳入年度工作目标考核。

以台州市为例,下一阶段应着力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配合做好国家基本药物质量标准提高和全品种覆盖抽验工作,确保辖区内基本药物生产企业抽验覆盖面、生产企业中标品种抽验覆盖面均达到100%;对基本药物进行全品种电子监管,完善地市级药品不良反应报告评价体系,加强基本药物生产、配送和使用环节监督检查。^[6]二是定期开展基本药物安全形势和质量监管工作状况评估,及时

汇总报送辖区内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和质量监管情况,加强基本药物质量监管工作进展情况的监测调查。三是监督辖区内药品生产企业执行新质量标准情况,及时向上级报告标准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对辖区内全部基本药物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应每半年不少于1次,全面完成辖区内基本药物生产工艺和处方核查工作任务,按要求组织参加《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培训。四是建立健全基本药物配送企业监管档案,按照CSP等有关规定,对基本药物配送企业每半年进行2次现场检查。五是加强基本药物不良反应监测与评估,提高对基本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现、报告、预警和分析处理能力。六是协助完成基本药物国家评价抽验,对国家评价抽验以外的其他由本辖区企业生产的基本药物品种进行全覆盖抽验,并通过基本药物抽验信息系统报送工作进展,依法对抽验结果不符合标准规定的产品与相关单位进行处理。七是按照《国家基本药物供货药品样品备案办法》,做好辖区内基本药物生产企业中标品种留样封签工作,配合做好辖区外企业生产的基本药物供货药品样品备案工作。八是对基本药物进行全品种电子监管。应要求本辖区企业生产的基本药物品种必须赋码,所有基本药物配送企业必须通过电子监管网实现数据上传,不能开展基本药物品种核注核销的企业不得承担基本药物配送工作,加强电子监管工作的督促检查,督促企业及时上传档案数据。九是加强辖区内药品监管部门信息化体系建设,加大对监管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信息化工作人员承担药品电子监管技术支持工作的能力。十是积极宣传基本药物质量监管的规定、措施和合理用药知识,组织媒体及时报道基本药物质量监管工作进展情况,营造全社会关注关心基本药物

表1 2012年台州市各县(市、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编制核定情况表

县(市、区)	社区卫生 机构数量	核编制数 (或拟定方案)	现编制内 实有人员数	现编制外劳动 合同人员数	定编进展
椒江区	10	588	429	131	已发文
黄岩区	13	809	657	210	已发文
路桥区	11	613	315	216	已发文
临海市	19	1 226	825	481	已发文
温岭市	16	1 200	1 066	361	已发文
玉环县	11	427	276	486	已发文
天台县	15	795	574	164	已发文
仙居县	20	757	617	156	已发文
三门县	14	641	374	239	已发文
合计	129	7 056	5 133	2 444	

制度实施的良好氛围。

4. 强化医改的社会保障功能

一是将医疗保险覆盖率列入政府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设计制定具有激励作用的考核办法;在各地落实五费合征的工作措施,突出民营企业特别是规模以上民营企业这个重点,积极扩大覆盖面,努力将这些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纳入参保范围;不断完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增强制度吸引力以提高参保率。

二是在探索建立多元化医疗保险费用支付结算方式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以台州市为例,应要求市区医疗机构对所有施行急性阑尾炎、结节性甲状腺肿、子宫肌瘤手术治疗的参保人员实行按病种收费,确保参保人员个人负担逐年下降。

三是社会保障卡实现医保“一卡通”。应将“一卡通”这项工作列入政府为民办实事工作项目,并制订具体的、操作性较强的考核办法;应组织相关人员和基层单位到先进地区学习考察“一卡通”建设情况;应起草本地《基本医疗保险“一卡通”实施办法》,并以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应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订《定点管理实施办法》《目录管理实施办法》《结算清算管理实施办法》等业务规程,并对相关业务人员进行培训;应完成管理平台建设,重点实现与上级平台的联网对接。

四是推进医疗保险门诊统筹。以台州市为例,要督促县、市统筹地区调整政策及时实施,使所有县市全面实施门诊统筹和市级统筹;应全面升级市区医疗保险信息网络系统,实施金保工程,首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发启用新的医保信息网络系统,为实施新的医保政策提供良好的服务平台。

5. 创新公立基层医疗机构绩效考核体系

当公立基层医疗机构全部执行基本药物制度后,所有的药品将实行零差价销售,随着零差价政策的稳步推进和不断深入,如何调动基层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工作效率,就成为医改的关键问题。为此,应该大胆创新,积极探索基层医疗机构绩效考核新思路、新方法。以台州市为例,应通过重点引入第三方考核、实施卫生院院长年薪制等,以乡镇卫生院绩效工资体系导入和年度考核方案制定为契机,完善绩效考核体系,以绩效考核深化医改工作。^[7]

(1) 基层卫生院考核办法

基层卫生院考核按周期可分为季度考核、半年度考核和年终考核三大类。其中,季度考核和半年

度考核可考虑由卫生局各个部门采取抽查和重点指标(KPI)考核方式进行分管领域工作的考核和结果反馈,年终考核由卫生局考核小组负责组织实施。卫生院年度最终考核成绩由季度、半年度、年终三大类考核成绩加权构成,其中年终考核成绩权重不少于60%。卫生院业绩考核对象根据工作重点和要求不同,可分成A、B、C 3类卫生院。

以年度综合目标任务书为主要考核依据,所有项目分为共性和个性指标两大类。共性指标具有类同性,采用统一的考核标准和考核方法;个性化指标根据卫生局对各类卫生院的不同要求设置个性的考核标准和考核办法,分散在4个维度之中。各卫生院还可就综合目标责任书之外的特色项目向卫生局考核领导小组申请参加年度考核,作为加分指标。

卫生院业绩的综合考核结果分为甲、乙、丙3类,与各卫生院的补助经费和考核结果挂钩,原则上补助经费按卫生院年度业绩考核成绩百分比例直接下发,扣留的部分补助经费由卫生局按各个卫生院的考核成绩和基数进行二次分配。卫生系统各类评优应与卫生院综合考核成绩紧密挂钩。

(2) 卫生院院长考核办法

卫生院院长考核内容应由其所在卫生院业绩和个人综合测评2方面组成,其中个人综合测评占其总考核成绩的30%。卫生院院长个人业绩的综合考核结果分为甲、乙、丙3类,考核结果与年薪挂钩,甲类卫生院院长年薪可增加20%,丙类可扣除20%。对考核结果为丙类的卫生院院长,可根据具体情况实行诫勉谈话,连续2年考核结果为丙类的卫生院院长实行降聘或解聘。

(3) 卫生院绩效分配指导方案

新绩效分配方案应打破档案工资体系,以基础性绩效工资和奖励性绩效工资2部分为主。基础性绩效工资与奖励性绩效工资的比例应控制在5:5左右,以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为基数。^[8]

基础性绩效工资 = 生活补贴 + 岗位津贴 + 工龄补贴,生活补贴、岗位津贴和工龄补贴分别占基础性绩效工资的50%、40%和10%左右,其中岗位津贴要体现行业特点、岗位职责等因素,适当拉开差距,实行一岗一薪。岗位津贴由基础岗位津贴和国家规定的特殊岗位津贴组成,基础岗位津贴 = 岗位津贴基数 × 岗位系数,岗位津贴基数由各卫生院根据本院测算结果确定,岗位系数为岗位类别系数、职称系数(或管理系数)和责任医生系数三者的乘积。

奖励性绩效工资分为卫技人员的奖励性绩效工

资和行政后勤人员的奖励性绩效工资。卫生技术人员的奖励性绩效工资应根据科室或个人完成综合目标任务的数量、质量、满意度(效果)和超额工作量等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与奖励性绩效工资挂钩;行政后勤人员的奖励性绩效工资应以卫生技术人员的奖励性绩效工资的平均数为基数,再乘以其奖励绩效系数作为其奖励性绩效工资,并与考核结果挂钩。奖励性绩效工资可由卫生院对科室或个人进行考核后,按月或按季预发60%~70%,余下部分经卫生局对卫生院年度综合目标考核后,根据考核结果再予以发放。

6. 定向培养农村社区医生,实现人员保障

以台州市为例,应根据浙江省卫生厅、教育厅、人事厅、财政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定向培养农村社区医生试点工作的通知》,对立志为农村卫生事业服务的浙江省内高考学生,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并在录取时即可与户籍所在地(以市为范围)卫生局签订定向就业协议。试点期间,农村社区医生培养由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湖州师范学院医学院和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3所院校承担。浙江省各县(市、区)卫生局可以根据区域卫生发展规划,提出定向培养计划需求,并统一与承办院校签订委托定向培养协议。

四、结语

随着医改工作的不断深入,指出新医改所面临的新问题,总结医改实践所创造出的新方法和新经验,是当前进一步顺利推进医改需要解决的现实问

题。综合而论,当前医疗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财政补助机制尚不完善、基层医疗机构编制人员不足、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队伍建设较为滞后、新农合筹资和保障水平总体低、基金结余率较高等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完善地方财政投入体系,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强化药物监管体制改革,强化医改的社会保障功能,创新公立基层医疗机构绩效考核体系。

[参 考 文 献]

- [1] 李克强. 不断深化医改推动建立符合国情惠及全民的医药卫生体制[J]. 求是, 2011(22):3.
- [2] 白剑峰, 李强. “再深的水也要趟”——卫生部部长陈竺纵论医改[N]. 人民日报, 2012-04-12(14).
- [3] Frenk J. Reinventing primary health care: the need for systems integration[J]. Lancet, 2009(9684):170.
- [4] 蒋学武, 赖亚曼. 学术医学的起源、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专家论坛)[J]. 中华医学杂志, 2012(2):73.
- [5] 侯岩. 我国区域卫生规划的沿革与创新[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2011(9):1.
- [6] 冯立中. 安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14.5亿旧债政府还[N]. 健康报, 2011-10-12(01).
- [7] 李子君. 陈竺称医改可借鉴香港“大医管局”模式[N]. 北京商报, 2011-06-08(02).
-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关于开展有资质人员依法开办个体诊所试点工作的通知(卫医政函〔2011〕166号)[EB/OL]. (2011-06-09)[2014-08-10]. <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zwgkzt/pyzgl1/201106/52184.htm>.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4)05-0054-06

我国公立医院的内部治理机制改革研究

——基于变革型领导理论的视角

李全利¹, 代志明²

(1. 广西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6;

2. 郑州轻工业学院 政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我国公立医院改革是新医改背景下的重大民生工程,而公立医院内部治理机制的改革是重中之重。变革型领导理论侧重于强调领导者的领导和管理实践,主张通过提高主体与客体(被领导者)统一的价值追求和工作认同来实现组织的变革与发展。在变革型领导理论潮流影响下,英国、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公立院所进行的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已经初显成效。鉴于我国公立医院改革存在内部治理结构职责不合理、院长职业化角色不鲜明、监管机制不健全、工作人员的医疗职业道德水平低等问题,根据变革型领导理论、借鉴国外公立医院改革经验,我国公立医院改革应着力于建立具有变革型的医院职业化管理队伍,实现医院由“单中心”向“双中心”治理机制的转变,创立动态的管办分离治理模式,构建公立医院内、外全方位监管机制,重塑公立医院职业道德体系。

[关键词]公立医院改革;内部治理机制;变革型领导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3.4;R197.3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5.011

1930年代初期,领导理论在管理学领域正式形成,到1940年代逐渐形成了系统的领导学理论并得到不断发展,其发展先后共经历了4个标志性阶段:20世纪初到1930年代的特质理论,1940到1960年代的行为理论,1960到1980年代的权变理论,1980年代初到现在的新型领导理论。变革型领导理论自1980年代就成为现代领导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新型领导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1],所以有学者将二者等同起来进行研究。变革型领导理论是一种包含性的具有综合特质类型的理论,它可以描述广泛范围内的领导行为,从一对一地试图特定地影响追随者(被领导者)到试图广泛地影响整个组织甚至与组织管理有关的外部主体行为,所以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在促成组织变革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公立医院改革是医疗保障建设领域的重要内容,是当前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关键问题。公立医院能否合理有效地进行改革关系到一国公民的身体健康,对于整个医疗体制的发展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我国公立医院改革已经推行多年,公立医院内部组织构建方面的改革也有了初步成效。在内部治理机制改革和服务体系建设,以及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鼓励多元化办医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获得了一定的成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改革中仍存在不少问题:体制机制改革未形成统一趋势,在医院管理人员的人事安排方面和提高医务人员积极性的机制建设方面还存在不足,最令人关心的医疗费用控制方面的效果还并不明显。这些问题不仅为继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提出了新任务,而且也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

[收稿日期]2014-06-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CGL105)

[作者简介]李全利(1992—),男,河南省泌阳县人,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代志明(1974—),男,河南省永城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特聘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卫生经济与医院管理。

李玲等^[2]分析了公立医院的政府层级问题,并提出公立医院改革应该管办分开、政事分开;夏莽等^[3]提出我国公立医院的内部体系变革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找不到适合公立医院的内部法人治理模式。内部治理模式关乎整个公立医院改革的成效,但针对公立医院内部治理机制的构建还很少有学者提出明确的指导性意见。变革型领导理论对于组织内部的变革治理具有价值导向性,公立医院中的管理和领导职能划分,以及相关利益分配机制等问题都可以从变革型领导理论视角进行研究。变革型领导理论是在近些年已被证实的可供事业单位变革时借鉴的指导性理论,可以在公立医院内部治理模式改革实践中引入该理论。因此,本文拟以变革型领导理论为切入点,在对比分析国外公立医院改革成效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公立医院内部治理机制改革的路径。

一、变革型领导理论的内涵与演进

变革型领导理论早在一战时期就出现于西方的政治领域中,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和研究视角的不断创新,第一次大萧条时期就开始出现在西方的经济领域。变革型领导理论不同于传统的领导理论,其更侧重于强调领导者的领导和管理实践,主张通过提高主体与客体(被领导者)统一的价值追求和工作认同来实现组织的变革与发展。^[4]变革型领导理论为领导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尤其是其针对有关组织的研究顺应了公立医院改革的需要。

“变革型领导”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唐顿提出来的,而将变革领导理论发展成为领导学重要理论的则是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他通过描述性地分析政治领导,认为领导可以分为交易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2种。^[5]在伯恩斯看来,过去的大多数领导理论模式的内在属性是一种交易关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是一种交换的关系,领导者通过满足被领导者的利益需求来实现自身价值需求的交换。所以变革型领导与交易型领导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变革型领导不是高高在上的任务发布者,而是寻求与被领导者之间合作进步的协商者,而且双方在这一过程中是平等的关系。^[6]

关于“变革型领导”定义的确立,先是由 House 提出较为相近的“魅力型领导”的概念;后来 Bass 通过界定领导者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于 1980 年给变革型领导下了初步定义——变革型领导是一种动态的未来预期,并鼓励创造被领导者对组织形成高度

认同感的一种具有目的性的领导模式。^[7]在这种领导模式下,领导者有目的地让被领导者或者合作者认识到其承担任务的重要性和责任属性,通过刺激被领导者或者参与领导的合作主体的高层次需求,使其为团队、组织甚至社会使命付出具体行动。

由于各国社会体制和经济环境不同,学者们在研究变革型领导理论时选择的研究维度和测量工具也不一样。Bass 等的多维度领导问卷对变革型领导行为进行了解析和分类,形成了“领导魅力”“领导感召力”“智力激发”“个性化关怀”4 个维度型变革领导;此后又增加了“追求合作”和被领导者“愿景表达”2 个因素^[8];再后来有中国学者根据中国的实际伦理又提出变革型领导除了“魅力”以外还需“德”,并认为德行垂范是中国特有的研究维度。^[9]所以研究我国公立医院内部领导机制改革不能仅仅从某一个因素来进行分析。

二、国外公立医院管理模式与改革成效

据世界银行统计,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瑞士 5 国的非营利性医院占各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的 78%~95%。其中政府公立性医院占有所有医院总数的比例相当高。^[10]公立医院的广泛存在不仅有效补充了市场医疗服务提供的不足,实现了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也较好地完成了政府维护公民健康权益的责任,成为守护公民健康的安全网。再者,公立医院提供的公共医疗服务具有公益性,公立医院在增加公共医疗服务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建立公立性的医疗机构来为居民提供医疗服务的方式成本低且有效^[11]。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公立医院是不一样的,根据当前变革型领导理论的特点可分析出世界上不同公立医院改革的成效也各具特色。当今世界的医疗卫生体制并不统一,多元化时代背景下的医疗保障机制也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固定模式。科尔奈等^[12]从不同的医疗资源筹集模式和医疗服务提供形式 2 个角度把世界上的医疗卫生模式划分为英国福利性保健、美国商业保险性医疗、德国社会保险式医疗、新加坡储蓄式医疗,以及已经消失的苏联公共性医疗 5 种模式。这些模式后来又不断变革和演进,现在已经成为其他国家医疗保障领域改革借鉴的典范。例如,1980 年代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潮流引发了各国在公共医疗卫生与其他领域的改革,在公立医院内部治理模式上各国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其中以英国的内部市场改革模式、美国的管办分离职责划分模式、德国的产权和管理改革模

式,以及新加坡的集团化产权重组治理模式最为典型。

1. 英国的内部市场化改革模式

英国主要推行了公立医院的服务市场化改革,让公立医院内部的筹资管理者与医疗服务提供方分开,这样医疗服务需求者就有了更多选择的权利。其基本做法就是在不改变公共卫生服务部门本质属性的条件下,在公共卫生服务供给主体之间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这样,政府部门就不用自己掏钱开办医院,但为了保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还需对其进行监管;通过引入市场来实现资金筹集与服务提供的分离,政府主管部门仅仅成为医疗服务的购买者,而公立医院的管理权则转嫁给那些公立医院的投资方。在此过程中,患者可以发挥“用脚投票”优势,医院服务投资方在整个医疗服务体系中也有了更大的领导管理权。根据变革型领导理论的鼓舞性激励和智力激发因素的诉求,公立医院最高管理层——董事会——就可以最大效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去组建自己的管理层并创新管理模式。

英国在公立医院内部治理上,先由卫生大臣代表英国政府部门授权医院董事会主席,然后由董事会主席组建董事会集团,并对公立医院的运营进行监管。董事会集团作为公立医院管理的上层,其主席和代表政府部门的卫生大臣共同决定董事会的其他非执行董事。这些非执行董事任期为4年,其工资水平由政府部门制定。公立医院的内部组织构建程序是相互循环的,首先由董事会主席和非执行董事从市场招纳公立医院总经理,然后公立医院总经理再与董事会主席和非执行董事一道共同决定其他执行董事(见图1)。

2. 美国的管办分离职责划分模式

美国虽然采取的是自由商业保险式的医疗卫生体制,但其非营利医院在低层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供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的公立医院主要是服务于没有经济能力参加保险的穷人和老年人,所以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是美国整体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最基本安全网。由于美国公立医院的投资者不是政府,因此政府有权管医但不直接建医(办医)。自1980年代变革型领导理论兴起以来,美国公立医院内部逐步开展变革,并最终实现法人的自主化改革;在内部组织构建上,实行董事会—院长负责制;与英国不同的是,为了增加民主性而设立了管理委员会;在人才配置上推行自我公开招聘、由上到下的人事任用制度,例如由董事会来组建管理委员会等。通常情况下,医生不是医院的固定编制人员,医院的各医疗部门的领导人是通过本部门全体医务工作人员民主选举产生的,医院管理委员会在决定医师职权时还必须经过董事会的同意。^[13]美国很多公立医院进行的公司内部法人治理结构模式改革主要是变更董事会的机构组成人员,让大量医生进入董事会。在之前医生只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进入董事会之后医生就扮演着领导者和服务者的双重角色。根据变革型领导模式中的魅力和理想化因素,以及领导动机激励等因素的价值诉求,那些变革型医生如果想成为领导者就会把自身强大的内在价值观和自己的认知体系植入公立医院董事会,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效地激励下属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进入董事会的医生不仅能为其他医生们树立榜样,而且容易形成本部门的内部激励,同时在提高医生整体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方面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3. 德国的产权和管理改革模式

德国的公立医院大部分是由政府直接投资建立,受政府直接管理或者由有医学相关专业的大学代管的,但也存在一些与企业签订合同共同经办的。德国的俾斯麦政府于20世纪末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医疗保险模式,随着社会性的医疗保险刚性需求的增加,其公共医疗开支费用剧增。于是,德国不得不在公立医院的经办合同关系和医疗费用提供方面进行改革。21世纪初期,德国就通过办医契约关系明晰公立医院产权,在内部的自我管理方面积极推进公立医院的自主化改革,鼓励公立医院自主经营和自我管理。在医疗服务费用支付方面,提倡公民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机构缴费,国家给予一定的补助支付。根据 Podsakoff 提出的六维度变革型领导中加强合作、实现愿景需求等因素的要求^[8],德国政府积极构建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不改变产权制度的前提下建立新的经营机制。这样,不仅避免了完全计划体制下的低效率,又克服了完全私有化所造成的不公平,不同所有制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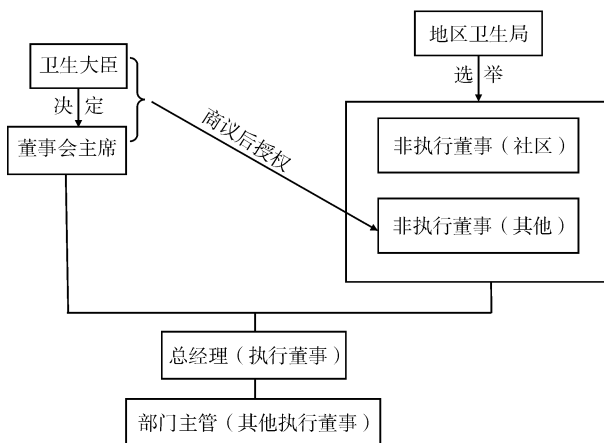


图1 英国公立医院内部市场化治理结构示意图

疗机构之间的竞争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公立医院提高办医质量和效率。由此可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不仅可以解决公立医院内部效率低下的问题,而且能够提高公立医院的办医效率,调动医院内部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4. 新加坡的集团化产权重组治理模式

新加坡的医疗机构集团化改革其实就是使医疗机构公办民营化。过去,新加坡的医疗服务市场上明显存在着公办和私立二元鼎立的局面。20世纪末期,新加坡对其公立医院进行了产权和集团化重组2个方面的改革。产权改革,就是先把公立医院投放到市场上运营,各市场化的医院运营主体构成新加坡保健子公司,其市场化管理机制建立之后在产权上收归国有;集团化重组,就是让产权改革后的市场化运营的各新加坡保健子公司全部纳入新加坡唯一的医疗公办机构——新加坡保健公司,从而形成具有集团化效应的医疗保健集团。新加坡保健公司虽是公司化运营管理,但其产权属于国有,国家卫生部是其唯一股东,新加坡保健公司是代表政府对公立医院进行管理的。

新加坡公立医院的改革先集中体现在公共(政府)统一办理上,后分散体现在私营化运作和管理上。这种做法使得曾经作为公立医院的直接管理者——政府——变成了投资人,管理运营则交给独具私营化特色的董事会负责。这种形式使得新加坡的公立医院管理灵活度更高,运营程序更为合理,运营效率大大提高。这不仅解决了新加坡医疗卫生服务经费不足的问题,而且对于后期新加坡巨大的医疗卫生服务积累基金的投资运营也产生了直接有利影响。因此,新加坡的这种公立医院公办民营化的改革是成功的,也是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

三、变革型领导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公立医院改革

公立医院在一国的公共卫生领域处于核心地位,在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提供方面也发挥着主导作用。如何加强对公立医院的治理,因而公立医院能够按照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来提供服务,是医疗保险机构、公立医院本身,以及医疗服务需求者共同面对的难题。首先,我们要做好医疗体系制度设计,然后要对公立医院要进行有效的监管,国际经验告诉我们,改善公立医院的内部治理机制也是重要手段。目前我国公立医院领导管理体制的变革虽然已经迈出步伐,但是成效并不显著。根据变革型领导理论的要求与国际经验,我国传统的公立医院官僚制形式要逐渐向法人治理模式

转变,这是必然趋势,但如何顺利实现这一转型还需进一步探讨。

1. 中国公立医院改革存在的问题

其一,公立医院内部治理结构职责不合理。我国的医疗治理体制经历了几十年的演变和发展,形成了院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并存的两种体制,在不同的级别和地区的医院采取的方式略有不同。我国公立医院的部门领导一般是由院长聘任或者是由医院的领导班子讨论决定院长批准。在医院里,党委、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医院决策,以及对医院领导集团进行监督的责任,但这种责任的实现程度在不同医院差别很大。正是由于目前公立医院的治理结构不合理,内部职责划分不清晰,医院中决策、执行和监督的角色不够明确,因而公立医院运营期间时常出现一些问题。再加上党委班子主要从事政治性工作,对医院的业务监管起不到有效的作用。所以,党委构建的公立医院领导模式限制了医院院长领导和管理能力的充分发挥,再加上党委领导班子的素质不一定与医院管理相匹配,这就有可能造成公立医院的发展偏离应有的方向。

其二,公立医院院长职业化角色不鲜明。公立医院院长职业化角色是指职业化改革过程中院长对自身角色的认知与定位,以及社会、政府、他人等外在主体对职业院长的角色期望。^[14]公立医院院长是公立医院的核心人物,医院大的方向改革和公立医院的运营效果等都与院长本人及其职业素质有关,院长这一领导角色在公立医院内部管理上发挥着全局性作用,因此院长的专业化管理水平高低已成为当今医院管理行业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在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医院的经营和管理都是由有管理学相关专业背景、经过专门医院管理培训的医院管理者或职业经理人负责。院长职业化程度高低不仅要从院长自身的素质来评价,还应从职业化院长的流动情况和管理机制是否健全等来评价。在澳大利亚,公立医院在人才进入机制方面已开始重视医生的职业化管理水平,对医院管理人员的医疗卫生管理能力和医疗职业方面的特长进行严格把关,要求公立医院院长不仅是医院的管理者同时还是某医疗领域的专家。我国的职业化院长则是“专业做专家,业余做管理”,身兼数职,平时无法集中于管理,聘用制度和绩效考核制度不合理又造成了混日子管理行为的发生。院长的非职业化导致领导难以树立权威,难以对下属形成有效激励,从而导致整个公共医疗体系缺乏发展活力。

其三,公立医院监管机制不健全。我国的公立

医院分布于各个区域,数量多,其服务范围也覆盖各个层次,服务内容十分全面,医疗费用的划拨和支配额度不断增加,其在我国社会中的地位也十分重要。在公立医院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却越来越低,药价上涨、看病成本增加都与医院的监管密切相关。医院领导层引导公立医院向盈利的方向发展,正是医疗机构监管机制不健全的后果。再者,公立医院的内部职能划分不清,多头指导造成公立医院内部管理无法监督。我国公立医院没有建立内部监管机制,由党委和医院院长组成的领导集体并不符合变革型领导理论中跟随者参与管理这一预期,二者之间没有专业性的沟通,不能相互补充或者互相监督,本质上还是单中心治理模式(公立医院的医疗直接服务群体——医生——不参与治理)。这使得公立医院的内部监督没有效果,约束力也不明显。医务人员不参与管理和监督,很难解决更不可能避免公立医院的低效率或内部腐败问题。

其四,公立医院工作人员的医疗职业道德低。虽然我国的公立医院改革已进行多年,但医患冲突仍普遍存在。医院的管理水平很大程度上受到公立医院管理人员素质的影响,公立医院的管理水平又关系到我国公共卫生事业改革的成败。公立医院领导除了要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和职业情操外,相对应的体制诸如公立医院领导的招聘录用制度、薪酬制度、人事档案管理制度等也应随之建立,这对医院领导职业道德情操的培养也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对医院领导失职行为的处罚不严格同样会引发管理失控和医疗腐败。所以,根据变革型领导理论的诉求,作为公立医院的领导者,应该根据环境的变化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

2. 我国公立医院内部治理模式构建

变革型领导理论提倡对组织的构建进行变革,主张组织内外部领导者自身素质的提高,在组织的内部管理形式变革等方面为我国公立医院内部治理机制的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导。借鉴国际上主要国家公立医院内部治理机制改革方面的成功经验,我国公立医院内部治理机制构建可以从医院的队伍重建、治理中心转变、管办动态分离、有效监管,以及整体医疗职业道德提高等方面入手。

一要建立具有变革型的医院职业化管理队伍。变革型领导理论是一个关注于未来、主张工作者的高度认同的行为导向型理论。建立一支高素质、专业化,能够应对各种危机或风险的变革型公立医院管理队伍,提升管理者对公立医院管理责任的高度认同,是实现公立医院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借

鉴澳大利亚公立医院的职业化管理体制,改革我国当前的官僚化领导体制并打破传统的保守型领导管理模式,能够使管理者更好地意识到所承担义务的重要性,以及明确其真正责任所在。公立医院管理者兼任科室主任在我国沿袭已久,过去被称为“双肩挑”“行政、业务两不误”。^[15]根据公立医院长期发展的战略需要和公立医院的人才需求,公立医院应实行公开招聘、公平竞争,在人才选用方面采取专业化择优录取;同时应建立绩效职业考核制度,及时评估,按效用晋升,最大限度地避免医院管理层的短期任用行为。

二要实现医院由“单中心”向“双中心”治理机制的转变。我国公立医院过去虽然也提倡“双中心”治理模式,但当时的“双中心”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双中心”。由医院院长和党委组成的“双中心”治理模式其实质还是“单中心”治理模式。因为党委领导班子并没有医疗职业情操和专业素质,而且双方又不能进行有效的互动;前者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左右院长的战略行为,牵着公立医院的鼻子走。代志明^[16]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入手,运用“路西法效应”对中国医生的职业形象嬗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重塑医生职业形象的“双中心”治理机制,主张在过去由院长、党委组成的医院领导班子的“单中心”治理基础上,组建由医生、护士、职员等专业人员构成的医院管理委员会,让医院内部的医疗服务人员共同参与公立医院的管理运营。这对提高公立医院的运营效率和建立均衡的内部监督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三要创立动态的管办分离治理模式。国际经验表明,在公立医院管理中引入政府之外的工作运营模式会增加其灵活性,从而刺激公立医院内部治理模式的创新。放宽公立医院进入机制将会极大地提高公立医院的行医效率。根据变革型领导理论,对公立医院工作人员的职责和权限进行划分,能够使其对高层次期望的诉求更加积极,使各部门(工作人员)对本职工作的认同和定位更加准确,从而使其对领导或者医院组织的归属感更强。管理部门和办医机构不断变革适应本单位的运营模式,不断变化、灵活应对,能使得固定的管办分离动态化。公立医院内部实行董事会制,能够使医院领导层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对医院的下属工作人员实行“例外管理”(即对不同性格或者工作绩效的下属实行不同的管理原则和激励手段),这样不仅能使管理更加灵活,而且能够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绩效。外部应实行政府放权,使政府的角色定位从直接经办公立医院向间接监管转变。要想使政府与医院之间达到

一种博弈的均衡,使公立医院脱离办医主体的束缚,我国可以像美国一样推行公立医院的法人化改革,使公立医院在内部治理和人员的进入/退出机制方面拥有完全自主权。

四要构建公立医院内、外全方位监管机制。制定完备的公立医院内部监管机制,不仅需要法律和制度的规范,而且也需要外部群体的参与。变革型领导理论强调在组织内部建立领导与追随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公立医院内部各部门应该相互监督,领导群体对下属严格考核的同时还应该贯彻民主思想,授予下属对领导的实质性监督权。为此,应实行医疗服务信息公开化,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透明度,加强外部群众或者媒体的监督;建立政府与市场双重监管的模式,鼓励正规高效的私立医院开展医疗服务业务,形成公私竞争格局;建立健全社会医疗卫生服务多元化监督体制,让医药供给部门、医疗保险经办机构 and 患者都参与到对公立医院的监督中来。当然,在预防公立医院内部腐败风险和应对突发性医患冲突危机时,法律的监管也不可缺失。

五要重建公立医院职业道德体系。公立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是公共性的,其工作人员从事的工作具有非营利性。变革型领导理论认为,首先应对领导者自身的愿景进行变革,然后再协同团体达成愿景共识。公立医院领导行为的变革取决于自身意识形态和工作制度环境的变革,而公立医院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对其服务行为又有着直接导向作用。建设公立医院的职业道德体系,首先,在宏观的职业道德建设制度层面,要建立严格而有效的原则性或法律性规范来提高医院的综合管理水平和效率,对违反职业道德规定的人员制定有针对性的人事、薪酬、职业档案、聘用资格等处罚措施,实行减人增效的用工制度,建立“权变奖励”工作机制,促进职工树立职业竞争意识,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其次,要把职业道德建设落实到公立医院领导者和工作者的具体工作程序之中。应加强管理者的思想道德素质,使其具备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思想观念和作风;增加对医疗工作人员的职业培训,开展医疗职业素质测评或者建立奖惩制度;树立榜样,对于社会回应较好的主体给予荣誉和物质奖励,发挥模范激励作用等。只有从思想、行动和感召力等各个方面入手,才能进行有深度的医疗职业道德建设。

四、结语

我国公立医院改革是新医改背景下的重大民生工程,而公立医院内部治理机制的改革是重中之重。

变革型领导理论作为新时期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性原则,在组织领导变革、管理模式创新,以及组织运营等环节都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在公立医院的内部治理机制构建方面,以变革型领导理论为研究视角要求塑造公立医院领导的变革性、职业化,其管办方式也应该动态灵活地分别设计,组织内部的治理机制要由“单中心”向“双中心”转变,其领导层、内部各部门领导及医疗服务人员的素质也应该提高。另外,医疗工作人员的医疗职业道德体系建设是使公立医院医疗服务真正深入人心和实现我国公共医疗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参 考 文 献]

- [1] 冯秋婷. 西方领导理论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355-375.
- [2] 李玲,江宇. 关于公立医院改革的几个问题[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4):107.
- [3] 夏莽,黄炜. 我国公立医院改革内部控制建设现状分析[J]. 中国医院,2014(2):76.
- [4] 卢乃桂,李晓蕾,黎万红. 西方变革领导理论对中国学校改革的启示[J]. 复旦教育论坛,2010(5):25.
- [5] 卫林英. 变革型领导理论研究综述[J]. 商场现代化, 2011(22):60.
- [6] 陈致中,许俊仟. 变革型领导:理论、结构与最新研究综述[J]. 现代管理科学,2012(9):27.
- [7] 杨中兴. 变革型领导理论研究综述[J]. 哈尔滨学院学报,2007(12):28.
- [8] 陈文晶,时勘. 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的回顾与展望[J]. 人力资源管理,2007(9):22.
- [9] 吴琼,施建军. 在变革中领导:变革型领导理论述评[J]. 南京社会科学,2010(2):44.
- [10] 代涛,尤川美,陈瑶. 部分国家政府举办公立医院的经验与启示[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09(8):2.
- [11] 李玲. 让公立医院回归社会公益的轨道[J]. 求是, 2008(7):58.
- [12] [匈牙利]雅诺什·科尔奈. 转轨中的福利、选择和一致性——东欧国家卫生部门改革[M]. 翁笙和,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26.
- [13] 那晓萍. 美国医院的管理模式和特点[J]. 当代医学, 2005(3):17.
- [14] 崔德行. 公立医院院长职业化发展策略研究[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2.
- [15] 宋丹. 基于战略的医院管理人员职业化之路[J]. 江苏卫生事业管理,2012(6):73.
- [16] 代志明. 双中心治理:化解我国医患紧张关系的新路径——基于路西法效应的视角[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24.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4)05-0060-05

欠发达农村男青年的择偶困境 及其衍生的社会风险

栗志强

(郑州轻工业学院 政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 欠发达农村男青年择偶困境包括两方面: 一是指择偶困难, 二是指婚姻支付高昂。究其产生原因, 一是出生比例和人口流动导致婚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 二是城镇化潮流和农民的理性化使得农村女青年更看重物质和经济利益, 从而对男青年构成巨大压力。欠发达农村男青年择偶困难可能衍生出一些社会风险: 加剧欠发达农村贫困风险, 威胁欠发达农村社会安定, 增加欠发达农村养老风险与家庭伦理风险。要化解这些风险, 需要帮助欠发达农村男青年改善经济社会地位, 在欠发达农村开展择偶观和家庭伦理教育, 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设计中提前考虑大龄未婚男青年群体的养老问题。

[关键词] 欠发达农村男青年; 择偶困境; 社会风险

[中图分类号] C913.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4.05.012

随着近年来我国农村婚龄人口性别比的失衡, 农村男青年的择偶困难问题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魏国学等^[1]从经济学视角对农民的择偶成本、择偶难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靳小怡等^[2]从人口学角度对性别失衡导致的各种风险进行了研究。但是, 聚焦于农村青年择偶困难衍生的社会风险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本文拟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 在对豫北农村调查的基础上, 对欠发达农村地区男青年的择偶困境产生的社会背景因素及其可能衍生的社会风险进行探讨, 并试图提出其应对之策。

一、欠发达农村男青年的择偶困境

欠发达农村男青年择偶困境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择偶困难, 二是婚姻支付高昂。

1. 择偶困难

随着19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升高, 中国婚姻市场上的男性婚姻挤压矛盾日趋激化。李中

清等^[3]认为, 中国女性婚姻的“高攀性”特点, 使得阶层较高的男性结婚的概率较高, 而阶层较低的男性结婚的概率较低。因此, 广大经济欠发达农村地区男青年作为婚姻市场上的底层群体, 承担了婚姻挤压的后果。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 农村女青年可以通过婚姻嫁往经济发达地区, 一些经济欠发达农村地区的男青年则成为择偶困难的重灾区。男青年择偶困难已成为欠发达农村地区的一大社会问题。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农村30~34岁的大龄未婚男青年占同年龄段农村男青年的比例为13.67%, 大大高于(市)镇的9.06%^[4]。据笔者对豫北农村L县H镇的调查, 该镇的村庄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男青年择偶困难问题, 有些村庄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僻, 男青年不得不采用外迁、在县城买房等方式来提高自己在婚姻市场上的筹码, 而有些在县城买不起房子的贫困男青年则不得不沦为“大龄未婚男青年”。

[收稿日期] 2014-06-20

[基金项目] 郑州轻工业学院2013年度博士科研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栗志强(1974—), 男, 河南省安阳市人, 郑州轻工业学院副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农村青年婚姻问题。

2. 婚姻支付高昂

近年来,农村青年婚姻“彩礼”持续攀升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豫北地区,由于婚龄女青年的严重短缺,婚姻市场成为女方的“卖方市场”,女方获得了婚姻谈判中的主动权,致使“彩礼”以惊人的速度攀升。据新华网报道,冀鲁豫部分农村地区结婚费用居高不下,动辄几十万元的天价成为不少农村家庭的沉重负担,有些家庭甚至因婚致贫^[5]。据笔者调查,豫北H镇的婚姻“彩礼”数额在十年间几乎增长了10倍。据H镇N村支书李长生介绍,该村的男青年婚姻“彩礼”在十年前不过几千元,现在却需要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除此之外,男青年家庭还需要盖新房、购买家具、汽车,有的女方还要求男方家庭必须在县城为孩子购买一套商品房(2013年当地商品房均价约每平方米3000元左右)。照这样预算,N村一个男青年结婚,他的家庭需要支出40多万元。这样高昂的婚姻支付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费用,不少男青年家庭为婚姻不得不四处借债,从而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即使是男方入赘女家,也往往需要支付5万元以上的“嫁妆”,甚至是拿汽车作“陪嫁”。据悉,2011年H镇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为8066元^[6],由此可以测算出当地男青年结婚所需的支出是一个农村三口之家近20年的收入。当地不少男青年正因为支付不起这笔高昂的婚姻费用,婚事一拖再拖,而成为大龄未婚男青年。

二、欠发达农村男青年择偶困境产生的原因

欠发达农村地区男青年择偶困境因何而产生?根据涂尔干社会学的方法论原则,“社会事实”应该用别的“社会事实”去解释,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存在于社会层面。归纳起来,欠发达农村地区男青年择偶困境的产生可归因于以下两个方面。

1. 出生比例和人口流动导致婚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

婚龄人口性别比是婚姻市场供求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它影响着婚姻市场的平衡。人口学研究表明,婚龄人口性别比的失衡将会造成严重的婚姻挤压^[7]。表1的数据表明,2010年H镇的婚龄人口性别比已经严重失衡,婚龄男青年数量大大超过女青年。表1中的数据仅仅是户籍在H镇的婚龄男女青年的数量,不排除已经在外打工并不打算回家乡择偶的女青年。因此,实际的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

可能要比统计的情况还要严重。存在失衡的婚龄人口性别比主要有2个原因:一是1980年代以来农村出生性别比的严重失衡,二是近年来大规模的城乡间人口流动。

有学者研究认为,中国1980—2000年出生队列缺失女性达920万之多^[2]。以笔者所调查的豫北H镇为例,自1980年代以来,该镇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严重失衡,男女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表2是豫北H镇1960—1990年代8个年份的出生性别比的官方统计数据。由表2可以看出,1960—1970年代该镇的男女性别比基本平衡,1978年以后,男孩的出生数量远远超过女孩。考虑到没有户籍的“黑孩”(豫北地区农村农民将出生时没有登记的孩子称为“黑孩”)的存在,实际的出生性别比可能要高于表2的官方数据。

表1 2010年H镇婚龄人口数量、性别统计表

年龄	性别		合计
	男	女	
18岁	504	259	763
19岁	594	465	1 059
20岁	713	578	1 291
21岁	737	561	1 298
22岁	709	670	1 379
23岁	1045	845	1 890
24岁	793	659	1 452
25岁	573	440	1 013

资料来源:H镇计生委人口统计资料。

表2 H镇8个年份出生男孩、女孩人数统计表

出生年份	性别	
	男	女
1965	898	868
1968	795	792
1974	760	857
1978	536	495
1980	507	405
1989	737	561
1990	718	579
1992	506	259

资料来源:根据《H镇志》有关资料整理。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婚姻资源从农村向城镇地区的单向流动,也进一步加剧了本来就已经失调的婚龄人口性别比^[8]。由于近年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农村女青年进入城镇打工,在城镇恋爱结婚或者嫁往经济发达地区,客观上也减少了欠发达农村地

区婚龄女青年的数量。婚龄人口性别比的失衡无疑是欠发达农村地区男青年婚姻困境的基础性因素。

2. 城镇化潮流和农民的理性化使得农村女青年更看重物质与经济利益,从而对男青年构成巨大压力

曹锦清^[9]认为,城市消费文化向乡村传播所激起的新的需求是无法在土地上得到满足的,这成为促使乡村劳动力向外流动的一个强大动因。城市消费文化表征着城市的生活方式,代表着先进、文明、便利、舒适,这些都对当代农民,尤其是农村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在城镇化的大潮之下,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已经成为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追求。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青年在住房、家具、电器等生活设施上日益向城镇靠拢,追求舒适方便的现代化生活。对于欠发达农村女青年而言,婚姻正是实现这一梦想的重要途径之一。利用婚姻索取尽可能多的钱和现代化生活设施,成为欠发达农村女青年过上“城里人”舒适生活的梦想。再加上农民之间的攀比心理,索要高额的“彩礼”等婚姻支付就形成了风气。

此外,贺雪峰^[10]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快速进展的农民理性化极大地侵蚀着中国不同地区农村的传统。农民理性化发展不断侵蚀农民的婚姻与家庭生活等方面,农民的择偶观念也呈现出日益理性化的趋势。在豫北H镇的调查表明,男方家庭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已经成为欠发达地区农村女青年择偶的基本标准,对婚后舒适便捷的物质生活的追求成为女青年选择配偶的主要因素。因此,感情因素在择偶中所起的作用日益衰退,甚至还出现了桂华等^[11]学者所谓的“婚姻变迁冲击家庭伦理”的现象。可以说,市场经济背景下,对经济利益的理性计算几乎渗透到农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婚姻也成为一种名符其实的“交换行为”。作为稀缺资源的女青年在经济利益上的追逐在客观上造成了欠发达农村地区男青年婚姻支付的攀升。

三、欠发达农村男青年择偶困境衍生的社会风险

社会学认为,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各个部分具有不同的功能并相互依存,任何一部分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到其他的部分^[12]。笔者认为,欠发达农村男青年的择偶困境作为一种社会问题,可能会引发如下4种社会风险。

1. 加剧欠发达农村贫困风险

对于农村男青年家庭来说,择偶难是难以言说的痛,择偶难导致的高额婚姻支付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根据笔者的相关研究,农村男青年的婚姻支付与其家庭条件、家庭地理位置存在反比关系,即家庭经济条件、地理位置越差的男青年家庭反而越需要支付高额的“彩礼”等结婚费用。^[13]对于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地理位置较偏远地区的农民来说,这笔经济负担更为沉重。尽管如此,儿女的婚姻是父母心中的头等大事,多数男青年父母是要千方百计地为儿子筹集结婚费用的。这样,几十万元的婚姻支付使得不少农村家庭因婚致贫,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桂华等^[11]学者通过对河南农村的研究认为,农村男青年娶一个媳妇需要花费10年的积蓄,为2个儿子娶媳妇需要父母辛辛苦苦打工20年。对于一些偏远、经济欠发达的村庄,普遍存在因婚致贫的现象,这将进一步加剧经济欠发达农村地区的贫困,扩大城乡间的差距,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 威胁农村社会安定

有学者认为,由于“择偶梯度”的存在,婚姻挤压后果的主要承担者是经济层级较低的农村男青年。^[7]因此,农村男青年择偶困难实际上主要体现为经济层级较低者的择偶困难。这样,择偶困难与经济上的贫困成为相伴而生的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经济上的贫困与择偶的困难形成了弱势地位的多重累积,欠发达农村男青年有可能产生被剥夺感和不满情绪,从而危及农村社会的安全稳定。有学者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从中观层面分析性别比失衡的后果,指出农村“光棍”群体的存在将会给自身、家庭和社区均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成为威胁社区公共安全的重要因素。^[14]

越轨理论认为,当社会结构没有为每一个人提供合法化、制度化的手段去实现自己的合法目标时,一些人将会采取非法的手段去实现这一目标。婚姻生活作为人类的一种基本需求,本应该得到满足。但是,在择偶困难的背景下,合法的婚姻生活目标的实现变得十分困难。那么,因择偶困难而大量存在的农村“光棍”群体的越轨行为必然增加。有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大量大龄未婚男青年的出现可能会引发打架斗殴、性犯罪、性产业的繁荣、非法性行为的增加、拐卖妇女儿童、影响家庭稳定等社会问题。^[15]此外,无法找到对象的农村男青年还有可能通过买卖婚姻、拐骗婚姻等非法手段进入婚姻,也有可能通过嫖妓、充当第三者等不正当的方式来满足

其性需求,从而败坏农村的社会风气和威胁农村的社会稳定。

3. 增加欠发达农村养老风险

欠发达农村男青年择偶困难将会带来诸多现实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可能导致未来的农村社会养老问题。据有关学者测算,2020年将有2400万“剩男”面临娶妻问题。^[16]根据择偶梯度理论,这些“剩男”将主要分布在广大农村贫困地区。若干年后,这些“剩男”将步入老年,由于既没有子女也没有配偶,加之经济上不宽裕,他们的养老和日常照料问题将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这对于政府和社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4. 提高欠发达农村家庭伦理风险

农民婚姻困境,不仅可能导致上述社会问题,也可能会冲击着农村家庭伦理。正如桂华等^[11]学者所言,在当前的农村婚姻市场结构和婚姻模式中,父母是婚姻负担的最终承担者,子女是婚姻彩礼的支配者,老年人则是婚姻负担的牺牲者。为了给儿子娶媳妇,父母要辛辛苦苦打工还债,儿子和儿媳却住在新房子里,使用着父母用血汗钱购买的现代化家具和电器,享受着准城里人的生活。豫北农村流行着这样一句顺口溜:“老的干了,小的淹了”,指的就是这种现象。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构成了青年人对老年人的一种代际剥削,反映了择偶困境背景下农村家庭不平等的代际关系和青年人的伦理缺失。

更令人担忧的是,欠发达农村男青年的择偶困境还可能导致农村家庭孝道的衰落。在对豫北农村的调查发现,由于婚姻市场上女青年的短缺,女方家庭在婚姻谈判中获得了极高的地位。借此,不少女方家庭在结婚之前会向男方提出“约法三章”:一是不负责养老;二是不负责还债;三是房子产权归自己,老人搬出去居住。于是不少农村就出现了“青年人住楼房,中年人住瓦房,老年人住草房”的现象。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不孝因男方择偶困难而获得了一定的“合法性”,不少农民认为“小的都顾不了,哪里还顾得了老的”。正因为这个理由,这种不孝者较少有其他类型的不孝者所背负的愧疚与不安,易使年轻一代认为对老人的不孝敬、不赡养是自然的事情。笔者认为,这种青年人对老年人的不孝行为极易在农村社会形成一种“示范效应”,在青年人中蔓延,影响到农村的社会风气。

因此,择偶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欠发达农村家庭的代际剥削和孝道的衰落,冲击着农村的家

庭伦理,提高农村家庭伦理风险。

四、防范社会风险的几点建议

靳小怡等^[2]认为,性别失衡下的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不在于风险是否会发生,而在于风险将于何时、何地、何种形式和规模发生,将带来多大的损失。在未来持续的婚姻挤压之下,欠发达农村男青年择偶难将成为一个长期性的社会问题,其衍生的一系列社会风险也将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短期内无法解决性别失衡这一前提下如何化解择偶难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是学术界所面临的一大课题。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帮助欠发达农村地区男青年改善经济地位

经济原因是欠发达农村地区男青年择偶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通过多种渠道对农村男青年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辅导,推动农村职业教育的逐步普及化,帮助他们提高致富能力,摆脱经济上的贫困。只有经济地位改善了,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在婚姻市场上的弱势地位,提高其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降低择偶困境与其经济贫困之间的累积程度,从而降低社会安全风险发生的概率。

2. 开展择偶观教育,在欠发达农村大力倡导以爱情为基础的择偶观念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女方过分看重男方的经济条件是导致男方婚姻支付攀升的重要因素,而女青年之间的攀比使得这种功利化的择偶观逐渐蔓延。同时,过分功利化的择偶观也是导致欠发达农村家庭伦理风险的主要因素。因此,建议在欠发达农村开展择偶观教育,大力倡导以爱情为基础的择偶观念,采用讲座、板报等多种形式的社区文化活动宣传正确的择偶观,努力树立农村婚姻新风尚。

3. 开展家庭伦理教育,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

有学者认为,当前农村家庭伦理的缺失是农民家庭关系日益理性化、农民价值世界倒塌所致,农民价值世界的坍塌正是农村社会伦理道德教育相对缺位的结果。重新建立农村家庭良好的代际关系,防范农村家庭伦理风险,需要在农村开展广泛的家庭伦理教育。具体来说,需要通过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在农村社会营造一种“以孝敬父母为荣,不孝敬父母为耻”的良好社会氛围。这就需要农村教育部门与民政部门联动,在学校、家庭、社区中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广泛的孝文化教育。

此外,农村舆论导向的缺乏与约束力的弱化也是农村家庭伦理风险存在的因素之一。由于缺乏正确的舆论导向,唯经济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左右了青年人的是非判断;由于舆论约束力的弱化,大大降低了青年人不孝敬父母所支付的社会成本。结果,青年人对老年人的代际剥削可以获得经济上的收益,却很少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这是农村社会的一个怪圈。在不少农村地区,由于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经济联系的减弱,村委会的功能也日益弱化,其对于一些冲击家庭伦理的行为也无能为力。因此,防范欠发达农村家庭伦理风险,需要确立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强化舆论的约束力。具体来说,需要发挥社区(村委会)在欠发达农村舆论引导中的功能,加强宣传、教育、监督,采取奖励和批评相结合的方式在农村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并保证其约束力。

4. 考虑大龄未婚男青年群体的养老保障需求

对于因择偶困难而出现的大龄未婚男青年群体,其未来的养老保障和日常照料问题是我们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设计中需要提前考虑的问题。一方面要考虑到这笔养老保障资金的来源,以免使其成为政府的巨大经济负担,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考虑未来农村未婚孤寡老人的日常照料问题,通过适当的社会养老方案的设计,满足这些老人的养老需求,使其老有所养。

[参 考 文 献]

- [1] 魏国学,熊启泉,谢玲红. 转型期的中国农村人口高彩礼婚姻——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2008(4):30.
- [2] 靳小怡,刘利鸽. 性别失衡下社会风险与行为失范的识别研究[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41.
- [3] 李中清,王丰. 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M]. 陈卫,姚远,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书店,2000:114.
- [4] 张翼. 单身未婚:“剩女”和“剩男”问题分析报告——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 甘肃社会科学,2013(4):51.
- [5] 孙亮全,晏国政. 部分农村地区结婚花费数十万 有家庭因婚致贫[EB/OL]. (2014-03-30)[2014-06-08]. http://news.xinhuanet.com/city/2014-03/30/c_126332731.htm.
- [6] 林州市年鉴编纂委员会. 林州年鉴 2011[Z]. 安阳:林州市年鉴编纂委员会,2011:290.
- [7] 陈友华,米勒·乌尔里希. 中国婚姻挤压与前景展望[J]. 人口研究,2002:58.
- [8] 田亮红. 打工潮背景下农村青年婚姻流动的变迁——以鄂西南山区坪村为例[J]. 青年研究,2009(2):56.
- [9] 曹锦清. 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62.
- [10] 贺雪峰. 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254.
- [11] 桂华,余练. 婚姻市场要价: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现象的一个框架[J]. 青年研究,2010(3):35.
- [12] 侯均生. 西方社会学教程[M]. 3 版.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164.
- [13] 栗志强. 性别比失衡背景下的男方婚姻支付——对豫北 H 镇的调查[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88-90.
- [14] 靳小怡,郭秋菊,刘利鸽,等. 中国的性别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J]. 青年研究,2010(5):21.
- [15] 刘中一. 大龄未婚男性与农村社会稳定——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社会后果预测性分析之一[J]. 青少年犯罪问题,2005(5):17.
- [16] 穆光宗. 矫正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舆论导向[N]. 学习时报,2006-07-12(01).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4)05-0065-06

迁村并居村民的社区适应性研究

——基于河南省中部地区的调查

张春兰, 贾舞阳, 李敏丽, 陈森蔚

(南京农业大学 社会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近年来,我国多地农村开展了有利于土地集约化治理的迁村并居工程。通过对河南省中部地区迁村并居典型试点的调查发现,迁村后村民的社区适应性总体上不太理想,集中反映在经济适应和生活适应2个方面,人际关系方面的适应性和心理方面的适应性相对较好,但也存在一定问题。这些问题的成因主要来自个体、家庭和社会3个方面,其中个人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和迁村形式等对村民的社区适应性有着很大影响。为了改善迁村并居村民的生活状况,提高村民的社区适应性,应避免行政力量的过度干预,真正关注村民的利益诉求;帮助失地村民重新就业,保障其经济来源;培养新社区村民的社区参与意识,促进公共参与;增加村民间的事缘型互动,重建熟人社区。

[关键词]迁村并居;社区适应性;社区公共空间;事缘型互动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4.05.013

近几年来,在城乡一体化建设背景下,我国很多地区的农村开展了迁村并居工程,将几个邻近自然村整合起来,建立新的农村大社区。这一工程的建设对于规范农村村貌,完善农村公共设施配置,集约农村土地资源,以及缓解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工业用地不足的问题都有着重要意义。

国内不少学者对迁村并居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李昌平等^[1]提出,“土地增减挂钩”政策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农村发展政策,农民应该抓住这次机遇,积极实行撤村并居,并从对基层政府财政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意义方面进行了阐述;洪增林等^[2]指出,根据土地所有制存在的形式,城镇建设区“拆村并居”模式可分为3种:国有化土地模式、“两制并存”模式、保权让利流转模式;左燕钢^[3]将农村集中居住的动因总结为工业化、城市化、农业产业化、城乡一体化、农民市民化5个方面;而郑风田等^[4]则认为,政府强制推进集中居住,不仅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缺乏合理统筹与科学规划,造成对乡村自然环境与传统的破坏。

总的来说,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迁村必要性、功能分析、推进模式、迁村后存在的问题等宏观方面,而对迁村并居的主体——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搬迁状况、新社区适应状况等微观方面关注的较少。鉴于此,笔者拟在对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舞钢市的迁村并居的农民进行抽样调查的基础上,考察其入住新社区后的适应情况和影响因素,以引导地方政府在规划新社区时,能了解并满足农民的合理需求,减少撤并中存在的问题,以促进农村新社区的健康发展。

一、研究设计与样本情况

河南省是我国中部地区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大省,自2009年以来受东部沿海地区的影响,借鉴其经验,郑州、洛阳、开封、鹤壁、舞钢等多市开展迁村并居工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很多问题。由于郑州、荥阳和舞钢是河南省较早实施迁村并居工程的城市,并且这3个城市皆位于河南省中部,黄河以南,有着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传统习俗,因此本

[收稿日期] 2014-03-24

[基金项目] 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201310307064)

[作者简介] 张春兰(1962—),女,甘肃省兰州市人,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社会政策。

研究选取郑州、荥阳、舞钢3市进行调查。郑州市作为省会城市,经济最为发达,荥阳和舞钢作为县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因笔者调查的对象为农村地区,而河南省农村地区经济整体上处于欠发达状态,且3地的农村距市中心普遍较远,没有受到其所在城市经济发展程度太大的影响,所以这3个城市的农村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

本研究把社区适应划分为经济适应、生活适应、人际关系适应和心理适应4个维度。其中,经济适应主要包括生产劳动的适应、搬迁前后对谋生手段变化的适应、村民对目前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观满意程度等;生活适应主要包括生活方式(出行、住房)、日常活动、社区治安、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适应;人际关系适应主要包括迁入新村村民之间的实际交往、邻里关系和村民对此的主观感受等;心理适应主要包括对新社区的认同度、住在社区的心理感受等。调查由经过培训的社会学专业学生实施,采取“集中填答卷—当场完成—当场检验—当场回收”的方式进行。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根据每个城市迁村并居的试点数目和迁村的村民人数,最终在3市发放的问卷数分别为:舞钢市190份,荥阳市110份,郑州市100份,回收有效问卷38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6.0%,数据采用SPSS 20.0社会统计软件处理,样本基本构成情况见表1。

表1 样本基本情况(n=384)

变量	选项	百分比/%
性别	男性	46.4
	女性	53.6
年龄	15~30岁	18.0
	31~50岁	39.6
	51~60岁	21.4
	61~83岁	21.0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47.4
	初中	33.1
	高中及中专	13.0
	大专及以上	6.5
婚姻状况	未婚	6.5
	已婚	87.3
	离婚	1.0
	丧偶	5.2

二、调查结果分析

1. 经济适应

调查显示,迁村并居后,在家庭年收入实际变化

情况方面,有73.4%的村民认为收入变化不大,14.1%的村民认为收入增加,仅有12.5%的村民认为收入减少。但是,在支出方面,有71.9%的村民表示现在的日常开销比过去增加很多,26.8%的村民表示差不多,仅有1.3%的村民表示开销减少。由此可见,家庭收入虽然没有很大变化,但日常开销即生活成本大大增加,这无疑加重了村民的生活负担,造成了村民对如今收入和经济条件的不满意。其中,在选择“开销增加”的村民中,排名前3位的支出项目为粮食开销(87.2%)、蔬菜开销(83.5%)、水电燃气费开销(53.8%)。迁村并居前,村民可以通过种粮食蔬菜实现自给自足,门前打井便可取水,烧柴和麦秸秆就可以生火做饭,这些都是免费的,而来到新社区后却什么都要购买,这对于素来节俭的传统村民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在村民的日常生活消费中,84.4%为粮食消费,78.4%为蔬菜消费,55.7%为水电燃气费,42.2%为教育支出,34.6%为人情往来,28.4%为日用品。其中人情往来占了不小的比重,说明村民在新社区仍然重视人情和面子,以在重要节日相互馈赠资源和礼物来维系人际关系。总的来说,村民对突然增加的生活开销并不是很适应,并且在生活方式上仍保留着传统农村的习俗。

2. 生活适应

调查显示,迁村并居后,有58.2%的村民表示空闲时间增多,33.7%的村民表示变化不大,8.1%的村民表示空闲时间减少,而空闲时间增多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土地,赋闲在家。对于闲暇时间的安排,排在前3位的是看电视、与别人聊天、散步,比例依次为33.4%、28.9%和25.6%。新社区的公共配套设施虽较为完善,新建了公共厕所、下水管道、路灯、停车场、棋牌室、健身器材、医疗室、图书室、公共广场等,但村民普遍反映对棋牌室、健身器材、图书室、公共广场等设施的使用频率很少。既然村民的闲暇时间比原来增多,不是没有时间去使用这些公共设施,并且这些设施就在家门口,十分便利,为什么村民在闲暇时间大多在各自家看电视,或者与周围的群体进行简单的互动交流,却很少使用这些免费的公共设施呢?笔者认为,这与迁村并居前后社区公共空间的变化有关。

“公共空间”的概念最早来源于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在中国关于公共空间的探讨主要是城市社会学对城市社区的研究。农村社区的公共空间主要指人们可以自由出入地进行各项活动和进

行信息、思想交流的场所。过去,村民们习惯于聚集在一起进行一些活动,如妇女聚在河边洗衣服,男人聚在田间地头的空地上一起聊天,这种自愿地聚集在一起活动的场所自然就成了乡村聚居中的公共空间。而在新社区,河塘、田地等为村民所熟悉的场所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陌生的棋牌室、图书室、健身器材,这些新的充满现代气息的空间令村民感到不习惯,因而他们可能也不情愿聚集在那里进行活动。

3. 人际关系适应

(1)对新社区人际交往圈(邻里、亲戚、交往)的适应。调查显示,虽有78.5%村民是与同村的人一起搬进新社区的,即整村搬迁,但是仍为邻里关系的只有24.8%,即搬入新居后村民居住的相对位置发生了改变,互动的对象多为新邻居,不过大家原来就是一个村的,一起住了几十年,适应得很快;与亲戚一起搬进新社区的村民占比为30.5%,未一起搬迁的原因在于原来就属于不同的村。搬入新社区后,有28.7%的村民表示跟原来相比现在与邻居的互动减少了,64.7%的村民表示差不多,互动减少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不熟悉,而是因为搬迁后村民的住房面积普遍比原来小,串门不方便,而且各家都重新装修过,家里比原来干净整洁,不好意思再去邻居家,怕弄脏,会感觉到拘束,所以干脆各自待在家里。因此,迁村并居后住房形式的变化无形中对村民之间的交往产生了阻碍,村民的人际关系圈和交往频数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不过整体上来说,村民比较适应新社区的人际交往。

在“遇到急事会向谁借钱求助”选项上,有70.1%的村民选择找亲戚帮忙,16.2%的村民表示会找现在的邻居帮忙,只有3.8%的村民表示会找朋友帮忙;在“闲暇时交流沟通会找谁”选项上,有8.6%的村民表示会找以前的邻居,73.0%的村民表示会找现在的邻居,9.7%的村民表示会找亲戚,4.1%的村民表示会找朋友,3.2%的村民表示不与人交流、独处,1.4%的村民表示以上情况都有。这说明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仍是新社区村民的基本社会关系,交往形式仍以初级交往为主,交往范围存在一定的狭隘性,业缘关系不发达,新社区还没有完成从传统农村社区向现代城镇社区的转变。在“迁居新社区后人际关系的自我评估”选项中,有10.7%的村民表示感觉很好,71.2%的村民表示比较好,15.4%的村民表示一般,只有2.6%的村民表示感觉比较差,而自我感觉很差的为零,这反映出迁村并

居后由于空间变换的缘故,村民的人际交往网络正在重构,不同村民对现有的人际交往的适应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2)集体活动的类型与参与度。调查显示,新社区一般有广场舞、节日晚会、电影放映等集体性活动,但是有58.5%的村民表示一般不参加,32.9%的村民表示心情好就去,仅有8.4%的村民表示一般都参加。一般不愿参加的集体活动为广场舞,且大部分为男性,他们表示“跳舞为女同志的活动,一般男同志不宜参加”,但除了广场舞每天晚上都有外,节日晚会和集体电影平均一个月一次或几个月才有一次,频次很低。这一方面说明村民对于新社区集体活动的参与度不高,另一方面也表明社区集体活动太过单一,也没有固定性和周期性,无法满足村民的需求。

4. 心理适应

(1)对新社区的接受程度。从对新社区的接受程度来看,有21.1%的村民表示很喜欢新社区,64.6%的村民表示对新社区感觉还好,13.3%的村民表示不喜欢,1.0%的村民表示很反感;从对外的态度来看,有31.0%的村民表示比较愿意向外人介绍自己所居住的社区,50.1%的村民表示无所谓,13.9%的村民表示很不愿意,这说明村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还不强。有些村民认为自己“对社区不了解,没什么好介绍的”;有些村民则认为这是社区管理人员的事情,与自己无关;有些人甚至觉得“介绍”等于“炫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应该安守本分。在遵守社区规定方面,有13.0%的村民表示一定会考虑,43.7%的村民表示一般会考虑,37.3%的村民表示不知道有什么规定,6.1%的村民表示从不考虑,这反映村民普遍对社区规定持漠视态度,社区规定还没有原先的村规有约束力,也说明了在主观感情上部分社区村民对新社区还是不重视和不接受的,社区的整合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2)居住在新社区的心理状态。迁居新社区后,村民的心理状态总体良好,有50%以上的村民表示没有孤单、焦虑、压抑的心理情绪,因为大部分是整村搬迁,周围多是原来熟悉的邻居,遇见烦心事大家可以在一起聊天,能够相互开解和及时疏导,且村民刚从农村搬进新社区,仍保有原先的乡土观念,对生活的期望值并不是很高,不会与城市社区更好的生活进行比较,只要能维持比较好的生活,心情都很好。但也有近三成的村民表示偶尔会有孤单、焦虑、压抑的感觉,其中感到焦虑、压抑的比例大于孤

单,原因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搬入新社区后日常开销比原来大,而收入并没有明显增加,所以会感到经济紧张,入不敷出,为生计发愁而感到焦虑。另外,新社区的住房面积一般都没有原来的大,而且房前屋后的绿地面积有所减少,出门便是水泥马路,与原来那种亲近自然的生活相比会感到一定程度上的压抑。只有 19.8% 的村民表示住在新社区的心情是“非常舒服”,62.1% 的村民表示“马马虎虎,还行”,16.5% 的村民选择“有点别扭”,这说明整体上村民在新社区居住的心情并不十分舒畅,而造成心理压抑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三、影响迁村并居后村民社区适应性的因素

1.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

经皮尔森卡方检验发现,新社区村民的性别、年龄与在新社区的经济适应、生活适应、人际关系适和总体适应情况之间的精确双侧检验值均大于 0.05,表明它们之间无显著相关关系。

村民的文化程度与经济适应有较密切的关系(精确双侧检验值 = 0.003 < 0.05),文化程度越高,经济适应状况越好。从表 1 可以看出,新社区村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 80.5%,这说明在新社区,村民即使拥有了新的身份,却没有与之相符的文化素养,没有从根本上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初中和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村民,比较及非常适应新社区生活的比例分别为 50.4%、40.1%,而高中及中专学历的村民非常适应新社区生活的比例高达 73.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村民非常适应新社区生活的比例也达到了 60%。这些次调查也表明,文化程度与对新社区总体的适应情况也有相关关系(精确双侧检验值 = 0.016 < 0.05),在对新社区非常适应和比较适应方面,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所占比例最高,为 76.0%,且没有很不适应的人;而在这个方面,小学及以下学历者占

44.7%,且有 22.1% 的村民表示不适应。

2. 收入状况

经济收入直接决定了村民在新社区中的生活质量。总体来说,家庭收入越高,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越小,当家庭年收入从不到 1 万元上升至 5 万元及以上时,食品支出超过总支出一半家庭的比例从 60.0% 下降至 18.2%。当食品支出比重很高时,村民的生活多维持在生存型消费的水平,还需为生计发愁,生活质量也不会很高,相应的经济适应能力也很弱。由于是失地搬迁后造成他们现在的生活困境,所以他们很容易把责任归咎于新社区,对新社区产生排斥心理。

收入状况与经济适应的相关性具体见表 2。由表 2 可知,当家庭年收入在 1 万元及以下时,67.7% 的村民在经济方面感觉不太适应,7.9% 的村民表示感觉很不适应;而当家庭年收入在 5 万元及以上时,不太适应的比例下降至 16.7%,并且没有很不适应的村民。可见,随着年收入的增加,村民的经济适应情况也在逐渐改善,收入状况与经济适应情况呈正相关。总体来说,迁村并居后村民的经济适应状况不太理想,不太适应和很不适应的村民占到了总调查人数的 50.4%,超过一半,而感觉非常适应的仅占 1.3%。

3. 迁村形式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迁村并居形式可分为整村搬迁和零散搬迁 2 种。整村搬迁指在迁村过程中原来同村的村民以村为单位,集体迁入新社区;零散搬迁指来自不同村庄的村民各自零散地搬入新社区。迁村形式对村民在新社区的人际关系适应有重要影响。表 3 显示,整村搬迁的村民,日常联系次数比迁村前多或与迁村前一样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6.8%、71.4%,均高于零散搬迁村民的比例;而零散搬迁的村民,联系次数比原来少的比例高达 54.3%,超过一半。原因在于整村搬迁能使村民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和非正式制度(传统、习俗)较为完整地保存下

表 2 收入状况与经济适应的相关性 (n = 384)

收入状况	经济适应情况/%				卡方检验值
	非常适应	比较适应	不太适应	很不适应	
1 万元及以下	0.8	23.6	67.7	7.9	$\chi^2 = 70.373$ Sig. (2 - sided) = 0.000
1~2 万	3.2	48.4	38.7	9.7	
2~3 万	0.0	67.9	29.5	2.6	
3~4 万	2.5	77.5	20.0	0.0	
5 万元及以上	0.0	83.3	16.7	0.0	
合计	1.3	48.3	44.8	5.6	

表3 迁村形式与邻里关系的相关性 (n=384)

迁村形式	同原来比与邻居联系次数变化情况/%			卡方检验值
	比原来多	和原来一样	比原来少	
整村搬迁	6.8	71.4	21.8	$\chi^2 = 34.08$ Sig. (2 - sided) = 0.000
零散搬迁	3.7	42.0	54.3	
合计	6.1	65.1	28.8	

来,村民在搬迁后与周围群体的同质性强,分化程度低,即使在新社区换了新邻居,但在原来的基础上重拾旧的关系网络也相对容易;若是零散搬迁,则村民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被瓦解,要想建立新的关系网络必须重新经营,而周围又是来自不同村庄的个体,村庄之间的异质性导致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性,重建新的关系网络比较困难。由于农村社会实践主要是基于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的信任,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能够产生预期,因而实践的社会风险相对较低。搬入新社区的村民仍具有传统农村村民的实践逻辑,在周围都是陌生人的情况下,没有了特殊性信任做基础,实践中所冒风险会更大,这也为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增加了难度。

四、提升迁村并居村民社区适应能力的对策建议

当前河南省的迁村并居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村民在迁入新社区后存在诸多方面的不适应,且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政策操作性较低,执行力度也不够。笔者认为,为了改善迁村并居村民的生活状况,提高迁村并居村民的社区适应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避免行政力量的过度干预,真正关注村民的利益诉求

在调查中,当被问到“政府在搬迁前是否征求过您的意见”时,大部分村民表示,只是在村民大会上象征性地通知了一下,大家只是知道要搬迁了,但并没有决定权,也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只能被动响应政府号召,选择搬迁。在迁村并居之前,村民在生活上也会遇到困难,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把责任归咎于政府,更不会埋怨政府。而在迁村并居后,村民虽然也可以发表一些意见与建议,表达一下他们的利益诉求,但是,他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没有真正获得平等的权利,所以,他们会一直认为自己是被政府所主导的,被行政力量牵着生活,他们生活中遇到的麻烦是政府造成的,一旦遇见困难就会全部归咎于政府。^[5]由此可见,在没有充分与村民沟通的情况下就盲目推行迁村并居,会违背村民的意愿,

带来不良后果。所以在迁村并居过程中,应该从村民的利益出发,确保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实施迁村并居,在新社区规划、建设、管理等过程中也要听取村民的意见,积极引导村民参与,并充分考虑当地的传统习惯和村民的生活方式,不能急功近利地强制搬迁,造成“被上楼”的怪相。

2. 帮助失地村民重新就业,保证其经济来源

经济状况是影响村民社区适应性的关键因素,而充分就业则是保障其经济来源稳定的重要条件,村民之所以对新社区感到诸多不适,究其根本还是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使其能安身立命。新社区居住的硬件条件虽然比原来的村庄优越,但村民在这里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谋生手段,加上大部分失地村民的文化素质不高,没有一技之长,难以充分参与市场竞争,只能从事纯体力劳动,且多为临时工,劳动代替性强,收入不稳定;而“40”“50”人员在年龄上处于尴尬位置,受到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和排斥,一旦失去土地,则很难找到工作。所以,新社区要依据当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村各项产业,尤其是二、三产业,积极招商引资,创办具有当地特色的乡镇企业,吸纳因失地而失业的迁村农民劳动力,让其能够在“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实现就地就业。另外,新社区本身也可以作为吸纳农民劳动力的重要渠道,部分村民可成为新社区的保安、保洁工、绿化工和园艺工等,这些社区服务工作技术含量低,工作量适中,相对较稳定且就在本社区内,村民较易接受。^[6]

3. 培养新社区村民的社区参与意识,促进公共参与

社区参与主要包括动员参与和主动参与2种形式。在缺少自治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村民们普遍缺乏参与村内公共事务的热情。在缺少自治氛围的新型社区中,村民的主动参与程度较低,主要表现为:对新社区的公共设施利用率不高,对社区内的集体事务漠不关心,对社区里现有的活动参与热情不高。村民搬入新社区后其日常的消遣也多局限于在家看电视、散步、聊天等只与熟人互动的活动,这不仅不利于新社区趣缘群体的形成,也不利于村民社

交网络的扩大、人际关系的拓宽。而主动参与模式又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在现阶段,动员参与仍是通往主动参与的必经之路,也是当前社区参与的主要形式。^[7]因此,迁村并居后的新社区应建立全面的量化考核制度,对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事务的村民予以鼓励和表彰,通过制度化的参与机制让村民知晓参与的重要性,激发村民社区参与的热情,循序渐进,逐步提高村民的主动参与意识,培养和提升其社区参与能力。此外,还要通过开展形式多样、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活动、文化娱乐活动等,满足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爱好的村民的参与需求。

4. 增加村民间的事缘型互动,重建熟人社区

根据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滕尼斯关于社区的定义,社区是建立在血缘、地缘、情感和自然意志之上的富有人情味和认同感的传统社会共同体。在原先的乡土社会中,村民们“守望相助,出入相友,关系密切”,是一个具有人情味的熟人社会,因为村民有共同的价值和传统,对村庄有着深厚的感情、强大的向心力和强烈的归属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来自外界的生存压力,逃避大环境下人际关系过于原子化而带来的困境。但在迁村并居后,由于村民由原先的传统社区搬入新型社区,尤其对那些非整村搬迁的村民来说,不仅居住地变得陌生,而且周围的邻里也变得疏离,建立在血缘、地缘、业缘基础上的传统社会支持网络遭到瓦解,社区精神失落,社区的人文区位意义在逐渐丧失,所以在新社区建设中,不应一味重视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还要重视对社区精神共同体的建设,使原子化的村民关系借助新的纽带来增进团结,这个新纽带就是“事缘”。“事缘”即社区村民由于共同参与某种关乎其共同利益的事务而建立起来的紧密联系。在新社区建设中应以村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为契机,倡导他们通过参与共同关心的事务建立起亲密关系,变得相互熟悉,互帮互助^[7],从而增强村民之间的信任感和凝聚力,建立熟人社区。

五、结语

总之,从对河南省中部地区迁村并居典型试点的调查来看,迁村并居后村民的社区适应状况总体

上不太理想,集中反映在经济适应和生活适应这两个方面,虽然人际关系适应和心理适应状况相对较好,但也存在一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成因主要来自个体、家庭和社会3方面,其中个人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和迁村形式等对村民的社区适应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以迁村并居来推动农村的城镇化发展是当前较为盛行的发展模式,然而现阶段的迁村并居工作,主要把重点放在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致力于改善道路、修建新房、建设新社区活动场所等物质方面的工作,而对迁村主体——村民——发展层面的需求关注不足,以至于村民在迁入新社区后存在着经济、生活、人际交往和精神等诸多方面的不适应。本质上来说,迁村并居不仅仅是居住形式的改变,更应该是从乡村到城市的根本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村民也将经历非农化和市民化的转变,而怎样使村民能够顺利地实现角色转变,尽快适应新社区生活,在新社区得到可持续发展,应当成为今后迁村并居工作的重点。如果新社区建设只重形式而缺乏实质性的变革,没有根据村民的利益去考虑农村的发展问题,那么最后只能沦为缺乏实际意义的面子工程,并不能解决农村实际问题。

[参 考 文 献]

- [1] 李昌平,马士娟,曹雅思.对撤村并居、“农民上楼”的系统思考[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3):33.
- [2] 洪增林,薛惠锋.城中村集体土地流转模式及其收益测算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107.
- [3] 左燕钢.农民居住集中化过程中的农民利益保障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0.
- [4] 郑风田,傅晋华.农民集中居住:现状、问题与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2007(9):6.
- [5] 王春光.城市化中的“撤并村庄”与行政社会的实践逻辑[J].社会学研究,2013(3):8.
- [6] 张海波,童星.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J].社会学研究,2006(1):133.
- [7] 王冬梅.从小区到社区——社区精神共同体的意义重塑[J].学术月刊,2013(7):34.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4)05-0071-04

社会转型背景下重塑社会信任的策略研究

杨岚

(郑州轻工业学院 政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在社会中的分配处于不均衡状态,社会底层民众往往遭遇信任剥夺和信任排斥。在中国当前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劳动关系的紧张对立和社会信任度的降低带来了潜在的社会危机,加剧了信任剥夺和信任排斥。要重塑社会信任,就要加强社会政策制定的顶层设计,致力于劳动力非商品化回归,确立发展型、能促型政策理念,促进社会改革目标的序列递进,加大社会投资力度,加快民主进程与政治改革。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信任;社会政策

[中图分类号] C912.3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4.05.014

当代中国经济绩效大幅提升的同时却又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居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不但经济地位低下,而且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也极其贫乏,这种状况造成底层劳动者缺乏发展的基本资源,丧失了发展的机会,进而造成劳资关系紧张对立,甚至引发了诸多冲突。因此,通过社会政策调控来重塑社会信任成为当务之急。本文拟在对我国社会信任资源不均衡分配造成信任剥夺与信任排斥情况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重塑社会信任的社会政策建议。

一、信任及其不均衡的分配方式

信任问题是当今社会学研究的热点与难点,但学界关于信任的定义众说纷纭,已有200多个定义。本文以孔凡义的信任定义界定为基础,展开讨论。

1. 信任的界定

学者孔凡义^[1]对学术界对信任的界定视角做了如下4种概括:一是心理学取向——信任是个人心理反应,是个人对他人和外界的反应,是由情境刺激决定的个体心理和行为;二是社会学取向——信任是人际关系的产物,是由人际关系中的理性算计和情感关联决定的人际态度;三是文化取向——信任的目的是为了简化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信

任是社会简化机制(卢曼^[2]);四是管理学取向——信任是在有风险的情势下,对他人的动机报以积极、自信的期待状态,是一个行为者评价其他行为者或行为者团体实际行为的主观可能性程度,评价在对该行为进行监控(或根本不可能监控该行为)之前和于该行为对其自身行为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进行。

2. 信任带来的社会收益

从对信任的界定看,信任作为一种资源给社会带来诸多好处,是一种“投资组合管理”,是一种权力节约手段,信任的存在缓解了行为者的担忧、疑虑、警惕和戒备,并从监视他人日常行为细节的高代价的措施中摆脱出来^[3]。卢曼将信任作为复杂社会的简化机制,认为人的有限理性决定了人类永远无法获取社会交往中的完整信息,因此需要通过信任来弥补理性的不足,增强社会成员内心的安全感,并在信任关系的建立中获得确定性,从而实现社会整体的稳定和谐。^[4]可见,信任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人际互动的结果,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同时又是自信的体现。信任他人意味着信任者愿意且能够承担因背信而受到伤害的风险。信任能带来福利,减少复杂性。一个能够促进牢固信任关系的社会,能够以更少的管理获取更多的自由,能够应付更多的意外事件,激发公民的活力和创造性,减少以规则为基

[收稿日期] 2014-07-23

[作者简介] 杨岚(1973—),女,河南省开封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助教,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福利。

础的协调手段的低效率,并提供更强的生存安全感和满足感,带来更多的社会宽容和体谅。

3. 信任资源不均衡分配的结果——信任剥夺与信任排斥

信任能够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益处,但信任资源的分配在不同社会阶层中是不均衡的。富有的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往往拥有较高水平的社会信任,而那些穷困的和受教育较少的人往往遭遇不信任。信任更容易使人为了集体行动的目的而联合起来,而不信任往往会阻碍集体行动。信任作为能够带来利益的生产性资源,在贫富阶层中不均衡地分配着,底层民众往往缺乏信任,容易受到背信的伤害,但又最需要信任支撑其脱离贫困,信任的马太效应不言而喻。

二、我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加剧了信任剥夺和信任排斥

1. 社会信任的变迁

马克思·韦伯提出,信任包括特殊主义的信任和普遍主义的信任。特殊主义的信任是指信任的确立是以特殊的亲情如血缘、亲戚、朋友、地域等为基础,并以道德、意识形态等非制度化的东西为保障;普遍主义的信任是以信用契约或法律准则为基础和保证而确立的,信任双方严格遵守信用契约是维系此种信任的关键。中国传统信任是由以家为中心的关系网络提供,是基于熟人社会而造就的特殊信任,这样的信任在传统家庭作坊等工作场域内发挥着凝聚社会力量、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团结的作用,但其弊端在于大型成熟的现代企业难以成型,经济社会交往合作的时间和空间受到掣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得到保护的同时,发展却相对停滞。^[5]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信任的幕后场景已经变迁,社会整体已从熟人社会走向了陌生人社会和抽象社会的场景之中,社会急剧转型释放了大量的不确定性。马得勇^[6]指出,一个处于急剧变化中的社会造成信任下降的最为普遍、最为重要的影响变量是社会的不确定性。社会变迁摧毁了传统的特殊信任体系,但新的信任体系尚未建立健全。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当前社会信任体系中出现的最大问题是,底层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在背井离乡日渐失去基于熟人社会的特殊信任、人格信任的情况下,在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中缺少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来支撑其形成普遍信任。

2. 信任剥夺和信任排斥的加剧及其后果

中国底层劳动者的工作形式是以非正规就业、维持性就业为主要特征。这种工作的非稳定性、非均衡性很强,流动性大,灵活就业多,工资低廉,缺少保障。同时,中国底层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在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过程中,脱离了原有的赖以生存的熟悉乡土,来到了充满竞争和劳动力商品化的陌生城市中,这部分社会成员构成了“缺场”的主角,对城市制度的依赖将大大增强。然而,问题在于:中国城市社会的二元化体系并未根本改变,城市制度不仅没有保护这部分流动中的随时面临失业的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利益,还造成了城市生活中对其巨大的社会排斥和剥夺,他们的基本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诉求得不到重视,信任难得甚至被剥夺。底层劳动者的信任丧失不仅带来了重重危机,如劳资纠纷不断,政府和资方治理与监管成本大幅度增加,也带来了许多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的考量虽会给予争取权益的劳动者以补偿,但劳动者也可能因为对政府和企业的不信任提出非分要求,一旦有人获得满足就会产生模仿效应,将社会治理带入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三、重塑社会信任的社会政策建设

福利制度理论认为,政府通过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保障国民的基本生活,构建社会安全网,不仅能降低人们的不安全感,而且可以减少国民为各自的利益而进行的市民参与(如工会的罢工、示威)。这样,一种普遍信任将在社会中逐渐恢复。^[6]国家在通过社会政策调整、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以重塑社会信任的过程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鉴于此,笔者提出以下社会政策建议。

1. 加强社会政策制定的顶层设计

培育底层劳动者的信任能力,需要自上而下从公共政策制定的顶层设计入手。当前底层劳动者信任能力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整体转型造成贫富分化对立。社会转型中由于各子系统未能同步发展,从而造成种种失范现象,其中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社会政策被忽视,其协调社会利益的功能尚未有效发挥,从而使底层劳动者缺乏必要的社会政策保护,社会日益分化成贫富差距巨大的对立阶层,进而造成劳动关系紧张,社会信任缺失。为重建社会信任和培育底层劳动者的信任能力,需要从宏观上通过公共政策制定加强对社会贫弱者的扶持。同时还需要克服政策制定的路径依赖问题,以

往扶持贫弱者的社会政策多是作为经济政策的补充,现在需要突破原有政策思路,明确社会政策不仅仅是手段和工具,也绝非仅仅处于经济政策的附庸地位,而是需要放在与经济政策同等重要甚至于优先考虑的位置。只有通过公共政策的顶层设计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统筹筹划,才能有效地避免因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而导致部分社会成员被推向社会边缘,也才能避免他们因被社会不信任而丧失自信和信任他人的能力。

2. 转变社会政策权利观

我们要致力于保障劳动者的权利,承认和尊重所有劳动者的权利,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要有代表权和参与权,并且要有健全的法律来维护他们的利益;要通过扩大社会保护确保劳动者拥有良好的工作条件,促进社会融合,提高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缺乏社会权利的劳动力的商品化意味着人的异化——工人成为商品,人们将成为他们自己所不能控制的权力的俘虏;即使是疾病这类微不足道的社会偶发事件,或是商业周期之类的重大事件,都能摧毁商品于反掌之间,劳动力将暴露于无法抵御的社会风险当中。马歇尔的公民身份及社会权利理论指出,社会公民身份带来的权利将解决劳动力商品化问题,同时也有助于消融阶级差别。^[7]公民权利的基本含义是平等,即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法律、人身自由、政治及基本生活待遇保障的权利。公民权利的落实和公民身份的平等有助于受到自由市场竞争淘汰的弱者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少量经济福利以至社会生活待遇的平等可有助于磨平自由市场产生的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及政治矛盾。^[8]因此,中国社会政策应适应当前形势的变化来调整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保制度的安全网络覆盖面,建立适度普惠的社保制度,加强社会保护,比如失业保险制度的健全。这将不仅使劳动者能够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在精神领域有安全感,对社会有信心,而且还能够降低人们的储蓄动机,鼓励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3. 确立发展型、能促型政策理念

我们不仅要给劳动者以权利,还要通过积极福利来创设底层劳动者参与工作和获得更好工作的机会,并使其在参与中发展自身能力。应以培养社会中产阶级为目标,通过能力养成正面引导底层社会成员提升劳动质量和劳动层次,在社会地位上向中产阶层靠拢,使劳动者在劳动、自立和自尊中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成为自我能动的社会人。与之对

应的发展型社会政策亦应循以下思路展开:强调多元化的政策路径,通过家庭、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渠道的社会政策干预作用于个人能力的提升,投资于人力资本。应以起点干预为战略重点,加强贫困者的资产积累;强调生计的思路,认识到底层劳动者也有自己的长处、财产和能力,可以被动员起来积极地参与发展的过程;通过社会政策影响底层劳动者从市场中获得收入的能力,为其创造发展能力的平等机会;培养其“经济认知能力”^[9],提高其管理财产、利用财富创造财富的能力;进一步推进教育公平政策,通过提高其劳动力素质促使其获得较高的社会回报。

4. 推动社会政策战略目标的序列递进

基于中国现实的理性选择,社会政策本土化战略目标应循着渐进发展步骤,将保障就业作为低阶目标,将推进“体面劳动”作为提升工作质量的高阶目标。首先,社会政策应引导调整就业结构,在公共服务领域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如社区服务、老年人照顾等。其次,社会政策还应引导“体面工作”的整体开展。体面劳动^[10]是由国际劳工组织的三方合作伙伴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共同提出的,其重点在于:公平的全球化、减少贫困、社会保障、社会融合和尊严。体面劳动的目标与社会信任的理念高度契合,与社会信任的塑造紧密相连,体面劳动伴生的和谐劳动关系与高度的社会信任互为因果。体面劳动旨在提升底层劳动者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消除贫困,为其带来安全感、尊严和保障,强健社会的中产阶层,使劳动者在工作中获得自信和自尊,增强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避免脆弱性。当这一切达成之时,劳动关系得以调和,劳动者在有能力给予信任的同时得到信任,从而成就一个良性的信任体系。为实现体面劳动的总体目标,需要国家出台相关社会政策,引导企业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效益,在促进就业、保障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劳动保护、薪酬、培训教育与个人发展等方面确定国家标准,并对落实到位的企业给予优惠政策。同时应设置政府、企业组织和工会的三方协商机制,确保劳动者在制度化渠道内实现利益表达,以制度机制保障来不断推进体面劳动的远景目标逐步实现。

5. 加大社会投资的社会政策取向

要加大社会投资,特别是要加大对家庭、教育和社会保障等社会领域的投资。国家在投资政策上要更加向社会领域倾斜,在社会管理中加大支持力度,推行“资产社会政策”。高夫^[11]的社会开支回流理

论指出,社会开支的增长不一定损害福利国家资本积累的能力,国家支付给个人的现金给付是一种“社会工资”,可以直接提升社会成员的购买力,有利于市场部门的循环运作。社会工资的正外部性收益明显,对现在和未来劳动力的再生产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给付与服务能够“回流”到生产和流通领域。米奇利^[12]主张应实施投资取向或生产主义的社会项目,社会福利开支可促进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增长,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实现社会开支的经济回报和成本效益,并促进社会成员自立自强。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迈克尔·谢若登教授^[13]提出的“资产社会政策”,也再次论证了加大社会投资是事半功倍的政策手段,“资产社会政策”是通过政策广泛和普遍性地促进公民和家庭尤其是穷人获得不动产和金融资产以增进他们的福利,为劳动力尤其是穷人发展能力奠定最基本的经济和物质基础,具有生产性政策特征,是从源头培养劳动力的能力。

6. 构建“制度化的不信任”机制

社会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博弈过程,政策制定者与政策相关方之间的博弈决定了政策走向,往往会出现因受强势利益集团的绑架而置换目标的现象,以保护和扶持贫弱者为目标就会被弱化和淡化,社会政策甚至会变形扭曲为有利于社会强者,导致马太效应。尤其在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里,底层劳动者在政策制定博弈中由于缺少话语权,无法争取自身权益甚至受损,从而对社会政策本身失去信任。因此,为确保社会政策制定中的国家与底层劳动者互信关系的建立,就需要有一套“制度化的不信任”机制在其中发挥作用。这种机制的建立值得借鉴的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做法:建立和推行确保劳工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制度。劳动者只有拥有了话语权,才有了争取工资和福利的权力,这种制度建立的目的是在于推进社会对话与矛盾化解,是对底层劳动者的可信承诺,有了这套机制的保障,也才能确保使底层劳动者遇到问题时相信诉之于这种制度化渠道能够寻求解决之道,而不是直接采取敌对态度或走其他非制度化甚至非法的程序。在当前中国社会

政策制定中,部分地区出台的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就是重要的政策举措,同时加强工会的维权作用,给工会以一定的政治地位也应是今后的工作重点。这是社会政策制定中的民主进程,“在所有的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信任文化在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中比在任何其他类型的政治系统更有可能出现”,这一进程有助于在沟通中培养底层劳动者的信任能力,并重建社会信任关系。

[参 考 文 献]

- [1] 孔凡义. 信任、政治信任与政府治理:全球视野下的比较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2009(10):123.
- [2] [德]卢曼. 信任[M]. 瞿铁鹏,李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
- [3] [美]马克·E·沃伦. 民主与信任[M]. 吴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9.
- [4] 董才生. 论吉登斯的信任理论[J]. 学习与探索,2010(5):64.
- [5] [美]弗兰西斯·福山. 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84-99.
- [6] 马得勇. 信任、信任的起源与信任的变迁[J]. 开放时代,2008(4):72.
- [7] [丹麦]艾斯平-安德森.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M]. 郑秉文,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9.
- [8] 彭华民. 西方社会福利理论前沿[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65.
- [9] Weyers M L.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unity Work: A South African Perspective[M]. Potchefstroom: Keurkopie, 2001.
- [10]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Decent work agenda[EB/OL]. (2014-03-10) [2014-05-10]. <http://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decent-work-agenda/lang-en/index.htm>.
- [11] Gough 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elfare State[M]. London: Macmillan, 1979:108-117.
- [12] [美]詹姆斯·米奇利. 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M]. 苗正民,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02.
- [13] [美]迈克尔·谢若登. 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M]. 高鉴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4)05-0075-05

办刊纠纷与新闻真实： 情感纪实类期刊的办刊瓶颈

——以《知音》为例

欧阳明，李建波

(华中科技大学 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多年来,以《知音》为代表的情感纪实类期刊因纪实信息刊布失实而引发的与当事者之间关于隐私权、名誉权等的争执纠纷不断。这种办刊纠纷的性质源自情感纪实类期刊要不要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的问题,而不是办刊品位高低的问题。导致情感纪实类期刊办刊纠纷的客观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缺乏对情感纪实类期刊的有效管理;二是媒介长期将以《知音》为代表的刊登软新闻的情感纪实类期刊归为“文化综合性期刊”,这无益于情感纪实类期刊对新闻真实性的恪守。从严格意义上说,情感纪实类期刊应属于情感新闻类期刊,要讲究新闻的真实性。导致情感纪实类期刊办刊纠纷的主观因素主要有对恪守新闻真实性原则的认识不到位和自身缺乏制度规范两个方面。解决情感纪实类期刊办刊纠纷的对策是:政府应致力于确保情感纪实类期刊不因采编成本上涨而削弱甚至剥夺媒体自我良性发展的客观条件;情感纪实类期刊应转变办刊观念,尊重新闻工作规律,改进新闻编辑工作方法;建立一支情感纪实类期刊独自拥有的以记者为主的作者队伍。

[关键词]新闻真实;知音;软新闻;情感纪实类期刊;记者队伍

[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5.015

多年来,我国情感纪实类期刊经常因纪实信息刊布失实而引发与当事者之间关于隐私权、名誉权等的争执,严重妨碍了此类期刊的顺利发展。其中,社会影响最大的首推《知音》期刊与著名作家毕淑敏之间的办刊纠纷,湖北知音传媒集团2012年的上市计划还因此引发以毕淑敏为首的社会名流和一些群众的质疑。《知音》月发行量多年来始终保持全国第二、世界第五的高位,是我国的标杆式媒体之一,社会荣誉多多,然而办刊纠纷极大地降低了社会、专家、行业和政府对其的印象与评价。

以《知音》为代表的情感纪实类期刊所遭遇的办刊纠纷颇为复杂,它涉及到的方法、技巧性问题较易解决,如报道稿件面对争议可取平衡手法应对,以名人作为中心报道客体的稿件应邀请名人撰写。不

过,根治纠纷则需寻根溯源,进行系统考量,否则问题难以解决。比如,有人以为其对策应在于媒体要建立严格的审稿制度,采取科学的核实手段,抵制追求轰动刺激、猎奇猎艳的办刊倾向。^[1]然而,《知音》《家庭》等情感纪实类期刊需要在公共利益与媒体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若要求媒体放弃自身利益是在将问题道德化而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本文拟以《知音》为例,探讨情感纪实类期刊办刊纠纷的性质、产生纠纷的原因与应对之策,以期为解决当前情感纪实类期刊所遭遇的办刊纠纷提供参考。

一、以《知音》为代表的情感纪实类期刊办刊纠纷的性质

以《知音》为代表的情感纪实类期刊遭遇的办

[收稿日期] 2014-07-29

[作者简介] 欧阳明(1957—),男,湖南省常宁县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编辑学。

刊纠纷,就传媒业看,源自报道失实,违背新闻工作基本原则,引发新闻界的普遍关注甚至斥责;就社会影响看,长年未断,恶评不少,波及领域广泛;就涉事者看,纠纷常直关名人,有时也波及特殊人物,涉及信息传播不当而引发的当事人物权之外的民事权利,以隐私权、名誉权这两大公民人身权为主;就采写主体看,引发纠纷的稿件往往由社外作者撰写,或凭空捏造、向壁虚构,或未经被报道者审阅、认可,甚至未采访被报道者,内容不属实。

在包括专家在内的不少人眼中,以《知音》为代表的感情纪实类期刊属于文学期刊,具体讲属于通俗文艺类期刊版块,其纠纷性质是“品位过低”。那么,《知音》等感情纪实类期刊办刊纠纷的产生是否属于刊物品位不高呢?回答是否定的。《知音》为了提高办刊格调,曾出台加强爱心题材报道,开设“道德的星空”专题,深入挖掘励志题材,坚持反面题材正面做等6项措施。然而,媒体的努力未能阻止办刊纠纷一再出现。我们不能因为《知音》将报道的重点放在社会的中下层,尤其是下层婚恋等情感生活领域而做出这类期刊品位不高的判断。因为,即使期刊报道的是社会管理层、上层或全社会的读书生活,若处理不当同样会显得内容低俗。

判断以《知音》为代表的感情纪实类期刊办刊纠纷的性质,离不开对《知音》类媒体的特点、所涉纠纷稿件特征的把握。业界和学界习惯于将《知音》等感情纪实类期刊归入文化综合性期刊,这是不太合适的。其实,以《知音》为代表的感情纪实类期刊属新闻期刊范畴,所刊发的包括涉及纠纷在内的当代记叙类纪实稿件属于新闻报道范围之内。对于《知音》等感情纪实类期刊遭遇办刊纠纷性质的误断,主要还是在于评判者对新闻报道的特点和以《知音》为代表的感情纪实类期刊的媒体类型缺乏正确的认识。其一,不少人对《知音》等感情纪实类期刊以刊发软新闻为主的实际和软新闻的新闻属性缺乏准确、完整的判断。无论是硬新闻还是软新闻都属于新闻报道,都应严格恪守真实性这一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其二,不少人对《知音》等感情纪实类期刊以消闲性软新闻为主的新闻属性缺乏准确、完整的判断。软新闻可以分为情感类与实用类两大类。所谓实用类的软新闻,指的是侧重面向8小时工作时间之外的个人生活、私人生活领域的衣食住行和娱乐,以引导公众个人消费行为的新闻报道,如《精品购物指南》《第一生活》均以刊发实用类的软新闻为主,这类纸媒常被冠名为“生活服务类

报刊”。而所谓情感类的软新闻,指着重于面向目标公众8小时之外的个人、私人的人际伦理及其内心思想情感波动的新闻报道,像《知音》《家庭》《女友》等情感纪实类期刊都是以侧重刊发情感叙事的软新闻为主。报纸中情感倾诉类版面上的稿件一般可以归入此类。其三,不少人对《知音》等感情纪实类期刊以刊发情感类软新闻为主的实际有误解,并因《知音》等感情纪实类期刊在新闻真实性上的不断失误而强化了原有的误解。

纵观全局,《知音》等感情纪实类期刊所遭遇的办刊纠纷性质在于感情纪实类期刊要不要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的问题,而不是品位是否高雅的问题。《知音》等感情纪实类期刊遭遇办刊纠纷的源头在于新闻真实性,而隐私权、名誉权等社会争议仅为其流。正是信息传播的新闻有假才引发相关方在根本利益上发生冲突,酿就办刊纠纷。只要《知音》等感情纪实类期刊恪守新闻真实性原则,那么,有关隐私权、名誉权等办刊纠纷就不容易出现,即使出现也容易解决。

二、导致以《知音》为代表的情感纪实类期刊新闻失实的主要原因

《知音》为保障所刊稿件的新闻真实性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基本集中在审稿环节,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一是编辑部核实;二是保留书面材料,由作者签定“作品完全真实”的协议书,加有作者单位、主人公单位的意见及其单位公章,被报道的主人公签字同意发稿的书面材料;三是公布举报电话,实行有奖举报,依法追究制假作者的经济与法律责任;四是当事实无法核准时,编辑部拒绝采用稿件。这些应对措施主要体现在2005年出台的《知音集团就维护新闻的真实性问题作出规定》《知音集团编辑素质考核内容》等文件中。

不过,《知音》所遭遇的办刊纠纷并未因其所作的保障新闻真实性的应对措施而有根本性的扭转,那么,如何才能有效避免办刊纠纷呢?有专家认为,《知音》等感情纪实类期刊已经到了转型的时候。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徐升国认为,随着阅读资源的丰富和获取渠道的便利,中国读者将不断成熟,媒体也需要伴随读者一起提升。大众期刊如果不进行内容提升,品牌升级,会越来越边缘化,在社会中的话语权会逐渐降低。^[2]笔者认为,导致《知音》等感情纪实类期刊产生办刊纠纷的原因颇为复杂,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

造成《知音》等情感纪实类期刊办刊纠纷的客观因素主要有以下2个方面。

一是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缺乏对情感纪实类期刊稿件新闻真实性的有效管理。按照社会分工和市场遴选,《知音》《家庭》《女友》类期刊不以传播综合性的各类新闻资讯为主,而以发表社会新闻一类软新闻为主。正因为如此,其纪实稿件很少直接接触行政管理、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问题,而是更多集中刊发社会的私生活问题。由于这类软新闻稿件大多远离治国经邦,社会对其新闻失实的敏感度相对偏低,容忍度相对偏高。这样一来,其新闻失实的综合成本往往低于硬新闻,内容常徘徊在新闻失实防范的边缘,党政管理部门和记者协会等行业机构对其的关注和管理也相对间接、薄弱,国家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和记者协会对其稿件新闻真实性的外在刚性约束也较低,相关规章制度的建设、落实上弱于以传播硬新闻为主的《人民日报》《羊城晚报》等综合性报纸,以及《南方周末》等新闻周报、《瞭望》《三联生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等新闻期刊。整个社会对硬新闻和软新闻在新闻真实性上敏感程度的差异,是以刊发社会软新闻为主的文化综合类期刊出现新闻失实的客观因素,而这又为《知音》这一类期刊在关于新闻真实性的自我管理约束上提供了一定的弹性空间。

二是我国期刊分类的不到位客观上无益于《知音》等情感纪实性期刊对新闻真实性的恪守。在中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国在期刊分类上采用了“五分法”,即将期刊划分为理论学术性期刊、文学艺术性期刊、文选文摘性期刊、文化知识性期刊和文化综合性期刊5类。其中的文化综合性期刊,又叫生活娱乐性期刊、文化生活性期刊,这种命名始自中国期刊协会首任会长张伯海。他当年将各种知识性、文化娱乐性、生活指导性和实用性的期刊统称为文化综合性期刊。文化综合性期刊有2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编辑工作由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以传者为主和以面向领导层服务为主转向以公众为主,即办刊面向市场,着重于满足目标读者的信息需求和文化需要;二是信息种类庞杂,期刊种类多样。从我国期刊业的健康发展和满足社会的需求看,我国的期刊分类需要再斟酌,尤其是文化综合性期刊有进行细分的必要。其实,《知音》等情感纪实类期刊严格意义上应属于情感新闻性期刊,因为这类期刊有3个特点:一是真实。这使《知音》等情感纪实类期刊与虚构类期刊相区隔,并将既往那些与《知音》《家庭》混在一起的有实

有虚的情感记事类期刊如《爱情婚姻家庭》剔除,使那些有虚构成分的期刊归入文学艺术类期刊,为其子类大众文艺类期刊或通俗文艺类期刊之一部分。《知音》《家庭》等情感纪实类期刊应剔除其所有的有真有假的栏目。二是时新。这使《知音》等情感纪实类期刊与历史纪实类期刊不同。三是情感,以人性、人情为核心。这使侧重于休闲性的专事情感类软新闻的《知音》与以刊发硬新闻为主的新闻期刊、以刊载生活实用类软新闻的实用新闻类期刊区别开来,并形成新闻特色鲜明的情感期刊。同时,依据上述3点,可以避免仅将《知音》等情感纪实类期刊理解为女性期刊。^[3]按照公众性别的接受偏好,《知音》在被划入女性期刊的同时,还需根据信息性质加以分类,即《知音》既属于女性期刊,又属于新闻期刊。

导致《知音》等情感纪实类期刊新闻失实的主观因素主要有2个方面:认识和制度。先说认识。以《知音》为代表的情感纪实类期刊对恪守新闻真实性原则还不能说特别清醒,常表现为时而清醒,时而模糊——遇外部压力较大时清醒,压力不大时糊涂;编辑组稿顺利时清醒,组稿困难时糊涂,甚至装糊涂。《知音》上半月执行主编夏钟认为,《知音》介于文学期刊和新闻报刊之间。这种看法完全无视《知音》属于新闻期刊的实际,没有认识到新闻报道能够向文学借鉴的仅在于形式而不是内容,且形式上的借鉴是有严格条件的:恪守新闻真实性原则。再说制度。1998年,《知音》所刊《妈妈呀,妈妈的血泪情》一文存在严重新闻失实。该文讲述了一桩所谓的真人真事,即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的湖北省宜昌县樟树坪镇高考状元张晓的动人事迹。然而,这样一篇动人稿件所讲述的基本事实全系子虚乌有,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处告知媒体记者,稿件中所谓的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的主人公张晓根本不存在。^[4]随后,为防范新闻失实,《知音》杂志社采取了“加大稿件的审查把关力度,严格执行相关审稿制度的应对措施”^[5]。其实,就这类以刊载软新闻为主的媒体新闻失实的屡禁不绝看,《知音》杂志社的前述补救措施恐怕还不够,制度上的漏洞难免会让别有用心者利用。显然,面对新闻失实,以刊载软新闻为主的媒体在防范制度的建设上还不够完善,力量还未施加于要害处。

三、解决情感纪实类期刊办刊纠纷的基本对策

解决以《知音》为代表的情感纪实类期刊新闻

失实以及由此带来的以隐私权、名誉权为重点的办刊纠纷是个系统工程,既要全面,又要突出重点,具体应做好以下工作。

其一,政府应致力于确保以《知音》为代表的情感纪实类期刊不因采编成本上涨而削弱甚至剥夺媒体自我良性发展的客观条件。有待加强的工作主要有3点:一是注意保护知识产权,强化全社会的版权意识和版权使用规范。国家应通过法规建设充分保证其他媒体、机构和个人,尤其是互联网在消费、使用《知音》等情感纪实类期刊稿件中付费且付费标准合理;坚决拒绝、制止网站等网络媒体对《知音》等情感纪实类期刊辛苦生产的作品的少偿甚至无偿使用。这样可以保护《知音》等情感纪实类期刊的合法权益和通过市场向社会提供合格乃至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的积极性、持续性。二是积极培育我国公众的良好文化消费偏好。当前,我国公众对付费接受媒体所提供的文化服务的积极性尚不高。其客观原因为,物价上涨而民众个人收入普遍不高,造成人们文化消费的付费能力偏弱;其主观原因为,人们倾向于刚性消费即生活必需品消费,而不倾向于软性消费即非生活必需性消费。也就是说,人们离开对《知音》等情感纪实类期刊的阅读照样可以生活,习惯并乐于免费享受《知音》等情感纪实类期刊所提供的情感纪实信息服务。因此,政府应从法规建设、行政管理和道德教育层面引导、培育公众的付费文化消费观念,并加以必要的刚性约束,从而从根本上化解《知音》等情感纪实类期刊因采写队伍建设所带来的办刊成本压力。三是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以《知音》为代表的情感纪实类期刊纳入新闻报道业务、媒体行业管理的范围。《知音》《家庭》均应有资格参加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类新闻奖评选活动。

其二,情感纪实类期刊应转变办刊观念,尊重新闻工作规律,改进新闻编辑工作方法。一是拥有较大发行量的《知音》《家庭》应树立主流媒体意识,适度增添硬新闻元素,启动对民间情感生活的合理合法的适度干预,走向强势媒体。二是以《知音》为代表的情感纪实类期刊应考虑对所刊稿件普遍实行事实与意见相分离的原则,尤其是当媒体对新闻事实把握有限、所报道的新闻事实包含负面信息时,宜尽可能少议论,少抒情,必要时只叙述,不议论,不抒情。当然,这么做难免会影响稿件的感染力。然而,稿件的感染力,以及与此相关的生动性则属于美的范畴,而新闻真实则属于真的领域,最有力量的是真,即纯美。不过,编辑部再好的设计,若对执行主

体缺乏有力的配套规范则很难获取到位的贯彻。《知音》等情感纪实类期刊长期以来难以被消除的办刊纠纷说明,根治情感纪实类期刊的办刊纠纷尚需登高望远,要在尊重新闻工作规律的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三是狠抓审稿环节。既然以《知音》为代表的情感纪实类期刊所遭遇的办刊纠纷在于媒体是否恪守新闻真实性原则,症结在于所刊稿件的新闻失实,那么,情感纪实类期刊如何办刊才能恪守新闻真实性原则,从而保证能够向社会提供真实可靠的新闻信息呢?从编辑工作环节看,媒体用来控制所刊稿件质量的最为紧要的环节是审稿。这就是说,应对办刊纠纷,必须将重点放在审稿环节,紧抓审稿环节不放松,尽最大努力将必然和可能引发纠纷的隐患在审稿环节中加以消除。《知音》强化媒体法务部对所用稿件去留、优化的决策权,就属于狠抓审稿环节的具体表现。

其三,建立一支情感纪实类期刊独立拥有的以记者为主的作者队伍。由审稿环节入手防止办刊纠纷,属于被动应对,虽然有用,但又因未直面新闻真实性原则而实际效果有限。以《知音》为代表的情感纪实类期刊和《人民日报》《三联生活周刊》《楚天都市报》这类注重刊发硬新闻媒体的一个重要的不同,是前者因没有自己的作者队伍致使稿件基本来源于社外作者。其实,刊发新闻报道的媒体,无论是以硬新闻为主还是以软新闻为主,都应以拥有一支过硬的社内作者队伍为主,即一般不宜在将作者的总体队伍安排在媒体内部编制之外。建设媒体独自拥有的以记者为主的作者队伍,是《知音》等情感纪实类期刊避免办刊纠纷产生的一个关键。

情感纪实类期刊之所以应将建设一支媒体独自拥有的作者队伍作为解决办刊纠纷的关键,其原因在于:第一,社内作者与社外作者的利益不同。在利益的谋取上,社外作者面对新闻的真实性而采取机会主义的可能性会远远高于社内作者。对作家、自由撰稿人的稿件,情感纪实类期刊要慎用、少用,最好不用,采写任务应尽量托付给有记者证的职业记者。第二,媒体控制社外作者和社内作者的能力不同。对于社内作者,媒体可以采取批评、警告、罚款、降级、处分、换岗直至开除等一系列手段;而对于社外作者,媒体对其的控制手段有限、偏软,至多是不再用其稿子。一些社外作者为了一己私利,在向媒体提供新闻稿时会有意无意地逃避对新闻真实性的坚守,部分人用来对付媒体的手段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有的社外作者甚至在期刊编辑部提供的能够佐

证其真实性的材料上大做手脚,文头、文尾是真,正文内容却偷梁换柱;有的甚至是作者或作者与法院工作人员共同炮制。应对来自社外作者的这一类瞒天过海伎俩,媒体颇为吃力,甚至防不胜防。相反,由社内作者所主导的新闻稿,尤其是重要新闻稿的采写,对前述社外作者所引发的麻烦及其危险往往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以规避或降低。在对稿件新闻失实的把控上,编辑处理是被动预防,作者处理是主动预防。第三,竞争的需要。媒体生存、发展的关键在于内容。没有好的作品,就不可能有长远的发展。在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市场力量日益强大的今天,在严守稿件的质量和提升稿件水平上,媒体需要在作者队伍建设上投入更多的力量。

在建设自己的记者队伍上,《知音》曾有所动作。1999年《知音》改为半月刊的前一年,曾专门成立了一个记者部,迅速培养了一批编辑记者。不过,现在的《知音》早已没有了记者部,没有了独自拥有的记者或作者队伍。显然,当年《知音》建立记者部不过是临时性的措施。那么,《知音》为什么未能坚持建设一支为自己所拥有的记者队伍呢?因为建设一支独自拥有的社内作者队伍,在强化办刊质量的同时又势必造成媒体办刊成本的增加,面对上涨的办刊成本,媒体若无法通过市场获取良好的补偿恐难行久远。

要想独立拥有以记者为主的作者队伍,首先,媒体应建设一支独自拥有的骨干作者队伍,社外的通讯员仅为辅助。这支队伍中的记者或作者有正规的人事编制,由政府或企业支付薪酬、奖金、福利等。其次,媒体应建立一支社内作者与社外作者并重而又以社内作者为主的作者队伍。在客观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媒体可仅设立少而精的社内作者队伍,以保

证所刊的每一篇稿件都能够实现社内作者和社外作者并举并由社内作者主导的采写全局。在客观条件限制的情况下,改由编辑兼司部分作者功能。这样,一方面编辑与社外作者共同采写,或共同采访并指导社外作者写作从而能把控稿件的采写全局;另一方面可增加编辑人数,以便每位编辑能有足够的时间、精力甚至乐趣与社外作者共同采写或共同采访再指导社外作者写作。制度化建设有助于媒体避免重大新闻失实行为的刚性化。在这方面,《知音》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第一,媒体在编作者队伍实现从无到有,从不稳定到稳定的转变。第二,媒体所刊用的稿件不再由社外作者独立完成。第三,媒体所刊用的稿件由社内作者主导。其中,后两点举措在《知音》中是一直存在的,即编辑兼任记者或编辑与社外作者共同采写稿件。不过,《知音》杂志社的上述行为恐怕更多的是属于编辑的自发行为,而非普遍行为,尚未上升到媒体的内部制度建设战略层面。

[参 考 文 献]

- [1] 孙燕君. 期刊中国[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32.
- [2] 网易新闻. 《知音》被指品味过低 上市计划遭质疑[EB/OL]. (2012-05-03)[2014-05-25]. <http://news.163.com/12/0503/05/80IDBGIM00011229.html>.
- [3] 晋雅芬. 妇女期刊:铿锵玫瑰背后的苦涩滋味[N]. 中国新闻出版报, 2005-10-18(7).
- [4] 霍鹏远,周敏,殷亚龙. 移花接木 赚人眼泪——一篇假报道出笼的前前后后[N]. 长江日报, 1998-02-23(10).
- [5] 胡孙华,王斯. 《知音》公开致歉三作家[N]. 长江日报, 2009-07-29(19).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4)05-0080-05

论微博的话语风格及其传播效果

李惊雷

(郑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在微博的传播空间中,每一个用户都有可能成为一个传播中心,以自己的粉丝群体为基础,构成一定范围的传播空间。微博传播具有多中心性和多向性的特点,并且其传播效果具有弥散性。微博用户由于其经历、学养和性格的不同,其所体现出来的话语风格也各不相同。在微博空间里,各种风格竞相登台,各放异彩,也因此造就了微博传播的复杂性特点。微博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物理空间的现实社会状态的复制,但是这种以话语实践的方式所建构的社会状态,由于微博传播的自媒体属性、网络传播的匿名特征而显得更为复杂,这种建立在话语表达实践中的复杂性通过舆论的推波助澜又反射于社会实践中,进而转化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这种基于自媒体特征的微博传播风格决定了微博传播内容的多元性和传播效果的复杂性。

[关键词]微博传播;话语风格;自媒体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4.05.016

话语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是折射社会行为甚至社会变迁的符码。1970年代,在语言学领域,话语分析跨越普通语言学的范畴而形成了社会语用学研究,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逐渐清晰,并成为学者们分析社会发展的一种理论工具。话语风格是综合性地体现话语理论特点的一个概念,在传播中,不同的传播媒介有不同的传播风格,传播现象就是建构在话语的运用基础之上的。因此,从话语风格的视角研究传播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互联网世界的产品总是在不断推陈出新,新形式的出现并不是一件很令人吃惊的事情。但技术上的新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力量往往出乎技术专家们最初的想象,而微博就是这样一种形式。最早的微博应为2006年起源于美国的Twitter,我国于2009年9月由新浪首先推出新浪微博,其后腾讯、搜狐等网站也陆续推出微博平台。与其他网络形式相比,人们对于微博仿佛宠爱有加。因为微博平台聚合了大量的用户,它不仅成为人们日常交往的一种形式,更成为表达情绪、形成舆论、寻找共识的重要途径。在国内外诸多重大社会事件中,微博展示了其强大

力量。但按照微博最初的功能设计,“它本来是不被用于其他目的的,它只不过是用来分享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些自我陶醉的琐事,就像我们每个人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一样:你现在在做什么?”^[1](P15)]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一个本来是方便社会交往、激发参与者共享日常生活体验的虚拟网络传播平台,为什么能产生那么强大的现实社会力量?为解答这一问题,本文拟从话语风格的角度对微博传播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微博的传播过程及其特征

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在其《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开宗明义所写的下面一段话成为后来者研究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的经典引注:“描绘传播行为的便利方式必须回答以下5个问题: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取得什么效果?”^[2]这段话既厘清了传播的结构要素,即传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者和传播效果,又勾勒出了传播的行为过程,即传播是由传者通过一定的传播媒介向受众传播内容并取得一定效果的行为或过

[收稿日期] 2014-08-20

[基金项目]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4BXW005)

[作者简介] 李惊雷(1967—),女,河南省汝州市人,郑州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媒介与社会。

程。在这5个基本要素中,传播渠道也就是传播媒介虽然只是物理性的技术工具,但在具体的传播环境中,传播的2个主体即传者和受者都是基于传播媒介而产生的,并且传播效果也与媒介的属性有着很密切的关联。在不同的媒介环境中,传播要素的不同组合使得具体的传播过程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而这些组合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围绕着一一定的媒介而展开的。所以,从一定层面上来讲,不同性质的媒介成为影响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

在传统媒介环境中,人们往往是通过新闻媒体来获知信息、求证真相的。这时的媒介与普通个人具有明显的功能区别,也就是媒介担负的是传播者的功能,而普通个体只是扮演着受众的角色。而互联网技术出现之后,信息传播的渠道呈现出多元化的形式,部分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开始发生转移。继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形成了新的解读传播的语境,传播的各个要素不断扮演着新的角色,传播过程甚至表现出颠覆以往的状态。

微博是迄今为止将 Web 2.0 技术体现得最为成功的一种网络平台形式,Web 2.0 从技术上为网络用户提供了及时互动的可能性。微博的鼻祖们最早对于微博的设想是基于小群体社交的目的,“在2006年还没有人想到 Twitter 的影响会如此深远,当时杰克·多尔西与 Twitter 的另外一位创始人比兹·斯通,正在他们的博客公司里工作,杰克·多尔西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创意。多尔西想要一种能让一小群人通过存储管理服务(SMS)交流的工具”^{[1](P183)}。这种创意的实现就是 Twitter。微博的出现不仅带来了社交的方便性,也给传统的媒介传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微博解构或者重新建构了新闻的流程和运营机制,使人们对于传播的要素及其过程有了新的解读。

在微博的传播要素中,传者的身份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在传统的媒体时代,传者往往是指新闻传者,其身份代表着具体的媒体机构,而在微博的世界里,传者的身份颠覆了以往人们对于信息传播者的认识,每一个微博的用户都可以是传播者。Twitter 的创造者威廉姆斯就把 Twitter 用户看作是报道者,他认为,“信息——搜集节点,世界上数百万的人会在 Twitter 上报道他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1](P184)}。他设想在一天当中, Twitter 用户能够看到在任何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在新浪微博上,微博空间的建构者主要有2种类型:个体的微博用户和群体的微博用户。个体的微博用户有一般的匿名用户和通过微博实名认证的“V”用户。加红色“V”的用户身份多种多样,包括演艺界明星、社会各界的

知名人士等,其中的一些用户由于其在公共事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被称为“大V”。虽然这些“大V”们对具体事件的影响未必是正面的,因此也引发了诸多的问题,但他们的影响却是不可小觑的。群体的微博用户包括松散的社会群体、政府的政务微博或者其他正式组织的微博、媒体的官方微博等,这些官微往往以蓝色的“V”以示区别。

建立在 Web 2.0 基础上的微博为人们的瞬间接触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这就使得微博传播具有极强的互动性,这一点是以往的传统媒体所不可及的,在一定程度上变革甚至颠覆了以往传播过程的单向性。在微博的传播过程中,每一个信息的传播者又可能是信息的接受者。如果说在传统的传播机制下,信息的传播者往往是高高在上的话,那么在微博的传播空间中,传者和受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两者的身份有可能是重叠的。

由于微博的传播者和受者与传统媒体的传播者和受者不同,因此传播的内容也随之具有多样性。按照最初的功能设计,微博是为了满足分享个人的日常生活经历的需求。比如, Twitter 的口号是“ What’s happening”, 新浪微博的宗旨是“随时随地分享身边的新鲜事”。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微博的这种元功能逐渐被拓展,除了展示个人的经历之外,微博更多地变成了观点、立场亮相的平台。微博的内容最初多为原创,而随着微博空间的活跃,现在却出现了转载居多的现象。而在这些转载的内容中,一部分为有趣的个人经历或者日常感受,更多的却是一些具有显著立场观点的内容。

微博的“粉丝”设计是微博内容传播的重要影响因素。一个微博用户拥有的“粉丝”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判断微博传播能力的标准。这使得微博的传播具有与其他媒体传播所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圈子”传播。以新浪微博为例,首先只有注册了新浪微博,才可以进入新浪微博的传播领域,每一个微博用户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获得“粉丝”,进而围绕博主形成一定的“圈子”。微博的传播其实就是在宏观的传播空间中区隔出微博的专有区域,然后这个专有区域又被碎片化为很多的“圈子”,这些“圈子”或大或小,呈现出交叉、包含甚或重叠的关系。

微博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际关系的连接程度和方式。@功能可以方便信息的传送,进而可以成为人们建构微博圈的一种途径。人们的日常生活可在一定的“圈子”中展开,“圈子”其实就是一定的社会群体。不过在物理空间,人们的“圈子”一般是以熟人为基础,体现为一定的初级群体的特

点,这样的“圈子”往往是以血缘或者情感为纽带的熟人团体。由此,“圈子”内部的人际关系具有强连接的特点,而与“圈子”外部的关系则相对较弱。当然,每一个人不可能仅仅隶属于一个“圈子”,但在物理空间,“圈子”的选择余地相对狭窄。在微博世界,“圈子”的性质较为复杂。在一个微博用户的“粉丝”群中,有相熟相知的,也有完全陌生的;建构“圈子”的纽带可以是情感、血缘,也可以是相同志趣、共同立场,还可以是完全的对立者。这里的人际关系连接的强弱依靠的是对微博内容的共识程度,并且,无论连接关系强弱,只要处于微博的关系网上,都会产生一定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强连接引发行行为,而弱连接传递信息”,“个别人的理性行为可以引发整个社会的非理性行为,在社会网络的作用下,群体智慧也许会引发愚蠢的行为”^[3]。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这样来设想微博的传播过程:假如某微博用户有200个“粉丝”,其中有100个“粉丝”从该处转载了某则微博,这100个“粉丝”又各有各的粉丝群体,这些不同的“粉丝”又从不同的节点转载了该条微博,以此类推。于是便有了这样的场景:100个人从某个地方得到了同一条消息,然后每个人都要离开。而这100个人离开的路径可能是不同的。这100个人沿着各自的路线行进时,在各自的路上又遇到各自的朋友,将这个信息传递给了他们。而这路上遇到的不同的人又有着自己的行进路线,又会遇到各自的朋友……

所以,在微博的传播空间中,每一个用户都有可能成为一个传播中心,以自己的“粉丝”群体为基础,构成一定的传播范围。这样,微博传播就具有了多中心性和多向性的特点,并且其传播效果具有弥散性。

二、微博传播的话语风格类型及其特点

作为语言学中的一个概念,话语首先是指建立在言语基础上的由字、词、语句等语言要素所构成的一种语言现象。“言语在本质上是一种个别性的选择行为和实现行为,它首先是由组合作用形成的。”^{[4](P4)}从某种意义上说,话语是扩展了的语言链。在普通语言学中,对话语的分析往往停留在话语结构和话语语义的层面。但与其他语言现象不同的是,话语具有一定的使用特点:只有当字、词等进入具体的沟通交流的情境时,才会产生现实的话语。因此,话语不仅要体现普通语言学的语法规则,更要服从其产生的现实情境的要求。所以,荷兰学者梵·迪克认为,对话语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纯粹语

言学的范畴,而应该从语言学、文学理论、人类学、符号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进行综合研究。梵·迪克据此建构了话语分析理论,认为话语分析“涉及语言、认知相互作用,社会、文化诸分析的一切层次和方法。这一点无须诧异,因为话语本身即社会的所有这些方面的表现”^[5]。

话语分析的建构基础是话语产生的社会性,但话语本身毕竟属于一种语言现象,所以,文本和语境便构成了2个基本的分析视角。文本分析是对文本中各个层次上的话语结构进行描述,它涉及构成文本的话语语法、话语的内涵和外延,其中,语法规则是说明句子组成的形式的具体样态及是否规范,话语的内涵代表着意义,而外延即为其现实中的所指。语境分析则是将话语置于复杂的社会关联的基础之上,具体而言,是把文本结构的描述与语境的各种特征如认知过程、再现、社会文化因素等综合起来对话语进行分析。

如果说文本和语境关涉的是话语的内容,那么话语的生产还必须有话语主体,即发言者和听说者。一个完整的话语是发言者基于一定的社会情境向一定的听说者发出一定语言信号的过程。由此,话语分析的结构要素应当包括发言者、听说者、内容,以及具体话语产生的社会情境。其中,发言者在话语的生产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话语的字词、句组,以及相关的语法规则,由此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话语风格。

风格是指具有一定独特特征的样态,话语风格则是指具有独特样态的语言表达程式。梵·迪克将话语风格称为“语言指纹”,认为“风格是话语典型的、可变的结构特征的总和,这些特征显示了在某一特定的语义、语用或情境中说话人的个性和社会语境的特征”^{[6](P75)}。

话语的风格特征与话语的发言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发言者个人的身份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话语的基本要素如字、词、句组和语法规则的选择,而这些基本的语言要素的使用又是发言者诸多社会性的折射。所以,发言者发言时的语境与社会情境建构了话语的风格特征。“风格是文本的语境特征。这种特征包含对表达程式的各种可能变化的限制和约束。”^{[6](P29)}话语的所指有可能是同一个对象,而且话语的意义也基本上相同,但由于说话者不同,话语就会呈现出不同的表达样态。

任何话语都有一定的语言结构,语言结构表现了语言的社会性特征。梵·迪克认为,“风格就不仅是社会语境的标志,它还体现个人、团体的个性特征”^{[6](P75)}。以社会语境与发言者个人特征为标准,

梵·迪克对话语风格类型进行了整理,以构成话语的不同要素作为划分标准,将话语风格划分为以下8种类型:一是个人风格,是指作为个体的话语发言主体在不同的场合下运用语言的个性特征的总和;二是瞬息风格,是个人类型的一种特殊形式,指在某个场合下个人语言特征的表现;三是团体风格,是指独立于情境因素之外的社会团体的大多数成员运用语言的共同特征,也就是指一定群体所共有的语言运用特征;四是语境风格,是指发言者基于特定的情境而具有的话语表达特征;五是功能风格,是指社会成员不是作为一般社会个体而是作为具体的社会角色而表达的话语特征;六是媒体风格,是指不同的媒体所拥有的不同的话语表达风格;七是社会方言风格,是指某特定社会文化团体或者组织的语言形式;八是话语类型风格,是指与特定的话语类型相联系的总体风格特征。

由于这8类话语风格是由社会语境和发言者不同组合而形成的,所以,它们相互之间并没有太过于独立的区隔,彼此之间存在着交叉或者相融的状态。不过,即使如此,这些风格类型的梳理也为理解话语的特征提供了分析框架。

按照话语风格的分析框架,微博传播的话语风格具有以下特点。

从发言者的个性特征来看,微博的发言者可分为个体发言者和团体发言者,个体发言者又可分为一般的个体和标记有一定社会身份的个体,团体发言者包括新闻媒体发言者、正式群体发言者和其他群体发言者。风格是由话语的主体决定的。由于发言者个性特征不同,由此也就构筑了微博传播话语风格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作为微博的注册用户,一般个体占居主要的部分。根据对微博内容的跟踪分析,一般个体的微博传播内容主要有原创和转载两种性质。原创的内容多符合“*What's happening*”的特点,也就是及时、瞬息宣告自己在当下的行踪或者心态。因此,一般个体的微博话语风格更多地具有个人性和瞬息性特点。

一些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公众人物在微博传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往往充当着微博空间的意见领袖。这些公众人物来自社会各个领域,如演艺界、体育界、学术界、政府组织和其他方面。他们在微博空间身份的建立,大多来自于在各自领域已经做出的贡献或者已经形成的影响力,也有一些微博意见领袖是借助于网络的传播特点而营造出来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大V”。其实,实名认证的个人用户数量也十分庞大,但并非所有人都具有

“大V”的地位和影响力。

公众人物来自于不同的领域,由于他们的工作性质不同,因此他们的微博风格也有所不同。来自于正式组织的个人微博,其传播行为略显内敛。虽然从理论上讲,微博多以个人名义注册的,但如果是以其具体的工作单位作为实名认证标签,那么在发言的立场、发言的内容和字词等的使用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框架约束。所以,这些微博就不能仅仅只是个人的立场表达或者情怀的抒发,更多的应被理解为是其所在组织或者群体的新闻发布,其微博话语风格更多具有功能性和团体性特点。

其他公众人物的微博风格则较为松散、自由,其传播内容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为个人生活、工作的日常记录。这种微博使用从形式上来看,与一般个体的微博使用很接近。但是由于其公众人物的身份所在,公开信息的性质、信息的数量、所使用的表达方式等都可能有一定的选择和设计,进而形成个人所独有的表达风格,并且这种风格往往与该公众人物所塑造的公众形象相吻合。另一部分则为具有较强立场性的内容。这些内容往往与一定的社会公共事务或者公众事件相关联。公众人物在自己的微博中,或原创或转载,或叙事或评议,立场鲜明,观点突出,在舆论场中彰显了其作为公众人物的影响力,所谓的意见领袖也就是由此而来的。这类微博话语风格表现较为复杂,兼具个性、功能性和话语类型性特点。

团体发言者的微博风格依据各自团体的性质而各有不同。总体来看,这类微博用户的立场表达、字词选择、内容发布等都具有既定的规范性,或者说团体用户的微博就是该团体在微博空间的新闻发布。所以,其微博话语风格更多表现为团体性、功能性等特点。

总之,虽说同为微博用户,但由于用户不同,其所体现出来的话语风格也各背景不相同。在微博空间里,各种风格竞相登台,各放异彩,也因此造就了微博传播的复杂性特点。

三、不同话语风格的微博传播效果分析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我国网民人数已达6.32亿。其中微博用户人数约为2.75亿,网民微博使用率为43.6%^[7]。这显示出微博使用的普遍化,而这种普遍化又催生出了一个新概念:自媒体。每个微博用户都有可能传播信息,成为信息传播源,并且由于微博技术所具有的特点,每个用户又有可能成为微博

传播的中心。互联网使用的方便性培育了大量的微博用户,这些用户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微博空间复制了物理空间,现实社会的复杂多样通过话语表达的方式以微博传播的方式得以重构。由于微博所具有的自媒体特征,每个用户都被赋予了话语的权利,用户使用微博可以方便迅速地表达自己的兴趣和价值取向。这种来自于微博技术设计所呈现出的传播特征成为传播风格的丰裕土壤,也因此成为社会问题预警与公共舆论形成的现实基础。

由于微博表达的字数限制,微博传播的篇幅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就了微博传播的特点:简洁、精炼,也因此使得微博话语的个性化特征更为突出。不过,任何话语都具有社会性特征,人们之所以能够进行沟通与交流,正是因为话语结构所体现的社会契约性。“语言结构是‘由属于同一个社会内各主体的言语实践所呈现的蕴藏’,而且因为它是由诸个标记组成的集合体,在每一孤立个人的层次上它只能是不完全的;语言结构只能在‘言语流全体’中才能有完全的存在,而人们也只有语言系统中将言语抽出时才能运用言语。”^{[4](P5)}可见,人们通过话语实践能够寻找社会共识,辨别群体认同。因此,微博传播风格的个性化特征就成为了一种高高飘扬的符号标志,数量众多的微博用户因此可以很方便地为自己的生活兴趣或者社会价值找寻到共识群体。

微博传播因其风格化可聚合大量的“粉丝”。在微博传播中,话语风格成了姿态表达,“粉丝”群体构成了一定的认同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无论这个群体的成员是向其他个体作出这些姿态或者运用这些符号,还是对其他个体作出的这些姿态或者运用的这些符号作出公开反应,这些姿态或者符号对于这个群体的所有成员来说都具有同样的抑或共同的意义”^[8]。美国著名学者米德将这种认同空间称为“论域”,认为“论域只不过是由共同的意义或者社会意义组成的系统而已”^[8]。在微博空间,基于不同的微博风格存在着大量的“论域”,由此形成了基于话语实践基础上的对立群体,也因此使微博论战成为微博传播的常态,现实社会的一些事件也由此成为微博事件或网络事件,进而演变为社会公共事件。

自从2009年新浪推出新浪微博以来,微博在公共舆论形成过程中具有极高的活跃度,很多事件都是通过微博传播而演变成为公共事件的。在微博传播过程中,一些风格鲜明、“粉丝”居多的微博用户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就是“大V”用户。这些“大V”的微博话语往往带有鲜明的立场归属、独特的语言表达等风格特征,成为微博用户在微博空间寻找社会认同的符号与标志,也因此有关事件的舆论形成中充当了意见领袖的角色。

如前所述,微博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物理空间的现实社会状态的复制。但是这种以话语实践的方式所建构的社会状态,由于微博传播的自媒体属性、网络传播的匿名特征而显得较为复杂。这种建立在话语表达实践中的复杂性通过舆论的推波助澜又反射于社会实践中,进而转化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这种基于自媒体特征的微博传播风格决定了微博传播内容的多元性和传播效果的复杂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微博传播具有显著的风格特征,也因此公共舆论的形成过程中表现出不同寻常的作用。不过,虽然微博传播具有突出的自媒体特征,根据前述的微博风格的不同主体,并不是所有的微博传播都具有自媒体的特征。团体(组织)微博的传播更具有制度化色彩,其传播风格的群体意志表达较为突出。但是,在微博传播的大众化发展过程中,如何能够有效地引导舆论、树立微博空间意见领袖的形象,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参 考 文 献]

- [1] [美]杰夫·贾维斯.公开:新媒体时代的网络正能量[M].南溪,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3.
- [2] [美]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35.
- [3] [美]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詹姆斯·富勒.大连连接: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对人类现实行为的影响[M].简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54.
- [4] [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 [5]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91.
- [6] [荷]托伊恩·A·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M].曾庆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 [7]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4-07-21)[2014-08-01].http://www.cnnic.net.cn/gywm/xwzx/rdxw/2014/201407/t20140721_47439.htm.
- [8] [美]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霍桂桓,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97.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4)05-0085-04

濒危民间艺术遗产的传承与创新

——基于豫北剪纸的调查

杨远

(郑州轻工业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 豫北剪纸具有浓厚的农耕文化基础,其主要分布于两大区域:以安阳—鹤壁—濮阳为中心的三角轴心剪纸带和以济源—焦作—新乡为中心的横向轴线剪纸带。豫北剪纸品种与样式繁多,颇具地域特色的有神衣、冥衣、纸帐和窗花。豫北剪纸题材多样,有不少是反映当地历史文化内容的,如《二十四孝》中的人物、《周易》、殷商古都文化、英雄人物等。豫北剪纸造型多夸张变形,随意而剪,不求形似而求神似;在技法上虚实结合,刚柔并济,构图饱满,繁简有序;在色彩上追求艳丽和明快,点彩窗花五彩缤纷;在表现手法上运用寓意、谐音、隐喻、象征,具有一种含蓄美。豫北剪纸属于吉祥文化,具有装饰功能和教化作用。据调查,豫北剪纸的艺人年龄较大,由于剪纸使用环境发生了变化,经济效益不明显,濒临人亡艺绝的危险境地。针对这种状况,政府从政策、制度上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对豫北剪纸的抢救和传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高校和艺术工作者也应担负起民间艺术遗产的传承与创新责任,努力促进民间艺术的发展、实现当代艺术的民族化创新。

[关键词] 民间艺术遗产;豫北剪纸;艺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 J528.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4.05.017

中国的文化遗产丰富多彩。就民间工艺美术遗产来看,许多都在现代社会中获得了重生,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对设计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现代设计艺术发展的源泉。但也有部分遗产由于现代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濒临失传、绝迹的危险,剪纸艺术就是其中之一。河南的剪纸艺术尤其独特,具有浓厚的农耕文化基础,寓意丰富。前几年,河南省民协组织相关专家对豫西的剪纸做了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1]。而豫西剪纸仅仅是厚重的中原文化之一角,其他区域的剪纸还有待调查整理。近些年,笔者受河南省民协邀请,与相关专家一起对豫北剪纸艺术做了长期的调研。本文拟根据豫北剪纸艺术的调查情况,介绍豫北剪纸的发展现况,并结合当代设计艺术的发展,探讨民间剪纸艺术的传承与创新问题。

一、豫北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渊源

豫北是指河南省内黄河以北的地区,地处中原腹地,行政区划包括安阳市、鹤壁市、新乡市、濮阳市、焦作市、济源市6个省辖市和滑县、长垣2个省辖县,总面积2.8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2100万。豫北四季分明,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以小麦、玉米、谷子、棉花等为主,是全国重要的麦粟文化区,矿产资源主要以煤、铁、石油著称,尤其是煤、铁开采历史悠久,这些为工艺美术提供了能源和原材料。

豫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史前“三皇五帝”中就有颛顼、帝喾两位主要活动在豫北,他们死后就葬在内黄境内,至

[收稿日期] 2014-06-27

[基金项目] 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2013GGJS-113);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2014]-JKGHC-0090);郑州轻工业学院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作者简介] 杨远(1975—),男,河南省南阳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美术史论、民间美术。

今尚有二帝陵遗存。1987年在濮阳西水坡发掘出蚌塑龙虎图案,据考证距今有6 000多年,为仰韶文化时期遗存,被称为“濮阳龙”^[2]。安阳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的发现地,安阳小屯殷墟遗址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豫北也是《周易》的源头地区,周文王被拘禁于羑里城(今属汤阴)时,将伏羲先天八卦整理、注疏,演绎为64卦,形成《周易》文化。

二、豫北剪纸的分布区域

在长期的历史文化滋养下,豫北剪纸成为当地工艺美术中掌握人数众多、分布最普遍、与民众生活和生产关系最密切的手工艺艺术,也成为豫北民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分布密集。豫北剪纸广泛分布于豫北的乡、镇、农村,按照剪纸的艺术特点,可以将其分为两大区域。

1. 以安阳—鹤壁—濮阳为中心的三角轴心剪纸带

这一区域包括安阳、鹤壁、濮阳3个地市,其中安阳市的安阳县、汤阴县、内黄县,鹤壁市的鹤山区、山城区,濮阳市的清丰县、濮阳县是剪纸分布比较密集的区域。这一带主要流行与地方文化、民俗习惯结合紧密的具有区域文化内涵的剪纸,如濮阳县郎中乡王海村的神衣剪纸,是当地的庙会活动所用的具有地域特点的一种剪纸艺术(见图1)。豫北的窗花剪纸也极具地域特点,从造型上看主要是方窗花(见图2),这跟当地的居室环境有一定的关系,这一带传统民居的窗户多为方格棂窗,窗棂多为5×5格式,25个方格,内外糊白纸。窗花外方内圆,造型美观,适合装扮窗棂。

2. 以济源—焦作—新乡为中心的横向轴线剪纸带

这一带包括新乡、焦作、济源市区,以及新乡县、辉县、修武、武陟、沁阳等县。这一带的民间信仰剪纸比较多,用以祭祀祖先和供奉神灵。信仰剪纸的功能已超越人生礼仪和节令习俗,成为人与神之间沟通的媒介,剪纸被赋予超自然的力量。新乡辉县的帐书剪纸,重在精神寄托与心理慰藉,极具神秘性^[3]。

三、豫北剪纸的艺术特色

豫北剪纸与豫西剪纸等相比,富有鲜明的地域风格,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品种与样式、题材、艺术风格与功能作用等方面。



图1 濮阳县郎中乡王海村的神衣剪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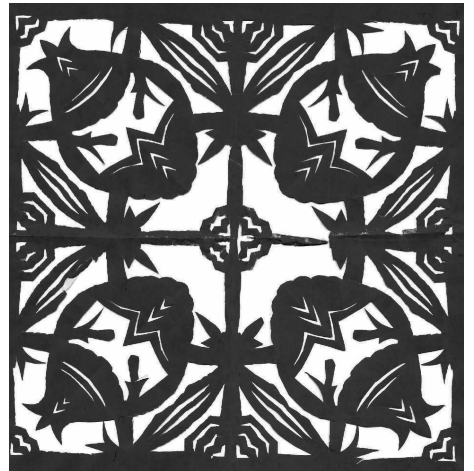


图2 豫北的方窗花剪纸

1. 豫北剪纸的品种与样式

中原剪纸的共性是其与人生礼仪和岁时节令密切融合,是民俗化了的民间造型艺术。豫北剪纸的品种有窗花、顶棚花、坑围花、墙围花、门笺、拉花、寿花和丧葬花等,衣饰纹样主要有鞋花、帽花、边饰纹样,除此之外,豫北剪纸还有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品种和样式,具体如下。

(1)神衣。神衣是用剪纸剪出的一种服装,主要是用于供奉神灵,主要流行于濮阳县。神衣是用红、绿、蓝、紫、黄、黑等色纸,以及金、银箔纸,剪成不同的衣服部件,然后拼接而成。每套神衣包括上衣和下裳,上衣有领、长袖或短袖,多为对襟、布扣;下衣为裙或短裤,总尺寸约为成人衣服的2/3。神衣

上面贴有用各色纸剪成的装饰图案和花边,有些衣服上还贴有“囍”和“春”字,“囍”字非婚嫁之喜,仅表示喜庆事,“春”字表示春天。神衣年年做,在神灵生日供奉,先在庙上展示,而后祭祀、焚烧。神衣的制作和供奉是集体行为,大家集资买纸,有人裁衣,有人剪花,有人粘贴,众人共同完成。

(2)冥衣。冥衣是用剪纸的形式剪出的一些服饰,主要用于祭祀祖先,其制作过程和神衣一样,其尺寸比较小,只是一种象征,神衣上面也有各类植物、花卉图案,是丧葬用品,在祭祀祖先时焚烧。

(3)纸帐。中原地区有写帐的习俗,尤以豫北安阳县、辉县为盛^[4]。所谓“帐”,是香客、信众按照所谓的“神灵”“天意”而书写绘画出来的图案。帐又称为盘、帐盘,大部分帐是用笔绘在纸或布上的,其中用纸剪出来的叫“纸帐”。纸帐上的图案和文字有些能够辨识,如庙宇、葫芦等,而大部分是抽象的图案文字,难以辨识,多为祈福纳吉之意,主旨大都是表达国泰民安、五谷丰登、风调雨顺、消灾祛病等美好愿望。

(4)窗花。窗花有单色窗花和点彩窗花两种。单色窗花一般用红色剪纸剪成各种适合图案,安阳一带流行的单色方窗花外方内圆,图案多是动物、花卉等具有吉祥寓意的题材,也有部分是几何装饰图案,端庄大方。点彩窗花剪纸也叫点色剪纸、染色剪纸,以宣纸为材料,前纸镂刻多为阴刻,点染的水色系颜色中加白酒调制而成,渗透力较强,一次可点染20~30张,颜色渗透自然,画面色彩艳丽(见图3)。豫北安阳县、汤阴等地制作窗花主要用这种工艺。

从剪纸技法上,也有一些独特的剪纸工艺,如套色拼贴剪纸工艺,在豫北非常流行。这种工艺一般



图3 豫北点彩窗花剪纸

以深色或金、银箔刻成的阳刻剪纸为背面,按画面物像的颜色和形态分别贴上多种不同色纸,以增加画面的表现力(见图4)。套色拼贴剪纸多用于居室装饰(壁饰)、门、纸扎、神衣、冥衣上。

2. 豫北剪纸的题材

豫北剪纸的题材和主题十分丰富,地域人文色彩强烈,通过不同的图案形式表现不同的寓意,有表现男欢女爱的,如鱼戏莲、鱼拱莲、鱼吻莲、扣碗、葡萄+老鼠等题材剪纸;有表现多子多福的,如葡萄、石榴、瓜+蔓等题材剪纸;有追求平安如意的,如瓶+花、柿子+如意等题材剪纸;也有驱邪禳灾的,如剪五毒、眉眼(虎头鞋、猪头鞋)、方胜等。除此之外,豫北剪纸的题材还有以下反映当地历史文化内容的。

《二十四孝》中有多位人物出生于豫北地区,与豫北有关联。如“为母埋儿”的郭巨乃安阳林州人;“刻木事亲”的丁兰,乃河内(今沁阳)人;“孝感动天”的虞舜,其故里是濮阳县;“负米养亲”的子路,在濮阳讲学,死后葬于清丰县;“单衣奉亲”的闵子骞为濮阳人,濮阳县有闵城的地名,范县还有闵子墓;“卧冰求鲤”的王祥,曾做过温县县令;“恣蚊饱血”的吴猛,故里也是濮阳;“卖身葬父”的董永,故里在武陟;清丰县以孝子张清丰命名……二十四孝为豫北民间工艺美术所表现的经典题材,剪纸也不例外。



图4 套色拼贴剪纸(沁阳·韦凤荣)

“文王拘而演八卦”,《周易》对豫北剪纸的影响极大,而《周易》也是豫北剪纸所反映、表现的重要内容,诸如阴阳平衡观念、和谐理念、天人合一观念等。殷商古都文化也是豫北剪纸表现的重大题材和内容,甲骨文、商代青铜礼器、青铜器纹样也常出现在剪纸中。英雄崇拜也是豫北剪纸的重要内容,像民族英雄岳飞,生在汤阴,习武在内黄,是家喻户晓

的民族英雄,岳飞事迹也成为剪纸作品的热门题材。

3. 豫北剪纸的艺术风格

豫北剪纸在造型、技法、构图、色彩、表现手法等方面表现出了其独特的艺术特点。豫北剪纸造型多夸张变形,不求形似而求神似,随意而剪,突出主体形象,夸大特色部位,追求神似。在技法上虚实结合,阳线和阴线相结合,刚柔并济,阳剪中辅以阴剪,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弧线流畅,线线相连,繁而不乱。构图饱满、浑厚,线条多、实面广,方正规矩、繁简有序,给人以端正大方、沉稳平衡的感觉。在色彩上追求艳丽和明快,点彩窗花五彩缤纷。在表现手法上运用寓意、谐音、隐喻、象征,具有一种含蓄美。

4. 豫北剪纸的功能和作用

豫北剪纸属于吉祥文化,具有装饰功能和教化作用,广泛应用于民众生活和生产中,为群众日常生活服务。像窗花、鞋花剪纸具有实用功能;许多剪纸大幅作品做成了中堂画、屏条,加装画框,成为具有装饰功能和欣赏价值的艺术品;有一些历史题材的剪纸,如“孝子图”,具有重要的宣教作用。

四、豫北剪纸的传承状况和创新思考

豫北剪纸在过去主要是通过民俗活动传承、师徒传承、亲缘传承等方式,得以延续上千年,而且在民间是受人尊敬的一种技能。但是,今天的豫北剪纸面临灭绝的危险。

据我们调查统计,豫北各地基本上都有剪纸能手,我们对260余位剪纸艺人做了走访,其中年龄最大的是新乡市获嘉县照镜镇的李同秀,88岁,年龄最小的是安阳县的李海燕,36岁;60岁以上的艺人占89%,尤以65~80岁的人最多。现在剪纸大多为邻里婚丧嫁娶所用,不出售,只有极少人做纸扎出售,95%的剪纸艺术无传人,面临着人亡艺绝的尴尬境地。

豫北剪纸随着现代社会环境的变化,已经逐渐失去了其使用的环境。如窗花一类的剪纸,过去是传统木构建筑常用的装饰用品,而现在大多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房屋,窗户也使用的是现代的玻璃窗,很少有人贴窗花。剪纸的使用场所在不断缩小。

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使很多民俗活动失去了生存空间,而剪纸是其重要的表演道具,活动没有了,道具也就不需要了,这也直接影响到剪纸艺术的发展。另外由于剪纸创造的直接经济效益太小,因此年轻一代也不愿意去学习传承。

上述状况导致剪纸艺术处于一个濒危的境地。那么,剪纸艺术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保护和传承创新呢?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首先,从政府层面上,应对豫北剪纸进行保护、抢救和传承。值得一提的是,从2002年开始由中国民间工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发起的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对豫北剪纸的抢救发挥了重要作用,命名了一批民间剪纸艺术之乡,评出了一些国家级剪纸传承人,并给予了适当的经费支持。如辉县剪纸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辉县的李爱荣被认定为国家级剪纸传承人,多次受文化部委派出国办展览、现场演示剪纸技艺;汤阴等县被命名为民间剪纸艺术之乡。

其次,高校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创新方面也应该担负起传播和创新的责任。高校应该利用自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平台,开展多项民间文化遗产的课题研究,培养民间艺术教育的师资队伍,开设民间美术课程,加强民间艺术研究,在学术交流中开展民间艺术专题讲座、现场展演、作品展览和参观考察等工作。

最后,青年学生特别是年轻的艺术工作者,更应该担负起民间艺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责任。很多优秀艺术作品的创作资源都来自民间文化遗产。如剪纸艺术,从形式到内容,都有被用于装饰、室内设计、产品设计等现代艺术设计中的成功案例,这不仅能使艺术设计别具一格,而且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传承民间艺术的作用。

总之,在新的历史时期,民间艺术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日益凸显,我们应结合当代设计艺术,寻求诸如剪纸等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创新途径,这也是实现艺术设计民族化的必由之路。民间艺术是当代艺术设计的灵感之源,因此我们的艺术设计工作者应多了解民间艺术,多运用民间艺术资源,从而设计出好的作品,以更好地传承民间艺术。

[参 考 文 献]

- [1] 冯骥才,倪宝诚. 中国民间剪纸集成·豫西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11.
- [2] 孙德萱,丁清贤,赵连生,等. 濮阳出土六千年前的龙虎图案[N]. 中国文物报,1988-01-29(4).
- [3] 陈江风,訾琳滢. 九莲山帐书文化源流臆说[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34.
- [4] 陈江风,曹阳,杨远,等. 九莲帐书——叩问苍穹的文化之旅[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24.

[文章编号]1009-3729(2014)05-0089-04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的河南省 创意产业开发研究

刘梦梅

(郑州轻工业学院 艺术教育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创意产业发展中的重要生产要素,发展创意产业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代传承的重要途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产业开发,有利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并提升其价值,有利于打造民族文化产业品牌,有利于实现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产业开发,应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代表性与整体性相结合的原则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的原则。河南省创意产业开发可侧重于旅游业、手工艺品和演艺业,采取层进模式、集群发展模式和政府引导模式,分类指导,层层推进。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产业;开发模式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5.018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的活化石,内容非常丰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利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有利于多样性地域文化的保护。但是,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中遗址保护和博物馆收藏等的保护方法,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活态性决定了其保护与传承的复杂性。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华民族传统的习俗、节日、信仰、习惯,以及民间艺术门类中的诸多传统行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化的个性和多样性受到了严重威胁。面临存续危机,如何在现代语境中,保护、传承、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如何立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实现其由文化资源优势到文化经济优势的转换,这是当代具有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学术界同仁需要深入思考和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

但是,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有关此问题的研究多过于宏观和概略,从理论到实践的系统性研究比较缺乏。本文既非单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亦非单一的创意产业理论探讨,而是在理论

与实践统一的基础上,立足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资源优势,以创意产业发展为突破口,寻找两者的联系点、融合点与平衡点。本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创意产业中的应用为主题,尝试性地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河南省创意产业开发的思路 and 对策,以期能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利用问题进行学理性补充和地方化验证。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创意产业的 内在关联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创意产业发展中的重要生产要素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撬动、催生、拓展创意产业发展空间的“阿基米德支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是创意产业发展的根基,它能够为创意产业发展提供多样的文化基因和丰富的思想内涵。河南省悠久的历史孕育了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创意产业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因此,我们首先要做好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认定和普查工作,在梳

[收稿日期]2014-06-20

[基金项目]2012年度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122400450309)

[作者简介]刘梦梅(1980—),女,河南省商丘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美术学。

理分析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基础上,对有生命力和市场前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深入挖掘,使之走向产业化道路。

2. 发展创意产业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代传承的重要途径

创意产业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传承提供创新路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方式决定了在现代语境中必须将其文化意蕴活化,并让其参与生产和市场流通,转化为文化商品,在现代生活中广泛生产、参与流通并创造经济价值,借助现代生产组织方式和流通手段,形成产业链条,甚至可以产业化生产,从而使其在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同时以创造经济价值的方式“应时而变”。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保护和传承的必然需要,也是产业发展中保持其文化原创力的关键所在,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内在联系。

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产业开发的必要性

1. 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并提升其价值的有效手段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生命的记忆和活态的文化基因,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担负着保持民族文化独特性和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多重职责。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损害和破坏,有的甚至已经濒临消亡。这种情况在近20年内尤为严重,抢救和保护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已经迫在眉睫。^{[1](P13)} 产业开发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中断,而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另一种保护,是发展中的求舍,是在民族文化传统中融入现代意识的再创造,也是回应了文化当随时代变迁而流变的本质面目。在方式方法科学得当的前提下,将创意理念融入适应产业开发的非遗项目中,这不仅能给当代社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同时还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领悟其独特魅力和文化意蕴,起到弘扬本民族、本地区传统文化,并在传播过程中完成文化传承与优化的作用。

2. 提高区域文化影响力的有益资源

文化品牌具有明显的文化附加值。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文化品牌可以通过对文化资源的提炼和利用成为文化灵魂的代表。一个国家、地区的文化竞争力与其所拥有的文化品牌数量紧密相关。摸清

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家底,依托民间美术、乡土文化等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从战略高度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创意品牌,这既关系到合理地使用与配置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又关系到文化产业发展的速度、规模、效益,同时也有益于提高区域文化的影响力,为区域经济建设和历史文明传承提供智力支持。

3. 实现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有生力量

创意产业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内容产业,是实现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力量。应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与创新体系,使文化组织、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其他文化组织之间实现有效互动,利用文化产品与知识经济来实现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同时应利用后发优势,加强对文化产品经营与开发的学习和模仿,增强吸收能力。因为文化的转移不同于物的转移,它必须经过人的理解才能被真正掌握。当前,文化的多元架构与技能的综合程度越来越高,这就需要加强文化产品的保护、开发、研究等领域的合作,利用不断增长的文化实力与文化品牌影响力来实现区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产业开发的原则

1. 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原则是非遗视角下创意产业开发的首要原则。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问题上,这一原则强调在满足我们这一代人文化需求的同时,要为后代人留下将来他们发展所需要的文化基因。对于非遗视角下河南省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其内在含义就是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资源实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在不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本真性面貌的基础上,通过创新、创意使非遗视角下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能够在一种健康、稳定和平衡的产业格局中获得快速发展。

2. 代表性与整体性相结合的原则

在后续的产业开发中,非遗资源的无形性和活态流变性,决定了确定其评估指标时的模糊性。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说明非遗资源产业开发的比较优势大小,在诸多待定因素中,我们应按照代表性与整体性相结合的原则,筛选和确定一些能够反映非遗

资源整体性保护特点且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评估指标,以此来确定何种非遗项目适合创意产业开发,以及可开发的程度。^[2]对此,我们可根据河南省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相要素(濒危性、稀缺度、典型性、传承度)、内容要素(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经济要素(使用价值、品牌价值、产权价值、开发成本)、保障要素(人力资源、市场需求、经营环境)4个方面慎重选取。

3.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的原则

非遗视角下河南省创意产业的开发要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使非遗项目的传承人与衍生品的相关制造者在获得必要的经济利益的同时,实现非遗项目的有效保护和永续利用。但是,在河南省非遗项目的产业开发中,一些地区地方保护意识淡薄,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的现象比较普遍。“少数地区甚至对其进行超负荷利用和破坏性开发,存在商业化、人工化和城镇化倾向,甚至借继承创新之名随意篡改民俗艺术,损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1](P92)}对此,在河南省非遗项目的产业开发中,一定要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原则,把握好两者之间关系的尺度。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河南省创意产业开发的重点

河南省创意产业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其大发展的热潮已经到来,但各地的创意产业趋同现象非常严重。为了有效地避免这一现象,应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原则的指导下,根据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种类、数量、分布等的调研结果,选择特色产业进行重点开发,这对于发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优势,以形成重点产业和支柱产业,十分重要。

1. 非遗项目的旅游业开发

当今世界,旅游业被称为“无烟工业”,旅游收入已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非遗项目的旅游业开发,就是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活态流变性特点,在不改变其内在规律和自然衍变过程、不影响其未来发展前提下的可持续性旅游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河南省旅游业发展的主要资源基础之一。河南省非遗项目的旅游业开发,应以具有河南文化地域特色的民俗项目展示为核心元素。“民俗旅游就是借助民俗来开展的旅游项目,它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俗事象和民俗活动为旅游资源,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鲜明、突出的民族性

和独特性,以其深厚的文化内涵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鲜感”。^[3]与单纯的游览自然风光相比,以河南省区域内的文化生态环境为背景,对当地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等独特生活方式所进行的可持续性旅游开发,不仅能够满足游客的“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起到宣传推广中原文化的作用,同时也可增加收入,从而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河南省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2. 非遗项目的手工艺品业开发

河南省作为手工艺品生产大省,其民间工艺资源总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在数量方面,河南省有南阳玉雕、禹州钧瓷、开封汴绣、淮阳泥泥狗等上百个手工艺品种;在质量方面,河南省民间工艺品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识别特征,承载着深刻的文化记忆,其精巧的手工艺品格,使其具有一般工业产品难以比拟的文化艺术价值;在价值方面,非遗项目中的手工艺品开发,不仅可以活跃乡村经济,让农民走上脱贫致富道路,而且可以摆脱单一的农业发展模式,实现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以文化艺术价值极高的泥泥狗为例,由于其贴近民众生活,并兼具审美和实用双重功能,其所蕴含的驱邪趋吉、子孙繁衍等吉祥文化寓意,更使人们对其一目了然,一触即通,快速解读,永久期盼。所以,公众对这些非遗项目中的手工艺品往往显示出较为强烈的购买意向,市场空间巨大。

3. 非遗项目的演艺业开发

河南省演艺类非遗项目内涵丰富,形式多样,且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中既有以豫剧、曲剧、越调、目连戏、怀梆、宛梆、河洛大鼓、河南坠子等为代表的戏曲文化,又有以宝丰民间演艺、濮阳杂技、豫西社火、信阳民间歌舞等为代表的民俗演艺文化。其地域文化艺术特征鲜明,在当代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首次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豫剧,不仅深深根植于中原大地,还辐射到山西、河北、安徽、甘肃、湖北、新疆、台湾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花木兰》《朝阳沟》《香魂女》《程婴救孤》《村官李天成》等一大批新老剧目,久演不衰,在全国有较大影响。^[4]但是,在河南省众多的演艺类非遗项目中,还远未形成具有世界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品牌,因此,充分发掘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资源优势,打造具有中原特色的知名文化创意品牌,是当前河南省非遗项目中演艺业开发的关键。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河南创意产业的开发模式

1. 层进模式

产业开发是对非遗资源的有效保护和提升,但并不是所有的非遗项目都适宜产业开发。对此,应坚持“永续利用”和“动态保护”的理念,通过分类区别、规范有序的层进发展模式,来完善非遗视角下河南省创意产业的开发机制。首先,随着现代语境的变迁,不适宜现代社会开发的非遗品类数量很多,不能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而强硬开发,否则可能得不偿失。对此,应从抢救第一的原则出发,对那些陷入生存困境、濒临消失、不适宜产业开发的非遗项目,通过文字、语音、数字等形式进行抢救性静态保护。其次,对于在河南省本土语境中具有广泛受众,体现较强文化地域性特征的非遗项目,可在其传承区域内进行适度的产业开发,使之在其产生、生长的原始环境氛围中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以服务于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最后,对于禹州钧瓷、南阳玉雕、开封汴绣等在国内国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非遗品类进行重点开发,应通过文化意蕴的深入挖掘、文化符号的创新设计、表现形式的多元化创新等方法,进行民族文化品牌的规模经营。

2. 集群发展模式

创意产业作为21世纪的内容产业,具有较强的产业融合性。加强各类创意产业园区(基地)建设,在其集群化发展中整合各种有益资源,是今后非遗视角下河南省创意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非遗视角下河南省创意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较好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基础,同时还需要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而这些条件并不是河南省内的每个城市和地区都具备的,因此,必须集中主要力量,根据产业开发特点,抓住产业开发核心,采用集群化发展的模式,以点带面,逐步推开。与北京的798和上海的M50这些采用创意园区的集群化发展模式而取得良好效果的成功案例相比,目前,河南省电子商务产业园、国家动漫产业发展基地、郑州华强文化科技产业基地、金水文化创意产业园等河南颇具代表性的文化创意产业

园区(基地)建设只是初具规模,处于起步阶段,园区特色并不明显。^[5]对此,整合河南省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加强对依托于此的中原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培育,以形成一批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群品牌,是未来非遗视角下河南省创意产业发展的内在需要。

3. 政府引导模式

相比前两种开发模式,政府引导模式具有起效快、推动力强的特点。作为公共权力的集中代表者,政府能够从规划、指导和组织实施方面,快速而有力地调动与产业开发相关的行政、学术、媒体等优势资源。首先,在规划布局设计方面,政府应对其文化底蕴、创新能力、营销环境、人才保障等因素进行前瞻性地综合考量,以确定非遗视角下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基地的级别。其次,在非遗资源的保护和认定方面,针对非遗资源保护过程中一些资源长期不被重视,保护措施不力,被遗弃、失传和破坏等现象,政府应积极组织对河南省非遗资源的数量、种类等状况的详细调查。再次,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政府在对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进行改革的同时,应兼顾非遗资源的来源地、持有人、传承人和使用者之间利益的合理分配。^[6]最后,在土地、税收、资金的保障方面,政府应制定有利于非遗视角下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土地、税收、资金方面的优惠政策,并完善前期扶持机制和后期奖励政策。

[参 考 文 献]

- [1] 王文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
- [2] 黄明玉. 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及记录建档[D]. 上海:复旦大学,2009.
- [3] 陶思炎. 应用民俗学[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140.
- [4] 王星光,贾兵强. 中原历史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68.
- [5] 卫绍生. 河南文化发展报告(2013)[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44.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4)05-0093-05

河南省电视动画产业现状与发展策略研究

汤梦箫

(郑州轻工业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随着河南省国家动漫产业发展基地与郑州市动漫产业基地的建立,河南省动漫产业发展速度显著提高:一是数量和质量稳步提升,二是类型日渐丰富。河南省电视动画产业重视本土资源的挖掘,产业链开发初具规模。但也存在自主创作积极性不高、艺术水准有待提高的问题。为推动河南省电视动画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应慎用本土文化资源,回归动画本体,针对不同渠道进行文化定位,培养跨媒介发展的视野与思维。

[关键词]电视动画;历史文化资源;产业链;跨媒介发展

[中图分类号]J954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5.019

相较于经济发达的省份,河南省的动漫产业虽起步较晚,但随着2008年6月位于郑州市高新区的国家动漫产业发展基地(河南基地)与2009年3月位于郑州市惠济区的郑州市动漫产业基地的建立,河南省动漫产业发展速度显著加快。据统计,动漫集聚区成立的6年间,动漫企业数量从个位数增长到了近90家^[1],涵盖漫画创作,动画创作、制作,网络动漫(含手机动漫)创作、制作,动漫软件开发,动漫衍生产品研发、设计,以及动漫专业培训等众多领域。其中,郑州小樱桃卡通公司、河南天乐动画影视发展公司等11家企业先后通过了国家动漫企业认定。这表明河南省动漫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动漫产业链基本形成,这将为河南省动漫产业的未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就整个动漫产业而言,国家对电视动画片的鼓励和扶植力度是最大的,且不断根据产业的实际发展情况做出调整,日益合理化、科学化。在国家相关政策助推下,近些年我国的电视动画产业发展迅速,数量、质量都有很大提升,河南省也是如此。与产业发展的蓬勃态势相适应,地域动漫产业研究成为动漫文化及产业的研究热点之一,大多数研究通过总结和透视产业发展现状,来探寻产业调整和升级的方法和途径。本文拟立足于河南省动

漫产业集聚区建立以来的发展进程,从现状、问题、策略等方面对河南省电视动画产业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从政府政策、文化环境、媒介生态、企业规划、作品呈现等角度,试图勾勒出河南省电视动画产业的整体形态。

一、河南省电视动画产业发展现状

由于河南省目前还没有影院动画,新媒体动画的发展尚处于萌芽期,大量的项目还在研发和试运行阶段,因而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河南省动画产业的主体——电视动画产业。河南省电视动画产业经过近6年的发展,成绩显著。

1. 数量和质量稳步提升

6年来,河南省的电视动画产业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从播出数量上看,由2007年的1部338分钟增长到2012年的14部8995分钟,连续多年进入全国前十,稳居中部六省第一^[1];从播出媒介上看,《少林海宝》《虫虫计划》《小樱桃》《代号12348》《少年司马光》等先后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播出,并有多部动画片在卡酷、金鹰、嘉佳等卡通频道播出;从质量上看,2009—2012年,先后有《独角乐园》《小樱桃》《中国戏曲经典原创动画》《雪孩子之拯救

[收稿日期]2014-06-11

[基金项目]郑州轻工业学院第十批教改项目

[作者简介]汤梦箫(1979—),女,河南省郑州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影视、动画文化及产业。

家园》《少林海宝》《小樱桃(第二部)》《代号12348》《少年司马光》《虫虫计划》《公路Q车吧》《二兔等着瞧》《开心果的绿色家园之哈哈森林》《乐乐熊生存大冒险》《龙归之龙行天下》《神探包星星(第一部)》15部动画片被评为国家广电总局推荐播出的优秀国产动画片。可以说,河南省动漫产业集聚区建立以来,河南省的电视动画产业发展速度较快、成绩显著。

2. 题材类型日渐丰富

相对于一般的影视剧和日美等国的动画片而言,我国动画片的观众主要为青少年,市场相对狭窄。但由于青少年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期,思维活跃,变动性极强,不同年龄阶段的青少年的欣赏口味有着极大的差异,因而对他们进行细分,调查研究每个年龄层观众的喜好,有针对性地创作出类型多样的动画片,是目前国产动画片创作的基本原则。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的规定:动画电视剧共有现实、历史、教育、科幻、童话、神话、特殊等8种题材。^[2]近几年,动画电视剧题材比例尽管有所波动,但总体呈现出统一的趋势:童话、教育、科幻类题材最多,所占比重最大,现实、神话类题材较少。河南省的动画片创作情况与全国情况基本保持一致,几乎各个类型都有所涉及,题材日渐丰富。目前我国电视动画片仍以4~14岁的年龄群为主体,因而童话类题材所占比重最多,如《小樱桃系列》《独角乐园》《公路Q车吧》等;“寓教于乐”是青少年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核心理念,因而教育类题材是国产动画片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普法教育类《代号12348》;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为动画片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拥有七朝古都开封和九朝古都洛阳的河南省更是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因而历史题材在河南省的动画片类型中所占比重较大,如《少年司马光》《少林海宝》《红孩儿与大学院》等;社会现实一直都是影视剧的直接创作源泉,而处于快速发展变革期的河南省更是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其中许多与青少年相关,因而近两年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题材的动画片,如反映留守儿童生活的《俺的铁蛋俺的娃》《河南三平精神》等大型系列动画片;与针对低幼年龄层的童话不同,流传悠久的神话蕴含着更为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需要观众更强的理解力和感悟力,因而所占比重较少,但是河南省的动漫创作者也一直没有放弃在这方面的探索,如智睿公司计划创作的《山海奇谭》就是以14~22岁的青少年为目标观众群的神话题材动画片。

二、河南省电视动画产业特点

从全国动漫产业基地的发展态势上看,各个地区的电视动画产业都积极依托区域优势资源,如经济、文化、旅游资源等,力图扩展区域动漫产业的发展空间。河南省从一开始也确立起了依托文化和品牌资源优势的发展策略与方向。

1. 重视本土资源挖掘

相较于其他动漫产业集聚区,作为有着千年积淀的中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河南省古老深厚的历史成为其无可比拟的文化优势。因而从动漫产业集聚区建立以来,河南省的动漫企业一直在努力挖掘本省的历史文化资源,力图创作出具有丰厚人文底蕴的动画片,在保证故事的生动有趣、曲折动人的同时,致力于传承传统文化、弘扬中原精神,打造河南省动漫产业的独特形象。如2010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此后重播多次的52集大型励志奇幻功夫动画片《少林海宝》,是将中国的武文化、禅文化、和文化与当代时代背景相结合,运用少林功夫这一时尚文化,以青春、冒险、热血、勇气为贯穿性主题,借助于世博会的契机,制作出的一部具有较高水准、较大影响力的动画片。又如由郑州谷晶动漫创艺有限公司2012年推出的大型动画片《名画神剪历险记》,取材于举世闻名的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讲述了精灵小谷和小晶与他们的朋友一起为了修复破损的名画,踏上了寻找画中人与恶势力斗智斗勇的历程,主人公在拯救《清明上河图》的同时也完成了性格的成长和蜕变。另外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的此类作品还包括《愚公移山》《老子》《少年司马光》《红孩儿与大学院》《山海奇谭》《太极》等。

2. 具有较强的产业链意识

目前河南省动漫产业集聚区内进行电视动画片创作的动画公司大多具有较强的产业链意识,往往在片子前期策划的时候,就已经计划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产业链构想,尽可能实现动画片制造产业间的联动效应。在这方面,小樱桃动漫集团无疑最具代表性。作为河南省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的动漫企业,从2010—2012年其动画片产量连续3年位居中部省份之首。该集团依托“小樱桃”这一核心形象,采用动画片和漫画双管齐下的策略,扩展观众群,至今已经开发出了2000余种动漫衍生品,有玩具、食品、日用品、文具、幼教用品等多个系列,为企业的未来发展打下了稳固的根基。索易动画的主打项目——科幻类题材作品《虫虫计划》,

已经通过品牌授权形式,在图书、音像、玩具、文具、日用、娱乐设施、游艺设施等多个领域进行产业开发,尽可能地延伸其产业链。

三、河南省电视动画产业存在的问题

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各个动漫基地所在的省市,在急剧增长的企业、作品、分钟数的数字背后,电视动画产业发展的危机和问题也日益显现。目前,河南省电视动画产业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

1. 自主创作的积极性不高

近些年,国家加大对动漫产业的扶植,一方面创造了中国动漫产业飞速发展、产量急剧提升的“奇迹”,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许多痼疾和弊端。比如企业单纯依赖政府补贴,没有经历市场竞争,无法适应越来越严酷的市场环境,再加上最初形成的在电视台几乎免费的播放习惯,造成了国内电视动画产业的制作成本高、风险大、利润回收周期长的种种危机。在这种局面下,许多动漫企业在制作电视动画片的时候,习惯性地依赖与地方政府、企业合作,使其分担前期投入的资金,或者在后期产品推广、营销上取得一些便利条件,河南省的许多电视动画项目都是如此。这种做法是企业降低风险、维持生存的策略性选择,但也容易挫伤创作者主动创作的积极性,造成创作上的惰性。另外,策划者和创作者必须立足于市县级政府、企业的资金前提,基于他们发展地方文化事业、塑造地方文化形象的具体需要进行选题策划,这对创作者的艺术创作多少会有一定的限制,极易使其在形象设计、故事构建、主题及情感倾向上流入平庸,缺少锐气。

2. 艺术水准有待提高

就目前国内电视动画的观众而言,“寓教于乐”是其基本的消费需要,也是政府、社会、学校、家长和青少年的倾向性选择。“寓教于乐”是艺术的基本功能和衡量艺术作品优劣的标准之一。这条标准对于处于知识信息爆炸、价值观极为复杂和多元化的今天尤为重要。“寓教于乐”的“教”与“乐”同样重要,不可偏废。其中,“教”是目的,教并不是自上而下的教育,或单纯地传授某一知识,应该以平等的姿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帮助他们树立健康的生活态度和理念,使人们内心更为纯净和强大,更加真诚、坚强地面对生活;而“乐”是手段,是人们可接受的、喜爱的内容和形式,二者必须紧密结合,才能创造出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发展力

的文化作品。而河南省的电视动画或者过于强调教育意义,从而流入刻板的说教,缺乏观赏性;或者过分追求故事的趣味,欠缺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因此,河南省的电视动画整体的艺术水准有待进一步提升。

四、河南省电视动画产业发展策略

目前国产动画片最被人诟病的缺点就是“没文化”,缺少文化内涵、理念和价值,而关于如何在文化层面上推进国产动画发展的讨论也从未停止过,无论是创作者还是业界研究者都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就河南省的动画产业而言,要想获得持续健康发展,可采用以下策略。

1. 慎用本土文化资源

运用地域文化资源打造有特色的形象、场景、内涵,是近些年逐渐被理论化、也被反复实践的动漫创作理念。“本土”从狭义上讲是各省市的民族、民俗、民间文化,从广义上讲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黄河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因此相较于其他动漫集聚区,河南省的文化资源优势明显。目前许多取材于地方传统文化的动画项目都有地方政府资金的参与和支持,这是动画公司原始积累期的特殊选择,也是一种有效、有益的途径。但是这种合作模式也会造成政府对创作过程进行一定的干预,希望作品中尽可能多地含有地方文化特色,且表现方式越直接、越明显越好,因为这样可以被政府直接用来做后期旅游、形象工程的资源。而这很可能会影响创作者原有的对形象、场景、故事情节的设计,使最终的创作成果显得生搬硬套、不伦不类。由于双方共同的需要,此类项目往往都是上百集的大型项目,作为内容生产厂商的企业未必有充分的时间、精力、能力去挖掘地方文化资源的内涵,会有力不从心之感,而只是用一些比较表面化的所谓“文化特色”对项目进行包装。

当然还有一些项目地方政府并没有介入,而是创作者有感而发,从传统文化资源中获取灵感,试图以此增强观众的熟识感,使其有一种文化认同感,如谷晶公司的《名画神剪历险记》就是缘起于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将北宋的文化、历史与流行的少年冒险、热血类动画相结合,可以说有一定的创意,但对于民族文化的提炼还比较表面化,在制作过程中又受到技术水平、制作周期的限制,最后的成片离原初的设想还有一定差距。因此可以说,在国内的动画产业环境中尤其对占绝对比重的电视动画

而言,创作者们挖掘、提炼、升华民族文化符号、特色、内涵上的能力还相当有限,即使有好的创意,也未必有条件将其构造、延伸为动辄上百集的长篇故事,最后很可能造成对文化资源生硬的表面化处理。

所谓的“本土文化资源”,既包括显而易见的、具有文化特色的服饰、发型、道具、场景等,还有本地的历史、文化内涵。“寓教于乐”的最高境界不是直接告诉观众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文化内涵是什么,而是启迪观众发问、思考。美国动画一直被当做“寓教于乐”的典范被研究,在其成功的作品中,并没有刻意凸显美国的文化传统、符号、内涵,但会散见于整个系列作品中,不时给观众以新的思考。比如《猫和老鼠》中《小孤儿》一集,就设定了感恩节这个社会情境,这一集中有2/3的内容都是在表现Jerry为了让小孤儿吃饱,阴差阳错地受到了很多捉弄,而他与Tom的争斗只占到了1/3的内容,故事主线发生偏移,这与以往的剧情设置是有差别的。究其原因,是为了突出感恩节这一特定的社会情境,是为了感谢印第安人,展现他们的习俗。通过这一社会情境的引入,引导教育儿童学会感恩,培养他们的善良和爱心,同时让他们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在娱乐中实现教育目的。

在当前国产动画的创作环境下,河南省电视动画产业要想获得较好发展,必须摒弃前期盲目追求地方特色、随意使用文化资源和传统的做法,真正将本土文化资源的核心、内涵研究透彻,对项目的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充分预估,看二者是否能完美契合,在此基础上再将外部符号与文化内涵、社会情境有机结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2. 回归动画本体

美国、日本作为动画强国,一直以来都被作为国产动画产业研究和借鉴的对象,尤其是他们在创作过程中都重视动画本体,并将之与媒介发展、社会变化相结合,更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美国的电视动画沿袭的是《米老鼠和唐老鸭》《猫和老鼠》的传统,通过情境设定,用幽默、夸张的动作贯穿极富想象力的小桥段,结构紧凑,让人在应接不暇的笑料中极度放松,并且将美国的历史、社会、现实贯穿其中。其电视动画将从美国并不厚重的历史中提炼出的冒险精神、自我成长、英雄主义等文化内涵反复强化,通过不断反叛、否定自己来获得重生,从而彰显美国的价值观。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美国又显示出其超乎寻常的吸纳、转化能力,将世界各国的文化资源拿来为其所用,但无论表

象如何,其深层次内涵都是贯穿始终的。而日本的电视动画将结构完整的故事、华丽的动作、夸张的表情、视觉系的形象设计与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忍者精神、武士道传统、怪物文化、流行文化中的萌、腐、宅现象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日本电视动画丰富的类型和独特的风貌。

与日本、美国相比,我国也曾经有过独具特色的动画传统,从中国美术片的开拓者万氏兄弟肇始,到1980年代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时代发挥到极致,水墨画、装饰画、木偶、剪纸、戏曲文化等都曾成为我国动漫艺术的标签。如前文所述,传统、地方文化资源都可以作为电视动画的艺术来源,但必须经过审慎的论证与坚实的研发过程,才可能形成较好的艺术效果。而且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我国的动画曾经有过辉煌时期,但是当时的动画艺术还未产业化,且在观众的动漫观影经验中尤以日、美为主,价值观、审美观极度多元,观众对国产动画作品的要求更高,因而想再重建昔日的美学和艺术传统,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动画艺术本身,研究动画艺术之所以被观众喜爱的最核心的文化要素:不可遏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动作的延伸、变形,夸张的表情,视觉美感的极致呈现,故事的节奏感,鲜明的主题与情感内涵,以及动人的音乐,只有具备了这些元素,动画艺术才可能真正成为跨越民族、文化疆域的艺术种类。当然,就目前河南省电视动画的制作环境、能力而言,这些要素不可能在一部作品中同时呈现,所以动漫企业在研发阶段必须对项目定位、成本、团队、优势、受众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集中打造某些核心要素,并将之作为衡量作品质量的重要指标。

3. 针对不同渠道进行文化定位,培养跨媒介发展的视野与思维

目前河南省的电视动画产业的媒介意识相对薄弱,电视动画基本仍只针对电视这一单一的媒介平台进行策划和制作,出现在网络平台上的大部分作品,也仅仅是止步于将网络作为低廉的推广和传播平台这种对新媒体最传统的认识上,这已经远远落后于新媒体环境的发展状态。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大大拓宽了动漫的传播媒介,也对动漫艺术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方面韩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一源多用”模式,即“一个创意、跨界产业、多种版本、不同载体”^[3],对好的创意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开发。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韩国近些年的动漫产业尤其是动漫形象和游戏产业才取得了不俗

的成绩。但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对每一种媒介的特性、受众、效果、影响因子进行充分的调研和评估,并据此对原初的创意进行不断的调整和修正,不能固守原有模式不放。就河南省而言,河南省麦草动漫科技有限公司在运作“二兔”这一形象时,就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二兔”最初定位的受众市场是青少年,通过网络、手机等新媒体进行推广营销,“二兔”的基本文化特征是反叛、无厘头、怀旧、幽默,主打80后的文化环境。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市场推广后,发现虽然这个形象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是企业盈利十分微薄。综合各方面条件考虑,该动漫公司推出了“二兔邮包”这一核心衍生品,主打低幼市场,并据此对“二兔”的形象和文化特征进行了重新的修改和定位,以此产品与二兔动画片、漫画结合形成联动机制,并通过微博、微信等平台进行延伸和强化。通过对电视、新媒体、漫画渠道和受众的具体定位,以及对形象、文化内涵进行的针对性调整,“二兔”最终成为了跨媒介发展的动画形象。因此,河南省的电视动画产业决不能固守电视这一单一的传播媒介,必须对新媒体的各种文化、产业现象,尤其是新媒体动画的发展态势保持高度关注。一方面,虽然新媒体动画主要诉诸青少年、成人观众群,其中的许多元素并不适用于电视动画传播,但其中某些文化理念和表现形式仍然能给电视动画以启发,如果能对其做适当的调整和转化,就可能成为电视动画中较为吸引人的、新鲜的元素,在提升作品质量的同时,为其跨媒介发展提供基础和可能性;另一方面,通过扩展媒介视野,电视动画产

业可探索整合媒介资源的途径,使电视动画具有更加多元化的传播途径和方式。同时,企业必须根据实际运营情况,在电视动画、网络动画、漫画的相互转换过程中,针对各种媒介调整项目定位和细节设计,不能期待某一种渠道、某一类产品就可以实现市场的全面繁荣。

可以预测,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电视动画仍然在动漫产业结构占据最重要的比重,且随着电视台、新媒体、影视公司、院线合作的日趋频繁和紧密,制作出观众定位准确、清晰且具有跨平台发展可能性的电视动画作品,并使其进入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流程,是创作者和研究者共同面对的课题。而河南省电视动画产业经历了近6年的快速发展之后,无论是其管理者、创作者还是其运营者都必须正视当前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把握新旧媒介整合的历史机遇,提升质量,打造品牌,使电视动画在整个动漫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以推动河南省电视动画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河南省动漫产业发展报告课题组. 河南省动漫产业发展报告[C]//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报告(2013).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88.
- [2] 盘剑. 中国电视动画发展报告[C]//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报告.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55.
- [3] 陈新梅. AGC 时代的韩国动漫产业[J]. 东岳论丛, 2011(11):116.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4)05-0098-04

郑州航空港航空物流系统的构建分析

仝新顺^{1,2}

- (1. 郑州轻工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2. 航空经济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15)

[摘要]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受机场基础设施、物流系统运营能力和人才支持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因而发展受限,用系统论的方法科学构建郑州航空港物流系统,有助于建设目标的实现。建议从基础层、业务层、管理调控层3个方面,分别构建航空物流网络系统、航空物流生产服务系统、航空物流组织管理和协调系统,同时根据郑州航空港发展环境条件的改善和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从时效性、可靠性、经济性和便捷性4个方面对其不断进行优化,从而真正把郑州航空港打造成国际航空物流中心。

[关键词] 郑州航空港;航空物流;物流系统

[中图分类号] F252.24;F127;V2-9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4.05.020

当前,随着国际竞争形势的改变和速度经济的兴起,“快”成为国际市场竞争的一大特征,从而使航空货运以其快捷、安全等优势得以快速发展。河南省作为内陆大省,不具备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地理环境优势。近年来,河南省抢抓发展航空货运的历史机遇,通过郑州新郑机场航空枢纽建设,带动航空物流业大发展,以航空物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与发展改造,期以临空产业的大发展带动航空大都市的早日实现。郑州航空港外引富士康落户郑州、内建综合保税区通关,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扩建如火如荼。目前,河南省正在利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和完善航空物流系统,打造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和全国对外开放高地。

处于初级阶段的我国物流产业发展迫切需要物流理论的科学指导,以促进物流业的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航空物流作为物流产业的子系统,在我国起步较晚,但随着速度经济的到来,航空物流在社会整体物流系统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是不可替代。航空港是临空产业和航空物流业发展

的集聚区,研究航空港航空物流系统构建理论,指导航空港航空物流业的科学发展,是当前发展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郑州航空港发展现状与战略定位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是我国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是以郑州航空港区(综合保税区)为核心的航空经济体和航空都市区。^[1]根据《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规划(2013—2025)》,到2025年,郑州航空货邮吞吐量达到300万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将成为国际航空货运的大枢纽和国际航空物流中心,成为引领中原经济区发展、服务全国、连通世界的开放高地。

2014年1~8月,郑州航空港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91.8亿元,同比增长9.6%;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53.1亿元,同比增长9.4%;完成货邮吞吐量23.5万吨,同比增长110%,增速在全国大型机场中连续3年保持第一。

[收稿日期] 2014-08-13

[基金项目] 2014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应用对策研究“三重”专项(2014-DC-219);2014年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决策咨询项目(2014D011)

[作者简介] 仝新顺(1963—),男,河南省辉县人,郑州轻工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

但是,按照现有的情况,即使2014年再次超水平完成30万吨货邮吞吐量,对照2025年300万吨货邮吞吐量的发展目标,270万吨的差距仍然很大,其瓶颈在于深受郑州航空港机场货运设施和网络不够完善、航空物流系统的生产运营能力较弱、人才服务的支撑水平不强等系统因素的制约。根据系统论相关原理,必须构建有效的航空物流系统才能实现郑州航空港成为国际航空物流中心的建设目标。^[1]

二、构建郑州航空物流系统的基本设想

航空物流系统是一个涉及多个不同类型企业组织之间协同工作的结构体系,是由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各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2]航空物流系统是航空物流的综合体,根据白杨等^[3]提出的航空物流三维概念模型,航空物流系统一般由航空物流网络系统(基础层)、航空物流生产服务系统(业务层)、航空物流组织管理和协调系统(管理控制层)组成。其中,物流网络系统是由以航空运输为主的运输线路基础设施、场站基础设施、通讯信息基础设施、仓库基础设施等构成,航空物流生产服务系统主要指航空物流企业的经营行为,物流组织管理和协调系统承担着航空物流业的规划、指导、调控、管理等功能。^[4]

根据国际航空物流中心的功能目标定位和构建中枢辐射式航线网络的要求,郑州航空港要建设成为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和国际综合物流区,就必须加快基于枢纽机场的航空物流系统建设,也就是要积极推进航空物流系统基础层、业务层和管理控制层的建设与发展。

根据航空物流理论和郑州航空港的发展现状,本文围绕航空物流系统的基础层、业务层和管理调控层3个方面,提出加快构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航空物流系统的如下具体建议。

1. 航空物流网络系统建设

物流系统的网络有2个基本要素组成:点和线。其中点是指在物流系统中供流动的商品储存、停留,以进行相关后续作业的场所,而线是指连接物流网络中节点的路线。按照白杨等^[2]提出的航空物流系统的空间结构(见图1),航空物流系统网络系统建设必须围绕场站、航线、储运和信息平台等强化提升。

一是加强场站基础设施、仓库基础设施建设。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立足实际、分步实施

的整体思路,应重点推进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总体规划和航空物流规划的实施;加快新郑国际机场二期工程建设,完善货机停机坪、滑道、仓储场站等物流配套设施,加快建设国际快件集中监管中心、海关和检验检疫监管仓库,引入自动化、智能化仓储设备,实现快件的自动化分拣、拆封、包装等物流服务。

二是加强国际国内货运航线网络建设。完善的航空网络由密集的国内外航线构成。因此,一方面,要推进国际航线开发,加强与南航、国航、深航等航空公司的沟通,积极开展国际航空货运市场需求的考察调研,针对不同企业的需求科学设计货运航线;另一方面,要持续拓展国内航线,开通郑州至上海、广州、深圳、昆明、乌鲁木齐、厦门等城市的货运“空中快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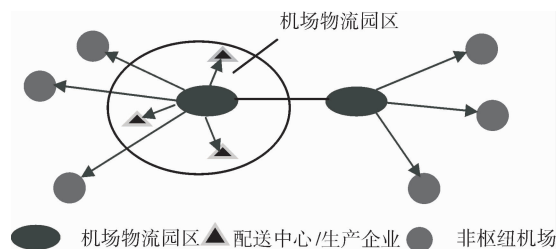


图1 航空物流系统的空间结构

三是加强地面交通物流网络支撑力度。应构建以航空网络为基础、机场为节点、陆路运输为通道的一体化物流网络体系,借助郑州铁路、公路优势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实现货物的全程运输,最终形成航空、公路、铁路高效衔接、互动发展的联运格局。同时,支持和鼓励具备条件的物流企业开行郑州至长三角、环渤海和中西部地区主要城市的卡车航班,进一步扩大郑州航空港货运市场辐射范围。

四是加强通讯信息基础设施与平台建设。航空港作为航空物流的集散点,有大量的物流信息分散在各个企业及不同部门之间。这些信息如得不到有效共享和顺畅流动,就会导致信息孤岛的形成,因此必须通过建设统一的信息平台将分散在海关、“三检”、航空公司、物流公司的信息联成网络,以实现物流信息在企业 and 政府部门之间的无缝交换和有效共享。

2. 航空物流生产服务系统建设

航空物流生产服务系统是由相应的航空物流业务构成。航空物流系统涉及许多组织机构,航空物流业务的顺利开展,离不开航空公司、货运代理、枢纽机场、第三方航空物流企业与相关政府管理部门的支撑和支持。航空物流生产服务系统建设应重视

以下3个方面。

一是加速引进国内外航空物流龙头企业。航空物流企业既是航空货运系统的主体,又是航空物流系统的主导力量。就郑州航空港现状而言,航空货代、航空货运、航空快递构成了航空货运市场的供给方,但缺乏能提供上述服务的真正的航空物流公司。因此,郑州航空港必须加快引聚航空物流龙头企业,深化与美国UPS、联邦快递公司、敦豪航空货运公司等大型企业的战略合作,借鉴全球化管理理念及经营模式,丰富和完善货运枢纽建设和发展。

二是加快本土航空物流企业的转型发展。外资物流企业的引入,肯定会产生“鲶鱼效应”,必然会给本土物流企业带来冲击和挑战。在日趋严峻的航空物流市场竞争中,郑州本土的物流企业应当尽快找准自身差异化发展定位:一方面,有能力和条件的企业要加速向航空物流企业转变;另一方面,基础薄弱的企业可以立足自身独特的业务优势,寻求与其他航空物流企业的供应链合作,最终形成郑州航空港合理的航空物流产业结构。

三是不断提升第三方航空物流企业的服务水平。实现客户最高满意度是郑州航空港物流产业提升竞争力的有力抓手,为此,可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第一,服务个性化。不同的物流需求方有不同的物流服务要求,第三方航空物流企业应根据需求方的需求特征、业务流程、产品特征提供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物流服务,同时要不断强化自身的核心业务,突出所提供物流服务的特色,以强化市场竞争力。第二,服务高效化。实现高效、快捷的运输是航空物流的核心竞争力。郑州航空港物流产业可考虑引入供应链管理理念,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以客户需求为基础的快速反应系统,满足客户对货物运输时效性的需求。第三,拓展增值服务。基于客户需求,郑州航空港物流产业可考虑提供物流金融、物流保险、商务咨询、设施设备租赁等增值服务,最大限度地提升客户满意度。

3. 航空物流组织管理和协调系统建设

郑州航空港航空物流组织管理和协调系统,应主要由物流管理组织机构、产业政策、法规体系、标准化体系、产业发展规划等子系统构成(见图2)。

航空物流业的发展与航空港临空产业发展息息相关,应重点选择临空指向性产业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发挥航空运输综合带动作用,吸引高端要素进航空港,强化创新驱动,促进航空物流产业集聚。应当强调的是,政府在航空物流组织管理和协调系统构

建过程中,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既是物流基础设施的创造者,又是物流产业进步的推动者,同时也是市场运行秩序的维护者,因此,应在产业发展、政策支持、体制建立等方面积极作为。此外,应根据中原经济区规划和郑州航空港建设规划,加强机场周边土地的科学规划和合理利用,恰当部署住宅、学校、医院、金融机构等配套设施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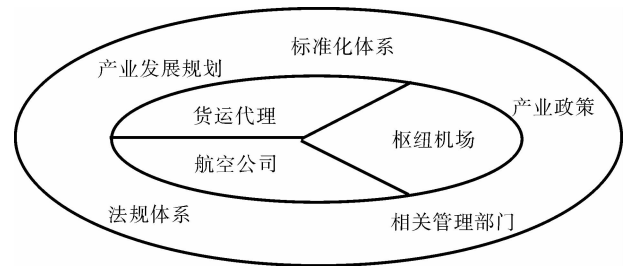


图2 航空物流组织管理和协调系统结构

三、郑州航空港航空物流系统的优化

航空物流系统的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系统环境的改变是持续不断的,因此,随着郑州航空港基础环境条件的改善提升和国际货运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郑州航空港航空物流系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优化。

航空物流系统的竞争优势突出表现在其时效性、可靠性、经济性和便捷性等方面,应持续优化。郑州航空港航空物流系统的优化应从以下4个方向入手。

1. 航空物流系统时效性的优化

航空货运的时效性是商品能在最佳价位与时机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的保障。因此,一方面,要借助多式联运方式提高其时效性。多式联运是一种最优化的联合运输组织方式,这种运作模式手续简便、安全准确,可减少物流环节、缩短运输时间、节约运输费用、提高组织化水平。郑州具有铁路港、公路港和航空港三位一体的交通运输优势,应大力推行“铁公机”陆空多式联运,以提高郑州航空港物流进出港的时效性,满足航空货运市场需求。另一方面,要借助一体化运作提高其时效性。航空物流企业是整合调整航空运输与物流资源的组织者,联邦快递开辟了一体化承运人的先例,未来航空物流企业的一体化运作将是一个大趋势。河南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具有一体化运作的先天条件,可以构建航空物流一体化运作团队,将货代公司、物流企业、航空公司、供货商和客户整合在一个大系统中,从而提高航

空物流的运作效率和效益。

2. 航空物流系统可靠性的优化

安全、可靠、快捷是供货商选择航空货运的根本原因。安全主要表现在航空物流作业的安全性,少有货损问题的发生;可靠则是信息方面的可靠性。我国内地的跨国公司之所以选择香港和韩国仁川机场转运航空货物,看重的就是他们的操作规范和优质服务带来的安全性。因此,郑州机场和相关物流企业,应通过机械化、智能化装卸搬运工具的使用以降低货损率,确保航空物流系统的安全可靠。

3. 航空物流系统经济性的优化

航空物流系统的经济性主要涉及运输、存储、通关、地勤、空运等各方面成本,只有降低上述作业活动的成本费用,才能打造郑州航空港航空物流的竞争优势。

其一,航空港物流园区建设必须靠近机场。靠近机场建设航空物流园区是降低运输成本的捷径。我们调研发现,无论是北京空港物流基地,还是上海浦东航空物流园区建设,都选择在紧贴机场的区域。郑州航空港物流区的规划建设,同样应做到靠近机场区域,以降低运输费用。

其二,利用信息技术建设现代化的航空货运仓库。郑州目前具备标准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的货运仓库极少,不能满足跨国公司供应链运作的需要。因此,航空港物流仓储设施的建设,必须运用EDI信息技术,建设标准化的自动仓库,降低库存管理的人力成本,实现精细化管理。

同时,还应通过对货运代理的运输路径和空运路线的优化,降低运输成本。

4. 航空物流系统便捷性的优化

一要简化通关手续,提高通关效率,降低通关成本。国际航空货运的通关能力已经成为航空物流业发展的关键。郑州航空港新郑综合保税区的建设为

航空货物通关创造了条件,郑州海关启动了“两单一审”通关业务模式,缩短了申报时间,简便了报关手续。

二要探索运作“卡车航班”运输,扩大航空物流辐射范围。我们提出郑州航空港发展陆空联运“卡车航班”,主要是指将一些大、重、多,不适应中型飞机载运的国际货物,借助海关监管卡车进行机场之间的地面运输,以替代和弥补郑州机场航班所无法达到的功能。

三要迅速构建航空港高效的物流信息平台。信息化改造是航空物流系统便捷性的保障。郑州航空港应整合航空公司、货代企业、物流公司、行业协会、郑州海关等信息资源,构建统一的郑州航空港物流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信息共享,提高航空物流运作的便捷性。

总之,随着速度经济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航空货运已逐步取代铁路运输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大动脉。我们相信,在国家政策的引领下,郑州航空港必将以航空物流为依托,进一步释放经济活力,为河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再添强劲动力。

[参 考 文 献]

- [1] 高隆昌. 系统学原理[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 [2] 何明珂. 物流系统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 [3] 白杨,朱金福. 航空物流系统的概念模型与结构分析[J]. 企业经济,2009(1):147.
- [4] 秦岩,马天山,吴群琪. 构建我国航空物流体系的设想[J]. 综合运输,2006(3):41.
- [5] 陈海. 我国航空物流体系的运作模式研究[D].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08.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4)05-0102-06

技术进步、分工演进与产业升级的实证分析

——基于贵州省的统计数据

鲁保林

(贵州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产业升级一般通过技术进步和分工演进两条路径展开,利用贵州省1978—2010年的统计数据实证研究分析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3个重要因素,发现:技术进步、PGDP、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与产业结构层析系数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这表明技术进步、交易效率所引致的分工演进均能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目前,与发达省份相比,贵州省仍面临农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竞争力不强,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的困扰,根本原因是技术落后和分工层次低。鉴于此,建议贵州省尽快制定和完善促进技术引进、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机制,破除阻碍和制约分工扩展的一切顽疾积弊,努力解决制度缺失和体制障碍等突出问题,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关键词] 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分工演进

[中图分类号] F121.3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4.05.021

现代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既有总量的扩张,也伴随着结构的转变,其中的结构转变最为明显地表现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林毅夫在阐述其“新结构经济学”时,明确地指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移的过程。如何进行产业升级已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拟在梳理产业升级动因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贵州省1978—2010年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解析促进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产业升级的含义与动因述评

关于产业升级的定义,学界并未形成明确一致的看法。Gerrifi Gary^[1]认为,产业升级可以分为4个层次:一是在产品层次上的升级,即同类型产品从简单到复杂;二是在经济活动层次上的升级,包括不断提升设计、生产和营销能力;三是在部门内层次上的升级,如从最终环节产品的制造到更高价值产品

的生产等;四是部门间层次上的升级,即从低价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Humphrey等^[2]提出一种以企业为中心的分类方法:一是流程升级,通过重组生产系统或引入高新技术将投入转化为产出;二是产品升级,根据单位增加值转向更高端生产线;三是功能升级,即获得链上新的、更好的功能;四是部门间升级,把从一个特定环节中获得的能力应用于新的领域或转向一个新的全球价值链,也称链升级。刘志彪^[3]认为,产业升级是指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状态的演变,主要包括两种形态的资源配置趋势:一是在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的导向下,资源在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的移动;二是在竞争导向下,资源在同一产业内部从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移动。靖学青^[4]认为,产业升级又称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第一、二、三产业之间,以及各产业内部依次转移、结构从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发展的动态过程。产业升级通过不断的

[收稿日期] 2014-08-13

[基金项目] 贵州省科学技术厅、贵州财经大学软科学联合基金项目(黔科合体R字[2013]LKC2026)

[作者简介] 鲁保林(1982—),男,河南省潢川县人,贵州财经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产业结构变化、主导产业转换,实现区域和城市各种经济资源在各产业之间的合理化配置(即产业结构优化),从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朱卫平等^[5]从动态的视角阐述了产业升级的内涵:“社会生产的低端投入要素价格在产业发展的需求刺激下日趋上涨,资源比较优势随之从土地、劳动力等低端要素发展到资本、技术等高端要素,这种要素禀赋的动态转化促使新兴主导产业不断涌现,并迫使旧主导产业只有通过技术、组织形式、产品升级才能减缓产业衰退,这个周而复始、由低至高的产业素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提升的动态过程。”田洪川等^[6]认为,产业升级包含3个层次:第一层次,产业总产值的增加;第二层次,产业结构由低级部门向高级部门的过渡;第三层次,产业素质的效率化。笔者认为,附加值创造能力的提升是产业升级的本质,产业总产值的增加是结果,技术进步、管理能力、要素投入结构的转变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因。

关于产业升级的动因,学界从收入、技术、分工、制度与人力资本累积等层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柯林·克拉克、西蒙·库兹涅茨、钱纳里等^[7-9]学者从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与需求结构的转变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富有开拓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视角多从技术创新、分工演进与制度变迁切入。笔者认为,制度变迁是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而技术创新和分工演进是其充分条件,所以关于产业升级动因的分析可以沿着“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产业升级”与“分工演进—制度变迁—产业升级”两条路径展开。

(1) 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产业升级。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为解释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变迁提供了理论基础。Wright Gavin^[10]认为,一国产业成功的主要标志是形成了具有生命力和创新机制的高技术产业。学界普遍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源动力^[11-13]。技术进步通过改变产品和要素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进而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一方面,技术创新促使新产品或新服务大量出现,从而带动需求结构和中间投入结构发生变动,最终使产业结构发生适应技术进步要求的变化;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带来了产业和部门间对生产要素需求的差异,导致这些要素在不同产业和部门间的流动,最终促成了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升级。^[14-15]

(2) 分工演进—制度变迁—产业升级。最早对分工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是亚当·斯密。在《国富

论》中,斯密剖析了劳动分工提升生产效率的途径及分工的实现机制。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建立了分工演进的动态理论框架。Allyn Young^[16]揭示了分工和市场容量的扩展所形成的报酬递增的循环累积过程。1950年代以来,以杨小凯等^[17]为代表的学者使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把分工演进内生化的系统描述了分工与专业化在推动社会经济运行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Becker等^[18]认为劳动分工不仅受协调成本的限制,还受到可获得一般知识数量的限制。劳动分工的拓展和深化促成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及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首先,社会分工的水平和模式通过市场容量和供求模式而间接塑造了一个社会的产业结构^[19]。其次,分工的深化造成越来越迂回的生产方式,“迂回生产”所引致的对其他行业分工的诱导性需求,导致了新兴行业和部门的发展与扩张,以及产业结构形态的变化^[16,20]。

二、贵州省产业升级进程与速率测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贵州省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2012年,贵州省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2.9%、40.5%和46.6%,初步形成了“三、二、一”的格局,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化、高级化。产业升级的动态测度方法有多种,本文采用Moore值和产业结构年均变动值来测定贵州省产业升级的速率。

1. Moore 结构变化值^[4,21]

该指标运用空间向量测定法,以向量空间中夹角为基础,将产业共分为 n 个部门,构成一组 n 维向量,把2个时期间两组向量间的夹角,作为表征产业结构变化程度的指标,即Moore结构变化值,其计算公式为:

$$M_t^+ = \sum_{i=1}^n W_{i,t} \times \sum_{i=1}^n W_{i,t+1} \times \left[\left(\sum_{i=1}^n W_{i,t}^2 \right)^{1/2} \times \left(\sum_{i=1}^n W_{i,t+1}^2 \right)^{1/2} \right] \quad \textcircled{1}$$

①式中, M_t^+ 表示Moore结构变化值; $W_{i,t}$ 表示 t 期第 i 产业所占比重, $W_{i,t+1}$ 表示 $t+1$ 期第 i 产业所占比重。整个国民经济可以分为 n 个产业,如果我们将每一个产业当作空间的一个向量,那么这 n 个产业就可以表示为空间的 n 维向量。当某一个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发生变化时,它与其他产业(向量)的夹角就会发生变化。把所有的夹角变化累计起来,就可以得到整个经济系统中各产业的

结构变化情况。我们定义矢量(产业份额)之间变化的总夹角为 θ ,那么就有:

$$\cos\theta = M_i^+$$

其中, $\theta = \arccos(\cos M_i^+)$, θ 越大,表明产业结构变化的速率也越大。

2. 产业结构年均变动值

产业结构年均变动值是反映一定时期内产业结构年均变化的绝对值,其计算式为:

$$K = \left\{ \sum_{i=1}^m [|q_{i1} - q_{i0}|] \right\} / n \quad (2)$$

②式中, K 为产业结构年均变动值; q_{i0} 为基期产业 i 的构成比例; q_{i1} 为报告期产业 i 的构成比例; m 为产业门类数; n 为基期 q_{i0} 到报告期 q_{i1} 的年份数。

为了了解贵州省1978年以来产业升级的进程与速率,我们利用1978—2012年贵州省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等基础数据,根据上述公式,分别计算了1978—2012年、1978—1990年、1990—2000年、2000—2012年4个时段的三次产业结构 Moore 值、向量夹角及其年均变化值、产业结构年均变动值,具体结果见表1。

表1 贵州省三次产业结构变化速率

时间段	Moore 值	向量夹角/度	向量夹角年均变化值/度	产业结构年均变动值/%
1978—2012	0.78	38.90	1.14	1.75
1978—1990	0.99	8.84	0.74	1.28
1990—2000	0.96	15.54	1.55	2.43
2000—2012	0.96	16.53	1.38	2.22

注:资料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贵州统计年鉴》。

表1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的1978—2012年间,贵州省三次产业结构的年均变动值为1.75%,向量夹角平均变化值为1.14。其中,1990—2000年的产业结构变动速率最大,为2.43%,高于1978—2012年间的平均值,几乎是1980年代产业变动率的2倍。而进入21世纪后,产业结构变化速度虽然较前期有所下降,但仍然很快。我们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显示,2007—2012年贵州省产业结构的变动率仅为0.98%,较前期有大幅下降,这表明贵州省各产业可变动的范围越来越小,产业结构日趋合理。

三、其于贵州省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1. 计量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技术进步和分工演进对贵州省产业结

构高级化的影响程度,本文选取技术进步、人均GDP(PGDP)、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比3个因素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考察,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log W = \beta_0 + \beta_1 \log TP + \beta_2 \log PGDP + \beta_3 \log NINV + \mu_1 \quad (3)$$

其中, W 为产业结构层次系数, TP 为技术进步指标, $NINV$ 为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β_1 、 β_2 、 β_3 分别为技术进步、PGDP、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变动弹性, μ_1 为误差项。

(1) 产业升级指标的测定

衡量产业升级的方法有多种,国外关于产业升级的测度方法比较完备,如霍夫曼系数、钱纳里标准结构方法等,但是这些方法需要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口径统一的高质量数据来支持,目前中国产业升级的数据并不能支持这些统计方法。中国学者测度产业升级主要是采用指标法:用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产业升级水平,用非农化水平来表示产业升级水平,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来定量测度和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另外,还有从产业分类角度出发,赋予第一、二、三产业不同的权重,然后乘以各自的比重水平加权后为产业升级指标;也可以用构建产业升级指标体系来衡量产业升级,如程如轩^[22]认为有3级指标来衡量产业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变动、就业结构变动和产业部门贡献率等。这些指标有的比较简单,如第三产业占比和非农化水平;有的为人为确定的权重系数,如产业结构层次法。周昌林等^[23]用各产业水平值和各产业产值在GDP的比重乘积之和来表示。产业水平值用产业中的劳动生产率来表示,在模型中用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乘以各自在GDP的比重加权后来表示^[24]。这里采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来反映贵州省产业升级的状况。设某区域有 n 个产业($i, j = 1, 2, \dots, n; j \leq i$),将这些产业根据层次等级由高到低排列,计算出各行业的增加值占比 $q(j)$,则该区域产业结构层次系数为: $W = \sum_{i=1}^n \sum_{j=1}^i q(j)$, W 值越大,表明该区域结构层次系数越大,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如图1所示,1978—2012年贵州省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整体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2004年以来上升势头明显,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与全国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逐步接近。

(2) 技术进步(TP)

学界通常使用全要素生产率等变量来表征技术

进步。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公式,我们使用白仲林等^[25]测算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所使用的方法。根据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的假定,在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把全要素生产率定义为 $TFP_t = Y_t / (K_t^{\alpha_K} L_t^{\alpha_L})$, 其中, TFP_t 表示 t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 Y_t 表示 t 年的产出, K_t 和 L_t 分别表示 t 年的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 α_K 和 α_L 表示第 t 年资本 K_t 和劳动 L_t 的产出弹性。贵州省 α_K 和 α_L 的估计值,我们直接使用白仲林等估算的数字 0.874 和 0.126。资本存量数据来自方行明^[26]的研究,劳动投入数据来自历年《贵州统计年鉴》。

(3) 分工水平

克鲁德曼提出了区域分工指数,通过考察区域间的产业结构相似度来说明区域间的分工水平。梁琦运用区域分工指数计算了我国六大区域间的分工差异。但是,区域间产业结构是否具有同构性只是复杂分工体系中的一个层面^[27],我们所要说明的分工问题包括企业内、企业间、行业间、产业间、区域间等多个层面,是一个难以量度的综合指标体系,在现有统计体系中,还没有一个能够直接测度分工水平的指标。不过,交易效率是影响分工水平演进的决定性变量,也是影响不同层面分工水平的关键因素,因此,交易效率能够比较全面而准确地说明分工的整体发展水平。交易效率的提升取决于交易技术的改进和交易制度的创新。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和现有统计体系的局限,我们用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NINV)来测度交易制度。计算这项数据所用的贵州省常住人口、国有固定资

产投资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均来自历年《贵州统计年鉴》。

另外,按照斯密的观点,分工是由人类本性中互通有无的交换倾向引起的,分工扩展受市场广狭限制。也就是说,分工的深化取决于市场范围和市场需求的大小。“既然交换的力量引发了分工,那么交换的力量,换言之,市场的范围将会限制分工的程度。”^[28]市场容量的扩大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分工经济水平的提升,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加入 PGDP 变量,以反映分工发展的程度和深度。GDP 数据来自历年《贵州统计年鉴》。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见表 2。

2. 实证检验和结果说明

宏观经济数据大多数是不平稳的,表现为随机游走,而传统的 OLS 模型的前提是解释变量必须是非随机变量。如果一个变量遵循随机游动,那么传统的 OLS 由于变量本身的随机性而会导致错误的回归结果。由于本文涉及到时间序列问题,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需要对方程进行协整分析。在此之前,我们先对模型的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存在单位根,则变量序列为非平稳序列,否则为平稳序列。表 3、4 显示, $\log W$ 、 $\log TP$ 、 $\log NINV$ 、 $\log PR$ 、 $\log PGDP$ 的原序列为非平稳序列,经过一次差分后变为平稳序列,它们均为一阶单整序列,记为 $\log W \sim I(1)$ 、 $\log TP \sim I(1)$ 、 $\log NINV \sim I(1)$ 、 $\log PGDP \sim I(1)$,因此可以使用协整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和分析,见表 3 和表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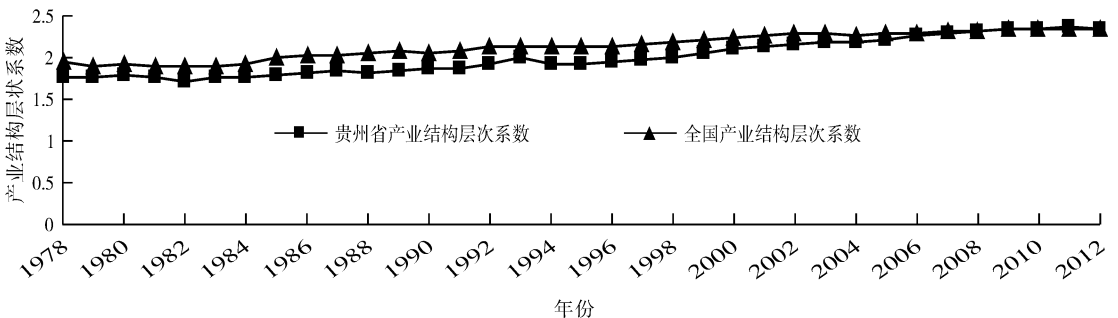


图 1 1978—2012 年贵州省和全国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变化情况

表 2 主要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值

变量	观测数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备注
$\log NINV$	33	-1.1451	-0.6323	-2.2092	0.3523	对数值,比重
$\log PGDP$	33	7.2195	9.4901	5.1564	1.2704	对数值
$\log TP$	33	1.1072	1.7613	0.0319	0.5367	对数值
$\log W$	33	0.6791	0.8507	0.5382	0.0998	对数值

表3 ADF 单位根检验

变量	检验形式 (C, T, P)	t 值	P 值	平稳性
logW	(C, N, 0)	0.6832	0.9898	不平稳
D(logW, 1)	(C, N, 0)	-5.3558	0.0001	平稳
logTP	(C, N, 1)	-1.6010	0.4701	不平稳
D(logTP, 1)	(C, N, 0)	-3.3866	0.0193	平稳
logPGDP	(C, N, 1)	0.8590	0.9935	不平稳
D(logPGDP, 1)	(C, N, 0)	-3.2962	0.0238	平稳
logNINV	(C, N, 0)	-3.5706	0.0123	不平稳
D(logNINV, 1)	(C, N, 0)	-4.5320	0.0011	平稳

表4 Johansen 协整检验

零假设	特征值	迹统计量	5% 临界值
None *	0.6292	49.3333	47.8561
At most 1	0.3284	18.5753	29.7971
At most 2	0.1461	6.2347	15.4947
At most 3	0.0423	1.3398	3.8415

注: D(·, 1)表示一阶差分;检验形式中的C和T表示常数项和趋势项,P表示所采用的滞后阶数(由AIC准则确定),N表示检验方程中此处对应项不存在。

本文采用Johansen特征根检验的方法对③式进行协整检验、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上,logW、logTP、logNINV、logP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使用变量logW对logTP、logNINV、logPGDP进行回归,得到回归方程:

$$\log W = -0.16 + 0.038 \log NINV + 0.125 \log PGDP + 0.010 \log TP$$

其中,t值为-3.85,R²为0.98

检验结果表明,技术进步、PGDP、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与产业结构层次系数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1)logNINV与logW正相关。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每上升1%,产业结构层次系数上升0.038%。非国有投资的增加促进了所有制结构的改善和整个经济效率的提高,使得各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更为充分,资源在产业行业之间的流动加快,产业结构更为协调。(2)logTP与logW正相关。全要素生产率每增加1%,产业结构层次系数上升0.01%。技术创新促使新产品和新服务大量出现以及产品档次上升,从而带动需求结构和中间投入结构发生变动,最终优化升级产业结构。(3)logPGDP与logW正相关。PGDP每上升1%,产业结构层次系数上升0.125%。PGDP的增加改善了人们的收入结构和需求结构,从而对产品的消费越来越依赖市场,而需求总量的增长引起生产要素

结构的变化进而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个人的消费结构不断发生变化。一般而言,消费结构从生存型为主向享受、发展型为主演变,日常消费品向耐用消费品演变。在此演变过程中,教育、医疗保健、培训、服务等消费趋于增加。面对中间产品需求和最终产品需求的变化引起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的变化,整个社会产品生产趋向耐用化、高质化与高附加值。在产品供求结构的演变中,产业结构升级趋于高级化。^[29]

四、结论性述评与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影响产业结构3个方面的因素——全要素生产率、PGDP以及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结果表明:技术进步、交易效率所引致的分工演进均能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目前,与发达省份相比,贵州省仍面临农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竞争力不强,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导致贵州省产业结构调整缓慢的根本原因是技术落后和分工层次低,具体表现为自主创新水平不足,产业链条短、行业间波及联动效应弱,市场竞争程度不高、市场范围狭窄等。鉴于此,建议贵州省尽快制定和完善促进技术引进、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体制机制,破除阻碍和制约分工扩展的一切顽疾积弊,努力解决制度缺失和体制障碍等突出问题。具体来说,应着力6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促进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的合作,建立“产—学—研”互动机制,努力促进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二是支持优势的传统企业做大做强;三是鼓励创业,尤其是吸引大学生创业;四是改善交通落后的状况;五是推进服务性政府建设,不断降低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成本;六是打破区域间的行政壁垒,降低要素流动成本,完善市场体系,改善竞争环境,实现交易效率的改善;七是鼓励地方政府加快招商引资的步伐。

[参 考 文 献]

- [1] Gary Gereffi.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9(1):37.
- [2] Humphrey John, Schmitz Hubert. 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 [J]. Regional Studies, 2002(36):1017.
- [3] 刘志彪. 产业升级的发展效应及其动因分析[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2):3.

- [4] 靖学青. 上海产业升级测度及评析[J]. 上海经济研究, 2008(6):53.
- [5] 朱卫平, 陈林. 产业升级的内涵与模式研究——以广东产业升级为例[J]. 经济学家, 2011(2):61.
- [6] 田洪川, 石美遐. 制造业产业升级对中国就业数量的影响研究[J]. 经济评论, 2013(5):69.
- [7] Colin Clark.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M]. London: Macmillan Co Ltd, 1940.
- [8] [美] 西蒙·库兹涅茨. 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M]. 常勋,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9] 钱纳里 H. 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 吴奇,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 [10] Wright Gavin.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uccess: 1879-1940[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0(9):651.
- [11] [美] 迈克尔·波特. 竞争优势[M]. 陈小悦,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 [12] [日] 筱原三代平, 徐有光. 产业结构与产业组织[J]. 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 1994(7):10.
- [13] 姜泽华, 白艳. 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与影响因素分析[J]. 当代经济研究, 2006(10):53.
- [14] 王边莲. 云南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关系分析及预测[D]. 昆明: 云南财经大学, 2012.
- [15] 谭黎阳. 论科技进步对产业结构变迁的作用[J]. 产业经济研究, 2002(1):52.
- [16] Allyn A Young.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28(152):527.
- [17] 杨小凯, 黄有光.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 [18] Becker, Gary S Murphy, Kevin M. The division of labor, coordination costs, and knowledge[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 107(4):1137.
- [19] 邓丽妹. 基于分工和报酬递增的经济增长理论演进[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2(4):75.
- [20] 郑凯捷. 分工与产业结构发展[D]. 上海: 复旦大学, 2006.
- [21] 刘志彪, 安同良. 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J]. 南京社会科学, 2002(1):1.
- [22] 程如轩, 卢二坡.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统计指标体系初探[J]. 中国统计, 2001(7):18.
- [23] 周昌林, 魏建良. 产业结构水平测度模型与实证分析[J]. 上海经济研究, 2007(6):15.
- [24] 李逢春. 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升级效应——来自中国省际面板的实证研[J]. 国际贸易问题, 2012(6):128.
- [25] 白仲林, 尹长斌. 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动态行为的经验研究[J].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4):119.
- [26] 方行明. 中国西部工业发展报告 2012[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162.
- [27] 孙佳. 分工、交易效率与技术进步[J]. 社会科学战线, 2012(10):61.
- [28] [英] 亚当·斯密. 国富论[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18.
- [29] 黄文正. 人力资本积累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J]. 经济问题探索, 2011(3):27.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4)05-0108-05

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组织结构创新设计

袁博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以高端的电子信息和科研服务为主的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占有资源成本低、附加值高等特点,已成为生产性服务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但传统的生产性服务组织,结构僵硬,灵活性差,管理水平落后,运行效率低下,不能适应现代经济活动的需要。应通过组织结构创新设计,发展无缝嵌入式事业部制组织结构、分散式扁平化组织结构和自适应式管理组织结构,促进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企业良性、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组织结构创新;无缝嵌入;分散式扁平化组织结构;自适应式管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5.022

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为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服务的行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 Harry I. Greenfield^[1]在研究服务业及其分类时提出的。Coffer^[2]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不是直接用来消费的,也不是直接可以产生效用的,它是一种中间投入而非最终产出,从中扮演中间角色,用来生产其他的产品或服务。

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是以信息化、智能化为载体,无缝嵌入传统制造业产业价值链的新型服务业。Granovetter^[3]将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分成两大类:结构嵌入型和关系嵌入型。

结构嵌入型生产性服务业是指那些在功能上直接嵌入生产过程,但又脱离生产过程而独立市场化营运的服务模块。结构嵌入型生产性服务业是最终产品或服务得以形成必不可少的投入,如信息服务、科研技术服务、物流服务、非银行金融服务、制造维修服务、融资租赁服务、总集成等。

关系嵌入型生产性服务业是指那些与商品形成全过程有一定的外部相关性且独立市场化经营的服务模块。这些服务包括与新生产结构相适应的人力资本形成所需要的服务,以及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

造业形成的整个生产体系进行空间上协调和规制所需要的服务,如教育服务、商务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电子商务服务、生产资料市场服务等。

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发展快速,作为服务业的核心增长点,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国家经济转型和结构性调整所重点扶持和发展的产业。芮明杰^[4]提出,现阶段要加快进行生产性服务业的内部结构性调整,重点是大力发展以高端电子信息和科研服务为主的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达到产业转型升级的目的。而在整体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企业的组织管理体系创新也应同步进行,以适应产业未来的发展。郭东海^[5]认为,生产性服务企业面对一系列全新的挑战,只有通过不断创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而创新管理能力则是关系着企业生存发展潜能的关键问题。

在企业管理体系中,组织结构是企业战略制定、框架设计、流程运转等活动的结构基础和支持,对企业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企业进行管理改革的必要构成。鉴于目前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组织结构存在一些问题,本文拟从组织结构创新的角度提出三种新型组织结构模式,以期有助于企业管理革新,实现跨越式发展。

[收稿日期] 2014-07-16

[作者简介] 袁博(1985—),男,河南省郑州市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工业经济。

一、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组织结构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组织结构的发展主要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职能型组织结构为主。在这一阶段,生产性服务业都是以部门或子公司的形态存在于生产企业内部,采用简单的职能型组织结构,便于企业集中管理,从而能更有效地执行管理层决策。第二阶段是多元化组织结构类型的出现。在这一阶段,随着制造业的生产过程逐渐细化,生产性服务业成为相对独立部门,逐渐脱离生产企业本身,成为单独企业,由于各个企业在主营业务、规模等方面差别较大,企业各自采用适合自身发展的组织结构体系,出现了多种组织结构并存的局面。第三阶段是以事业部制组织结构为主。在这一阶段,企业规模逐步发展壮大,纷纷采用与生产企业一致的事业部制组织结构,以此完善管理体系,提高管理水平,这一阶段延续至今。

事业部制组织结构最早起源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是由通用汽车公司总裁艾尔弗雷德·斯隆于1924年提出,故被称为“斯隆模型”,又称“联邦分权化”,是一种高度(层)集权下的分权管理体制^[6]。

事业部制组织结构有许多优点,如各事业部自主经营,责任明确;便于组织专业化生产,形成经济规模;权力下放,有利于最高领导层摆脱日常行政事务和直接管理具体经营工作的繁杂事务;各事业部之间可以有比较、有竞争,由此增强企业活力,促进企业的全面发展;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良好的适应性等。事业部制使用范围广泛,现今90%以上制造业企业均采用这一组织结构。但从近年来的发展状况来看,事业部制组织结构的缺陷愈来愈明显,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其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组织结构僵硬,灵活性较差。事业部制组织结构中的各事业部功能完备,分工明确,管理模式稳固,不会轻易进行改动,有较高的稳定性。但同时,这种结构略显僵硬,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受制造业的影响较大,事业部制在面对产业发展有较大调整和转变的情况下反应滞后,无法及时进行调整和改进,导致企业发展落后。

二是组织体制封闭,与生产企业衔接不紧。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和辅助环节,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密切,而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相对独立,管理体系封闭,加之没有建立与被服务

的生产企业之间的管理对接机制,导致与制造业企业衔接度低、沟通不畅、协调性差等问题的出现。

三是管理方式落后,部门间矛盾频现。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大多是从传统的生产企业中分离出来的,仍然沿用生产企业的事业部制组织结构的管理体系,而由于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属于服务业,不是制造业,并不完全适合这种组织结构,因而管理效率低下,部门间矛盾频现,导致企业效益每况愈下。

可见,现阶段的组织结构体系已经严重降低了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管理效率,进而影响到整个行业的发展和壮大。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组织结构进行审视和评估,创新设计更加适合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

二、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组织结构创新设计

本文从组织结构设计和管理机制两方面提出3种适合于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发展的组织结构管理体系。

1. 无缝嵌入式事业部制组织结构

嵌入式系统的概念最早来自于计算机技术领域,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对嵌入式系统的定义是:“用于监视、控制或者辅助操作机器和设备的装置”。嵌入式系统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自动化生产和计算机软件服务领域。嵌入式系统可以有效地提高运算和处理能力,与主系统自由分离,灵活性非常高,并且可同时在多个系统中进行切换,是目前自动化生产主要采用的辅助系统。

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与生产企业的关系类似于嵌入式系统与主系统的关系,这种互动发展的模式可以使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更好地与生产企业母体进行对接,消除彼此之间的差异和磨合,实现高效生产。而对于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来说,这种对接仅仅是初级层次的简单嵌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与生产企业母体价值链对接的问题,因此需要更高层次的对接形式——无缝嵌入式对接。无缝嵌入式对接是指各个单位在领导、管理、后勤、通讯等部门的管理体系和技术支撑完全一样。当由一个单位指挥其他单位时,如同指挥自己的单位,从组织结构上看,如同2个单位已无缝对接成1个单位。无缝嵌入式对接要求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与生产企业母体的管理体系要完全一致,没有任何阻碍

地进行对接,以实现理想状态下的嵌入。

要实现无缝嵌入式对接,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可在原有事业部制组织结构的基础上成立一个无缝嵌入对接部门,对接部门主要负责对其内部1个或多个与生产企业母体进行无缝对接的事业部进行相应的组织结构调整,并进行对接后的协调、监管、后勤等后期保障工作,最终达到与生产企业母体的组织结构设置完全一致,其结构模式具体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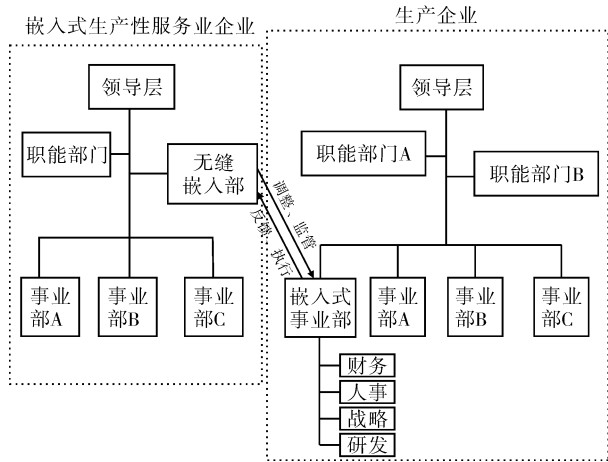


图1 无缝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与生产企业对接管理体系

如图1所示,完成组织结构统一之后,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将调整后的事业部并入生产企业母体,在其管理下,正式成为生产企业母体的一个事业部,与其他事业部协作完成生产过程。在嵌入式事业部内部仍然采用独立的职能制组织结构,此时,事业部无缝嵌入完成,嵌入式事业部从组织结构上看已经成为生产企业母体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在所有权上仍然归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嵌入式事业部即时向无缝对接部反馈运行状况并执行下达指令。

无缝嵌入式事业部制组织结构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原有的事业部制的基础上新成立无缝嵌入对接部门,专门用于调整、监管嵌入式事业部的运作,使其与将要嵌入的生产企业母体在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上保持一致。对于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来说,可以做好在嵌入到生产企业母体之前的准备工作,以期让嵌入式事业部更快地融入到生产企业母体的管理和运行当中。

二是与以往生产性服务业同制造业的合作关系不同,无缝嵌入式管理体系是将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一个事业部整体无缝嵌入到生产企业当

中,成为其中一部分,与生产企业母体融为一体共同发展。这种机制可以最大程度地消除嵌入式事业部与被服务企业之间的衔接障碍,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契合度,大幅度地提高双方合作的效率和默契程度,使生产制造过程更加平稳、顺畅。

2. 分散式扁平化组织结构

组织扁平化的理论起源于新制度经济学,1937年科斯^[7]最早提出这一概念。1990年哈默等^[8]提出革命性企业再造概念,即通过对公司的流程、组织结构、文化等进行彻底的急剧的重塑,以达到绩效的飞跃。他们认为,企业再造就是从根本上打破传统的、建立在纵向劳动分工和横向职能分工的运作体系,以新设计和重建的作业程序(流程)作为企业组织结构基础的组织形式。

组织扁平化管理是企业为了解决层级组织结构在现代环境下面临的难题而实施的一种管理模式。当企业规模扩大时,原有的解决方法是增加管理层次,而现在的有效方法是增加管理幅度。当管理层次减少而管理幅度增加时,金字塔状的组织结构就被“压缩”成扁平状的组织形式。

目前扁平化管理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企业管理当中,特别是以事业部制组织结构为主的制造业领域。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同样是以事业部制为主要的组织结构,但由于其行业的特殊形态即要与制造业保持即时互动发展的模式,使得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需要兼顾自身与合作生产企业的发展状况。而分散式扁平化管理体系正是解决目前困境的有效途径。

分散式扁平化管理体系是把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结构分散化,将相应的事业部嵌入到与之合作的生产企业当中,实现无缝对接,保留事业部的所有权和监管权,同时,减少组织结构管理层级,增加管理幅度,提高管理效率(见图2)。

如图2所示,分散式扁平化组织结构分为2个层级:一是领导层,包括公司领导和下设的各职能部门,负责公司的整体战略规划、信息发布、人事任免等事务。领导层领导各事业部和职能部门,各职能部门负责企业运行的后勤保障工作。二是分散事业部层,包括企业内部事业部和嵌入在各个生产企业的事业部,由于这些事业部都已纳入各自被服务企业体系当中且比较分散,嵌入式事业部只保留所有权,日常运行全部由所在生产企业管理,可以指定由设立的在管理层和各嵌入式事业部之间的无缝嵌入对接部进行监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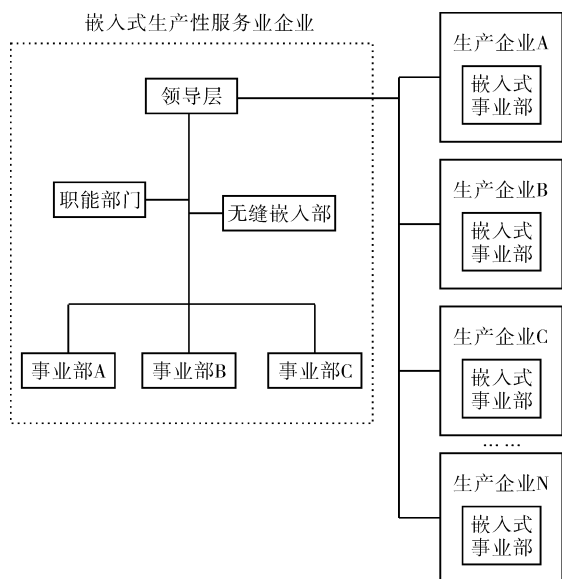


图2 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
分散式扁平化组织结构

分散式扁平化管理体系有以下2个特点。

一是采用分散集中式管理方式,效率高。各嵌入式事业部归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所有,嵌入式事业部所在生产企业对其进行直接管理,包括下达工作计划、跟进工作进度、绩效考核、人事任免等。各嵌入式事业部内部职能部门负责日常运行辅助工作,由无缝嵌入对接部进行监管。分散集中式管理方式既保留了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组织结构的完整性,又充分放权,由各个分散嵌入式事业部所在的生产企业进行直接管理,保证了部门间的沟通,减少了管理阻力,提高了管理效率。

二是管理层级减少。传统的扁平化管理层结构最少需要2层,即领导层和事业部层。而分散式扁平化管理体系下的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由于部分事业部被嵌入到生产企业中由其管理,企业的管理负担和压力大大减轻。而在完全分散式扁平化管理体系下,由于所有事业部都脱离领导层嵌入到对应的生产企业当中,此时企业内部没有进行直接领导的事业部,实际管理层级只有一层即领导层,企业的领导层得以从日常繁琐的层级管理中完全释放出来,成为纯粹的决策机构,这样,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就达到了扁平化管理的理想状态,企业组织结构也实现了最优化。

3. 自适应式管理机制

生产性服务业是一种中间服务而非终端产业,它把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入到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所产出的是无形的对被服务企业的价值链结

构和生产流程的优化。随着现代制造业生产过程的日趋复杂,生产性服务业广泛地参与到生产的过程中,从原先的辅助性角色逐渐变为制造业价值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发展必须依附于生产企业的发展。而作为生产性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这种依赖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因此,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必须与制造业实现同步发展,才能成为制造业环节中重要的一部分,更好地为制造业服务。

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组织结构上与生产企业母体实现完全无缝对接之后,还需要相应的管理机制作为维持新型组织结构体系运行的保障,以保证生产企业的制造流程可持续运行。自适应式管理机制是针对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而提出的新型组织结构管理机制,使嵌入式事业部能根据被服务企业的发展状态即时调整自身的发展状态,以形成自动适应组织结构体系的管理机制。自适应式管理组织按适应程度主要分为3种形态。

(1)初级形态。在这一形态是嵌入式事业部进入生产企业母体组织结构的初期阶段,组织结构间的协调和磨合度不足,生产性服务业仍然依附于制造业,完全根据生产企业的发展战略进行被动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生产企业母体作为引领者,嵌入式事业部作为追随者,战略调整是自上而下的单方向递进式调整。这样,嵌入式事业部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完全充当了辅助者和附属物,对组织战略的调整反应迟钝,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运行效率低下。

(2)中级形态。随着组织结构之间的协调和磨合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嵌入式事业部的运行水平和效率的不断提升,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边界逐渐被消除,嵌入式事业部与生产企业母体完全融合,嵌入式事业部已经无缝渗透到了生产流程中的相应环节,对组织战略的调整反应迅速,可即时进行相应调整。在这一阶段,嵌入式事业部与其生产企业母体实现同步发展,已成为组织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组织运行效率显著提高。

(3)高级形态。这一形态是嵌入式事业部发展的成熟阶段,也是最终阶段,此时嵌入式事业部与生产企业母体之间表现为互相依赖、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的关系。嵌入式事业部不仅可以与被服务企业同步发展,自身的战略调整还可以反向引导生产企业母体进行相应的调整,产生对制造业的“外溢生产效应”和促使生产企业母体进行调整的“外溢改革

效应”,与被服务企业互动发展,以实现企业的最终发展目标,具体模式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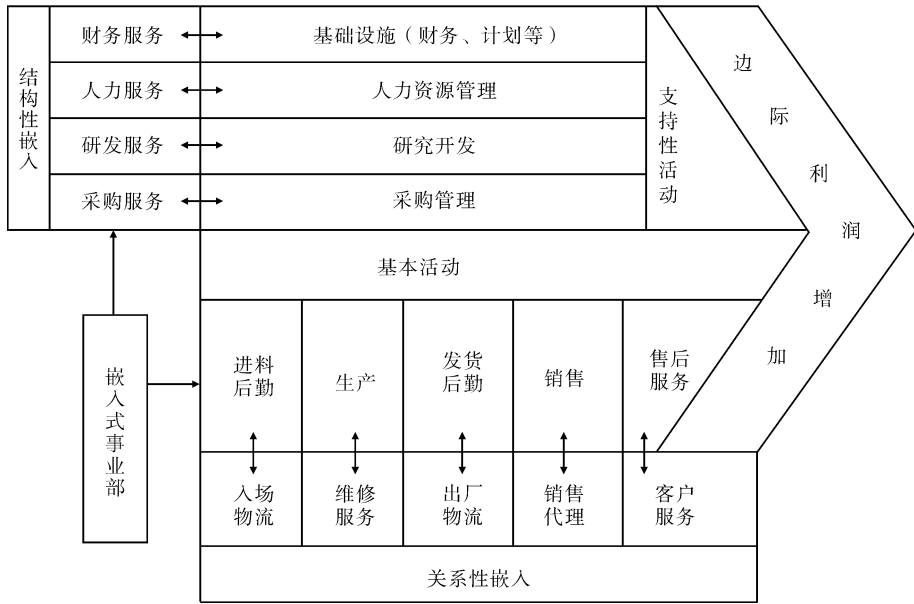


图3 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与生产企业互动发展模式

三、结论

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优化现有制造业价值链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近年来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同时,由于组织管理体系发展相对滞后,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组织结构上还存在诸多问题,长期没有找到适合其发展的组织结构体系作为支撑,导致企业规模呈粗放式增长,发展质量相对较低。本文提出的3种组织结构创新模式是对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组织结构创新的一次探索,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一是为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组织结构变革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有效的方法途径,从而加快内部的变革,帮助企业完成产业升级,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对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组织结构体系进行改造和创新,完善其内部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有助于企业形成更加科学、合理、完备的现代企业组织管理体系。三是大力推进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发展,为其发展和壮大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体系,有助于提升企业和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四是推进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组织结构调整,有利于我国产业转型和升级,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对促进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组织结构变革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其中服务企业与被服务企业的

协调沟通、克服变革的阻力和困难等问题有待进一步做深入的研究,这需要对可行性和操作性进行具体的分析,以使企业真正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

[参 考 文 献]

[1] Harry I Greenfield. Manpower and the Growth of Producer Services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2] Coffey J. The geographies of producer services[J]. Urban Geography, 2000(2):170.

[3] Granovetter, Mark.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3):481.

[4] 芮明杰. 大力发展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J]. 上海国资, 2012(4):33.

[5] 郭东海.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创新管理研究[D]. 天津:天津大学, 2011.

[6] Robert E Hoskisson, Charles W L Hill, Hicheon Kim. The multidivisional structure: organizational fossil or source of valu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3(2):269.

[7] Ronald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22-37.

[8] Michael Hammer, James Champy. Reengineering the Corporation: a Manifesto for Business Revolution [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4.